

京華風雲錄【卷一】

北京宰相

京夫子 著



聯華

《京华风云录》卷一

北京宰相

京夫子 著

联经出版

目录

- 序 历史造就的旷代美男
- 第一章 红色特工总司令
- 第二章 秦皇再世定都何处
- 第三章 傅冬菊谒见周老师
- 第四章 傅作义朝圣西柏坡
- 第五章 周恩来重塑君臣关系
- 第六章 江青求助周副主席
- 第七章 维维啊，你在哪里？
- 第八章 陪都金孔雀
- 第九章 北平赶考
- 第十章 陕北来的老棉袄
- 第十一章 香山露峥嵘
- 第十二章 中南海楹联
- 第十三章 周恩来留置和谈代表
- 第十四章 国号之争
- 第十五章 重用高岗是着妙棋
- 第十六章 中央政府周委员
- 第十七章 西花厅宴请南归女
- 第十八章 发落贺子贞上海备冷宫
- 第十九章 妙解「空前绝后」
- 第二十章 开国大典惊魂
- 第二十一章 张闻天蒙羞周恩来受辱
- 第二十二章 需要精神自我调节
- 第二十三章 主席，我不是帅才
- 第二十四章 千里谋杀毛泽东——出访失态
- 第二十五章 千里谋杀毛泽东——秘戏孙维世
- 第二十六章 千里谋杀周恩来——智倾莫斯科

- 第二十七章 江青上书陈情
第二十八章 干女儿也说《清宫秘史》
第二十九章 贪恋红尘
第三十章 金日成密访借铁骑
第三十一章 陈赓请缨横扫东南亚
第三十二章 朝鲜事变毛周点将
第三十三章 林彪婉拒挂帅出征
第三十四章 群英聚会中南海
第三十五章 彭德怀临危受命
第三十六章 毛岸英从军
第三十七章 杀子之仇不共天日
第三十八章 周恩来欲做平民总理
第三十九章 救金山护龚澎
第四十章 高岗进京播火种

《京华风云录》共四卷。（卷1）《北京宰相》是写周恩来事，（卷2）《西苑风月》以高岗为主线写建国初期事，（卷3）《夏都志异》写庐山会议彭德怀案，（卷4）《血色京畿》写文革事。

序 历史造就的旷代美男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风云人物之中，周恩来无疑是最富传奇色彩，又具风流魅力的一位了。人称他为历史造就的旷代美男，慕煞过多少红色影星、南北佳丽。更主要的，从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凡二十六年，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亦是中国共产党内唯一身居高位从未下过台的政治不倒翁，并两度出任过国民党政府的高官。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共产党的领导人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上台垮台，大都没有善终。唯周恩来伺奉过所有上述首领，忠心耿耿地熬活了下来，生前盛名，身后殊荣，真正的红运亨通，硕果仅存。

有趣的是，这样一位「风流总理」去世迄今二十年，却仍然「盖棺难定论」。对他的道德人格、政绩操守、历史地位的评估依旧众说纷纭，争论热烈，扑朔迷离……有说他是中国工农红军之父，中共情报特工系统的创始人和操作者；有说他是毛泽东神话破产之后的中共第一完人，新的政治图腾与精神领袖；有说他风流潇洒，知识渊博、能言善辩，智勇双全，时而隐身幕后呼风唤雨时而挺身前台叱咤风云，其韬略远在汪精卫、蒋中正、毛泽东之上；有说他是本世纪杰出的外交家、谈判者，伟大的政治表演艺术家。他通晓英语，能说日语、法语、德语、俄语。但在一切正式场合，只说国语。他的表演颠倒乾坤、倾倒众生，曾使精明的蒋中正糊涂，多疑的毛泽东上当，狡黠的林彪释怀；更曾让马歇尔受骗，尼克松、季辛吉眼花缭乱。

有说他大智若愚，在毛泽东面前俯首贴耳，竭尽忠诚，文革期间不跟毛泽东斗勇，而跟毛泽东斗智，为顾全党和国家的大局忍辱负重，低三下四，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办了不少违心的事，最终能在毛式法西斯疯狂中保护下大批老干部、老将军；有说他大奸似忠，实为毛泽东手下的头号帮凶，文革期间他秉承毛泽东的旨意，掌控着中南海内的生杀大权，是为「中共中央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项目审查小组组长」，「中共中央刘少奇、王光美项目审查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林彪反革命军事政变集团项目清查小组组长」，并先后亲笔签署过逮捕包括高

岗、饶漱石、彭德怀、习仲勋、贺龙、彭真、黄克诚、罗瑞卿、薄一波、陆定一、杨尚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大批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命令……毛泽东利用他，取代了张闻天，逼走了张国焘，放逐了王明，割爱了高岗，斗垮了彭德怀，整死了李立三，谋害了刘少奇，惩戒了邓小平，爆炸了林彪。他则利用毛泽东，保全了他自己。

有人说他先当毛泽东的上级，整肃毛泽东，后当毛泽东的下级，拥戴毛泽东，两种身分都扮演得有理有节，无懈可击，真正的能上能下，能君能臣……最耐人寻味的又正是这毛、周二人之间战友不像战友，主仆不像主仆，同事不像同事的关系。早在三〇年代（一九三二—一九三四）的江西苏区，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书记兼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的顶头上司，曾经代表党中央整肃过毛泽东的地方主义、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三次撤销过毛泽东的红军政委职务，并开除过毛泽东的党籍。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毛泽东终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从周恩来手里夺得军委主席一职，成为了周恩来的上级。之后便一直记恨周恩来，疑惧周恩来，数十年来几欲除掉他而后快。周恩来却低眉敛目、心悦诚服，察言观色，随机应变，软磨硬缠，使出浑身解数，使得毛泽东摆脱不了他，每遇危机还不能不利用他，乃至倚仗他。

可以说，在二十世纪光怪陆离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没有比毛、周二人的关系更复杂、更微妙的了。以毛泽东性格的偏执多疑，忌贤妒能，阴险残忍，反复无常，本该十个周恩来都完蛋了。完全是因为周恩来处事缜密，阴柔圆熟，如履薄冰，竭诚伺奉。令到暴君都无从下手。毛、周二人始终未能撕破一张虚浮不实的面皮，而纠缠到死，奉陪到底了。毛泽东是树，周恩来是藤，藤树相缠，藤死树枯。是为一项特殊的权术奇迹，直令世人叹为观止。

也有人说，周恩来立党为公，一生清廉，含辛茹苦，鞠躬尽瘁，是人民的好总理。如果不是他早八个月死在毛泽东的前头（周去世于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毛去世于同年九月九日），而是他死于毛之后并像邓小平一样长寿，他决不会允许自己的养子李鹏的禄位高过北京

市电业局局长，智商平庸的李鹏也做梦都梦不到会平步青云鸡犬升天为「国家总理」。周恩来也不会拒绝与和平请愿的大学生们谈判——他曾于文革初期在人大大会堂与包围他的红卫兵小将谈判三天三晚终于说服对方撤退，而愚蠢地调动一二十万野战军进北京屠城，发生「六四」惨案。对弹丸之地的国际自由港香港，他会着眼于中国整体经济利益，而跟英国政府谈判出一个一九九七年之后继续维持繁荣自由的两利方案，作为主权回归的过渡，绝不会为收回主权不惜把香港变成死港。他更不会批准贻祸子孙、后患无穷的长江三峡大坝工程上马……且慢！歌功颂德者不应忘记了周恩来是个多面体，是个善玩权力平衡的红色政客。如果他死在毛泽东之后，多活十年八载，他绝不会允许他手下的亲信军人叶剑英等发动宫变，于一个晚上突然逮捕以毛泽东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他会一如既往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作为毛之后党和国家的第一把手，他不会让手中的权力向一边倾斜，而会不偏不倚行中庸之道：既让邓小平复出抓国民经济，行使总理职责，也会让江青当上党的副主席，并尊为「母后」。两派相互制衡，他处于裁决与安抚之高位，才能掌控全局。一派掌权，决非领袖之福。因此，文革中入狱的大批老干部，以及被迫害致死的刘少奇、彭德怀等，则只可能得到某种「政策甄别」，而不是彻底的平反昭雪……；一切均会以维护「领袖形象」、「党的利益」为重。悠悠往事，克己复礼，服从毛泽东思想这个中共赖以安身立命的「现代周礼」。那一来，中国大陆的当代历史就可能另有曲折。最乐观的估计，也会令到后来的改革开放推迟十几二十年，更难想象会发生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一举取消毛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取消毛式人民公社，恢复乡村政制，平反全国冤狱，鼓励私有经济，大力引进外资，开办经济特区，从经济基础上推翻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等一系列大事了。

周恩来是要保全他的忠君名节、死后声誉的。毛泽东不死不倒，周恩来死了也不倒。

多数人这样说。也有人力排众议：以周恩来的威望、学识，及其四十年来屈服于毛泽东封建社会主义帝王淫威积淀下来的反叛意识，

说不定会有惊人之举，对外推行亲西方外交，对内彻底清算毛泽东的罪行（毛氏一九五八年初在批判周恩来右倾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悍然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引发中国有史以来的大饥荒饿死人口五千万一条就足够了），光明正大地做一回「中国的赫鲁晓夫」。争议终归于争议，假设终归是假设。今天，我们站在历史老人的肩头来俯瞰周恩来，描述周恩来，仍然不能不惊讶于周恩来性格的多面性，人格的多重组合。他是一位现代政客，一位革命修道者，一尊红色无量佛。可以说，周恩来的人生哲学是根深柢固的中式传统文化与某些西方人文精神的奇异结合。周恩来身上，折射出了中国儒、道、释三大宗教教义的怪影。在外交场合、谈判席上，他表现出了儒家的忠贞礼义，攻守游刃有余，潇洒风趣；在杀机四伏的党内斗争中，他表现出了道家的坚韧飘逸，阴柔圆融，出手凶狠；在他的文武同僚乃至下属面前，他又表现出了释家的慈眉善眼，温文尔雅，八面玲珑，广结善缘。

周恩来还被誉为汪精卫之后的「中国美男子」。他一生中有多多少少红颜知己？恐怕难以详计。从南开美女张若名，柏林少女陶芬比兰，到中共早期领袖张太雷的美貌遗孀王一知，到左翼女星陈波儿，到「画中人儿」龚澎，「干女儿」兼情人孙维世、周小燕……。「干女儿」最多的时候达三十九名之众。真正的群星灿烂，美女如云。他的发妻邓颖超却其貌不扬，甚至有些丑陋。他倒是模范地遵从了一夫一妻制，从一而终，只是从没有误过与各式美人儿的「邂逅」。揭去圣者的面纱，拂去图腾的光焰，还周恩来以本来面目。读者将在本书了解到周恩来最为风流浪漫、多姿多彩的后半生（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年），以及一幅幅风云诡譎、大开大阖的历史图画。

第一章 红色特工总司令

人类历史常有神来之笔，演出荒诞大剧：某些貌似坚不可摧的强大政权，武装到牙齿的统治机器，往往于数月之间，甚至在一个晚上，便摧枯拉朽，势如崩雪，彻底完蛋。一九九〇年苏联及东欧六个共产党政权的解体是这样，一九四八年冬至一九四九年春的中国内战形势也是这样。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辽沈战役结束。国、共两党血战两年半，东三省落入中共之手。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淮海战役（亦称徐蚌会战）结束，长江以北的中原、华东大地一片红。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战役结束，傅作义将军麾下的六十万国军被切断了经由海上南逃的生路。一月十六日，傅作义的「华北剿总」与中共华北野战军和谈成功，签订城下之盟。一月三十日，傅作义将军与中共代表叶剑英将军于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办理移交手续，宣布北平和平解放，中共解放军即日开进北平城。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南京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引退下野」，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谋求和谈、结束内战。

一月二十一日，随毛泽东驻蹕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周恩来，命令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率领一组精干人员，星夜赶赴北平，接收香山、颐和园及中南海，为党中央机关与首长们乔迁北平打前站。

千古帝都北平，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引领在望。

这一年，周恩来五十一岁，是为中共中央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①。

周恩来自一九二四年夏天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肩负苏俄共产国际的特殊使命，先后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总政治部主任，广州革命政府江东督办；一九二七年四月国民党开始清党，他则潜伏上海领导上海市工人第二次

①总参谋长为彭德怀，此时正专责共军西北战事。

和第三次武装起义；同年八月一日他又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共武装斗争第一枪，随即率部南下广东汕头占领出海口，以图建立根据地；失败后潜逃香港转回上海，任中共地下党中央军委书记、中央常委、秘书长、组织部长，创立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指挥情报刺探及暗杀活动。南京政府曾悬赏十万银圆取他的头颅。一九三一年初他进入江西中共苏区，代表党中央整肃毛泽东，从毛手中夺下中央红军军事指挥权，指挥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一九三四年领导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抗日」。一九三六年初促成西安事变，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令，重新重用他为中华民国政府军政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是他第二度担任国民党高官。拿着国民党的高薪，实际上担任的是中共派驻武汉、重庆、最后是南京的首席代表。

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利用合法身分，暗中指派一批思想左倾的国民党高干子女——中共秘密党员，作为「冷棋子」，神不知鬼不觉地撒向国民党军政要害部门及高级将领身边，其中最著名的有打入南京政府军令部的田壮飞、刘斐，胡宗南的亲信秘书熊向晖，卫立煌的机要员李硕，傅作义的宝贝女儿傅冬菊，蒋主席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的外甥女郁文（现今中共人大委员长乔石的夫人）……以及诸多的国军兵团司令、副司令、军长、师长均为中共秘密党员。因之有内战史研究者说，国民党军队表面上是败在战场上，实际上是败在周恩来的那支钻进国民党心脏地带的「第五纵队」手里。哪里是蒋介石及其高级将领们在指挥剿共？不如说是周恩来通过中共情报系统把国民党军队指挥得团团转，一批批陷入共军的重围，或是在战役的关键时刻，整师、整军的国军阵前倒戈，称之为「火线起义」。国共两党如此内战，国民党岂有不败之理？

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以二十三万精锐大军进攻陕北中共中央机关的战役。当时留守陕北的中共军队只有彭德怀手下的二万四千人马。

且不论武器装备的优劣，单是兵力双方悬殊了十倍。正是那个周恩来于一九三七年末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秘密召见过的熊向晖（熊父

为当时的湖北省高等法院院长)，奉命通过父辈的关系潜伏到胡宗南身边当上政治秘书。十年之后，把西北剿总司令部每天的作战命令，准确无误地传送给周恩来，使其对胡宗南部队的行动了如指掌，于是毛泽东、彭德怀「运兵如神」，每战皆捷，二十三万国军被二万四千共军牵着鼻子走，打得晕头转向，屡中伏击，一败涂地。

周恩来的聪明在于，把这一切归功于领袖毛泽东，归功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军事天才。倒是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期间，每逢胜战，都不禁心底暗自叫好：好个熊向晖，他一人抵得上几个野战师嘍。

一九四八年夏季，中共解放军进入战略反攻，周恩来更密令各中央分局。要求那些长期打入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冷棋子们」发光发热，提供情报，并尽力瓦解、策反京、津、宁、沪、杭等城市的国军。于是该年秋季，济南战役一打响，被周恩来亲自策反的第三十六军军长吴文化，即率部起义，调转枪口，与共军联手杀人城内，拿下了山东省省会。

类似的情况，亦发生在最后一任东北剿共总司令卫立煌身上。由于一批潜伏的中共秘密人员的运作、周恩来亲自写信对卫立煌诱降，致使卫立煌率二十万精锐镇守沈阳，北不援长春，西不援锦州，长时间按兵不动，最后竟一枪未放，丢弃沈阳，只身逃回南京，而让林彪白白捡了二十万全套美式装备的大军，经中共东北野军改编，挺进关内，包围平、津，虎视中原。当年东北野战军的百万雄师，竟有近半兵源来自俘获收编后的国军。

在淮海决战战场上，八十万国军所以兵败如山，源于潜伏南京政府军令部内的次长刘斐，向中共统帅部传回精确的国军作战部署，调动命令；以及源于早年由周恩来亲自策反并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的两位国军军长张克侠、何基澧的阵前倒戈，火线起义。

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将军属下的数十万大军接受中共改编，则是由傅作义的爱女傅冬菊等一批潜伏于华北剿总的中共情报人员所促成。

四月二十二日，国民党首都警卫师师长王晏清（包括蒋介石警卫团、陈诚警卫团在内）率部起义，南京失守；五月淞沪战役，亦有淞

沪警备副总司令刘昌义在共军兵临上海时投诚。

接下来的湖南和平解放、广西和平解放、云南和平解放、内蒙古和平解放、新疆和平解放、江西和平解放，无一不是周恩来指挥下的中共情报系统的大手笔。据统计，国共内战时期（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国民党陆海空部队，师以上重大起义事件多达六十余起。十五个整编师，一千多名将领，七十二艘舰船，二十六架飞机，上百万官兵被中共策反成功，接受中共改编。

周恩来自二〇年代中叶惨淡经营起来的中共情报系统，为中共打赢内战，夺得江山，居功伟硕。

至今，人们认识到的周恩来，是为中共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外交家，伟大的谈判者，为人民鞠躬尽瘁的总理；而甚少人认识到，他是中共情报总司令、特工祖师爷、和谈大巫师。君不见，在温文儒雅、风度翩翩、能言善辩、亲切和蔼、艰苦朴素、任劳任怨、面面俱到、广结善缘的背后，藏有多少个真实的周恩来？

第二章 秦皇再世定都何处

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九四八年三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前委机关，从陕西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横越晋北，一个月后与刘少奇、朱德的中央工委会合，坐镇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指挥两百万人民解放军，上千万的土八路、支前民工，掀天揭地，大打特打。这回打的不是小日本，而是两、三年前的友军中央军，友党国民党。打小日本，你蒋介石一退再退，留有后手；我毛泽东游而不击，扩充实力，都是为着这最后的决战。你仰仗美国，我背靠苏联。西北、东北、华北、华东，热烘烘的国土，打它个翻天覆地，血流五千里，尸骨堆成新的三山五岳。总的趋势：国军打日本人行，打内战不行。共军打日本人行，打内战行。

毛泽东从陕西出来，要做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位秦皇，二十世纪的秦始皇。

周恩来却很难在历史长河中找到一位人物相类此，李斯？张良？韩信？萧何？诸葛亮？郭子仪？刘伯温？都不是。周恩来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

可是在一九四八年春天，夏天，苏俄老大哥斯大林还在奉劝中共小老弟，中国内战应以长江为界，力争建立北方政权，实现南北分治；毛泽东、周恩来则无视苏俄老大哥的指教，还在设计、构想：要花五年的时间才能打败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但他们也打算先到黑龙江的哈尔滨去，背靠苏联老大哥，联合一些民主党派，成立一个中华民主联合政府，以跟南京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对峙、抗衡。出乎毛、周意料的是，只过了半年之久，中共军队就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自然不要再跑到天寒地冻的哈尔滨去成立什么临时政府了。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之际，建国定都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

毛泽东的眼睛早盯住了地图上的北平。他却不把心事说破，而开始在党内高层征询意见：我想听听大家的，我们的新国都定在何处？

历代王朝的京城不是在西安，就是洛阳、开封，还有南京、北平。杭州古称临安，那地方玩玩可以，做国都肯定是短命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那么，我们的国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

战争年代，王霸之业未定，中共高层还是较有民主气氛的。虽然大家已经习惯了奉承毛泽东，遇有问题，却也还是可以坦率地说出各自的看法的。

朱德总司令主张定都西安。西安古称长安，历史上最强大的汉唐王朝都定都在那里，又靠近陕甘宁边区。没有陕甘宁边区，就没有我们党和军队的今天。

在中共高层，彭德怀副总司令是唯一坚持不称毛泽东为「毛主席」的。他主张国都更靠西一点：老毛，等我去把甘肃拿下来。定都兰州吧！从全国地图上看，兰州才是中国的地理中心。不是说孙中山先生当年也设想过把兰州定为国都？那里是比较穷，比较落后，比不上华北、华东的那些大城市。但西北民风淳朴，人心厚道。我们共产党人比较容易保持艰苦朴素，不忘本。不然进了华北、华东那些花花世界，坐上龙廷，人就易变喽！

刘少奇比较务实。这位「毛泽东思想」的发明者及狂热鼓吹者，同时是个现实主义者。他主张打下南京再定都。南京有现成的总统府，及各部委办公机构，大批建筑物一经接收即可启用。建国之初，百业待举，此一来可节省下大笔费用。

任弼时表示赞同：南京的优势，别的城市无法比拟……毛泽东笑笑说，南京确有优势，可是天气炎热、潮湿……当然，离庐山很近。蒋某人不是每年夏天都上庐山去办公？那里的夏宫也是现成的。

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将军却反对定都南京。叶剑英背出一首唐诗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毛泽东动了诗兴，指着叶剑英说，此人有文化，算个儒将。本人的南京印象，只记得几幅楹联。城北燕子矶有联云：「江水滔滔，洗尽

千秋人物，看野云闲鹤，万念俱空，说什么晋代衣冠，吴宫花草；天风浩浩，吹开大地尘气，倚片石危栏，一关独闲，更何须故人禄米，邻舍园蔬。」还有秦淮河一联：「二八朝金粉，十里笙歌，裙屐昔年游，最难忘北国豪情，西园雅集；九曲清波，一帘梦影，楼台依旧好，且消受束山丝竹，南部烟花。」

毛泽东的古文化知识，博学强记，在中共领导人物中，确是无人相与仲伯。

江西苏区时期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遵义会议扶植毛氏有功、「七大」之后却被贬为中共东北局城工部长的王稼祥，来西柏坡开会，拜望毛泽东时，问：是不是定都北平？

毛泽东让他说说定都北平的理由。

王稼祥精通俄文，亦是饱学之士，说：我认为北平离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然龙盘虎踞，六朝烟雨，但离港、澳、台近了些，今后美蒋作乱，也必定是在南方；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孔子西行下到秦嘛！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我们的地方。

几乎无人提到洛阳、开封。北平、南京成为首选之地。

毛泽东在听了刘少奇的意见后，倒也有几分动心。「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定都南京，占有蒋某人所留下的一切，何尝不是他的夙愿？江南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春去苏杭，夏去匡庐，都很近便。

关于定都之事，党内军内的智多星周恩来却保持着谦恭的沉默。毛泽东通过近两年来转战陕北、华北，让周恩来以军委副主席身分代理总参谋长职务，对这位老同事、老对手已不像过去那样隔膜。周的忠心耿耿，小心翼翼，以及非凡的办事能力，已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他的好感。

周恩来坚持着自己与毛泽东相处的守则，悠悠万事，定都建国。毛泽东主席不主动问起，他是不便发表高见的。且他已经十拿九稳地揣摸到了毛欲定都北平的心事，当然不便说破。任何高明的第一号人物都不愿自己的助手言行超前。征求一下党和军队高级干部们的意见，

只是一幕过场戏，一道手续而已。

主场戏及主角，非毛泽东本人莫属。

毛泽东终于发问了：恩来，定都何处？朱老总、彭老总、少奇、弼时、剑英、稼祥他们都各抒高见了，你我朝夕相处，怎么就听不到你的意见哪？就要开七届二中全会了，此事，政治局和书记处内部，应该拿出一个比较一致，比较成熟的意见来。周恩来已经成为毛泽东党务军务上的大管家，从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战事，处理各类情报，签发各种命令、电报、文件，代拟新华社电讯、人民日报社论，主持各类会议，接见各方代表，调配各路大军的后勤供应……到关照毛泽东家的衣、食、住行，周恩来日理万机，细心周到，井然有序。既不越位越权，又不贻误军情，使得喜怒无常的毛泽东，都不易挑剔出什么不是来。周恩来说：定都建国，是本党浴血奋斗二十几年的最大心愿……今日的局面，来之不易，还是请主席拍板。

毛泽东显得有些不高兴了：你这不是助长我搞一言堂？一言九鼎，乾纲独断？我是共产党的主席，胜利了也决不能做皇上，对不对？毛某人不是朱元璋，更不是李自成。

周恩来笑了：主席言重了。那我就说说吧，供主席参考。我比较倾向于王稼祥同志的意见，定都北平。少奇同志建议定在南京，也确实能够避免大兴土木，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毛泽东问：定在北平，就一定要大兴土木？

周恩来说：那倒不一定。我们可以先把机关安置在北平的香山或是中南海这些地方。

毛泽东说：这就对了，我喜欢香山。北平复名北京，南京仍称南京。大唐时候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嘛，一国两京，自古始然。京者，首善之区也。

你能不能把你的想法说得详细些？

周恩来见毛泽东主席此刻心境甚佳，有兴趣听人说话，便不失时机地把自己的想法亮了出来：定都之计，我以为宜北不宜南。从历史的角度看，历来都是北方战胜南方。四千多年前，北方的轩辕氏「黄帝」战胜了南方的神农氏「炎帝」，还有蚩尤，建立了统一的华夏古

国。以后的夏、商、周、秦、汉、魏晋、隋、唐，也都定都北方，北方统治南方。北宋定都黄河流域的汴梁（开封）时，甚为强大。北宋末年抵抗不住北方游牧民族辽金的南进，丢失了黄、淮以北的大好河山，迁都临安，称为南宋，已是偏安一隅，苟延残喘了。最后被蒙古铁骑所统一，建立起元朝，定都燕京，称为大都。元末那个安徽凤阳的放猪娃朱元璋倒是在南方起事，建立起明王朝，定都金陵，改称南京。可是到了他的儿子辈上，镇守北平的燕王朱棣率兵南来，以靖难为名，占领了南京，废了惠帝朱允文，夺得皇位，迁都北平，营建紫禁城，称为北京。还是北方的胜利。明末李自成起义，从陕西而河南，经南北进，攻入北京，在紫禁城待了一个月，即被东北入关的满清八旗兵所败，建立起大清王朝……本世纪初，孙中山所倡导的国共合作，创建起国民革命军，后进行北伐，取得胜利。这次加上朱元璋那一次，大约是我国几千年文明史上，仅有的两次南方战胜北方，统一北方。但国民党政权的所谓统一，是徒有虚名的乌合之众的假统一，南北各省区军阀的政治大拼盘。可以说蒋介石领导下的南京政府从未真正统一过谁。各省军阀拥兵自重，蒋介石根本统一不了号令。这也是我人民解放军在主席英明指挥下英勇作战，能迅速将其打败的原因之一。至于我们党革命之初，在南方起事，诸多磨难，血流成河。也是经过了长征，举着北上抗日义旗，到了陕甘宁，终于找到并确立了自己的伟大领袖，天时地利，才算稳住了阵脚，在八年抗战中日益发展壮大起来。这次国内战争，我们成了北方，国民党成了南方，只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我们就独霸东北，控制华北、中原，之后南下、西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我国历史上，又多了一次北方战胜南方……毛泽东认真听着。恩来真是说古道今，巧舌如簧呢，很有他自己一套呢，不乏领导者的风范魅力。

周恩来则随时留意毛泽东主席的反应。在毛泽东面前谈历史，会不会被认作班门弄斧，小儿科？为什么要说这么多？毛泽东主席自「七大」以来，已养成居高临下、俯瞰一切的思维习惯。今后还是少发表些独到见解，多做些实事，不要再往前挤……这也是周恩来的优点，二十几年来党内无数次的权力更迭中，他从来回避被拥戴为第一

把手，甚至不作第二把手，而安于第三、第四的位置。过去，在瞿秋白手下，李立三手下，王明、秦邦宪、张闻天手下，他从来处在老三、老四的位置。也就从来不与第一把手去争斗。老大是龙，老二是虎，龙争虎斗，不是龙伤，就是虎死。他却总能保住老三、老四。如今到了毛泽东手下，前面还有朱、刘，他仍是老四。从来老四做实事。实际上的权力往往大过老三，甚至老二。

毛泽东见周恩来不说了，才笑了：恩来，你这也一言堂啊，能不能到七届二中全会上，也去细数一下，定都之计，宜北不宜南的历史依据？

周恩来心里一怔，脸上依然谦虚温顺：不大好吧？我只是把平日常心里想的说出来供主席参考。要说，也只能由主席去说，主席威望高，说话容易被听进去。

我还是搞不懂，恩来你自己就不好说？

我们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朱老总、彭老总、林彪、贺龙、陈毅、聂荣臻、邓小平、刘伯承、叶剑英，包括主席，少奇，弼时，我，还有张闻天、陈云、稼祥同志他们，都是南方人。我要一说历来都是北方战胜南方这话，他们能同意？我不马上被孤立起来，做对立面了？

周恩来的几句玩笑话语，说得毛泽东哈哈大笑：恩来，聪明过人，聪明过人……高岗、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这些北方汉子，可要欢迎你的高论啰！你不便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的话，我也不便去说。我们还是人无分南北，搞五湖四海。定都北平的事，继续征求意见。其实，到陕北蹲了这十几年窑洞，我也是半个北方人了啰，习惯了北方干爽的气候。记得三十年前第一次到北平，最吃惊的，是头顶上的天，总是那么碧蓝碧蓝，连一丝云彩都下大见……今后若再回南方去长住，那又潮湿又闷热，要出汗又出下来汗的天气，怕也是过不大惯了啰。

周恩来陪着毛泽东打了一阵哈哈。

说起北平，毛泽东忽然问：对了！叶剑英来了一封电报，说《人民日报》二月一日发表林彪、罗荣桓给傅作义的公开信，惹得傅作义大动肝火？骂我们不守信誉？不讲道义？

周恩来说：本来，北平和平协议一月十六日就已签订，傅作义的

部队拉出城外接受改编，随后华北野战军进了城。林、罗的信也可以不公开发表。北平地下党也有过要求，担心人家讲我们出尔反尔。

毛泽东问：为什么还是发表了？而且林、罗给人家的最后通牒信的落款日期又恰恰是一月十六日，这算怎么回事？二月一日来发表，马后放臭屁，制造混乱。

周恩来解释：主席，这事书记处会议讨论过……信是由我代拟，送主席改定。朱老总有过顾虑，少奇、弼时主张发表。主要是从全局出发，给全军将士一个交代，也给傅作义的下属们一个警告，叫做又拉又打嘛。只拉不打，是右倾；只打不拉，是左倾。这次叫先打后拉。记得主席也是同意的了……毛泽东打断了周恩来的话：这事我失察了，又拉又打是我讲的，可见多数并不代表真理。你是我的总参谋长啊，一向考虑问题很周详的！

周恩来连忙缓和气氛，这件事我有重要责任，搞了折衷……傅将军那里，我负责做好工作。

毛泽东手一摆：我是误听了你们的……还是尽快安排傅将军来见个面，以求前嫌尽释……这事，等米高扬走了立即就办。北平兵不刃血，傅作义立下了大功劳的！

第三章 傅冬菊谒见周老师

一九四九年二月上旬的一天，西柏坡村周恩来的住处，来了位神秘的女客人。女客二十五、六岁年纪，高挑个儿，算不上美貌，却也清清秀秀，浑身上下隐隐透出官宦大家女子所特有的那股子娇气与傲气。

周恩来从与秘密来访的苏共特使米高扬的会谈中分身出来，站在门口一见女客人，端在右腹上的右手臂就尽可能地伸了出去，握住了女客人的手摇着，或者说被女客人的纤纤玉手捧住了，双方都兴奋地叫着：「傅冬菊！你是冬菊啊，十年不见，长成大姑娘了，大姑娘了。」

「周老师！老师您还是老样子，一丁点儿都没变！真格的，看上去更精神了。」

「京片子，嗬嗬嗬，你这丫头，小丫头……这丫头（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没擦桂花油！是不是？我们快进北平去吃烤鸭啰。」

周恩来大笑着，牵了傅冬菊的手，让进了屋里。

「周老师也喜欢《红楼梦》那些才子佳人？还记得史湘云取笑花袭人的典故：这次我正好带来了几只全聚德的烤鸭，放在了李克农部长那里。」周恩来亲自给客人泡茶，端上一盘大红枣，才坐下，「冬菊，你没爽约，还记得十年前在重庆说过的，要请我吃北平烤鸭：太好了，太谢谢你的礼物了。」

傅冬菊一直敬佩着周恩来亲切和蔼、平易待人的领袖风格，甚为感动地说：「学生忘性再大，也不敢忘记老师说过的话，教过的事……当年，是老师指引我走上了革命的路。」

那是一九三九年，在抗战大后方的陪都重庆。十七岁的傅冬菊就读于天津迁来的南开中学。她的父亲为抗日名将——国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兼绥远省察哈尔省两省政府主席的傅作义将军。当时重庆南开中学集中了一批国民党党政军要员的子女，大都天真烂漫，思想左倾。学生们关心战事国是，自发组织起了一个读书会，热衷于传阅讨论有关抗战救国、联俄容共、唤起民众的书刊。读书会还经常请一些出身南开的名人来演讲。周恩来这位中共驻重庆

办事处的首席代表，又是兼着国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自然是南开学生们引为骄傲的大学长了。周恩来多次受邀到读书会演讲，舌粲莲花地大讲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混为一谈，热情洋溢倡言民主自由，生动风趣宣扬平等博爱，说得学生们热血沸腾，倾心向往。

周恩来看中的是这批国民党高干子女的「特殊价值」。于是读书会内很快成立起一个秘密小组。经过慎重挑选，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的外甥女，傅作义将军的宝贝闺女等，均被吸收为秘密小组成员。周恩来将秘密小组交由中共地下党南方局直接领导。南方局负责人为中共元老董必武。周恩来对小组成员极尽关爱，并小心翼翼，亲自找他们个别谈心，亦师亦友，交流感情，大灌红色迷魂汤。他并不要求这些党国高官子女加入中共组织，而要求他们尊重、孝顺自己的父母，要取得父母的信任。他宣称自己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遵从的是三民主义和总理遗言。他说抗战时期的进步青年，首先应当是个爱国主义者加民族主义者，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他本人和延安的同事们追求和奉行的正是团结进步、民主建国的理念。

思想激进的傅冬菊，很快被周恩来的说教所迷倒。她经常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拜望「周老师」。每来必留饭，周老师还亲自下厨替她烧制淮安名菜「红烧狮子头」。她多次向周老师提出去延安学习，却被周老师和师母以慈爱所婉拒，鼓励她和她的同学们安心留在大后方，完成自己的学业：打败了日本鬼子，建设自己的新国家，需要你们的科学文化知识，需要你们的青春与智能。

那时我们就过时了，该退出政治舞台了，国家就是你们年轻一代的了。

周恩来深懂得这批青年人的心理：越不叫革命越想革命，越不让去延安越向往延安。一九三九年前后，傅作义将军多次来重庆出席国府重要的军事会议。每次，都由小冬菊提供自己父亲的保密住址，并充当联络人暗通款曲，让周恩来、王若飞去拜访交谈。

傅冬菊不知不觉成了周恩来手下最具效力的情报员。她与她的同

窗——蒋介石侍卫长的孩子，经常替周老师弄到总统府最新最机密的「资料」。傅冬菊还利用她「国府抗战方面大员的千金小姐」的特殊身分，掩护过不少中共的地下人员。一次她和两位女同学从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出来，即被中统便衣盯上了，怎么也甩不掉。她急中生智，索性领着同学走进重庆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官邸，去找她爸爸的「结拜兄弟」，中统便衣却遭到警备司令官邸的宪兵喝斥，莫可奈何地悻悻离去。

周恩来对少女时代的傅家千金的方针是「放长线」，而尽量避免「急功近利」。傅冬菊重庆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昆明的西南联大中文系。在西南联大期间，她只被允许加入中共青年团的前身——民族先锋队组织。她的顶头上司是王汉斌（现任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根据周恩来的秘密指示，王汉斌直接负责「培养、保护」傅冬菊，不能出现任何的「差池」，「保护」好了傅小姐，就是保护好了党的「长远利益」。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傅冬菊正好从西南联大毕业。根据她本人的意愿，她随《大公报》报社迁回天津，当了记者。在天津，二十三岁的傅冬菊终于被批准为中共秘密党员，即将被派上「大用场」。利用《大公报》记者的身分，她经常往来于天津、北平，去拜望她的统率着六十万大军的「华北剿匪总司令」的父亲。傅作义将军本已通过国府驻美大使胡适帮忙，替女儿安排下赴美留学，入读密苏里大学新闻系。「身负重任」的傅小姐即以「国家需要我，爸爸需要我」为由，在傅作义面前耍娇卖傻，拒绝出国深造。

身为「华北剿匪总司令」的傅作义将军呢？自信久经沙场，纵横官场，千锤百炼，既有军人的机警，又有封疆大吏的谨慎。他自知身边的卫士中就有人被蒋介石的军统收买当着密探。他的办公桌上从不留下一页写过字的纸张，所有废纸全都由他自己动手烧成灰烬，或是撕成碎片投入抽水马桶冲走。他发出命令也习惯以电话口述，不留文字依据。即便是对跟随他多年的亲信秘书、参谋人员，严格规定谁该知道的事就到谁为止，该知道某部分的决不让知道另外部分，只有他本人知道全局，掌控全局。

傅将军却从未防范过自己的宝贝闺女。在他看来，他的思想左倾的记者女儿，经常出言不逊，举止仍像孩子般幼稚单纯，可爱又可笑。对于女儿经常留在他书桌上的某册毛泽东著作，或是宣传马列主义、揭露国民党腐败黑暗的书刊，他也总是不以为意。父女二人交谈时，女儿每逢提到蒋某人的专制，重用嫡系排斥非嫡系，就言词激烈，咬牙切齿。当父亲的从不发表评论，任女儿胡说。国共两党的事，蒋先生其人其事，还要你这黄色毛丫头来长篇大论？有时他以开玩笑的口吻问女儿是不是入了共产党，走火入魔了？女儿也以开玩笑的口吻说：「我还不够格呢！谁叫我是华北剿匪总司令的千金？我就是想加入，人家还怕要呢，以为是你们派去的奸细呢！」

傅作义深信不疑。他自信对共产党深有研究，深刻认识。最优秀的共产党人如周恩来等，也只可私下里交朋友，但绝不是同路人。作为一名乱世军阀，他更担心、疑惧的是南京的蒋先生。他明白「有枪便是王」，丢了军队，丢了地盘，在蒋先生眼里便一钱不值，狗屁不如。

一九四八年十月，山海关外锦州一役，决定国军在东三省的生死存亡。蒋总统时而飞往沈阳，时而飞往北平，两地督战，命令卫立煌的大军从东向西出击，傅作义的大军从热河向东挺进，务将中共林彪的精锐部队合歼于锦州地区。正是惧于国军的这种战略态势，林彪几次抗拒毛泽东的命令，迟迟不敢发起锦州战役。而毛泽东、周恩来却依靠潜伏于卫立煌和傅作义身边的情报人员，掌握了精确的情报，严令林彪不顾首尾，集中优势兵力，放手大打。果然，东面的卫立煌率二十万大军驻守沈阳，就是抗拒蒋介石的命令，不向锦州方向发一兵一卒；西面的傅作义数十万大军据守热河，为保存实力，亦跟蒋介石软磨硬拖，不向东面的锦州方向出击……眼睁睁地看着部署在锦州、黑山、塔山、营口一带的廖耀湘兵团及新一军，跟数倍于己的中共东北野战军血战十几昼夜，尸骨成山，血浸大地，终于不敌而全军覆灭。数十年后，一些退休的中共老军人，忆及当年锦州战役，抢攻黑山，争夺塔山，仍对国军廖耀湘兵团及新一军的死打硬拼的顽强战斗力，

心存敬佩^②。国军丢失了东北战局，固然是败在了占有绝对优势兵力的中共东北野战军手里，更是败在了只图自保而按兵不动的卫立煌和傅作义两人手里。

傅作义将军的如意算盘是拥兵华北，与山西王阎锡山联手割据。

再说已经成为中共老练特工的傅冬菊小姐，竟把她父亲在天津的办事处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共「地下交通站」。一批批从北平经天津赴东北、山东、河南、安徽等解放区的中共人员，均在这由傅家亲兵把守的办事处内安全留宿，交接关系。为了顺利通过国民党宪兵所设的关卡，傅小姐还从北平她父亲的办公桌上偷来公文纸，模仿父亲的笔迹，写出一张张便条，再贿赂以光洋、金条，没有华北剿总的关防大印，一批批中共人员都顺利通关，各奔前程。

也是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关外锦州战役打响之时，傅冬菊小姐通过她设在国民党天津宪兵司令部的内线，弄到一份即将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在天津各大学校园的人员名单。情况十万火急，她来不及召集会议应变，冒着危险亲自出马，坐着傅总司令驻津办事处的轿车，去各大学通知有关人员立即撤退，使宪兵司令部的搜捕行动全部落空。但傅冬菊小姐的异常行径亦被当局发觉，正在考虑如何制造借口使她落网时，当地青红帮头子的侄女（她的同伙）却及时把消息透给了她，使得她连夜逃离天津，回到了北平。一经进入了父亲的华北剿共总司令部的卵翼，就谁也不敢动她一根汗毛了。

恰好这时中共华北局特工部门，也要调傅冬菊到北平来工作，专责她父亲大人的情报。她的顶头上司仍是那个在西南联大时领导栽培过她的王汉斌，还有刘仁（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崔月华（曾任中共国务院卫生部部长）。单从这三位中共地下党要员共同领导一个傅冬菊，亦可见周恩来手下的特工系统是如何重视这位傅家千金的战略价值了。

为了逼和，周恩来指挥下的特工系统，布置下四条秘密渠道，通往傅作义的华北剿总：一是傅冬菊；二是傅作义的老师刘原同；三是傅作义的保健医生兼医务处长杜敬之；四是傅作义的联络处处长李腾

^②见张正隆着《血红雪白》一书。

九。华北剿共总司令部文印室亦由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掌管。

在这同时，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动手写信，向傅作义将军本人悄悄展开和谈攻势。毛、周的亲笔求和信，经由傅冬菊送至傅作义将军手里。跟着林彪率东北野战军百万雄师进关，配合聂荣臻的华北野战军，完成了对结集于北平、天津、塘沽、唐山、张家口一带的傅作义部队的分割包围。

平、津局势危急，傅作义设在中南海的华北剿总也进一步加强戒备，包括傅冬菊在内，也被严禁出入。傅冬菊在中南海父亲身边弄到的情报怎么传递？

傅小姐不早不迟，这时却跟一名叫周毅之的小伙子热恋起来。傅将军对宝贝女儿一直十分放任，非常时期，竟未调查一下自己女儿的男朋友是何种人物：原本是周恩来的堂侄儿！于是傅冬菊便每天以见男朋友为借口，准时将情报传出。于是傅作义本人每日的详尽动态，经傅冬菊、周毅之内应外合，由北平地下党电台拍发至西柏坡周恩来手上。

「准确地了解傅作义将军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是为傅冬菊小姐每日的工作重点。中南海居仁堂甚为宽大，傅作义生活简朴，用屏风相隔，一边为办公室，一边摆了张床铺做为卧室。傅冬菊白天帮父亲做机密性文字工作，晚上陪父亲说说话、散散心。傅作义身边的工作人员已经大部分意志消沉、悲观厌战，都想寻求新的出路。左倾思想如同空气无孔不入。傅作义只把女儿当心腹。傅冬菊则日夜守候在父亲身边，执行地下党的两大使命：一是稳住父亲，不让父亲乘坐南京政府派来的专机逃跑；二是婉转劝告父亲识大局，看清前途，为保全北平古迹立新功，接受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的和谈请求，早日派人去跟等候在城外的中共代表会面。说是傅冬菊每天跟父亲的谈话内容，都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口授，她全凭脑子记下要点，回到父亲身边就动之以父女亲情，有理有节地说给父亲听。

诸葛一生唯谨慎。傅作义也是一生谨慎。中共东北野战军进关，配合华北共军完成了对平、津的战略包围后，他已无心恋战，动了接受和谈的意念。但事关他本人的脑袋安危，他从未对亲信们吐露。蒋

总统的耳目也是无所不在，稍有不慎，即会招致毒手。他唯一可以一吐满腹心事的人，只有自己的女儿。

而他的这此「心事」，却立即被他所信赖的女儿汇报给西柏坡村的周老师。要切断此一道路，可是国军天津守军的军事部署全部被中共情报人员所掌握。天津战役最后打成巷战，双方坦克、大炮在城内逐街逐楼争夺，经过二十九小时的血战，中共以四倍于国军的优势兵力，全歼天津守军十三万余人，占领了天津。至此，中共军队控制住了从山东半岛至辽东半岛的整个渤海湾，使北平城变成四面重围的孤城。

一月十六日，中共代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傅作义代表邓宝珊、周北峰，举行第三次和谈，双方签订和平协议，中共保证傅作义将军及其亲属的家室财产完好无损，许诺傅将军在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内任职；傅部除留下一个团作为傅将军的私人警卫部队外，其余的几十万人马放下武器，撤至城外，由中共派人进行整训，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

一月三十日，傅作义将军在中南海勤政殿，与中共代表叶剑英将军举行了北平和平移交仪式。其时国军已撤至城外去接受改编，中共军队已控制住了整个北平城。

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却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目，全文登载一月十六日以林彪、罗荣桓名义给傅作义将军的一封信「最后通牒」。

这「最后通牒」在列数了傅作义及其部属的战争罪行之后，写到：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分所应得之罪责，即在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自救自赎。

办法如下：1、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作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

免；2、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作。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上午一时起，至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十时。如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则实施攻城。攻城时本军将用精确战术，使最严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恕宽，勿谓言之不预。

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 政治委员罗荣桓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

说是傅作义将军于二月一日当天看到《人民日报》上的这份「最后通牒」之后，顿时火冒三丈，拍着桌子大喊：「老天爷，哪有这等事！一月十六日签了和平协议，一月三十日办了移交，我的部队早就出了城，共军早就进了城，如今却来最后通牒！我是光杆司令了，再没有用处了……。」

傅作义将军被公开羞辱、伤害，感到自己被出卖了。共产党竟然这样不讲信用，不讲道义，还不如江湖上的盗匪，一达到目的就变脸，就不认人。当他再次看到通牒的日子是一月十六日的时候，他就更痛苦、绝望。一月十六日至今，已过了整整半个月，这不是朝我打黑枪吗？要逼人于死地，要在北平和全国人民中间把我的名声搞臭吗？他越想越后悔。他不想死，想逃出北平。可是他已成瓮中之鳖，蒋总统派来的专机早已撤离，他已是插翅难逃了。

接着又发生了两件中共公开羞辱他的事：一是中共西郊公安局通知傅作义去登记住址及其财产，二是二月二日他请他的密友邓宝珊将军午餐，守城的中共士兵竟将邓将军连人连车子扣下。邓将军下车求情，报上自己的大名。中共士兵以刺刀逼住他：知道！你是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傅作义的同伙，战争罪犯！邓将军被中共士兵羞辱够了，

扣押了整两小时之后，中共大员陶铸（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才出来做好人，给解了围……父亲所受到的羞辱，也是中共特工傅冬菊经过一再要求，来西柏坡村拜见「周老师」的原因。当傅冬菊提出此事时，周恩来却以是下边闹了点误会为由，一语带过，接下来说：「功臣，冬菊，你年纪轻轻，却为党立了大功。毛主席说了，傅作义将军是为国家、民族立了大功，等进了北平，他要奖给傅将军一颗像天坛那样大的勋章！」

周恩来跟傅冬菊并排坐在木沙发上，他捏住冬菊的手，表情像父辈一样的慈祥。

「周老师」几句话，傅冬菊心里的疑虑完全消失。她相信了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那封「最后通牒」确是下面闹了误会，出了差错，毛主席、周副主席马上会出面澄清。

「像天坛那样大的勋章？」傅冬菊乐了：「早听说毛主席是个很风趣、很伟大的领袖。周老师，学生这次，能不能去见见毛主席？」

「是啊，是啊，应该，应该。我看看能不能作出安排……。」周恩来拿起办公桌上的一个什么本子，翻阅着，仿佛在认真考虑傅冬菊的要求。过了一会，周恩来才说：「冬菊，这几天，来了一些重要的客人，主席和我每天都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我可以告诉你一些好消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即将发布新的进军令，我人民解放军正部署渡江作战，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些日子，主席和我们这些一人，都恨不能把每分钟掰成两分钟来用，既要指挥战事，又要筹备新政协会议，准备成立新国家，新的中央人民政府……真是千头万绪，千头万绪呀！」

周恩来却没有告诉傅冬菊：几天之前，史大林派来秘密使者米高扬，代表史大林，听取中共领导人汇报内战局势以及新的中国的建国大计。中共领导人则希望通过米高扬的来访，获得苏联及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外交承认及其经济、科技援助。

在周恩来跟傅冬菊亲切谈话的过程中，不停地有男女军人，穿梭般小跑着，送来各种紧急公文、电报、信函，交由周恩来审阅、签字。傅冬菊听着，看着，都坐不住了。周恩来却按住她的手：「不忙，不

忙。十年一见，我也很想念你和你的重庆南开中学读书会的那批可爱的小朋友啊！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对了，我记起来了，你们读书会里，是不是有汤恩伯将军的公子和陈仪主席的女儿？好象都跟你关系不错似的……。傅冬菊点点头，等着老师的下文。周恩来给学生茶杯里续了水，才说「这次你通过北平地下党组织提出来见我，我立即委托李克农部长把你请来了。除了想看看我们的冬菊同志成长个什么能干模样了，还有个任务，要派你秘密去上海和杭州，会会你的几位中学同学。党中央现在想尽一切办法，争取上海、杭州两地都和平解放。不动刀戈，以免生灵涂炭呀！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流血的苦难史。从我个人来说，真不愿意看到内战再打下去。我们对汤恩伯将军和陈仪主席，也会像对你父亲一样，待遇从优。二月一日报纸登的那封信的事不算，我会查清楚……。到了南方，你就归华东局潘汉年同志领导了。具体的，由李克农部长找你谈。一句话，不管情况如何发展，安全第一。我可要看到小冬菊同志平平安安回来见我！」

傅冬菊被周恩来一席话，说得浑身热血沸腾。她站了起来。准备告辞。周恩来也站了起来，并朝门口摆摆手，示意门外那手拿电文的女秘书暂时不要进来：「冬菊，你还有什么要求？包括你个人工作、生活方面的，都可以告诉我。」

傅冬菊双手捧住周恩来那只受过伤的右臂，尽量克制着，才没让眼泪流出来：「老师，有句话，或许学生不应该说。我是在北方人……。今后不想长期留在南方工作……。」

周恩来双手放在傅冬菊肩上：「好闺女，这个放心。你不说，我也应该想到。定都北平后，你自然要留在北平市委或是中央机关工作。你还应该跟你父亲住在一起，尽你的孝道。有你照顾好你父亲大人，我们才放心啊！」

第四章 傅作义朝圣西柏坡

傅作义，字宜生，人称抗战的民族英雄，内战的失足狗熊。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出生于山西省荣河县安昌村。父亲傅庆泰一生勤苦，曾为脚力、船夫，后靠贩运煤炭发家。成为荣河县大户。一九一〇年，十五岁的傅作义接受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革命思潮，考入山西陆军小学。一九二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在太原参加山西起义，担任学生军排长，英勇作战。一九二一年被保送到北平清河第一陆军中学就读。一九一五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一九一八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时年二十三岁。

这时的傅作义，已长成一个身材魁梧，腰背挺直的北方大汉。国字型的脸膛上，目光深邃，炯炯有神，表情严肃，干练威武。他回到山西阎锡山部队当了一名见习军官。他性格内向，勤于思考，寡言尚行，处世方正。四年之中，从排长、连副、连长、营副、营长，一路上升为少校团副。一九二四年随阎锡山出兵石家庄，完成任务出色，升任团长。一九二六年阎锡山与冯玉祥大战，傅作义奉命守卫天镇城，冯军久攻不克。傅作义受阎锡山器重，称为难得之青年将材，擢升为少将旅长，旋又升任为中将师长。一九二七年的涿州之战，傅作义身先士卒，以少胜多，夺城之后守城三月，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干及爱民思想，使他「一战成名天下知」，「守城名将」声震中外。一九二八年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天津警备司令。一九三一年升任为三十五军军长，兼绥远省省主席。他着手经营河套，兴办水利，并屯田养兵。数年间卓有政绩。他本人则长年着一身整洁布军装，居住在军营之中，每日早起，与部属一道升旗，出操，摸爬滚打，励行官兵一致。他生活简朴，待人宽厚，重义轻财，乐于助人，是国民党军队里一位有着众多美德的模范将领。

真正使傅作义成为我国现代著名军事家、华北大将军的，是对日作战。他是唯一一位跟日本侵略军血战十三载的常胜将军。一九三二年一月，日军进犯山海关，华北危急。傅作义主动请缨，发起长城抗战，其主力第三十五军与日军肉搏，厮杀声彻于天地。怀柔一战重创

日军，打破了日军不败的神话，大大激励了全国军民守土抗敌的决心。这一年，他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一九三六年八月至十二月，他指挥历时五个月的绥远抗战，全歼百灵庙日军，获百灵庙战役大捷，再次戳穿了日军不可战胜的谎言，大涨了中国军民的士气。须知，傅作义在华北地区抗击日本侵略军，早于一九三七年「七七」全国抗战四年之久。

「七七事变」国共合作全面抗战之后，傅作义率部转战于察北、晋北、河北、绥远诸省，参加了平型关会战、忻口会战、太原守城、绥南会战、包头会战、绥西会战、五原会战等著名战役。十三年间（一九三二—一九四五），他一直率部战斗在抗日最前线，转战一万八千余里，进行大小战役、战斗二百九十多次，基本上保持不败纪录，曾被誉为「民族英杰」、「中国战神」。

这样一位抗日名将，民族英雄，却也失算于中共深谋远虑的统战策略。一九三六年八月，傅作义未获南京政府许可，毅然发起绥远抗战，毛泽东从延安派南汉宸秘密赴绥远，送给他一封亲笔信，内称「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如能毅然抗敌，弟等决为后援，为救亡图存而努力」云云。傅作义阅后大为感动。百灵庙大捷后，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援西通电。一九二七年初，毛泽东再次派南汉宸赴绥远慰劳，赠送锦旗，盛赞傅为抗日先锋。同年十一月，太原保卫战前夕，周恩来来到太原，与傅作义相谈数日，称兄道弟，分析敌我态势。一九二八年初，南京政府任命傅作义为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年底进而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毛泽东则写下一封长信，密派彭雪枫送去绥远，并与之密谈合作抗日事宜。

傅作义抗战心切，南京政府一次次批准他扩充兵源，他急需培养大批干部。因惧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政治腐败。他转而求助于延安，派自己的心腹周北峰去延安拜会毛泽东，要求中共派一批青年干部到傅部队去从事政治宣传工作。周恩来手下的社会情报系统真是遇到了「天赐良机」，当即派出几十名抗日军政大学学员投入傅军。一如中共军队创立政治工作制度，团以上设政治部，营以下设政治指导员。从此，中共人员在傅作义军队中扎下根，并秘密发展组织。这就

种下了祸根，抗战胜利后转内战，傅作义担任「华北剿匪总司令」，与中共军队作战，全无军事秘密可言，只能屡战屡败了。

傅作义将军对共军作战的最后两次大动作，一是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根据内线密报，派出华北剿总的空军飞机准确地轰炸毛泽东的住所，险些把毛泽东、聂荣臻等当场炸死；二是同年十月二十五日，傅作义经与蒋总统密谋，派出两个军的人马，分乘四百辆卡车，携带一百吨炸药，组成一支快速突击部队，偷袭平山县西柏坡村，打算将中共中央机关一举炸毁。但情报被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及时获得，中共军队得以紧急调动，于中途伏击了这支偷袭军的先头部队，死伤三千五百余人，使整个计划中途废止。

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国民党军队与日本侵略军作战，打得颇有声色，英勇顽强，出现过傅作义、张自忠、李宗仁、杜聿明、廖耀湘、郑洞国、孙立人等大批抗日名将，并有一千四百多名少将以上高级将领捐躯疆场；而中共八路军、新四军，则于一九四〇年华北百团大战之后（彭德怀为此役一直饱受毛泽东批评），基本上游而不击，只是借抗日之名拼命扩充实力，中共军队死于战场的只有一名高级将领：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打日寇，共军远逊于国军。可是到了一九四六年冬转而打内战，一位抗日名将却先后均成为共军手下败将。以致在东北战场上，许多国军官兵被俘后仍不服气：你们打日本鬼子不行，打内战行！

傅作义将军即是这样的典型：抗日的英雄，内战的狗熊。城下之盟，败军之将，自是虎落平阳，英雄气短了。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共在对傅作义将军实施「先打后拉」的羞辱策略之后，批准他由邓宝珊将军陪同，前去西柏坡林朝圣，拜会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搭乘军机先飞石家庄。在石家庄机场，中共中央派来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和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专程迎接，换乘吉普车驶往平山县西柏坡村。傅作义一如往常，身着普通布棉袄，手里提着十条中华牌香烟，做为给毛泽东、周恩来的见面礼。在车上，他见杨尚昆抽烟抽得很凶，便从中取出两条来要先送上。杨尚昆谦逊地笑着相谢：傅将军给我们主席、副主席的见面礼，我怎么敢先掠其

美？

下午二时，傅作义一行抵达西柏坡村中共中央招待所。周恩来早已等候在那里。傅作义对比他小三岁的周恩来毕恭毕敬。周恩来则拉住他的手说：「太原一别，转眼又快十年了。我们是老友重逢，老友重逢！」傅作义却苦笑着说：「宜生城下之盟，谢谢周先生的关心！」周恩来说：「傅将军抗日英雄，常胜不败，只是蒋某人封你为华北剿共司令打内战，才有败绩，值得深思啊！」

傅作义点着头。因跟周恩来是老熟人，便说了句老实话：「我的部队里，包括我的总部，我的左右，全是你们的人嘛，我的一举一动都被你们看在了眼里，安有下败之理？」

话一出口，傅作义即有些后悔。自己是客人，言不由衷的大实话，会使主人难堪、尴尬……周恩来向以反应敏捷、巧言饰非著称，这时哈哈大笑：「傅将军，你算个明白人。这叫人心向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哈哈……。」

周恩来的大笑，反使一本正经下苟言笑的傅作义脸上红一道，白一道。

接着，周恩来严肃地说：「傅将军，你是俊杰啊，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比蒋委员长高明多了。蒋某人是见棺材不落泪。你却能以国家大局、人民利益为重，和平解决了北平问题，避免了千年古都毁于战火。否则，真要给国家民族带来一场不可弥补的大祸。和平解放北京，你立了大功。毫不夸张地说，是功标史册，名垂千古。」

傅作义倒是没想到周恩来会给他这么高的评价，自是十分受用。顿时把前些时《人民日报》发表林、罗给他的「最后通牒」信（他更不会知道此信系由周恩来亲自起草），以及北平市公安局通知他去登记等等不快、压抑，拂去了不少。他想，真如那句俗话讲的：「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啊！」

周恩来接着说：「欢迎你与我们合作。我们的合作有历史根源呢。抗战时期，我们在敌后合作打日本，相互支持，互通有无，携手作战，在晋察冀和绥远，你跟我们的贺龙、徐向前、程子华、邓华、杨成武、李克农都是老朋友啊！现在我们又开始新的合作。本来我们打算到哈

尔滨去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临时联合政府。现在有了北平，我们就不要跑那么远了，可以在北平开会了。你应该参加会议，你既是有党派的，又是有功将领，也就更具代表性啰！]

周恩来的言语里，饱含封官许愿之意，使得傅作义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迎。你和恩来是老朋友，我和你是信使往来，互通款曲，神交久矣！]

傅作义对毛泽东的头一句话却是：「我有罪，宜生以待罪之身……」]

毛泽东立即打断了他：「不要这样讲啊！两军交战，孰能无过？北平和平解放，你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啰，应当谢谢你啰。你过去是抗日的功臣，现在又是和平解放北平的功臣。假如你过去有过错误的话，那么现在功过相衡，还是功大于过。」]

这时周恩来请大家坐下来喝茶、吃点心。

周恩来见傅作义心里仍有疑虑，便说：「傅将军可以向你的部下讲清楚，既然是和平改编，你原来的部队在改编之后，就都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和其它成员一样，绝不歧视。你大约不太清楚，我们部队里的士兵，有一小半是从国民党军队里解放过来的。所以国民党的军队越打越少，我们的军队越打越多。讲远一点，我本人曾在民国政府军政部门两度任职。我们毛主席职位最高，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就当过国民党的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还代理过中央宣传部长。还有我们的朱总、彭总、刘伯承、贺龙这些高级将领。过去也都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而且大大有名的。」]

毛泽东说：「对，恩来说的对。我看这里面主要是个思想立场问题，思想立场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一接下来，毛泽东再次谈到北平和平解放的重大意义：「北平是世界有名的文化古都，过去八国联军欺负我们，火烧圆明园，毁掉了我们的万园之园，破坏了许多名胜古迹。这次如果我们这些炎黄子孙自己再在北平摆战场，毁了北平，烧了紫禁城，炸了天坛、北海、颐和园，我们就真成千古罪人了！子孙万代都要骂我们。这个罪名，你傅将军，我毛泽东，还有朱老总、恩来都要背啰！现在好了，傅将军，还有邓将军，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啰，一个锅里舀饭吃，青菜萝卜，彼此彼此啊！」]

毛泽东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周恩来说：「确是一家人了。说起来，我跟傅将军还沾了亲戚，傅将军的千金冬菊小姐的爱人周毅之，是我的堂侄儿呢！这事我也是前些日子才闹清楚。」

傅作义目瞪口呆，一脸傻笑，惊多于喜。

毛泽东再次拉住傅作义的手，风趣地说：「那就更好了。今后，我们是姑舅亲，打断骨头连着筋，难舍难分了。蒋委员长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被傅将军耍掉了！」

傅作义没想到毛泽东的江湖气习这么重，真像个山大王呢，连忙说：「蒋某人的码头，是被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耍掉了。」

傅作义在西柏坡村住了两天，中间断不了大宴小宴。席间毛泽东问傅将军对今后的工作有何打算，傅说想回河套去抓水利建设。毛泽东说那太小了，至少要当中央政府的水利部长，在国防委员会里也应挂职。

周恩来却未对傅作义提及本月初，傅冬菊来见的事。因为那样一来，也就太伤傅作义的面子了。连傅的爱女都是中共奸细，中共这掏心战术，岂不太令人毛骨悚然？傅作义将军半世英名。战功赫赫，却被中共当猴儿耍了。

第五章 周恩来重塑君臣关系

说是在八十年代，北京某郊区县委书记、县长两人闹矛盾。县长指着书记说：你想学毛泽东呀？只管大事，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指挥一切？要我当周恩来？大事小事，里里外外，白日黑夜一把抓？加上俯首贴耳，谦虚谨慎，唯命是从？没门！如今谁不想当毛泽东？谁想当周恩来？

真是一滴露水映照出太阳的光辉。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八日两天，毛泽东在延安中直机关干部大会作《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由此展开。

不久发展成「抢救运动」，毛泽东指使中央社会情报部长康生，在党内大抓特务、奸细，数百名国统区来的革命青年被关入窑洞，刑讯逼供。实为一次毛泽东所主使的排除异己、清理门户运动。主要清理对象一为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所留下来的军事干部，二为王明、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所代表的莫斯科共产国际派系的党务干部，叫做反省路线，交代问题，弄清思想，轻装上阵，重新出发。

「延安整风」是周恩来与毛泽东重建关系的关键时机。聪明的周恩来明白，如果不能在此次运动中取得毛泽东的宽谅与好感，他将像李立三、王明、秦邦宪一样：永远被排除在中共领导核心之外了。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身在重庆，请假缺席。会议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并规定中央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样，毛泽东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中共最高权力宝座，刘少奇第一次被宣布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助手，原中共总书记张闻天和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则被排除于权力核心之外。

同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奉命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周恩来一行乘坐吉普车及卡车，一路上走走停停，直至七月十六日才抵达延安。他开始大会小会上交代，检讨自己在历次党内错误路

线时期的问题。自我批评，也接受别人的批评。他检讨了整整一年零四个月，多次痛哭流涕。陕北红军领袖高岗曾在中央整风学习小组会上当着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面，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是个老牌机会主义分子，每次错误路线他都有分，都很积极，可每次都蒙混过来了，都没有下台，而继续留在中央领导岗位上，脸皮比瓦窑堡的土围子还厚！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则指他为党内不倒翁式人物，时左时右，左右逢源，总是跟风跑；刘少奇则着重指出他是两次王明路线的主要人物，江西中央苏区时期推行王明路线，他是红军三人团成员，并且是「党内受委托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排挤、打击毛泽东同志，造成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失败。

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江西苏区，给党的事业造成过不可弥补的损失。第二次是一九三八年王明从莫斯科回来，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口号，他又拥护过一段，后经毛泽东同志及时提醒、警告，才没有紧跟下去；中央社会情报部长康生则指他长期负责党的军事工作，但长期打败仗，一九二七年两次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失败了，跟着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率部南下广东汕头又全军覆灭。一九三一年底转至江西中央苏区指挥红军，也是一路败仗，可称为屡战屡败的败仗将军。要不是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红军队伍早断送在周恩来们手里了……。

周恩来被批评、斥骂得一无是处，体无完肤，里外皆黑了。但他并不气馁，不委屈，亦不申辩。而是一一地去找批判他最激烈的高岗、彭德怀、刘少奇、康生等人个别谈心、交心，检讨自己的错误。高岗仍在背后骂他为老狐狸。

刘少奇则被他的谦虚、诚恳态度所感动，开始替他在毛泽东面前开脱、说合。

也有朱德、贺龙、刘伯承、薄一波等人替他抱不平，指出有的批评不客观，缺乏善意，是人身攻击。

周恩来本人则继续检讨自己，同时大歌大颂毛泽东的英明领导，称颂「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寻找了二十多年才寻找到的真正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路线」、「跟随毛泽东同志前进，中国革命才能从失败走向胜利」。在检讨自己的错误时，他曾经声泪俱下地说：自己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自己的错误加起来有好几吨重，无论党怎么处分自己都不过分，毫无怨言……直到参加整风学习的大多数成员，都觉得他的检讨可以了，甚至过分了，毛泽东才出面说话，认可他态度诚恳。认错深刻，思想立场已经转变到党的正确路线方面来了。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召开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六届七中全会成立了一个「主席团」，是为「七大」领导班子的雏型。毛泽东任「主席团」主席，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为「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再次排斥了周恩来。倒是朱德总司令在政治局会议上仗义执言，说周恩来同志无论是资历、品德、对党的事业的贡献、党内党外的影响，都在自己之上，周还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周如果不进主席团，自己这个主席团成员当得有愧，内心不安。朱老总的发言，得到了任弼时、贺龙、陈毅、刘伯承、陆定一等人的附议，并纷纷指出，不肯定恩来同志在党内的地位，亦会影响今后他返回重庆跟国民党政府谈判的权威性……众意难却，毛泽东不得不笑脸相迎，同意朱总司令的提议，欢迎恩来同志参加「主席团」，作为从王明路线上觉悟过来的代表性人物。

在「七大」的日程安排上，规定由毛泽东作开幕词及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任弼时作会议筹备情况报告，以及由高岗、彭德怀、陈毅各准备一个大会发言，而没有周恩来的大会发言。如此安排，会议选举时，周恩来仍有可能被排除在最高决策层之外。毛的意思很明显。今后只让周当一名事事听命于延安的谈判代表，并与董必武一道，留在重庆抓统战、外交方面的事务。周恩来当时的尴尬处境，可想而知……名声大得很，实权半点无。大约也就是在这期间，他更意识到自己在党内的命运，已掌握操纵在毛泽东的手里。不取得毛泽东的某些好感，某种程度上的信任（完全的信任已不可能，何况毛对任何人都只有四分之三的信任），自己今后在党内的日子会越来越艰难——周恩来真是料事如神了，他的同辈同事张闻天、王稼祥、李立三、王明等人每下愈况的命运，即是最好的

印证。张闻天学识品德都在毛之上，在党内也广有人缘，但书卷气太重，又厌于权争，处处给毛让路。毛则反过来对张的道德学问处处忌讳防范；王稼祥精通俄文，为人正直，敢于跟毛争论是非曲直，亦厌于权争，不肯对毛趋炎附势，毛则刻意对其疏远；王明的悲剧在于自视太高，始终不肯认错，不肯对毛俯首称臣；李立三倒是毛俯首称臣了，毛却始终不肯宽谅自己的长沙老乡……毛泽东曾说，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他结识了几个亲密的朋友：刘少奇、高岗、康生、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还有周扬。

恰恰是上述这些毛泽东的亲密朋友们掌控着党务系统和军务系统，且都不大把他周恩来放在眼里。周恩来被冷落，被孤立。然而周恩来的高明在于身处逆境，不争不闹，照常穿梭于中共领导人之间，虚心学习，征求大家对自己的批评与帮助。实则他是在发挥他的以柔克刚的韧性战术，悄悄游说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贺龙、陈毅、刘伯承，替自己说项，同时一次又一次地找毛泽东本人个别交心，沉痛检讨，软磨硬缠，直至缠得毛泽东不得不对他作出让步，允许他在「七大」开幕式上作个表态性质的发言。时间不超过十分钟。所谓「表态性质的发言」，毛的旨意很清楚：应表态拥护刘少奇新发明的「毛泽东思想」一词，要在大会上带头高呼「毛泽东同志万岁」、「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政治工作的指导方针」、「永远跟随毛泽东同志的旗帜前进」。周恩来在「七大」开幕式上照办了，尽管他振臂高呼上述口号时还不大习惯。跟着他又争取到了做一个关于统战工作的大会报告，也就争取到了进入最高决策层的机会。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朱、刘、周、任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五大书记」，他终于没有被毛泽东甩下权力班车。至于毛泽东则达到了他的权力顶峰，以一人之身兼任五大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党报党刊编辑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竭尽忠诚，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一日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表现得淋漓尽致。他除了亲自照料毛的衣食住行、安全警卫，还在一次次的大小宴会上代毛喝酒，以防毛被人灌醉甚至中毒。毛睡的床铺，坐的椅子，他都要亲身先试

一试，检查是否安全，是否舒适。

毛喝的水，吃的菜，他更要先尝一尝，并以一双特制的象牙筷子来测试是否有毒。毛泽东自是十分受用，不得不夸赞说：「恩来，你比江青还细心，还会照顾我啰。」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中旬，国共和谈破裂，周恩来在美国友人马歇尔帮助下，率中共代表团从南京返回延安，留在毛泽东身边，准备大打内战。翌年三月，蒋介石命胡宗南率二十三万大军进攻延安，留在陕北的中共军队只有彭德怀手下的二万四千人，双方兵力相差近十倍。三月十八日傍晚，延安的大部分中共中央机关人员已撤离，来势凶猛的胡宗南大军已攻到延安城外，炮弹已落在毛、周等人所住的窑洞前爆炸。说是窑洞在炸弹爆炸的声浪中震动，毛泽东手里的茶缸却未晃动。负责保卫党中央的彭德怀司令员赶来吼叫了两次：「老毛，你还不走，叫我怎么指挥打仗？」毛泽东就是不走，说是要亲眼看到胡宗南的士兵才撤离。彭德怀火了，命令警卫团战士用担架把毛泽东抬走。毛泽东走出窑洞，瞪圆了眼睛喝问：「谁敢抬走我？」周恩来见毛、彭二人闹得很僵，周围已枪声大作，不走确实不行了，便出面打圆场，当即叫来中央警卫团的负责人：你留下个排，代替毛主席守在这里，亲眼看到胡宗南的士兵才撤离！他转而请示毛泽东：「主席，这样安排了，怎样？由他们替你看到胡宗南的士兵。我们还是走吧！」

撤离延安后，天下大雨，毛泽东心情极坏，动辄发火骂人。连周恩来在内，不时挨毛痛骂。三月二十日，周离开毛，到子长县王家沟与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周一离开，毛即感到失去了依傍，开始冷静下来思考问题。

三月二十五日，周与朱、刘、任相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再让任弼时回到毛身边，去提示毛，让毛提出中央领导人分成三部分：毛、周、任、陆（定一）留在陕北，组成中央前委及其直属支队，任弼时为司令员，陆定一为政治委员，周专责军事情报，并代彭德怀行使总参谋长职务，协助毛指导全国各解放区战事；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为书记，前往华北，领导全党党务，指导解放区土改工作，并筹组华北人民政府；叶剑英、杨尚昆等留在晋北，组成中央

后委，筹办军饷军粮，负责后勤供应。

中共中央机构一分为三，轻装简行。既避免了拖着个庞大的班子被胡宗南的大军一网打尽，又陕北、晋北、冀西北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便于相互呼应，神出鬼没。

毛、周、任、陆率领的中央前委及其直属支队辗转于陕北的深山大沟，老天却不作美，连日大雨磅礴，一行人东躲西藏，晓宿夜行，风雨泥泞，苦不堪言。毛泽东仍然心情不好，动不动训人骂人，大发雷霆，连他的贴身卫士都感到太难伺候了。干不下去，而坚决要求下连队当兵。周恩来只得动员自己的卫士小黎去替毛泽东服务。小黎开始也不干，要求下连队。经周恩来以组织名义下令，才答应只去干一年。其实黎是想留在周身边，周脾气随和，比毛好伺候得多。

毛、周、任、陆一行曾经被胡宗南的大军追逼无路可走，到了黄河边上。

六月上旬，为了过不过黄河，毛泽东和任弼时发生了激烈争吵。两位湖南老乡拍着桌子吼叫。任、陆二人都主张过黄河。过了黄河，就是贺龙、聂荣臻的晋察冀解放区的天下。周恩来保持中立。毛泽东一人坚持西进，你们怕死你们过黄河，我一个人也要留下，死也要死在陕北！任弼时则指他蛮干，不顾死活，缺乏理性，中直支队只有三个加强连八百来人，还拖着十几名家属子女，怎么向西？在敌人密集的地带钻隙缝？过了黄河就算失败？不过黄河，留在陕北挨打，就算胜利？

毛泽东盛怒之下，当场宣布，撤销任弼时、陆定一的中央直属支队司令员和政委职务，任命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委。周恩来对毛泽东温顺谦恭，从不顶牛。但他明白，不过黄河，也无法西进。他命令部队悄悄往北撤退。胡宗南的部队紧追在后，双方相距不到十华里。有时是毛、周一行在山沟里走，胡宗南的部队在山顶上追。更有一天黑夜胡宗南的部队迎面开过来，毛、周一行无法后撤，只好从胡军中穿插了过去，竟然神话般未被发觉，或是发觉了亦未开火……某日黄昏翻过一座山头时，毛泽东忽又发了湖南骡子脾气。他不让后卫连队抹掉泥路上的脚迹，还让插上一块木牌，上书「毛泽东一行由此路过」！

很有一点水浒草莽英雄的气概。警卫部队负责人很为难，请示周恩来：怎么办？

周恩来命令：「写上吧！先交给主席去看看，主席走过，不要插上，把泥路上的足迹抹掉。」陕北转战一年，周恩来就是如此这般地伺奉毛泽东，比那个逆毛龙鳞的任弼时，显得灵活、机智多了，更能满足毛泽东的领袖欲。毛、周所以敢于在最困难的日子里留在陕北，带着一支八百多人的直属支队在国军隙缝里钻来钻去，是因为胡宗南身边有个周恩来亲手秘密安插的特工熊向晖，在每天准时把胡宗南的军队调动情况通过秘密电台报告给周恩来。胡宗南麾下的军、师、旅、团、营各级指挥官里，也都潜伏着众多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而任弼时、陆定一等人，却不知道胡宗南最信任的政治秘书熊向晖的存在。

更由于彭德怀司令员靠了熊向晖提供的准备情报，率领中共西北野战兵团的英勇善战：二月二十五日青化砭一役全歼胡宗南第三十一旅；四月十四日羊马河一役全歼胡宗南第一百三十五旅；五月四日蟠龙镇一役全歼胡宗南第一百六十七旅；八月二十日沙家店一役，全歼胡宗南第三十六师；接下来是榆林大捷……那时，毛泽东屡屡向周恩来提及熊向晖：你十一年前撒出去的这只冷棋子大显神通啦，胡宗南真是愚蠢到家啦，二十几万大军被我们牵了鼻子走；那时，毛泽东也念念不忘他的湘潭老乡彭德怀，称赞彭老总为军事天才，西北猛虎，作风顽强，粗中有细，每战必胜，全军楷模，并写下诗篇：「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最可悲的要数那位蒋委员长的嫡系爱将、坚决反共却又志大才疏的胡宗南了。在西北战场一败涂地的一九四七年六月，还出资保送自己的亲信秘书熊向晖赴美国深造，入读密执安州大学，后转俄亥俄州大学。他对熊向晖毫无察觉。两年后的一九四九年夏天，熊向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硕士学位。辗转纽约、旧金山、香港，回到北平，向他的「老师」周恩来「报到归队」。

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撤离延安，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渡过黄河进入华北，毛、周、任、陆率领中央前委及其直属支队在陕北山沟沟里转战了整整一年。其艰苦情状，可想而知。周恩来对毛泽

东歇尽忠诚，小心翼翼。他总是安排最好的窑洞给毛泽东住，最好的食品给毛泽东吃。自己则常常跟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等人挤住在一起。任弼时患有严重肺病，每遇风寒就通宵咳嗽，痰中带血。周恩来端水送药，予以照顾。有时毛泽东不顾敌情，想住就住，想走就走。军情再紧急，周恩来也没有为毛泽东的某些异乎寻常的举动与之红脸、争辩。连卫士们都服了「周副主席的好脾气」。他总是顺从毛泽东，只在具体的部署中不露声色地悄悄作些修正使其安全、可行。警卫部队的负责人跟他配合默契。

毛泽东从周恩来的近乎仆从式的温顺中得到快意满足。毛的确需要周这样一位既言听计从又才干杰出的助手。他是个只抓大事、厌烦小节的帝王式领袖，好大喜功，自认为「运筹窑洞之内，决胜千里之外」。他常常爬在地图上，指指划划，只讲个战略意图，描下一张战略草案，而由周恩来他们去设计出完整方案，描绘出每一细部，使之具体可行，最后以毛泽东的名义下达命令，交由各路大军去出色完成。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毛、周、任、陆一行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之后，中央前委、中央工委、中央后委三家会合，恢复为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中共五大书记毛、朱、刘、周、任，都集中在西柏坡村共事。毛泽东总算看准了周恩来，无论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外交、统战、情报诸方面，周都是个难得的全才。以周的资历、学识、谋略，不可使称王，只可做宰相。只要抓住他是个老牌国际派，追随过陈独秀，追随过瞿秋白，追随过李立三，追随过王明、秦邦宪、张闻天，党内硕果仅存的五次机会主义路线的骨干分子这一条，再加上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代表王明、秦邦宪临时党中央整肃自己、撤销职务、开除党籍那笔老账，周恩来就会在自己面前恭恭敬敬，规规矩矩。

毛泽东从未在公开场合上赞扬、表彰过周恩来，也从未考虑过周恩来做权力接班人。毛的权力接班人早就定下了，是那个在延安整风期间发明「毛泽东思想」一词的刘少奇，是那个在「七大」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时一百多次提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以高八度的声调呼喊「毛主席万岁」口号的刘少奇。毛泽东那时经常赞扬刘少奇是党的

白区路线的正确代表，是党的出色的组织活动家，优秀的马列主义理论家。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曾在党内广为传颂：「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而对于周恩来，毛泽东多的是会议上疾言厉色的批评，会下当众训斥。毛泽东离不开周恩来，又记恨周恩来，限制周恩来。正如周恩来离不开毛泽东，又随时随处防范着毛泽东一样。彼此都如陕北老乡的一句俚语所说的：「老回回捡了个猪蹄子，扔扔不得，吃吃不得。」

这里，我们还可以提及这样一件至今鲜为人知的史实：一九四二年，毛泽东的亲弟弟毛泽民（毛远新之父），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被军阀盛世才逮捕下狱。盛世才反复无常，先亲共后反共。毛泽民在狱中受到严刑拷打，招供出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秘密：他哥哥毛泽东和周恩来有仇，一直记恨着周恩来。一九三二年在江西苏区发生的富田事件，他哥哥差点被叛乱军人（红军）所杀，他哥哥一直怀疑后台老板就是周恩来。他哥哥常对他说，周恩来是他事业上的绊脚石，是罩在他脑袋上方的克星……毛泽民虽然向盛世才出卖了大量的中共秘密，但盛世才并没有饶他一命，还是于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下令将他枪决。中共建政后，毛泽民一直被尊为「革命烈士」，至今无人认他为叛徒，变节分子。

到了一九四九年春天，大好河山，中共已唾手可得。正是用人之际，毛泽东苦于找不出一个可以与周恩来相匹敌的人物来代替。在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召开的中共进城之前最为重要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人及各路诸侯都讲了话，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却一直没有安排周恩来发言。直到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周恩来才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发言的机会。但他的发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首先赞颂了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全党的高度团结。他说三年来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不是偶然而来，而是在毛主席领导下通过斗争得来的。他再次检讨自己过去犯过许多错误，靠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他才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他要求全党高级干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进城之前重读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不当李自成、牛金星、刘宗敏式的人物。他强调在今后的工作中，原则性和灵活性要相结合。他指出全

国胜利的到来，面临由分散走向统一。中国不是联邦，但是有明显的区域特点，因之统一的方针，应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上。有步骤、有重点地走向统一。在谈到战争和生产的关系到时，他提出依靠东北，抓住华北，坐稳中央，支持前方；并要抓好城市接收，恢复工厂生产，鼓励商业活动，安定人民生活。

周恩来的发言，受到中央委员们的热烈认同，令大家心服口服，公认今后治理国家，非他莫属。毛泽东又一次逼得做顺水人情，在随后的会议总结报告时，不得不宣布以下信息：我们马上要进北平成立新人民政府了，主要人员怎么配备？现在还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我本人也要参加领导，其性质为中央政府的总主席。我和恩来，算毛遂自荐吧，说自我加冕也行。

第六章 江青求助周副主席

江青依上海女人的习惯，称丈夫为老板。毛泽东对于此一称谓，倒也欣然，曾经当着卫士的面笑问：我是你的老板，还是共产党的老板？

江青带着女儿李纳随毛泽东从陕北来到河北省西柏坡村之后，开始受到毛泽东的喝斥，甚至痛骂。革命一天天走向胜利，毛泽东的脾气也一天天增大。

江青心里明白，与毛同居已十年，毛对自己的那股新鲜劲儿早过去了，日久生厌，越来越看不上眼了。老板看得上谁？心里放不下谁？不是那个即将从苏联回国的神经病女人贺子贞，而是周副主席的心肝宝贝、干女儿孙维世那浑身骚得出水的小妖精。

周恩来夫妇却是江青唯一可以投诉的人。每次，江青眼泪含含、饱受委屈地来，诉说老板如何喜怒无常，如何横蛮暴躁，如何当着卫士、保姆的面，骂得她狗血淋头，只差没有动手打人了。江青说，老板好几次对她扬起了巴掌，虽说最后落在了桌子上，椅背上，但她蒙受的羞辱，眼泪难以洗清，没想到她追求革命，追求妇女解放，还是落到了头号大男人主义手上，云云。

周恩来夫妇那时把江青当小妹子，总是尽力劝导她，宽解她。中央让你担任了主席的生活秘书呢，管理主席的衣食住行呢，是党给你的重任、对你的信任。你要注意主席的喜怒哀乐。主席是诗人气质，考虑党务军务大事，指挥全国战争，负担重，压力大，容易在家里动气，是可以理解的呢。主席也只能在家里发发脾气。在书记处会议上，政治局会议上，他是头，负总责的，处理问题，任命干部，要一碗水端平，有理有节，大家心悦诚服……。周恩来说，我们只有一个主席，一个领袖啊！全党经过了二十几年的血火奋斗，经过了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秦邦宪、张闻天这些人的领导，都不行嘛，最后才找到了毛主席啊！包括你江青同志在内，我们都要服从自己的领袖，革命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大道理。大道理要管小道理。你受了委屈，但你占的是小道理，是不是？山西有支民谣唱：「夫

妻吵架不记仇，白天吃的一锅饭，晚上枕的一个头。」是不是？

周恩来乐于充当毛江的和事佬。他总是把江青劝顺了，才亲自陪着，送回到毛的身边去。江青回到毛的身边，恢复为依人小鸟、施展床第欢娱之时，自然会把他周恩来的话，学舌给毛主席听的。

其实，在三、四十年代，周恩来也是喜欢江青、欣赏江青的。江青原名李进，字云鹤，艺名蓝苹。江青一名则是毛泽东封赐的。一九三八年春天，二十三岁的蓝苹从上海投奔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当戏剧教员。她不但身材高挑，面貌姣好，气度高雅，而且多才多艺。上海电影明星不说，还擅长表演话剧，清唱京剧、评剧，拉得一手好二胡、京胡，写得一手好蝇头小楷，做得一手好女红，也会烧几道山东菜、上海菜。当然也是个情种，须臾少不得爱情雨露的滋润。到延安之前，公开的婚姻或同居关系已有过四次。作为一名追求个性解放的现代女性，蓝苹堪称为全才了。尤其在当时延安的大群土头土脑的红军黄脸婆中，更显得鹤立鸡群，光彩照人。芙蓉出水、娇艳欲滴，有多少男人倾心爱慕，便有多少女人切齿忌妒。

蓝苹在延安的第一个恋人是鲁艺的训育长徐一新。惜乎徐一新很快被从武汉来的、比她更年轻更鲜亮的孙维世所夺，逼得她上杨家岭，勾引上了党的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有家有室，妻子贺子贞是井冈山时期的红军女英雄，去了莫斯科治病蓝苹就乘虚而入，钻了毛主席窑洞。毛主席是大英雄，什么样的女人玩不得？偏偏轮到你是个上海滩来的资产阶级臭明星、烂女子去上床？把梅毒、花柳传给了毛主席咋办？刚从九死一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走过来，延安的工农红军干部、战士们的阶级义愤、憎恨是可想而知了。便是伟大的毛主席跟蓝苹的「野猫偷食」，也必须夜入晨出，不便暴露在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的。红军干部战士只差没有进窑洞去捉奸——当然是捉蓝苹了。

延安的早春，滴水成冰，冷得出奇。一天清晨，有人亲眼看到，两个警卫战士在毛主席窑洞门口的坡道上泼水，很快造成一道冰坡。天刚蒙蒙亮，蓝苹裹着大衣从毛主席的窑洞里宿完夜，悄悄推门出来。一踏上冰坡，就哎哟一声跌了个嘴啃泥。毛泽东在室内听到响动，忙问：「什么事？」蓝苹眼泪含含爬出冰坡，什么话也没敢说，快步走

人。毛主席也没有挺身而出，训斥警卫战士的恶作剧，只是觉得警卫战士资格太老——都是江西苏区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应当撤换成陕北当地苦大仇深的红小鬼。

几天之后，蓝苹患了感冒，去杨家岭中直机关的医务所看病领药，也受到医生、护士的公开羞辱：「哟！你叫江青？怎么改名啦？不叫蓝苹啦？封号都有了？发低烧？不想吃东西？是不是怀上啦？究竟是谁的种呀？」

一个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的现代女性，在延安却遭遇到了农民革命者们根深柢固的封建道统。新式农民革命走着封建主义的老路，外来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个代名词。不久，周恩来从陪都重庆回到延安参加党中央会议，认识了江青，并听闻了有关她的种种幸灾乐祸的传闻。鲁艺院长周扬倒是替自己的下属抱不平，认为有太多的同志们对男女私情兴趣过大，是一种不健康的风气，革命队伍本身反封建任重道远。周恩来赞赏周扬的看法，也生出来对江青的同情和怜爱。他决心站出来支持江青和毛泽东同志之间「正常的同志式的男女关系」。

延安地处偏僻，民风纯朴，但思想守旧，过去是座土围，必须开新风，树新俗。他建议中直机关领头举办舞会，大家都来学跳交谊舞，推行真正的男女平等，移风易俗。周恩来的提议，得到了毛泽东、张闻天、王明、秦邦宪、朱德、王稼祥等人的一致赞同，认为既可活动筋骨，锻炼身体，是一种健康的休息方式，又可融洽上下级关系，增进同志间的交流、友谊。

可以想见，周副主席的理解、同情，以及在延安倡行跳交谊舞，对江青来说是何等的及时、何等的重要了。而且周恩来对地本人，也公开提携、呵护。

一天，周恩来受邀去杨家岭中央党校演讲，请江青骑马同行。那时，他们身后尚无大批卫士、随从。那时，江青刚取得中央政治局的「约法三章」，被允许跟「毛泽东同志同居，在生活上照顾毛泽东同志。但不得过问党内政治」。江青也刚学会骑马。她的坐骑是彭德怀副总司令送的一匹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

彭德怀从激烈反对毛、江乱搞男女关系（曾经说过最刺耳的话：

我们在前方打日本强盗，老毛在延安偷鸡摸狗），到送给江青坐骑，当然是个很大的转变。

正如战斗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贺龙将军也曾经激烈反对毛、江关系，后来常常派人奉送黄河鲤鱼给江青同志食用一样。人和人总是要相互转换关系的。

那天，江青为了在周副主席面前表现一下自己的骑术，刚扬鞭跃马，马头却向周副主席的坐骑撞了过去。周副主席的坐骑受惊，前蹄腾空，周副主席落地，跌断了右臂。周副主席忍着钻心的疼痛爬起来，第一句话竟是：「蓝苹，今天的事，你不要对任何人提起，包括对主席也不要提起。我只说是自己不小心落马……否则，你在延安会受到更多的指责，更显孤立。」江青感动得拥抱了一下周副主席，流出了真挚的热泪。

对于这段公案，双方都信守了诺言。江青瞒住了毛泽东，周恩来瞒住了邓颖超。直至二十一年之后的一九六七年夏季，文化大革命的疯狂高潮中，身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妻以夫贵大权在握的江青，要抓周恩来「投敌变节叛徒」问题，周恩来才对糟糠之妻邓颖超说出了这段自己为何摔断了右臂的隐情。

周恩来寒心地说，江青是知恩不报，而且要恩将仇报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江青是唯一跟随毛、周、任、陆的中央前委转战陕北的中央领导人的妻子，备尝了战火、雨雪、生死考验。当时毛泽东身边有五位秘书：陈伯达、师哲、胡乔木、田家英、江青。陈、胡、田为政治秘书，师哲为俄文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专责毛的吃喝拉撒。

陕北转战一年，兼任中央直属支队司令员和政委的周恩来看在眼里，江青表现很好。步行、骑马、爬山越岭，风雨里战火里。江青带着女儿李纳，跟大家一起咬紧牙关，经受住了考验。每到驻地歇下，江青除了料理毛泽东的吃住，还主动帮警卫战士补衣裤鞋袜。她带有一把理发剪子，负责给毛泽东理发，也给警卫战士们理发，以及教李纳的保母织毛衣，做针线活，还教警卫班的士兵们认字、学文化。那时的江青，既不像一九三九年前后，也不像后来的文革前后，没有人

骂她戏子、臭明星、会惹事，爱做假。她确是中央直属支队里的一名成员。周恩来多次在支队党的会议上，表扬江青是位顽强的女战士，出色的女同志。

一九四八年四月至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在河北省西柏坡村驻蹕了整一年。毛泽东经常对江青发火，大骂过江青三次。江青找敬爱的周副主席大哭过三回。

头一次是一九四八年夏季，全军开展三忆三查运动，边作战，边整休，边运动，边扩充。忆封建苦、民族苦、家庭苦，查阶级，查思想、查立场这是毛泽东下令推广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的军队工作经验。隶属于中央直属支队的江青也不例外。中央社会情报部查出她在上海当女明星期间，跟许多男人同居鬼混，被捕过，如何出狱？是否自首过？是否当过叛徒？那时江青是个小人物，敌伪报纸上没有刊登过名字和资料，只有江青本人才能交代清楚。江青在党的审查小组面前好狼狈啊，晚上睡到床上向老板哭诉，请老板替她说说话，让她过关。毛泽东大为光火：住嘴！我是党主席，我怎么能替你在上海的那些污七八糟事情打掩护？你到底和多少男人上过床？也从来没有对我交代过！我看你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

毛泽东对江青的厌恶，甚至对自己的卫士也不相瞒：「没想到她的历史这么复杂，不干净。看来跟她的婚姻，是草率了。现在想和她分手，又要顾到政治影响，还有什么领导人的形象！」

有说江青一度想到自杀。反正她怎么改造，怎么跟着部队行军，吃苦耐劳，跟警卫战士打成一片，也不算工农化，也无法摆脱过去的历史。但又有说江青外表柔弱温顺，内里却是钢铁公司，她怎么都能活下去，而绝不会轻生。每当地痛苦无助之时，她就会躲进树林里，小河边，去拉她的二胡，拉她拿手的《江河水》、《病中吟》、《汉宫秋月》，那幽怨愤懑的琴声，能使溪水哽咽，山风饮泣。

她找到周副主席哭诉自己在「三忆三查」运动中受到的委屈，以及老板对她的恶言训斥。周副主席挥了挥那只因她而永远端在右腹上部的右臂，安慰她：「你不就三十年代初在上海的那点子事？查出来什么证据没有？没有就好。就是要重证据嘛，我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不是追求革命，追求进步，追求光明，你一个上海女明星，会去投奔延安吗？延安物质条件那样差，那样艰苦。你投奔延安这行动的本身，不就为你作了最好的证明？不要紧张，放轻松些。你是党员，当然要参加运动，接受审查。你是主席的妻子，主席当然要讲原则，不好替你出面说什么。我可以出面，替你找有关的同志招呼一声。是李克农同志他们？还是中组部？放心回去，照顾好主席的起居生活，才是组织上交给你的重任。」

靠了周恩来副主席的「关爱」，江青在「三忆三查」运动中过了关，她的历史嫌疑问题不了了之，不再有人问津。毛泽东也少了件烦心事，恩来同志还是很会办事，很能办事的。

此后江青每逢政治运动就反感，就躲避，就请假外出养病。由于老板不尊重她，常当着卫士、医生护士训斥她，喝骂她，连带这些服务人员也都敢于议论她，看不起她。她出去养病，就议论她「又外出躲风、逃避运动去了」。五十年代在中南海，她还为这事跟毛的卫士长大吵过一场。在西柏坡村，江青第二次被毛泽东怒骂，是为了女儿李纳的保姆。保姆是个解放区穷苦人家的女子，十八岁，童养媳出身。在老板身边兼做些杂务。江青看出来老板喜欢这个模样儿清秀，见男人就脸红的乡下女子，经常手把手地教她学认字、写字。她和卫士不在身边时，老板还搂搂抱抱的。那妮子也不躲闪，任老板把玩，还哼哼唧唧的喊亲大大。江青发现过几次，也没有去闯破。

她也眼看着就快四十岁了，十几岁从山东老家诸城到济南，到青岛，从青岛到上海。从上海到延安，从延安到西柏坡，也是小半个中国了，什么样的世事，什么样的男人没有经见过？老板是个花心汉子呢，见了年轻漂亮的女人就眼睛都贼亮呢。身体又壮，食欲性欲都很强。像这个年轻的乡下保姆，老板要玩玩就玩玩，只要不对自己的家庭构成威胁。但另一类女子，年轻美貌，有知识有文化又有风度的，她就不能不小心提防了。万不得已时，她也会撕破脸皮。鱼死还网破呢。三八年年底那次，要不是她挺着个肚子闯进中央政治局会议，哭泣着，轻拍着肚子里的那个老板的「果子」（即第二年出生的女儿李纳），还讨不来政治局的「约法三章」呢。老板一是碍着「约法三章」

的面子，才宣布跟她结合的呢。

因老板宠着小保姆，江青对小保姆也陪着小心。但毕竟心里不舒服，吃了个苍蝇似的。一次小保姆给老板补裤子，那针脚长的哟，哪个女人干的活计？江青忍不住把裤子拿了过来，批评说：「连针线活都不会，你还穷苦出身哪！你这哪里是打的补丁？只怕打的木匠的马钉哪！」两个卫士也在旁帮腔，嘻哈取笑，幸灾乐祸。小保姆羞得无地置容，哇地一声哭了：「你们欺负人！你们欺负人……。」毛泽东在书房里看文件，听到了小保姆的哭声，便踱步出来问：「怎么回事？谁欺负了你？」小保姆哭得更凶了，边哭边报告：「江青同志取笑俺，说俺贫苦出身，不会针线活，打补丁的针脚像木匠的马钉……。」

毛泽东刷地一下脸都青了，瞪圆眼睛，指着江青吼道：「蓝苹！你听清楚，在我这里工作的卫士、保姆，都是组织上派来的革命同志，不是你的佣人，奴仆，她出身苦，从小给人当童养媳，砍柴打草放猪，当然不会什么女红！你不是嘲笑她打的补丁是马钉吗？我就是喜欢她打的马钉！你蓝苹不是还会绣花吗？雕虫小技，又有什么了不起？今后，你若不尊重他们，你就给我滚！明天开党小组生活会，你先做检查，再讨论给你处分！」

吼罢，毛泽东拉起年轻保姆的手，进了书房，摔上门。这回轮到江青含了两泡泪水，还不敢冲着书房门回上一声：「你就护她的短吧！只要你不把她的肚皮弄大……。」两名卫士呢，早溜得不见了魂儿。

江青一肚子苦水。还面临着明天的党小组生活会。要当着全体卫士、厨师、司机以及保姆的面，作检讨认错误，向那明明是勾引了她男人的小保姆道歉赔不是，还要接受党纪处分……这是哪门子理？她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偷偷哭了半晌，不知道怎么过明天那尴尬的一关。她忽然想到，邓大姐不是从晋察冀军区医院来到了西柏坡？听说还要秘密转去上海医病，看看人家周副主席，对自己的妻子是何等的关怀。周副主席不是圣人，也有相好的，但毕竟尊重邓大姐，爱护邓大姐。哪像老板这样，又好色，又粗暴专横，典型的大男人主义作风。

江青来到周副主席住处看望了邓大姐，连带着诉说自己不平的心曲。周、邓默默地听着，脸上充满了理解和同情。有一句话，周恩来

不便说出：「主席对待女同志的品味不是很高，总是饥不择食嘛。」这回是邓大姐从正面、反面、侧面各个角度，来阐述夫妇之道，驭夫之术，小不忍，乱大谋，忍得一时气，免却百日忧。丈夫终归是自己的丈夫哩，那些花花草草，算得了什么？我对恩来，就这么着，再怎么着，我也是你老婆……，周恩来则主动提出，由他去找中直党委第一支部第一党小组说说，小组长是小黎对不对？他原来是我的卫士，从我这边调过去的。主席本人嘛，是不会有时间参加党小组生活会的。这几天淮海战场打的正热闹，我军势如破竹，书记处连夜开会，许多紧急情况等着处理。

邓颖超大姐拉着江青去擦干净眼睛，洗脸匀脸。江青细皮嫩肉，明眸皓齿，还是个美人儿。主席也总是不知足，得陇望蜀哩。之后由周恩来、邓颖超陪着，送江青回到毛泽东身边。当着周、邓的面，毛泽东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嘱咐江青泡茶、摆红枣、花生、柿饼，还对邓颖超开玩笑：「小超啊，你一年多没有陪过恩来了吧？让恩来打光棍，晚上不好熬啰！他只好拼命工作。想给他派个护士，又怕你提抗议，嗬嗬嗬。恩来讲你还要去上海疗病，对对，主要是去陪住孙夫人，莫叫她的两妹妹、妹夫，把她接到台湾或是弄到美国去了，那就对我们成立新国家、新政府大大不利啰。」

江青在西柏坡村，第三次遭毛泽东喝骂，是为了吃红烧肉的事。江青是位懂得驻颜保养、讲究饮食养生的人。她饮食偏好清淡，小盘小碟，爱吃蔬菜水果，肉类以鲜鱼为主。贺龙在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在北平附近，经常送来黄河鲤鱼、鲫鱼，白洋淀青鱼、胖头鱼。毛泽东则嗜好香辣辛烈，炒菜必用猪油。

也是湖南乡下人的习惯，认为吃猪油亮眼睛，吃菜籽油则会使眼睛发乌起雾。

猪肉、腊肠、肥肥瘦瘦，他长年不断，百吃不厌。他还有个规矩，每逢前方打了胜战，来了捷报，必定嘱咐厨师给他做一碗红烧猪肉，炖得肥肥烂烂的以示庆祝。他相信吃肥肉能补脑子。他之所以聪明过人，智能无穷，就是因为自小嗜吃肥肉。

江青作为他的生活秘书，实在是出于对他健康的关心，不愿眼见

着他肚皮日益突挺、身体日益肥硕了下去，而悄悄要求厨房师傅，减少猪油用量，肥肉尽量少放。厨师、卫士也都一致同意。这天，淮海战场传来大捷，邓小平、陈毅指挥下的二野、三野，全歼了国民党的八十万大军。这就是说，蒋委员长已经把他最大的一笔战略老本赔上了，不可能在长江沿岸再组织起象样的战役。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已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指日可待的了。毛泽东高兴了，特地叫来卫士长：小黎，通知厨房，今晚上加餐，加一碗红烧肉，肥一点！卫士长当面答应，转背却作难，去请示江青。江青指示，多炒两碟瘦肉吧，量大一点，加上一尾清蒸胖头鱼，三样蔬菜也改用菜籽油。

晚餐依旧是江青陪伴毛泽东。毛泽东很少准许自己十岁的女儿李纳上席。小孩子不得享受特灶。毛泽东兴匆匆地在餐桌前坐下。江青坐在他的对面。一碟碟精心制作的青辣瘦肉片、豆豉肉丝上席了，清蒸胖头鱼也上席了，毛泽东没有等到他的红烧肥猪肉。他仿佛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厉声喝来卫士长：「我讲过的话为什么不作数？为什么不做红烧肉？」卫士长和厨师很少见毛泽东为吃饭的事发这样大的火，一时手足无措，又不敢回答，只以眼睛望望江青，便赶快低下头去。毛泽东盯住江青问：「蓝苹，是不是你发了指示？」江青心里发悚，脸上陪笑，鼓起勇气说：「老板，肥肉吃多了，对你的身体不好，吃肥肉是乡下农民的习惯，他们从事重体力劳动，出汗多，消耗大，你不同……。」

毛泽东桌子一拍，站起身子，指着江青的鼻头：「你住嘴！我就是个湖南农民，我就爱吃农民的饭菜！我有农民的吃喝习惯！你不是说我喝汤、嚼菜出响声，不文明吗？好！从今日起，我不要跟你这个城里人一起吃饭了！我还看不起你这种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城里人呢！」

骂罢，毛泽东一甩手回了书房。不吃了，罢餐。

伟大的党主席罢餐，西柏坡村真要塌了天了。卫士、厨师、大小秘书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了。解铃还得系铃人，他们都请求主席的生活秘书江青同志拿主意。江青当众受辱，好心得到恶报，也正有气：他不吃了，我也没有食欲了，相信你们也吃不下什么了。有什么

办法？你们还是去把周副主席请来吧！人家周副主席快成他的大管家、老妈子了。

周恩来副主席正在接见几位从上海秘密来访的民主党派人士——转达南京政府的和谈意图的，听了卫士的报告，立即中止了跟上海客人们的谈话。赶到毛泽东的住处，立即召集江青、卫士、厨师开会。先表扬后批评，说：「大家爱护主席的身体，关心他的健康，你们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党中央也是满意的。问题是，对于主席长时间以来养成的生活习惯，你们不能操之过急，说改就改。犯了左倾急性毛病嘛。欲速则不达，得讲究方式方法，循序渐进嘛。怎么可以主席说了话，你们又没有征求他本人的同意，就擅自决定不做红烧肉了呢？不可以的！这也是一个尊重主席、爱护主席的原则问题。当然，你们工作得很辛苦，我不应过多的批评你们这些对党、对领袖忠心耿耿的好同志。关键的问题是今后怎么办？大家先说说，怎么办？」

卫士、厨师都苦恼地直抓头皮，江青更是没了主意：老板说今后不要和我一起吃饭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周恩来以和蔼的目光看下每个人一眼，才胸有成竹地说：我看这样吧：我先拿个初步方案，供你们做个参考，今后，厨房里做两份饭菜，一份给主席的，尊重主席的生活习惯；一份给江青同志的，照顾到江青同志的生活习惯。在革命队伍里，还是要男女平等嘛。你们看看，怎么样？还有没有更周详一些的方案？没有了，就先这么试行吧。但每顿饭菜，还是摆在一张桌上，东西相对，同时就食。怎么样？

周副主席处理问题，真叫绝了。江青破涕为笑，朝周恩来鞠一躬。卫士、厨师也跟着向他鞠躬。周恩来赶忙一一来握握他们的手，边说：不可以的，不可以的，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今晚上这顿饭怎么办？

就按我这方案重新做来了，多做一点。主席那里，我负责去请，我来陪吃一餐。对了，小黎，你去告诉李维汉同志，请他继续和上海的朋友们谈，我晚上再请几位老先生吃消夜。

半个钟头后，饭菜齐备。周恩来陪毛泽东说说笑笑。走出书房，来到餐桌前。席分两头：毛泽东这头红烧猪肉、梅菜扣肉、辣子香肠、

酸辣汤、糙米饭；江青那头小盘小碟，精致素淡，加上两个白面馍馍，一小只玉米面窝窝头。

周恩来居中，两头的菜都用。江青为了表示和解，不时探过筷子，来毛的这头挟去一片半片。毛泽东则正眼也不瞧江青的那一头，井水不犯河水。

自此，毛、江夫妻二人，只要在一起用餐，就遵从着周恩来设计下的这一就食方式。直至五〇年代末，毛、江二人在中南海丰泽园内分居为止。那时，毛泽东住丰泽园的菊香书屋，江青住丰泽园内光绪皇妃住过的静园。

第七章 维维啊，你在哪里？

小超来西柏坡村只住了两星期，就又秘密转往上海去疗养。

周恩来无疑是中共最为忙碌的领导人。千头万绪在他这里汇总，由也分别轻重缓急，交由每晚上的书记处会议议决，或是直接送毛泽东审批，后送其它三位书记圈阅。他每天只能睡上两、三个小时。每晚临睡前，均由秘书替他排出一个第二天的节目表来，每十五分钟或是十分钟为一单元，每单元处理一件要务，或是批阅一份文件。每天深夜还随时要被紧急电文、重大情报所唤醒。

他给值班秘书、卫士下有一道硬性命令，一有重要情报、电文，应随时叫醒他，一分钟也不准迟误。

他的书房和卧室只拉有一道布帘子。办公桌旁摆有一张木躺椅，垫着一床黄军被褥，还有一张旧毛毯。毛毯还是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朱老总送给他的战利品，他带着长征到陕北，带着赴西安、赴重庆、赴南京，后又转战陕北，直至西柏坡村。他说他这人比较念旧。包括东西用旧了，就会生出感情。靠了这张躺椅和军毯，他可以抓住空隙，随时躺上去，盖上毯子放松一会。但脑子也空闲不了。快进北平了。这些日子他脑子里经常浮现两张美丽的面影，两双明媚的眼睛：孙维世、龚澎。

小维维，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来西柏坡村看看？上个月初斯大林同志派米高扬秘密来访，想调你来帮忙做做翻译，你这个莫斯科大学戏剧系毕业的高材生都不肯来，请假，说工作实在忙不开。你好像比我还忙哪。丫头，你都在忙些什么？还不是在华北军区筹组你的话剧社，热中于自编自导自演。你是有戏剧才华，而且是个全才。这方面，你是比江青强……我知道，你不来西柏坡村，是不愿见到江青。你总是让她的老板心动。你是个性太强了，太过争强好胜。

你有女子的通病，嫉妒心重。你以为江青的角色好演？她的日子轻松？我倒是庆幸你没有当上她现在的角色呢。嫉妒可是女子的精神毒品，日后可能因此而吃亏呢。

周恩来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孙维世的情景。

那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被蒋委员长任命为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长的周恩来，一天外出开会回来，见办事处门口有个身影清丽的少女，正红着脸蛋、噙着眼泪求告着门卫什么事。他过去看了看。门卫向他眨眨眼睛报告，这个小妹子说要进去找我们的周副部长。他对面目姣好的小妹子笑了：你要找周副部长？跟我走吧，看看我能不能帮你找到他？小妹子跟着周恩来进到办公室坐下。周恩来给她泡了一杯茶，才和气地问：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了？你找周副部长有什么事？

小妹子眼睛忽闪忽闪，大胆地看着他：我名叫孙维世，十七岁了。周副部长和我爸爸是同志。爸爸不在了……我要周副部长送我去延安。

周恩来眼睛一亮：「你爸爸是……。」

小妹子口齿伶俐不等问完就回答：「我爸爸叫孙炳文，妈妈告诉的，我六岁那年，爸爸被国民党杀害了。」

周恩来再坐不住了。浑身都颤抖了，差点大声叫喊了起来：「你是孙炳文的女儿！孙炳文的女儿长这么大了！我就是周恩来，你爸爸的老战友呀！你爸爸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光荣牺牲的。他是我们的坚强战士，革命烈士……过来，过来，孙维世，维世呀，你是党的女儿，烈士的后代，是党的女儿，烈士的后代！」

孙维世早忍不住了，哇哇地哭着，扑向了周恩来：「周伯伯！你就是周伯伯……妈妈常常跟我说起你，说一九三二年爸爸和朱德伯伯在德国柏林留学，你是他们俩的入党介绍人。」

周恩来抱着小维世。让小维世坐在他的膝头上。自六岁起就失去了父爱的小维世小鸟依人地偎依在他的胸前，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她是找到了父爱，找到了温暖和依傍。

接着孙维世的母亲任锐也来到八路军办事处，跟周恩来和邓颖超见面。周恩来留他们母女俩在办事处住下。原来任锐有五名子女，丈夫死后，正生活无着。邓颖超见周恩来那样喜欢小维世，总是拉着小维世的手不放，小维世也一口一声伯伯、伯母的，十分亲人，便说：「任锐啊，维世就给我们做干女儿吧，你看周恩来真是馋这个女儿哪。」当下，任锐便让女儿给周、邓行了下跪礼，喊了爸爸、妈妈。

不久，经周恩来一手安排，小维世和母亲任锐及四个兄妹，被送去了延安。任锐留在中央机关工作，小维世则进了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读书。

在延安，孙维世见到了爸爸的老战友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妈妈。朱德、康克清更是对小维世百般宠爱。十七岁的江南姑娘，长得那么清纯、水灵，一时成了延河边上的金凤凰。朱德又把这只烈士留下的小凤凰介绍给了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王明、任弼时。真是人见人爱，成为中共领袖们共同的宠物。

连生性严肃的彭德怀副总司令从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回来，见了小维世也眉开眼笑：孙炳文烈士的女娃？长得好，长得好，到延安，有出息！

可以说，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的孩子们，谁也没像孙维世那样，被所有的领导人家庭宠爱。特别是朱德总司令一家，凡是吃个带蹄子、有翅膀的荤菜，必定要叫上小维世这宝贝女儿。小维世出入于领导人的住处，带给领导者们愉悦的笑声和青春的气息。自然，也助长了她身上的娇气和傲气。

一九三八年的延安，在大群灰头土脸的红军黄脸婆中，出现了五位美女：烈士遗孤孙维世，民歌手郭兰英，华侨靓妹冯凤鸣，电影明星江青，北平女生吴广惠。其中又以孙维世最年轻，最是顾盼生辉，光彩照人。

江青是这年春天从上海来到延安的，任鲁迅艺术学院戏剧教员。她长孙维世七岁。孙维世比江青晚半年到延安，是为她的学生了。俗话说，女人和女人最难相处，革命阵营里漂亮的女人之间尤其难以和衷共济，总会相互猜忌，暗中较劲，互别苗头。最后是尔虞我诈，彼此夺爱，火水难容。这年年底，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排演多幕话剧《王老五招亲》，孙维世饰演丫环，江青饰演姨太太。在杨家岭礼堂演出时，孙维世演得声泪俱下，感人至深。江青因不喜欢所扮演的角色，表演平平，没有给人留下印象。演出结束，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上台接见演员，直夸孙维世演得好，很出息，学生赛过了先生。

一句「学生赛过先生」，引得涉世不深的孙维世趾高气昂，春风

得意；引得青年教师江青妒火中烧，咬牙记恨。这期间，她们师生俩又正为一名鲁艺的青年领导人争风吃醋，暗中较劲，且又是孙维世占了上风。青年领导名叫徐一新，鲁艺训育长，曾经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被王明封为著名的「中共二十八个半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因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只是挂个名，训育长则为实际的领导者。江青初到延安，进入鲁艺，即与训育长徐一新恋爱，一个年轻美貌，一个风流倜傥，才子佳人，年龄相仿，情投意合，两人很快有了肌肤之亲，已经谈及婚嫁之事。夏天，孙维世来到延安，进入鲁艺，正是情窦初开，急于品尝人生禁果，千不该，万不该，也看上了训育长徐一新。

徐一新名为「中共二十八个半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之一，马列主义理论懂得不多，追美貌女子却是个高手。他自然不难看出，孙维世比江青更年轻，也更亮丽，又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受到张总书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最高领导人的宠爱，前程无可限量。他毅然决然地中断了跟江青的往来，而一门心事地与孙维世热恋起来。延河边那片杨树林里，原先是徐一新跟江青相拥相亲，如今换成跟孙维世的情话绵绵。徐一新教孙维世唱会了《红梅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苏联爱情歌曲。他们常常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成《延安郊外的晚上》。孙维世硬是从江青热烘烘的怀抱里，活生生地撵走了心爱的男人。爱情的甜蜜与痛苦仿佛出自竞争与夺取，失去的永远是最宝贵的。情场如战场，唯胜利者的旗帜高高飘扬。江青是被打落牙齿和血吞了。在最高领导层，她除了跟社会情报部部长康生攀得上一点山东诸城同乡关系之外，就再无半点依傍了。

康生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时本是王明的得力副手，回到延安却出卖王明投靠了军委主席毛泽东，后来果然在撮合毛、江男女私情上出了大力。但此时刻江青却自知不是孙维世的对手。小媳妇是所有领导人心目中的宠物。怎么咽得下这口气？真如《三国演义》里讲的，既生瑜，何生亮？延安既然来了江青，为什么还要冒出来一个孙维世？

江青毕竟是位从上海滩演艺界摔打过来的女子，有血性，也有心计。夏末秋初，刚失恋的那些日子，她经常晚上一个躲到延河边去，

拉她拿手的二胡独奏曲解闷。她的琴艺不俗，悠扬而刚烈，沈郁而忧伤，如歌如泣。以致某个月夜，毛泽东和警卫员出来散步，远远地听到河边传来的琴声，便命警卫员去替他悄悄打探清楚，是谁人在河边弄琴？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江青失去了徐一新，却也要因祸得福了。

其时，用毛泽东本人的话来说，他「刚从延安赶走了三个女人」，一是毛的妻子贺子贞。二是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三是北平女学生吴广惠。贺子贞怀疑毛与美国洋婆子和北平洋学生都发生了奸情，在家拍桌打椅，跟毛大吵大闹，并扬言要派警卫员去枪毙那两个勾引毛的骚货。毛为免事情闹大，命史沫特莱去抗日根据地采访，命吴广惠返回北平，并安排自己的妻子贺子贞去莫斯科治病毛泽东正是空床寂寞，旷夫难耐。江青正是失恋之后，企求新主。江青眼睛明亮，眼力很准。毛泽东虽然大她二十二岁，年龄上可以做她的父亲，但毛已是中共实际上的一把手，多少女子想攀附还找不到门路呢。毛泽东窑洞里那正空缺着的土炕，等着自己去填铺呢。说不定日后还可以当上一把手夫人呢。在康生部长的热心撮合下，她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毛泽东的怀抱，施展开她从上海演艺界男士们身上习得的床第技巧，使毛泽东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性爱欢娱。尤物，真是尤物，妙不可言，欲仙欲佛。几个晚上的窑洞偷欢，两人龙翻凤舞，难舍难分。

上海来的女明星攀上了有妻有室的毛主席，革命圣地延安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却叫孙维世傻了眼：还是江青老师厉害呢！比起毛主席来，一个鲁艺的训育长，算得啥玩艺儿？

不久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开会，汇报工作。这次邓颖超大姐没有陪他回来，杨家岭有一座为他空置着的舒适窑洞。他和干女儿也是一别半年。他很快了解到干女儿跟江青为一个叫徐一新的干部争风吃醋的事。幸而江青退了出来，又另恋上了毛泽东同志。否则为这种夺人所爱的风流事件哭哭闹闹，在革命圣地延安影响会有多坏。一天会后，周恩来把干女儿孙维世叫到自己的窑洞里，关上门，狠狠地进行批评教育：你还不到十八岁，正是读书上进的年龄，谈什么恋爱？而且跟人去争一个男同志，多不道德？那个徐一新也太不像话，不走

正道。什么「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狗屁！王明同志私自在莫斯科封赠的这称号，也太片面了。

你知道吗？连毛主席、朱总司令、少奇同志的名字都没有，我也没有，他这算什么狗屁标准？我看徐一新应该上前方去锻炼，而不是躲在后方搞三角恋爱，败坏风纪，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加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调。维维啊，你要争气，要听话，要立即中断跟这个徐一新的往来……。

周恩来似是严父，更多的还是慈父。孙维世被骂得涕泪交流，可怜楚楚。

周恩来心软了，心疼了。他将干女儿搂在了怀里。干女儿也依恋着他。干女儿倒是有什么话都不瞒他，肯把心事说给他：「你看嘛，我都长这么大了嘛……，我也不要影响你和干妈的关系……。」

一九三八年秋天，周恩来刚四十出头，何尝不是热血男子，七情六欲都很旺盛？一个年近十八，成熟得水蜜桃似的江南美女，温香软玉，投送在自己怀抱里，且是那么的依恋，那么的热烈……。短短几个小时的个别谈话，完成了一个非凡的转变，一个伦理观念上难以逾越的转变。此后，干女儿和义父都有了双重身分。

孙维世听从了周副主席的教诲，中断了与鲁艺上司徐一新的往来。一个被众多领袖人物所宠爱的红色公主，自然要认清前路，一心向上。

周恩来作为中共的首席代表，兼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自然是住在陪都重庆的日子多，回到延安的日子少。但只要回到延安，就力排众议，尽力促成江青与毛泽东同志的同居关系。他是为孙维世，也是为自己。同时又能藉以缓解江青与孙维世的关系。他知道毛泽东也很喜欢孙维世。毛每回见到小维维，眼睛都放亮的，拉住小维维的手，半天都放不下的。他再也不愿看到另一种多角关系的形成，即孙维世插足毛、江之间，重来一番争风吃醋，乌烟瘴气。

说是毛、江关系渐趋明朗之后，一次江青见到孙维世，颇为得意地说：小孙呀，你叫主席做伯伯，这回该叫我做阿姨了吧？孙维世小鬼大，不知厉害，又嘴不饶人：是吗？该叫你做什么，只怕还说不准哪！贺子贞才是我阿姨辈分的人，她快从苏联回来了吧？只怕到时

有好戏看哪！说的江青脸上挂不住，红一阵，白一阵，下不来台，还不敢发作。

周恩来却成为江青在延安最可亲近、尊敬的人。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周恩来因陪江肯骑马去中央党校，途中被江青的坐骑冲撞，摔断右臂。周恩来因此未能返回重庆，留在延安由当地中草药医生疗伤。在这之前，中央政治局已通过了认可毛、江同居关系的「约法三章」。毛泽东、江青举行了一次简单的「婚宴」，请了两桌客人。客人名单上有女作家丁玲和鲁艺女生孙维世。丁玲、孙维世二人竟然拒绝赴宴，不给毛、江面子。丁玲结记的是四年前在瓦窑堡时跟毛泽东的短暂恩爱；孙维世妒恨的是江青，这个前不久还败在自己手下的女人，这个在延安地方几乎人见人恨的上海女明星，竟然一飞冲天了呢，飞进毛主席的窑洞，做上娘娘梦了呢。

延安缺医少药，周恩来摔断的右臂有坏死的可能。中共中央决定让他去莫斯科医治。同年八月二十七日，周恩来一行离开延安，经由甘肃、新疆赴苏联。同行的有邓颖超、孙维世、王稼祥、陈昌浩、李德。王稼祥是新任驻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陈昌浩是张国焘的老同事、老部下，张叛党出逃后，陈须赴莫斯科学习、改造；李德为共产国际驻中共的首席军事顾问，长期与毛泽东不和，这次随周恩来返莫斯科，实际上是被毛泽东所驱逐。唯孙维世随周恩来赴莫斯科是个例外。是孙维世找毛泽东软磨硬缠、又哭又笑、撒娇放嗲的结果。说是江青亦在背后做了毛的工作，放走了这位危险人物，有利地和毛的感情安定，居室和睦。

周恩来一行于九月中旬抵达莫斯科。周恩来随即入住克里姆林宫医院。一住三个半月，由邓颖超、孙维世二人轮流看护。其间，苏俄大夫主张替周截去右臂，但周恩来本人坚决反对。邓、孙二人对周尽心尽力，体贴入微。彼此间难免各怀心事，惹下过种种不快。但邓颖超毕竟是周恩来的发妻，她成功地说服周，安排孙维世入读莫斯科大学戏剧专业，去完成干女儿所喜爱的艺术学业。孙维世是得天独厚了。她是中共公派到外国专修艺术的第一人。后孙维世在延安的母亲任锐曾写诗勉励：「儿父临刑曾大呼，我今就义亦从容，奇语天涯小儿女，

莫将血恨付秋风。」

同年年底，周恩来出了克里姆林宫医院，右臂总算被保住了，但被固定在右腹前，不能伸直。从此，周恩来的右臂永远端在了右腹前，成为他作为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标准形象。

孙维世在莫斯科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六年冬学成归国，途经东北哈尔滨时，拜见过林彪，林彪一见钟情，意欲求婚。但孙维世无意。不久，孙维世回到延安，回到周恩来身边。她时年二十五岁，出落得更为娇媚、艳丽。周恩来最不放心的，仍是她和江青的关系。一别七年，人家江青早已是毛主席的妻子，生了个宝贝女儿李纳，显得温文尔雅，谦和有礼，似个贤妻良母了。江青见了孙维世，十分亲切友爱，仿佛从前什么事都未曾发生过。

孙维世却对江青不冷不热，显出一种学成归来的高傲。毛泽东对孙维世却是更为关切、喜爱了，直夸小维维长大了，成熟了。他专为孙维世设家宴，请周恩来、邓颖超作陪。毛泽东称赞孙维世是共产党自己的红色艺术家，无产阶级的戏剧权威。整个晚上，孙维世滔滔不绝地向毛主席汇报自己在莫斯科的学习、生活情况，还不时站在毛、周、邓的面前表演几个戏剧动作，说几句流利的俄语，引得毛、周、邓大乐，唯独没有把女主人江青放在眼里。

第八章 陪都金孔雀

龚澎，安徽合肥人，一九一六年生，是一位出生于书香世家的名门闺秀。父亲龚振鹏，字镇洲，博学宏词，品性刚正，为辛亥时期著名革命党人。

龚澎自幼入读天主教教会学校，聪慧好学，端庄内秀。一九三七年二十一岁时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精通英语。在校期间思想左倾，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燕京大学共青团。「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联手抗日，龚澎受中共地下党派遣来到重庆，进入设于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任周恩来秘书、新闻发布人兼英语译员。周恩来视若一颗红色珠玉，八路军办事处的仪表人物。此时龚澎身高一米六七，在陪都重庆的知识女性中，她的品貌才学，高雅风度，加上一口流利英语，一时冠压群芳，艳若天人。周恩来的另一秘书王炳南的德籍妻子王安娜称她是「画里走出的人儿」，重庆文化界、新闻界称誉地为「仪态万方的陪都金孔雀」，美国著名的中国通费正清博士说她是环球新闻界一位最出类拔萃的女性，使得驻节重庆的众多英美外交官以及西方记者，多因她的魅力而发狂。

龚澎当然不会把好色而轻狂的大鼻子洋人放在眼里。来到重庆的第二年，她遇见了高她三班的燕京大学校友刘文华。刘文华亦为中共地下党员，毕业后去了延安，被任命为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秘书。

其时刘文华随彭德怀来重庆谒见蒋委员长，住在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

龚、刘二人美女英雄，一见钟情，旋即定情。彭德怀副总司令为人豪爽、古道热肠，乐于成就部属的终身大事。周恩来虽然觉得自己的秘书年岁尚小，但怯于彭老总的情面，亦予批准。于是举行了一个朴素的革命婚礼，不拜天地，不进教堂。只向主婚人彭德怀、证婚人周恩来各行了三鞠躬礼。两位首长的男女秘书喜结连理，一时在中共办事处内外传为佳话。替刘、龚办完婚事，彭老总就匆匆赶回山西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去了，去筹划不久后发起的震惊中外的华北抗日百团大战。临行前，他特准刘文华婚假一月，留在重庆陪伴龚澎度蜜月。

彭老总虽然是个粗人，喜欢骂人训人，但在成人之美方面，倒常常是粗中有细，甚讲情感的。

由于前方情况吃紧，刘文华与龚澎共度了二十九天，就要返回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去。嘉陵江头，依依惜别。刘文华深情地对爱妻说：澎，烽火征尘，万里关山，你、我完成了人生最美好、最幸福的一段。带着你火热的爱，我今后投身疆场，是死而无憾了。龚澎伸手捂住他的嘴巴：文华！不许你讲，不许你讲不吉利的话……。刘文华抱住自己的心上人，还是把话讲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是去前方杀小日本，生死未卜。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讲：「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澎，我有这个思想准备，希望你我也有思想准备。龚澎虽然知道丈夫讲的是大实话，但她还是不要听，不要听：文华，我的壮士，我的英雄，请记住，十年二十年，我都会等着你，不管你日后是伤是残，只要活着，我就会陪伴你到百年。一定的，一定的！我背一首唐诗送给你：「心心复心心，结爱务在深。一度欲离别，千回结衣襟。结妾独守志，结君早归意。始知结衣裳，不知结心肠。坐结行亦结，结尽百年月！」

刘文华回到彭德怀身边，忠于职守，工作勤勉，于战事中表现出色。百团大战之后，奖励有功人员，刘文华被提升为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司令员为后来在八十年代出任过中共国防部长的秦基伟上将），已是中共八路军中的一员战将了。

一九四二年，周恩来为着照顾自己所倚重、关爱的秘书龚澎的感情生活，通过延安的中共中央军委批准，调刘文华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实为出任中共南方局军事部部长，专职协助周恩来指挥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美女龚澎，在即将盼望到丈夫归来之际，更是面若桃花，艳丽照人了。

就在刘文华接到组织调令，将赴重庆与龚澎相聚的前夕，他于一次行军途中急性盲肠炎发作，并很快病变为腹膜炎，因当地医疗条件差，贻误了时间，待被送至太行军区总后勤医院时，未及手术抢救即去世。刘文华临终前忍受苦剧烈的疼痛，浑身抽搐着，歪歪斜斜地给党组织也是给自己的爱妻写下了遗言：「……我的妻子，我在想她……」

我若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它不脱离革命，她就永远对得起我。未能与她共享百年，是我对不起她……。」

刘文华去世一个月后，消息才由延安转到重庆。周恩来痛失了一个好战友，一个尚未到任的好部下。在与中共南方局的另外两位负责人董必武、王若飞商量之后，他受南方局党组委托，找龚澎谈话，告知这个不幸的消息。

他们最担心的是龚澎不哭。龚澎外柔内刚，心性高洁，从不把陪都重庆的一些涎脸赖皮年复一年追求着她的中外公子哥儿们放在眼里。她心目中只有两个可亲可敬的英雄男儿，一是自己的丈夫刘文华，另一个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周恩来。龚澎忠于自己的丈夫，虽然婚后只共同生活了二十九天，但她在党组织生活会上说过，这二十九天，已占有她感情生活的全部。龚澎要是得知她日夜思念的丈夫去世的消息而不哭，只是发呆，神思恍惚，魂不守舍，致使悲苦郁结心头，造成精神分裂，精神错乱，可就真要把这颗红色珠玉、这只陪都金孔雀给毁了。

周恩来找龚澎谈话，首要的，是引导龚澎哭出来，放声痛哭，哭个够，把心中的悲苦尽情宣泄。他把龚澎唤进办公室，掩上门，请坐下。茶几上已经替她沏好了她安徽老家的六安茶，还有两碟她平日喜欢的广西话梅、话李。

龚澎心里怪怪的，天天做周老师的秘书，怎么忽然这么客气了呢？她进而敏感地发觉，平日总是有说有笑、轻松自如的周老师，怎么脸色这么沉寂，目光这么肃穆，出什么事了？

重庆的年轻女性都喜欢称周恩来为「周老师」，而不像男士们称他为「周副部长」、「周副主席」。周恩来细心地替她剥开话梅话李的包裹纸，请她吃。之后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给她讲起了法国大革命时候圣女贞德的故事。圣女贞德的故事龚澎小时候在天主教学学校里就读到过，至今记得很清楚，不知周老师为什么要讲起……。

接下来，周恩来又从书桌上拿起一本打开的书，念起了俄国革命文豪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之歌〉，盛赞那飞翔、击搏于暴风骤雨、雷电轰鸣、山呼海啸中的海鸟。

周老师，请告诉我，出了什么事了？龚澎终于忍不住地轻声问。

周恩来仿佛没有听到她的问话，接下来又讲开了杨门女将穆桂英的故事。龚澎尊敬周老师，并像热爱长者那样热爱着他。她耐心地听完宋代那位杨家孀妇挂帅出征、爱国无私的英雄故事。

周老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就说吧！告诉我，是不是刘文华他……，龚澎眼前一片茫茫雨雾。

周恩来知道本次谈话最艰难、也是最关键的时刻到了，他忽然哽着喉咙、噙着泪水说：龚澎，你是党的好女儿，党的坚强战士，本办事处最优秀的女工作人员，也是我最好的秘书，出色的新闻发布人……。男儿有泪不轻弹，我今天却要跟你一起，闭起房门大哭一场……。我受党的委托，要把一个不幸的消息转达你……。你知道，这对我，同样是个沉重的打击……。

周恩来率先跌坐在木沙发里，痛哭失声。龚澎于张惶失措中傻了，它从未见过周老师这副悲痛欲绝的样子。周老师为革命出生入死二十几年，什么样的厄运、大灾大难没有经见过？一股酸楚的又是暖意的母性感情，溢上了龚澎心头。她移过身去，蹲在周老师面前，双手扶住周老师的膝头，也跟着哭了：周老师，你不要哭啊，你要保重自己啊，我会坚强的，告诉我吧！我会经受住党组织对我的考验……。

周恩来坐直了身子，两手抚在龚澎的肩上：澎澎，党的好女儿，我的好同志，我今天就是要和你一起，我们谁都不要把悲痛闷在心里……我哭，自己失去了一个好干部，好弟兄，你哭，是失去了好丈夫……延安来了电报，刘文华同志已经为党的事业、为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晕天黑地，哇地一声，龚澎气绝在周老师的怀里。周恩来哭着连忙拍打她的肩背，终于把她的哭声拍打了回来……：文华，苦命的文华，你狠心把我扔到了这世上……。文华、文华……。三年前，嘉陵江边送别，你就有了预感……。那时，我心里有句话，没敢告诉你，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我从小受过洗礼，可我们结婚没有进教堂，主会不会怪罪我们，肯不肯庇佑我们……。呜呜呜，主啊，我成亲没有进教堂，您就这样惩罚人……。呜呜呜……。

根据战时规矩，八路军曾家岩办事处没有为刘文华举行追悼会。刘文华是牺牲在八路军太行军区二分区政治委员任上。只在周恩来和龚澎二人的胸前，各佩了一朵小小的素白绢花。后来他们又在一起哭泣过几场，两三个月下来，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痛失了丈夫的龚澎，把一腔感情转移到了周老师身上。她越来越依恋周老师。它每天早起，在周老师上班之前，把他的办公室清扫得干干净净，整理得井井有条。连削铅笔、研墨汁之类的小事她都细心地做。有时周老师从外边回来，只要没人跟随，她就会凑近提提周老师的衣领，扯扯老师的衣襟，或是轻轻提醒：胡子又长了，你要天天修面哪。

周恩来生平喜爱美色，怜香惜玉。他不乏关系亲密的美丽女友。他的「干女儿」曾经达到三十九名之众。但很少有人能真正动摇他的家庭观念。邓颖超也表现得相当大度，内紧外松。龚澎却是个例外。周恩来太喜欢这个才貌双绝、性格温柔、秀外慧中的女秘书了，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

丈夫去世后，龚澎在办事处内外，新闻发布会上，成了「冷面美人」，更显得高雅绝俗。却把一颗心交给了周老师。她是个情种。她说：「周老师，我心里好害怕……。可我以前什么都不怕。」

「你怕什么呀？任什么事，有我顶着，小傻瓜。」

「我怕离开你。一天见不着心里就慌得厉害。」

「我也是，从未有过的，是刻骨铭心了。好像自己活在这世上，就是为了两件事，一是党的事业，二是你……。」

「周老师，没有了刘文华，我再不能没有你了。我不在乎名分。只要能跟着你就成。」

「傻话，真是傻话。你不在乎，我在乎呀！是要认真考虑了。」

可是周恩来没想到邓颖超这回会主动出击，并意志如铁。当然是关起门来大吵大闹，寻死寻活。中国传统妇女对付变心男人的十八般武艺全都披挂上阵。邓颖超哭闹之后是哀哀求告，晓以大义，诉以利害：「你和龚秘书闹出这事，你们想到过后果吗？」

「想到过。我终要跟她名正言顺的。」

「恩来啊，你怕是在痴人说梦吧？还是在装愚卖傻？」

「什么意思？你不再哭闹就好。问题可以摊开来讨论嘛，我们好好商量，总可以找到妥善解决的办法嘛。」

「好，我们都冷静下来，我也不再找你哭闹了。但你要先听我把话说完，不要中间打断。」

「可以的，先听你说。」

「我是说，你跟龚澎在大后方乱搞男女关系，这事传回延安党中央机关去，传到山西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去，会是个什么反应，造成什么影响？八路军将士在前方英勇杀敌，流血牺牲，党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喝小米粥、啃窝窝头，你作为党的代表，长驻重庆吃香喝辣，大宴小宴，却还要在蒋委员长的眼皮底下，跟自己的女秘书、也是革命烈士的遗孀乱来！刘文华同志尸骨未寒！你一位党的高层领导人却占有了他的娇妻！我不知道你怎么去面对延安党中央的同事，怎么去面对太行山的八路军将士。事情公开了，只怕你连曾家岩办事处都待不下去！你有勇气携龚澎情奔出走吗？」

「你住嘴！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龚澎同志也是。」

「这就对了。恩来呀，你也是党的一位久经考验的领导人物了。什么是轻，什么是重，难道还不会掂量？再说，在党的历史上，你既执行过陈独秀的右倾路线，也执行过瞿秋白的左倾路线。还有李立三路线，王明、秦邦宪先左后右路线。党的哪次错误路线少过你？你那次不是积极推行者？在江西中央苏区，你代表王明的党中央整过几次毛泽东同志？你以为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彭德怀这些同志对你没有看法？前两年你跟孙维世的事我都忍了，也不提了。这次你跟龚澎的事，只要传到延安去，你就把自己孤立于党的领导集体之外了，二十几年出生入死打下的基础就毁在你自己手里了。我不怀疑你对党的忠诚，对理想的执着。但你会下台。不要以为蒋委员长看重你就没有人能取代你。只要延安一个指示，南方局的董必武同志、王若飞同志就可以随时替换你。当然你会说，你可以从头做起。但那是很困难的。在党的历史上，领导人下台之后，都很难东山再起……。」

晓以利害，击中了要害。在感情问题上，周恩来总也斗不过邓颖超。邓颖超的后面站着党组织、党中央机关、党的领导集体，说不定

还要加上太行山的八路军总司令部。事情明摆着，关于婚姻家庭，只要邓颖超不放他一马，他就休想有任何改变。他既想要党的事业，又想要个人感情。个人感情却从来要服从于党的事业。

面对着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周恩来屈服了，退让了。这也是他的优点，总是善于在党内妥协、退让。在同辈同事们面前退让，包括对邓颖超同志退让。牺牲的是自己的感情，女友的感情。

当他把妻子的这番道理，有所保留地倾诉给美丽的龚澎听时，龚澎第一次叫了他傻大哥：我可从没想到要你去跟她摊牌呀，也没有要求你跟她分开。她说的都对，是没法对延安党中央、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做交代。我一个人好办，只要不离开你，留在你手下工作，天天可以看到你……。

澎，那也太苦了你，太对下住你……这样吧，我们两个既已好成这样，你今后就要听从我的安排。可惜我不能学春秋时候的范蠡公，带了自己的西子去隐居太湖……。

一九四三年夏，日军侵占香港。中共香港地下工委负责人、《时事晚报》及《华商报》主笔乔冠华率地下党人员，撤离香港，经桂林回到重庆，在中共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工作。乔冠华笔名乔木，被毛泽东称为「南乔木」。而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亦笔名乔木，则称为「北乔木」。南、北二乔，文采风流，文章锦绣，足为中共的两支笔杆，两位才子。且「南乔木」更是精通英语，能说善辩，风度潇洒，人品俊逸。

乔冠华在香港期间曾跟才艺超群的女钢琴家姚锦新小姐相恋。但姚锦新小姐不愿返回战火纷飞的内地，而远涉重洋去了美国。两人恋情就此中断。

乔冠华才华洋溢，一时成为重庆众多名门闺秀所追求的目标。就在周恩来、邓颖超奉党中央命令返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前夕，周、邓精心安排龚澎与乔冠华见面，并作东请饭。果然，风流倜傥的乔冠华立即被才貌双绝、风度高洁的龚澎所倾倒，进而苦苦追求。才子佳人，相互倾心，龚澎不得不割舍了对周老师的感情。两人很快定情，结了婚。

虽然不无遗憾，周恩来总算了却一桩心事，结束了一笔情债。

一九四五年秋抗战胜利，乔冠华重被派往香港，以名作家、名记者身分作掩护，接续领导香港地下工委工作。龚澎随行，劳燕并飞。

至一九四九年春天止，周恩来已经将近四年没有见到美女龚澎了。屈指算来，龚澎刚进三十三岁，正是一个女人走向成熟、最富风韵的年纪。

第九章 北平赶考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选定进北平的日子。

三月，对中共领导人似乎是个特别的月份。两年前的三月十八日，毛、周、任、陆率最后一批中共中央机关人马撤离延安。一年前的三月二十三日，毛、周、任、陆率中央前委机关过黄河，进入华北地区。今年三月这回，却是启程前往北平，去定都、建国。周恩来幽默地说，看来三月二十三日是个吉日。

毛泽东凌晨三时上床，仍然毫无睡意。是兴奋得不能入眠。他靠在床上嘱咐卫士，早上九时叫他起床。他拿起一册《史记》，翻到〈项羽本纪〉来读，也没能读进去。到北平去！意味着一个新朝代的诞生、新的国都、新的国号、新的纪元、新的基业……。想起三十一年前的一九一八年夏季，他一个湖南青年学生头一回进北平，身上穷得虱子都咬不出血，八个人共睡一张土炕，放屁都不敢翻身子。那时，偌大一座千年古都谁把他放在眼里？谁认得他毛润芝是老几？不久连街头小贩的烧饼、白薯都吃不起了，只好去投奔恩师杨昌济教授，在杨家白吃白住。杨教授的北大同事梁漱溟先生第一次见到他，还以为他是杨家的门房……。正如那句俗话讲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士别三十年，更要刮目相看矣！这回是以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三百万人民解放军统帅的身分进北平。北平，你再冷落不了我这乡下人……。乡下人以农村包围城市，今天得到了城市……。可是，明末李自成也是乡下人，率领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不到一个月，领袖们就腐败得一败涂地。李自成本人住进皇宫自封皇帝；丞相牛金星天天大宴宾客，广招门生；大将军刘宗敏则搜括财物美女，天天严刑杀人。连镇守山海关的大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也被刘宗敏霸占。几十万起义军士兵也屯集北京，大肆抢劫……。李自成、刘宗敏们的倒行逆施，终于激起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放清兵入山海关……。李自成很快被清兵击溃，退出北京，败走河南、四川，旋即烟飞灰灭……。我们不要做李自成，不要做李自成……。

早上六时，周恩来来到毛泽东住处的值班室，问值班卫士：「主席睡了没有？」卫士进到内院，到毛的卧室门口望了望，回来报告周副主席：「没有，还在抽烟、看书。」周恩来说，「想想办法，让主席睡一觉。」卫士轻声说，「医生开的安眠片，主席又不肯吃。」周恩来眉头一抬：「难道就没有别的法子了？你们上午十点才喊醒他。」卫士明白了，周副主席的意思是叫人给主席做全身按摩，或是去请江青同志来陪主席睡觉，主席一阵龙威虎猛，累了，也就睡着了。

周恩来本人也是通宵未眠。也是兴奋得睡不着。他让自己的卫士长提着马灯随着他，到那些搬空了机关借住的房间内，一处一处的检查，看看有无疏忽遗忘，看看院子已否打扫干净。中直机关的大部分人马已经陆续去了北平西郊，在香山的一些国民党官僚撤走后空置下来的公馆别墅里，以及一些大小庙宇道观安顿下来。他还特别规定了一条：中直机关工作人员，不是工作需要，三个月内不准进城。中央警卫团除执行任务者外，更严禁进城。

七时，周恩来才回到自己的住处。工作人员已经起床漱洗。他悄悄进了卧室，和衣靠在床上。他有些累，但很清醒。他庆幸党的领导人物都很清醒。首先是毛泽东主席很清醒，年初即重新提出来，要求全党高级干部重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不做李自成。二月份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经毛泽东主席提议，做成会议决议，进城后，切记戒骄戒躁，厉行勤俭建国，不大兴土木，不盖楼台馆所，严禁给领导人做生日、祝寿，禁止以领导人的名字做街名、地名、城市名称，严惩腐败贪污，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等等。刘少奇同志更清醒地提出：根据我国国情，进城后，不忙实行社会主义，而应先实行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发展经济，繁荣市场，鼓励工商业，条件成熟时，再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主席完全赞同刘少奇同志的意见，说这也是党中央的集体意识，并问少奇同志：实行新民主主义，十五年的时间够不够？少奇同志说，可能还要长一点。毛泽东主席说，那就二十年吧。

周恩来拿起摆在枕边的那本《甲申三百年祭》来翻看。郭沫若的这篇史学论文，最初发表在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重庆

《新华日报》上。还是他带到延安，推荐给毛泽东的。毛泽东阅后大感兴趣，称赞郭沫若的文章做得好，做得及时。抗战胜利在即，革命迅速发展，是得吸取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惨痛教训。毛将郭文列为延安整风文件，全党干部人手一册……。

「……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李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撙节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

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抢掠民财者也」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就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实在是并非浅鲜。……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

几小时之后，就要启程去北平。这可是个历史性的日子。从农村进入城市，从打天下到坐天下，从战争到和平，从动荡到安定。是得居安思危啊！毛泽东主席不做李自成，他周恩来不做牛金星。但他喜欢做事，喜欢忙碌，喜欢热闹。对于堆积如山的事务、文件、会议、会见，有一股狂热的情感，从无厌倦。越乱越忙，越显出他的英雄本色。他早就迷恋上了日理万机，一批又一批的工作人员围绕着他团团转。在党内高层，或许有人怕做政府总理，上下不讨好，左右易受气。他却乐于当总理，从未想过做党主席。就像毛泽东乐于做党主席，而从未想过当总理。总理就是宰相。内阁总理事务大臣，是晚清才出现的官衔。英日称首相，苏联称部长会议主席。还是中国人发明的「总理」这一名称准确又耐听：当然最根本的区别，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

帝制后，总理大臣不再需要每日五更早期，去行三跪九叩，三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九时，周恩来被室外的说话声惊醒了。他一看表，吓了一跳，翻身站起，开门一看，是刘少奇和他的新夫人王光美、朱总司令和夫人康克清来了。

他们个个容光焕发，笑容满面。他歉意地说：「对不起，醒迟了。你们去过主席那里了？」

刘少奇拉着小他二十四岁的王光美的手，说：「去过了。站在值班室门口，都听得到院子尽头主席的鼾声。主席睡好了，这比什么都重要。」

周恩来说：「对，对。我向主席的卫士交代了，十点钟才叫醒主席，尽量让他多休息一会。总司令，你和克清同志都有早起散步的习惯，我真是羡慕你们。」

朱德乐呵呵地说：「我们已经把西柏坡上上下下都走了一圈。我和少奇在这里住了一年半啊，他还在这里办了喜事。你和主席也住了快一年了吧？这里是我们的新起点罗。还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它。」

刘少奇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西柏坡是个有纪念意义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可以考虑在这里搞个纪念馆。」

周恩来连忙点点头：应该，应该。到了北平，等忙过一阵子，提议政治局专门议一次，统筹规划，分期分批，把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还有南昌、西柏坡等地方的革命历史纪念馆，建立起来。

王光美像个女大学生似的，怯生生地问：「我们党小组刚学过七届二中会议文件，不是进城后禁止盖楼台馆所？」

康克清说：「王光美啊，你太年轻，还不懂得我们党的许多习惯……。」

刘少奇怕王光美难堪，接过话题说：「二中全会的决议，是禁止领导人搞特殊化。盖纪念馆是为了胜利后不忘本，也是为了对全党同志及其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周恩来说，「少奇同志是深思熟虑的了。党的有关决定，也是可以根据新情况、新需要作出修正、改动的。」

刘少奇说，「韶山，还有韶山，不管主席本人同不同意，都应当设纪念馆。」

朱德这时插话说：「开国之初，百业待举，够大家大忙特忙好几年罗，还要内外安宁，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快开饭了吧？我们要先填饱肚子罗。」

恰好服务员进来报告：「首长，早餐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都送到这里来，首长们一起吃？」

周恩来问：「今天要上路，有什么好吃的？」

服务员报告：「白面馍馍鸡蛋汤，还有酱萝卜。」

朱德说：「少奇、光美，我们就地解决了吧？吃了一年多的白面馍馍，我可还是喜欢炭火烤红薯。进了北平，只怕是更难吃得到了。」

王光美说：「总司令，北平的烤白薯才出名哪，我上学时候，天天在街角的小摊上买一个，现烤的，边吃边走，又香又烫手。」

康克清问：「光美小妹，听讲北平还有糖葫芦也很出名，是啥子东西做的？」

大家边吃边说笑，仍不时有电报、急件送到饭桌上来请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阅签。还有军委秘书长杨尚昆来报告今天经过调整后的车辆安排：共是美式中型吉普车十一辆，苏式军用卡车十辆，五大书记和各自的秘书、卫士长各乘一辆吉普，其余领导人三人或四人共一辆吉普，领导同志的家属小孩以及其它人员，都坐卡车，人和行李混装。行车顺序，因考虑天气干燥，二十一辆大小车子一齐开动，灰尘很大，除沿途已由十九兵团负责全线警戒外，中央警卫团的骑兵连打头，与车队拉开一华里的距离。主席的吉普是第一辆，其余吉普随后。

不觉已是十点。服务员来报告周恩来：「主席值班室电话，请周副主席立即过去一下。」

朱德夫妇、刘少奇夫妇都站了起来，告辞离去。

周恩来快步来到毛泽东住处，见毛坐在床沿，卫士长正蹲在地上，帮毛穿裤子，系鞋带。毛则一脸下高兴，瞪了眼睛在训人：说好九点钟叫醒我，为什么推迟到十点？革命还没有完全胜利，你们就不听我的了？

周恩来笑笑微微地进来：「主席，休息好了？」

毛泽东下床，立正床边，任由卫士长替他结上裤腰皮带，扣上裤扣：「恩来，他们这么快就搬救兵来了？」

周恩来说：「不怪他们。是我六点钟过来看了一下，说你还在看书。我叫他们十点钟才叫醒你。今天要上路，坐长途汽车也很累人的，让你多睡一会。」

毛泽东伸起双手，慢吞吞地伸了个懒腰，笑了：「睡得不错。今天进京，不睡觉也高兴啊！进京赶考嘛！是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跟着笑了：「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被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告诉杨尚昆，我们不要一天赶到北平，路上慢慢走。进城不性急，告别乡村。」

下午一时，西柏坡村旁，滹沱河北岸马路上，一字排开二十几辆军车。

十一辆吉普车为清一色的马力强大的美式战场指挥车，都是前方将士缴获来的战利品。司机和卫士们均已站立在车旁。中央警卫团的骑兵连亦列阵待发。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陈云、李富春、张闻天、李立三、王稼祥、陆定一、杨尚昆等人，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来到车队前。

上车前，毛泽东要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每人讲一两句话。

毛泽东说：「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考出好成绩来。满分不可能，八十、九十分也不大容易，争取七十分，至少六十分！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李自成，更不是牛金星和刘宗敏！我们不能再爬雪山、过草地，进行长征了，我们要千秋万代长住北平！」

大家长时间热烈鼓掌。

朱德说：「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我到了北平，最想吃烤白薯，看看它和井冈山上的红薯，陕北的红薯，味道有什么不同！」

全体大笑，热烈鼓掌。

刘少奇说：「我们从农村进入城市，从解放战争走向和平建设，从打天下走向坐天下，这是伟大的历史转折，我们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要把握住这来之不易的历史契机！这就是说，我们要建设新中国，进行新的万里长征！」

大家鼓掌。

周恩来说：「主席刚才讲了，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我的理解，我们都要考及格。我们也一定能够考及格！总司令说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少奇同志说得好，面对伟大的历史转折，我们要从头学起，进行新的长征！」

大家热烈鼓掌。

任弼时因肺病复发，被卫士扶着，已上了汽车。他表示只有高兴，没有什么说的了。因转战陕北期间，他跟毛闹得不愉快，书记处已决定他进北平后，主要任务是养病。

第十章 陕北来的老棉袄

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组成的「进京赶考」车队，当天只走了一百来华里，就停留在唐县附近的淑闾村。本来可以赶到涿州过夜的。毛泽东说：「急什么？要赶到北平去吃大席？」

早有汪东兴等人去布置警戒，杨尚昆等人去安排食宿、架设通讯设施等。周恩来则亲自到毛泽东的下榻处查看，四周环境是否安静，门户是否安全，晚上如厕是否方便，毛每日必备的工具书《辞海》、《辞源》，近来又在攻读的《史记》、《资治通鉴》是否已从行李车上取下来了。

毛泽东早已心照不宣地观察到，周恩来热心服务，认真、细致、周到。

晚饭后，毛泽东让周恩来下通知，除病号任弼时休息外，朱德、刘少奇、陈云、董必武、李立三、张闻天、王稼祥等，都到他的住处来集合，听取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的工作汇报。

人员齐集后，毛泽东看着战友们，都和自己一样身着清一色从陕北穿来的青灰布老棉袄，很为满意，也很有些感叹。这一身老棉袄有纪念意义，是一个象征，却差点叫周恩来、杨尚昆他们给换了装呢。

那是在西柏坡村驻蹕期间。一天，负责中直机关后勤事务的军委秘书长杨尚昆，来找周恩来汇报，说是聂荣臻同志的华北野战军司令部那边，有一批从傅作义部队后勤仓库接收过来的美国纯毛制服呢，厚的薄的都有。聂总问是不是送一卡车到西柏坡来，再挑选几名北平裁缝，来给中央领导人换换装。这样，大家进北平时也穿得整齐、气派些。主席和总司令进北平，少不了要举行个阅兵仪式。

周恩来表示同意，春天到了，天气会日渐暖和，虽说大家身上的陕北大棉袄应当珍惜，但换换季，轻轻装，还是可以考虑的。聂总说的也有道哩，进北平时大家穿得整齐些，也是个政治影响问题。

杨尚昆要求周副主席去向毛主席提出。周恩来问：「尚昆，你一直留在延安工作，和主席共事的时间比我还长啊，这么具体的事情，为什么自己不去说啊？你又不是不知道，主席是喜欢下面的同志直接

向他汇报工作的。」

杨尚昆老实巴巴地说：「本来不是什么大事情……去主席那里汇报，要看他的心情而定。他心情好的时候，当然很耐心、很和蔼。就怕撞上他烦心的时候……把换装的事提到原则高度，思想作风问题，就不好办了，连带聂荣臻同志都会吃批评。」

周恩来点点头：是啊，有时你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是很为难的。但以后你不要再跟人谈论主席的脾气。记住了，主席就是跟我们发脾气，也是出于对大家的爱护和关心。换装的事，我也要看看机会，在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来议一议。

记得是一月三十一日晚上十二时，北平和平移交仪式完成的电报传到西柏坡村。毛泽东主席高兴了，让朱、刘、周、任，加上董必武、张闻天、王稼祥、李富春、李立三、陆定一诸位，来他的住处小聚。又吩咐江青下厨，帮助厨房弄出几样荤素菜食，喝着山西老窖，来了个小小的庆祝。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中直机关进驻北平便提到了议事日程。南方北方的钻了二十几年的大山沟，蹲了二十几年的茅屋窑洞，有了今日，意义大着呢。

确是破了例。一般来讲，毛泽东是严禁中直机关人员搞什么祝捷活动。

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结束，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天津战役结束，他都没让搞什么祝捷活动。他总是在捷报上批上一句孙中山先生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或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之类的豪言壮语。再就是允许高级领导人的小灶食堂，中级领导人的中灶食堂，普通干部及警卫部队的大灶食堂，一律一人加一份红烧猪肉。每逢打了胜战，毛泽东就要吃炖得肥肥烂烂的红烧猪肉。

当晚的酒宴结束后，毛泽东留下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开每日凌晨的书记处例会。周恩来趁着毛主席兴致好，便将聂荣臻提议送一卡车美国制服呢和几位北平裁缝来，给中央领导人换装的事，说了说。

朱德总司令听了很高兴，说：「好嘛！快进北平了，大家是应该穿

得体面点。过去没有条件，部队不讲究军容，基本上缴获到什么就穿什么。今后要逐步改善，军纪、军容、军威，三位一体。」

毛泽东喝着浓茶，眯缝着双眼，边剔牙边说：「总司令同意了，就换吧。一人一身中山装，人置衣裳马置鞍……现在是供给制，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换不换？警卫部队的士兵换下换？好几千人马哪。」

周恩来说：「傅作义的华北总部有现成的被服厂，仓库里存放着一批棉布。我们的华北野战军也有后勤被服厂，要是单换中直机关人员和警卫战士的服装，应当不是很困难。」

任弼时说：「傅作义的后勤仓库里，有没有现成的服装？把帽徽、领章改改，不就可以先将就着穿？」

周恩来说这要问问聂荣臻和杨尚昆他们。

刘少奇低头审阅着一份什么文件，这时抬起头来说：「不太好吧？快进城了，共产党的干部、战士穿国民党官兵的服装？」

毛泽东笑了：「国民党的军服，我们不少同志穿过多次啊！总司令和恩来是代表。第一次国共合作，恩来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军第一军党代表；总司令那是是军官教导团团座。穿的都是国军军服嘛！第二次国共合作，恩来官拜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至少同中将衔吧？总司令则是接受改编后的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也是中将衔吧，还不都穿的国军的将官服？身在曹营心在汉，服装不是实质问题。衣服怎么穿啊？小事一件，也可以是大事一件，大家议一议，如何？」

这时江青提着茶壶进来给五大书记续水，听在谈论服装的事，便插进来说：「你们男同志，也应当考虑一下我们女兵的服装呢，不要搞得都是四个口袋或是两个口袋，男女没有区别。女兵的裤子，最好改成裙式……。」

朱总司令哈哈笑了：「解放军女战士穿裙子？当兵可不是上学堂，进舞厅呢。」

刘少奇说：「苏联红军的女兵是有裙装，长裤子外面套裙子。」

任弼时说：「现在还考虑不到给全军将士定装的事。」

毛泽东见江青说的不着边际，便脸一沉：「蓝苹！你要守纪律。你

只是我的生活秘书，这里是书记处会议，党内军内的事，你不要随便插嘴！服务员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总是你来添茶倒水？」

周恩来见江青脸上挂不住，眼睛里已是泪闪闪的，忙说：「因为在主席这里开会嘛，江青也是主人嘛！谢谢你，主席也是关心你。这些事，还是由服务员来做吧。李纳睡觉了？」

江青感激地朝周恩来点点头，无声地退出去了。

毛泽东见各位不再开口，有点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恩来，换装的事，你找杨尚昆他们去统筹安排吧。下面还要讨论别的事？我们要抓大事，不要变成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下一步应是林、罗的第四野战军南下，配合二野、三野，打过长江去，决不搞什么划江而治。宜将剩勇追穷寇，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周恩来以为问题解决了，毛主席同意了给中直机关人员换装。第二天中午，周恩来通知杨尚昆：「谈妥了，换。中央委员及中央直属部副部级以上干部，一人一套呢制服；以下干部和中央警卫团官兵，一人一套布军装，样式统一为中山装，干部四个口袋，士兵两个口袋。」

可是当天下午，毛泽东一觉睡醒，想起昨晚上（实际上已是当日凌晨）谈到中直机关人员换装的事不妥，这个口子开不得也，立即碰了碰床头边的那只铜铃。铜铃是周恩来送他的战利品，不大，作传唤用，一碰就会发出一串清脆的叮铃声，值班卫士一听铃声就会进来。

卫士在毛泽东身后垫上两个大枕头，再扶他起来半躺半靠着。第二件事是泡来一大缸滚烫的浓茶。毛泽东边喝茶边看着周恩来的军委作战室送上的各路大军战报和当天的《人民日报》。卫士退出。

铃声又响。毛泽东对探身进来的卫士说：「去把杨秘书长找来。」

不一会，卫士进来报告：「杨秘书长正在周副主席那里研究事情，他说稍等一会就到。」

毛泽东不由分说地手一推：「再去，要他马上来，先来我这里谈。」

杨尚昆快步进来时，头上冒着热气。毛泽东仍半靠半躺在床上：「尚昆啊，你在我身边工作有多少年了？坐下，坐下说。」

杨尚昆不知头尾，小心地在床边木椅上坐下，笑说：「自一九三四年长征算起，到陕北后我一直留在中央军委，除四七年三月主席分

配我和剑英同志去山西，在军委工作一年，共有十五年时间都在主席身边。」

毛泽东燃起一支香烟：「是啊，十五年啊，不算短罗。在我身边工作过的人，你是创纪录的罗。你和恩来共事多长时间？」

杨尚昆怕冷似地缩了缩肩膀，坐直了身子：「江西中央苏区时期，长征期间，我都在红三军团工作，和彭老总、少奇同志共事。真正在周副主席手下工作，是最近大半年的事。」

毛泽东递给杨尚昆一支烟：「记得你是红三军团政委，老彭是司令员，少奇同志是政治部主任，老资格了……这烟是傅作义送的大中华，不错。听说傅将军也要送你两条，你没有收？」

杨尚昆说：「傅作义来见你，一共才带了十条烟做见面礼。我去石家庄机场接他，他大约见我抽烟抽得多，就要拿出两条来，我当然不敢领他这个人情。」

毛泽东笑了：「看来，你还是个老实人，会办事，所以一九三五年到陕北后一直留你在军委做秘书长，可是，如今有些事情，你为什么不愿意直接来找我谈？如果你们都不愿意直接找我谈工作，我这个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不就成了空壳了？」

杨尚昆心里打了个冷噤：「我的工作有疏忽，有错误，请主席批评、教育。我认真检查，改正。」

毛泽东深深吸一口烟，眯上眼，闭上嘴，全吸进去了，一丝不漏，好一刻，才从鼻孔里透出淡淡的两小股。他眼睛仍眯着，忽然很响地咳了一口痰，噗地一下准确无误地吐进脚边的痰盂里，才问：「给中直机关人员换装的事，是怎么个来龙去脉？你刚才正跟恩来研究这个事？」

杨尚昆见问这个，偷偷舒了口气，心里倒是释然了。便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这事，是他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的，但只是提议给中央领导人换换服装，为进北平做准备。并未提出给全体中直机关工作人员包括警卫部队都换装，那样兴师动众。

毛泽东说：「问题就在这里了。聂荣臻也好，你也好，为什么不直接找我谈？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官愈做愈大，话愈来愈不好说

了？」

杨尚昆忙说：「责任在我，不在聂荣臻同志。是我担心主席太忙，指挥各个战场，日夜操劳，早上都睡不着觉。西柏坡地方又小，常有汽车往来，闹哄哄的，才没敢把换装的事，直接报告主席。」

毛泽东一口喝下半缸浓茶，说：「小事一桩，是不是？我倒觉得是件大事。年初，我和书记处几位就提出，全党中高级干部重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是要求全党全军在革命胜利形势下，戒骄戒躁，反对腐败，防微杜渐，我不当李自成，你们不当牛金星、刘宗敏。上个月的二中全会上，我也讲过几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仍然存在，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北平城里还有无数的王府，有无数的陈圆圆啊。」

杨尚昆低头吸烟，洗耳恭听。

毛泽东挥了挥手：「去告诉恩来和总司令，中央警卫团的指战员可以换装，其余人一个也不要换，就穿陕北老棉袄进北平，有什么不好？让北平的市民、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看看，就是我们这些陕北山沟里出来的乡巴佬，战胜了美式装备的中央军，我们不谋私利，为人民服务。」

杨尚昆连连称是，表示坚决执行。

毛泽东抬手又碰了一下铜铃。他传唤卫士来扶他起床，帮他穿衬衣、毛衣，系裤子，穿袜子鞋子，还有洗脸水，热毛巾。他也很少洗澡，而由卫士替他做按摩，擦身子。他才五十六岁，身体正强壮，一再宣称自己决不做皇帝。

三月二十四日午后，毛、朱、刘、周、任一行离开唐县淑闾村，当天傍晚时分抵达北平市南边的涿县。涿县古称涿州，为北平南部的重要门户，三国时候出过风云人物刘备和张飞，演出过千古传颂的桃园三结义。城内至今存有张桓侯祠，正门联云：

使君乃天下英雄，谊同骨肉。

寿侯为人中神圣，美并勋名。

有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将军来接。叶将军敦请毛主席等领导人当即改乘火车前往北平。毛泽东不答应。他执意不要匆匆

忙忙进北平：「剑英啊，我们到了刘备、张飞的老家，又是刘关张结义的地方，一路上桃花开得火红，我已派人去找涿县县志来读，行何匆匆？」

叶剑英将军报告了进北平住宿，较为安全等理由。

毛泽东说：「进城做大官，欲速则不达，快了易坏事。你们性急你们先走，我要留在涿州过夜。还找不找得到张飞家后面那座桃园的旧址？」

毛泽东说走就走，说停就停，一言九鼎，大家只能服从。不满情绪也是有的，病号任弼时就说过：「毛泽东同志的某些行事方式，是大家惯出来的，总是将就他，顺着他，少奇、恩来和我，都有责任。听不得不同意见，历史有可能重演，我们这个党总有一天要吃大亏的。」

中央领导人中，任弼时是唯一敢于跟毛泽东争吵、发表不同见解的人。还有一员武将——彭德怀副总司令，也敢于在毛泽东面前直言无忌，从不称呼「主席」，而二十几年一贯制，喊「老毛」。毛泽东则称他为「老彭」，二人之间常有争吵，但小同乡加老同事，关系颇亲密。除了这一文一武，其他大员们对毛主席都是毕恭毕敬。尤其是刘少奇、周恩来、高岗三位，极像是在毛主席面前竞赛各自的忠诚。朱德总司令则乐于当好好先生，挂着虚名。彭德怀远在西北战场，任弼时孤掌难鸣，身体又差，肺病咯血，毛泽东已经刻意疏远、冷落他。

此时刻，毛泽东是有意憋大家一憋，急着进北平分权，各据要津？河北老乡不是有句俗语：「倒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呢。」千年古都北平，进去容易，出来难呢。

他问：「剑英呀，北平军管会主任，你是大家的父母官了。我们进北平，到底住在哪里？」

叶剑英看看周恩来，说：「我们提出过几种方案，中央书记处一直没有明确答复。」

实际上是毛泽东心不在焉，一直没有明确的指示。有次甚至说：「偌大一座北平，还怕没有我们几个人的住处？」

周恩来怕毛主席不悦，忙说：「主席这一段特别忙，书记处会议上是议过两次……。进城后的临时住处，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颐和

园，一是香山。主席说过，两个地方都可以考虑。少奇同志和朱总司令、弼时同志主张住香山。颐和园毕竟是座公园，迟早要恢复对市民开放。我也赞同暂住香山，那里别墅、楼馆、寺庙很多，附近还有碧云寺、卧佛寺、八大处，中直机关及军委机关都住进去，也没有问题。当然，那些佛寺、道观，应尽可能地不去打扰。」

毛泽东笑了：「你也是个香山派。只好都去香山寻仙访道罗。山上空气好，弼时养病，可以长住」

大家都陪着毛主席笑了。毛泽东又问：「我们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是个大目标哩！蒋特、日特、美特，暗藏的肯定不少，坐火车进城，安全不安全？」

周恩来说：「剑英和荣臻他们都考虑到了，十九兵团已在铁路沿线警戒。火车行驶期间，所有道口关闭。剑英这次调来两列火车，第一列是货车，载警卫部队；第二列是客车，主席领着我们中直机关人员乘坐，直驰清华园。休息后，在南苑机场有个阅兵式，请主席和总司令检阅，之后跟北平市的民主党派人士见见面。」

毛泽东没有理会周恩来似的，只盯住叶剑英问：「我们的部队和平接收北平快两个月了，不是早举行过入城式？报纸都登过照片和消息了。我也早说过不要再搞什么阅兵式，形式主义，劳民伤财，为什么还要搞？我们不久就要召开新政协会议，宣告新中国成立，举行开国大典时，不是还要有阅兵式？」

叶剑英无言以对。他只好又求援似地望着周恩来，像在说：「南苑机场阅兵的事，不是早请示过了？怎么事到临头，忽然变卦不搞了？怎么向受阅部队交代？为了迎接这次检阅，平津战役的参战部队的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一个装甲兵师，共三万官兵，已经演练了近一个月。」

周恩来没有直接代叶剑英回答，而绕了个弯子说：中午离开唐县淑闫村时，朱总司令没有上他自己的车，而到我的车里来坐了一段路。朱总也问过我，主席是无意在南苑机场阅兵了？朱总说：「主席主要考虑的是兴师动众，形式主义。主席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但我想到，如果通过一次阅兵仪式，提高我军士气，鼓励将士英雄杀敌，打过长

江去，解放全中国，就还是有必要的。」

毛泽东语气缓和了些：「总司令是同意阅兵的罗。恩来，你自己的看法呢？」

周恩来说：「主席的意思我初步理解……开国大典肯定要有阅兵仪式，但那是半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的事：成立新国家、新政府，还有多少大事要筹备，人力物力要齐集。所以我觉得，明天的南苑机场阅兵，跟以后开国大典上的阅兵，并不是简单的重复。从鼓舞士气，欢送部队南下，去取得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就还是有必要的。何况，荣臻、剑英他们，还安排了上万名北平市的民主人士、教授学者和市民代表，在阅兵式后跟你见面，代表北平两百万人民欢迎我中央机关和领导人进城。」

毛泽东对叶剑英笑了：「蒋委员长喜欢搞的一套，你们这么快就学会了罗！我只能服从你们的安排了，不是？但今天进城的时间，由我来决定。你们随时做好准备。」

晚上，中央书记处照常毛泽东的住处举行例会，叶剑英、李维汉、杨尚昆等列席。先传阅了各野战军发来的战报，听取了李维汉的关于南京、上海、广州、成都、昆明等敌占城市在我地下党领导下，以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要和平为口号的学生运动情况汇报。

之后，由叶剑英汇报北平市情况。叶剑英说：「由于执行党中央「原样不动、全盘接收」的方针，北平的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和破坏。城里市民生活一切照常，工厂照常生产，学生照常上课，商店照常营业，街头巷尾仍然到处是小摊贩。原来的市政府机关大银行等，都派了军官和接管人员。社会秩序很好，没有发生过骚乱，过去的黑社会帮派和街头流氓也没有出来捣乱。反动分子和潜伏下来的特务，现在还没有公开进行破坏。对他们来说，也许是时机未到。」

毛泽东插话说：「对于阶级敌人，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不要松懈我们的警惕性。凡是反动的东西，凡是牛鬼蛇神，你不打，他不会倒。扫帚不到，垃圾不会自己跑掉。」

叶剑英接着说：「现在北平的男女老少，都称赞北平的和平解放。如果不是和平解放，像我们打天津那样，北平真不知道会被战火毁坏成什么样子。所以这是给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也是一个大奇迹，历史上很少有的。」

毛泽东点点头。朱德说：「首功应当归于傅作义将军，他带了个好头。剑英啊，要教育好我们的干部、战士，还有公安人员，要学会尊重傅作义将军、邓宝珊将军他们，心胸要宽阔些，不要再搞小动作，找人家的麻烦了。共产党人不要小家子气，还要解放全人类呢！」

周恩来说：「剑英，总司令刚才的这段话，你可以带回去传达。今后，南京、上海、武汉、广州、成都、昆明，我们都要力争和平解放。任何地方的国民党军队愿意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编，我们都欢迎。」

刘少奇说：「我们仍要花大力气，抓好接管工作。这是新的历史转折。我们不但能够解放大城市，更要学会管理大城市。学习城市管理和经济建设，已是摆在全党面前的首要问题。要教育全党干部，正确对待民族资本家、工商业者。工厂照常开工，工人才有工做，不失业；商店照常营业，市民才能购买到生活必需品。我们绝对下要再犯前年、去年解放石家庄、济南等大城市所犯过的左的错误，让工人去接管工厂、商店，导致工厂、商店关门，工人失业，市民上街游行示威……。」

碰头会一直进行到凌晨一时。就在要散会的时候，毛泽东忽然提出：「现在进城，诸位意见如何？」

刘少奇率先拥护：「好得很！现在北平市民都睡了，便于铁路沿线和北平市内外的警戒。只是总司令有早睡的习惯，要辛苦一点啦。」

朱德说：「没问题，困劲早过啦。现在进北平，正好头脑清醒。」

周恩来看看手表：「如果能在两点钟出发，五时半我们可抵达北平西郊清华园站。李克农同志他们已打前站去了。主席、总司令、少奇、弼时和其他同志，可在清华园内休息半天。我和剑英去找聂荣臻安排下午南苑机场阅兵的事。还有晚上的住宿问题。阅兵后，北平军管会请我们吃烤鸭。之后，由李克农同志陪主席、总司令、少奇、弼时同志去颐和园，那里还是值得住一晚的。我就直接去香山，迎接各

位二十五日上山。这样安排了，还有什么没想到的？剑英、维汉、尚昆，没有意见了？你们马上去传达命令，分头组织大家上车，两点钟准时出发。」

二十四日晨六时，大多数北平市民尚在熟睡，城区上空飘浮着一层薄薄的雾气，毛、朱、刘、周、任等一行抵达北平清华园站。有聂荣臻、彭真、李克农等在月台上迎候。立即分成两路，中央领导人的家属子女们，由杨尚昆带队，乘数辆大客车去香山，各家各户的先安顿；领导人则改乘小轿车，驶入静悄悄的清华大学校园。校园内外，已由中央警卫团戒严。

安排好毛、朱、刘、任等的休息处，周恩来自己也躺在行军床上打了个盹。他实际上并没有睡着，而在思虑着全天的节目表：九时半，要和叶剑英、李克农去聂荣臻的司令部，应当把北平市委负责人彭真也拉上，具体检查一下下午三时南苑机场阅兵的安全措施。要求他们再审核一遍名单，主要是阅兵之后，接见哪些民主党派人士和学者名流，还有市民代表。一定不要有坏人混入。到现场拍照的记者，必须是地下党员，其他记者一律不予安排；接受检阅的部队，严格执行「有枪无弹」纪律；中央警卫团应有两到三个连队换上便衣，接见时在人群前面组成一道人墙；毛、朱、刘、周、任等只跟傅作义、邓宝珊、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少数人握手……十时半，找叶剑英、彭真等人专门谈一谈中直机关及领导人住进香山后的生活物资供应问题，……十一时半，到南苑机场现场检查一遍，确定领导人的车队入场退场的方位，受阅部队的方位，市民代表站立方位……阅兵和接见后，叶剑英代表市军管会、彭真代表市委招待中央领导人吃烤鸭……。之后毛、朱、刘、任的车队驶往颐和园过夜，自己则上香山……。对了，中午时分，李克农应带一个小组去颐和园，部署警卫工作。颐和园内原来的职员，包括和尚、尼姑、花工等，应统统暂时放假离园，换上北平市委的服务人员……。

毛泽东毕竟是勉强地接受了当天的南苑机场阅兵。他直拖到下午五时，太阳都快落山了，才率领一长队中共领导人，穿着一色的陕老棉袄、棉帽、棉裤、棉鞋，分乘二十几辆吉普车，缓缓地从受阅部

队面前驶过。毛泽东、朱德并排站立在最前面一辆敞篷吉普车上，朱德行举手礼，毛泽东则竖起右手巴掌，小幅度晃动。当受阅部队走着方阵，发出整齐划一的呼号：「毛主席好！朱总司令好！中央首长们好！」毛泽东挥着手回应：「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市民代表那边，共有一万来人，则在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等口号。

检阅完毕，毛、朱、刘、周、任等领导人都下了车，傅作义、李济深等十几位代表人物被领了过来。毛泽东怕冷似的双手袖进了袖筒里，满脸笑容地点着头，并没有伸出手来跟人相握。他把握手的任务交给了朱、刘、周、任等人。周恩来照例显得最为活跃，一一握手并一一介绍，一口一声老前辈、老朋友，这回到了北平，大家要长期共存，真诚合作，和衷共济了。

毛泽东袖着手，单独跟身着黑呢大衣、头戴礼帽、两手交叉在胸前的傅作义聊了几句。毛泽东再次感谢傅作义将军为和平解放北平，为保全北平这座千年古都作出的巨大贡献：傅作义呀，是应该奖给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勋章呢！

当晚十时，毛泽东入住颐和园景福阁，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由于负责保卫工作的李克农把园内原来的工人统统「放了假」，北平市委的服务人员又没有如期来到，以致毛泽东等人的住处冷冷清清，开水都喝不上，火墙也无人烧。毛泽东瞪着眼睛训斥李克农：「你搞的什么名堂？西太后花海军军费修了这座园子，你就连水都不给一口喝？你把园里的工人都赶走了？荒唐！工人农民谁会来谋害我？人民是水，我们是鱼，鱼离了水，能活？你参加革命多少年了？连这个还没有搞懂？」

毛泽东喝上了卫士烧出的热茶，睡上了卫士生起的火墙。周恩来在香山，第二天才听到了这事。他苦笑：「这事北平市委也有责任，应当批评一下。看来，李克农擅长的还是情报工作，今后不宜再让他执行中央领导人的保卫任务，去惹主席生气。所谓保卫工作，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提供细心、周到的服务。」

第十一章 香山露峥嵘

三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朱、刘、任等大队中共中央领导人抵达香山。整座香山自二月中旬起已实行军事管制，对外名曰延安迁来的劳动大学，简称「劳大」。山下居民依京腔称之为「老大」，并很快猜出了其中的奥秘。

香山山林面积达五千余亩，南面有著名的八大处，东北坡下有碧云寺、卧佛寺、香山植物园，再往东走十来华里，便是颐和园与圆明园了。香山最高点为西端的香炉峰，海拔五百余米。山上共有各类楼、台、亭、榭、庄、院、寺、阁、馆、轩计五十余处，多建筑于南面及东面山坡各处，其中著名的有：东南面山坡上的双清别墅，东北坡入口处不远的香山别墅、松林别墅，山顶的见心斋、昭庙、观音阁、玉华山庄、玉华三院、玉华四院、梯云山馆、栖月山庄，以及南坡上的玉香馆等。香山的一大特色，凡是风景优美的观景点上，均建有亭或台，著名的有看云亭、半山亭、白松亭、多云亭、望烽台、琉璃塔、阅风亭、多景亭、森玉笏、西山晴雪、朝阳洞等等。大清乾隆年间还在这里建有避暑行宫勤政殿，惜已毁于兵火。

毛泽东一家住了双清别墅；朱德一家住了玉香馆；刘少奇一家住了玉华山庄，任弼时一家住了栖月山庄。其于梯云山馆、玉华三院、玉华四院、见心斋、覲憩等处，亦分别住下了其他的领导人及其家属。

周恩来本人则跟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主要工作人员，住在靠近出口的香山别墅和松林别墅，共有大小百余个厅堂房间，两大中直机关都塞进去了。

当然以毛泽东一家所住的双清别墅条件最好，坐落在香山寺南，地势高峻，有两股清泉从院子西面的石壁中涌出，泉水晶莹清冽。大清风流皇帝曾经在此留连整日，于水泉石壁上题「双清」二字，由此得名。一九〇七年河北境内发生洪水灾害，慈禧太后的赈灾大臣在香山创办慈幼局，收养父母双亡无家可归的灾区孩童，却挪用赈灾款在这里造下一座宫院式别墅，名为恭候老佛爷慈禧驾临，实为自己占用，称为双清别野。

双清别墅景色幽静，雕梁画栋，长廊回旋，碧水如镜，别有洞天。院内山、水、树、石均顺其自然，少人工斧凿。甘冽的泉水汇聚一池，涟漪清沏，植有荷花睡莲。环水有廊有亭，亭后楼台，因材施教，秀丽非凡。

在此春赏百花，夏避炎暑，秋观红叶，冬踏素雪，真人间仙境了。院外有一曲径，两面皆为峭壁，通往不远处的看云亭——又称翠薇亭。万绿丛中一红亭。江青曾在此亭，为毛泽东摄下了那帧坐于藤椅上，身着银灰色中山装，远望云山的著名照片。三月末的一天，香山东门外突然闯来数百名没有携带武器的傅作义警卫部队的官兵，高呼着「要粮饷、要生活、要自由」的口号，妄图冲进山里，向中共领导人请愿。

原来根据中共与傅作义将军签订的北平和平解放协议，傅作义将军被允许保留一个加强团的兵力，作为他私人的警卫部队。可是自中共军队接管北平及周围地区之后，傅作义将军的这支警卫部队并没有去警卫傅作义，而被限定在西郊翠微路的一座兵营里，禁止外出，由中共政工干部天天给他们上政治课，搞忆苦思甜，回忆对比，进行阶级教育，实为分化瓦解。却两个月未发给分文薪饷。终于激起官兵们的不满情绪，于是集体冲出军营，到香山去找中共领导人和平请愿。

傅作义警卫部队的请愿活动，被守卫香山的中共中央警卫团所阻吓并劝离。这个延安来的中央警卫团番号为八三四一，实为一个师的建制，官兵人人都是神枪手，司令员即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汪东兴。

事情立即被反映到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那里。这还了得！

傅作义是什么用意？为什么不管束自己名下的警卫部队？香山现在是什么地方？你傅作义还能不知道？闹事竟闹到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去了！周恩来立即驱车去到华北军区司令部所在地的八大处，找到聂荣臻司令员，还没进院门，就喊道：「荣臻！快下命令，派一支部队去给我执行任务。」

聂荣臻正在吃晚饭，很少见周副主席这么急促过，放下碗筷立正迎着：「周副主席，执行什么任务？」

周恩来说：「为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你现在马上派人去把傅作义警卫部队包围起来，收缴他们的枪械弹药，命令他们离开营地，接受我华北军区改编。」

聂荣臻当初是中共与傅作义和谈签字的代表之一，这时稍稍迟疑了一下：「是不是先跟傅作义先生打个招呼？再派部队去收缴他们的武器？」

周恩来一向以遇事从容不迫、富于君子风范著称，这次却急不可待了：「你怎么打了几十年战，还书生意气？还要去跟傅作义谈判？你以为傅作义会同意让他的警卫部队放下武器？谈判早已结束，现在由你派部队去执行任务！快刀斩乱麻，以绝后患。傅作义有意见，让他直接来找我谈。」

当天晚上，聂荣臻命令手下的一支精锐人马，以三倍于傅作义警卫团的兵力，突然包围了翠微路傅部兵营，占领制高点，架设轻重机枪，再派人突入兵营，先下了哨兵的枪，再由原来派在兵营里的中共政工干部到各营房去，向那些正睡得迷迷糊糊的士兵们发出命令，规规矩矩交出武器弹药，不许磕磕碰碰，摔摔打打，否则军法从事，绝不客气。枪口之下，无人进行反抗。华北军区却收缴到了一个加强团的崭新的美式冲锋枪、卡宾枪及其无数弹药。这些美式新武器，比那些苏联红军所赠予的，以及从日本人手中所收缴到的枪械，先进多了，具有更大的杀伤力。

在北平城里，傅作义住宅附近，另驻有傅氏警卫团的一个半连队，也由周恩来下命令，于当晚同一时间被缴了械。警卫团的三名团级军官及几名带头闹事的营连级军官，则被拘捕。天刚蒙蒙亮，傅作义将军名下的这支徒手警卫部队，奉命开拔到昌平区境的人民解放军军营内，被分化瓦解，化整为零了。

当晚周恩来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待着华北军区执行命令的结果。他并严令封锁消息，禁止报纸报导不说，便是在党内军内，知道此事的人也越少越好。

聂荣臻将军也通宵未眠。凌晨五时，当派去执行任务的军区作战处处长来向他复命，报告任务圆满完成，并把傅部的三名团级军官抓

起来了。

聂荣臻问：「周副主席让你抓人了吗？」作战处长报告，「没有具体指示，但我觉得一不做，二不休，还是先抓起来再说，左一点总比右倾来得保险。」

聂荣臻马上电话报告请示周恩来。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回电话：「替我谢谢你部圆满完成任务的指战员们，抓人抓得好。我已报告了主席，主席也同意武力解决，以免后患。至于被抓起来的那几个人，过两天放了他们，请他们吃顿饭，讲清道理，摆明利害，他们会感激我们的。再送他们进保定军校学习，另行分配工作。跟国民党人员打交道，就要这样，先抓后放，先严后宽，给个出路，他们会感激涕零的。」

第二天一早，傅作义将军才得到报告，自己的警卫部队被缴了械，一夜之间成了真正的光杆司令。他于是又大发雷霆：「共产党讲话不算数，不守协定，不讲信义，过河拆桥！」他给周恩来的值班室打电话，值班室听说是傅将军有急事，答应立即去请示。但周恩来没有接电话。值班人员告诉傅作义将军：「周副主席刚服了安眠片睡下，不能叫醒他，您有急事，是不是先去找我们的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同志谈谈？」

傅作义将军曾经想打电话找毛泽东主席。但连周副主席都不肯接电话，毛泽东更是高高在上，不肯过问这些俗事了。何况中共领导人，都是一群住窑洞住出来夜猫子，晚上开会，白日睡觉，晨昏颠倒。

傅作义叫了车，怒气冲冲地去敲开了叶剑英将军的朱漆院门，进屋就拍桌大叫：「为什么要撕毁和平协议？为什么要缴了我警卫部队的械？还抓了我的人，你们干脆连我一起抓走好了！北平已到了你们手里，我反正没有用处了，你们就一起抓走吧！」

叶剑英也是丈八和尚摸不着头尾。这已是傅作义第二次大喊大叫、义愤填膺了。不管怎样，傅将军发火，还是事关重大，非同小可。且长江沿线的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中，党中央亦有意争取长江以南各省市能效法北平方式，兵不刃血，和平解放，所以必须善待傅作义将军。叶剑英在中共军队中向有「福将」、「儒将」之称。「福将」是指他身经

百战，出入枪林弹雨，却从未受过枪伤，成为罕见的军事人物；「儒将」是指他好读书，善诗文，遇事冷静沉稳，具深谋远虑。他当即先向傅作义表示了歉意，自己作为北平军管会主任，对晚上发生的事毫不知情，失职失察，并肯定此事只是下边的误会，绝不可能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指示。毛主席、周副主席二位，您已是很熟悉的了，他们从来就是高度赞扬傅将军和平解放北平的功绩的。毛主席多次说过，保全北平，傅将军立了大功，是全民族的功臣，还多次提到，一定要请傅将军参加新政府工作，同时也要继续过问军事方面的事情。

叶剑英一番美言，傅作义怒气消了大半。叶剑英请傅作义将军先喝茶，嘱咐服务员安排早点招待。他自己则进内室去给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打电话，问情况。

过了半个多小时，叶剑英回到会客室，见傅作义以军伍习惯，毫下客气地吃过了早点，气色也平静下来了，便说：「傅将军，我刚才不得已，打电话把周副主席叫醒了，他服了安眠片刚睡了一个小时。您知道，周副主席日理万机，是我们党最忙碌的领导人……。」

傅作义一听，反而感到些许内疚了。他问：「周副主席有什么指示？」

叶剑英笑笑说：「周副主席也是刚听了汇报，他直埋怨底下的人办事鲁莽，伤了傅将军的颜面。傅将军的警卫团去冲香山，人家又没带武器，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他会指示马上放人，要学会尊重人嘛。他嘱咐此事一定要向傅将军说明并致意。至于您的那一个加强团的警卫部队的问题嘛，周副主席也有个建议，让我先转达一下，看看傅将军本人的意见。并说，他仅仅是个建议，最后还是要由傅将军本人裁决……。」

此刻，傅作义倒是有点受感动了，他恭敬地问：「周副主席的建议，具体内容是些什么？」

叶剑英有意停了停，亲自替傅作义续了水，才说：「周副主席的意思，两个多月前签订和平协议时，给傅将军保留一个加强团的警卫部队，是为了防备北平城里国民党军队中的宪兵和蒋介石嫡系对傅将军下毒手，搞突然袭击。现在，北平早已被和平接受，大的环境变了，

毛主席、朱总司令、少奇同志和周副主席本人，每位都只有一个班的贴身卫士。傅将军的这个加强团还有不有必要？五个营十几个连队两千多号人马，实在也是傅将军的累赘。何况，谁能担保这两千多号人马里，就个个都靠得住？其中就一定没有暗藏的蒋介石的特工，在随时准备谋害傅将军？就一定没有不良分子，打着傅将军的旗号做坏事？我们认为，傅将军的安全，主要的，首先靠大环境来保障，再就是靠一支人人忠诚的精锐小分队……。」

傅作义不吭声了。他仿佛被周恩来副主席的建议所触动。他问：「周副主席有什么具体的办法？」

叶剑英见谈话将要达成既定的目标了，仍不动声色地说：「周副主席建议，由傅将军亲自去原警卫部队中，挑选出三、五十名最可靠的人员，组成一支近身卫队，跟傅将军住在一起，归傅将军指挥。卫队的每位成员，可配备大、中、小三件武器，比如说每人一支美式卡宾枪，一支德式快慢机和一把左轮手枪。相信这样，对傅作义将军本人和家室的安全警卫，才是最有效、最可靠的。」

傅作义是个轻易不动温情的山西铁汉，这时眼睛也发红了：「叶将军，没想到周副主席日理万机，还替傅宜生想得这么细致、周到。」

叶剑英笑着说：「周副主席让我转达一个口讯，他会安排时间，请你吃晚饭，具体谈谈您在新政府中的工作安排。」

傅作义坐不住了，颤着声音说：「宜生出身军伍，是个粗人，一定知恩图报。」

过了几天，傅作义果真被通知去亲自挑选了三十五名近身卫士，每人配备了大、中、小三件武器。可是根据中共中央警卫局的统一规定，所有领导人包括毛、朱、刘、周、任在内，贴身卫士只发给枪枝，不配给弹药。傅作义将军亲自挑选的三十五名近身卫士也不能例外。

第十二章 中南海楹联

中共书记处最初的北平定都计划，香山和中南海均是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机关的临时办公场所，长远的设想是在香山以东、颐和园以南的开阔农地上，营建一座新北京，而将北平老城完整地保存下来。中央所属机关当然要在新北京，不要去老城沾染上帝王宫阙的陈腐气息。

相信该项甚具创意的设想，因为第二年即陷入耗资巨大、死伤兵员百余万的韩战而被搁置了。

香山位于北平郊外西北角，属西山山脉，离城四十余华里。

中南海则位于北平市心脏地带，东面紧靠着明、清皇宫——故宫博物院，整座园林占地一千五百亩，其中水面七百余亩。打开北平市地图，你可以在城区中央地带见到一串自北而南的绿色翡翠般的湖泊：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北海、中南海和南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北海均早已辟为公园。中南海亦于民国初年一度辟为公园，供市民游览。

环中海、南海的大片宫殿群落，始建于宋辽时代。宋辽以前，这里还是一片风光秀丽的天然湖泊，燕京古城则在现今的通县一带。与汉人的大宋王朝相对抗的辽国君主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傍湖营造起瑶屿行宫。辽国盛极而衰，金朝取而代之。公元一一五三年，金王朝正式迁都燕京，中南海成为皇宫，随之大兴土木，开挖湖泊，广植花木，重新营建起金碧辉煌的宫殿群。之后蒙古铁骑南下，建立大元王朝，定都燕京，改名大都，继续营造环北海、中海、南海的宫殿群落。到了明代，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夺得皇位，把国都从南京搬到燕京，改名北京。朱棣在中南海的东面营建起崭新的宫室——紫禁城，并为北京城设下一条从北至南的中轴线：安定门、钟鼓楼、地安门、景山万春亭、神武门、干清宫、泰和殿、午门、天安门、前门、永定门。清兵入关建立起大清王朝，袭用了明王朝的这一建制，继续扩建明代宫室，而把中南海改称西苑，作为皇室的避暑园林。中海和南海亦称作太液池，喻意可与西天瑶池相媲美。

四面宫墙两座海，五朝帝都一园林。

下面，让作者领着读者诸君，从南至北，神游一次中南海罢。中南海南门今名新华门，为仪门，位于南海最南端，临西长安街。黄琉璃筒瓦覆顶，重楼重檐，面阔七间，原为大清乾隆皇帝为取悦西域来的宠妃香妃所建，名宝月楼。当年楼外建有回子营，说是香妃登楼望月回子营，就像望到了家乡一样，可解乡愁。有联云：烟云舒卷揽胜赏，松石古澹怡远情。

佳兴四时同，图呈苑里。清光千里共，鉴彻池心。

玉宇近高寒，栏凭十二。庆霄增朗彻，界俯三千。

民国初年，袁世凯坐镇中南海时，为贯通东、西长安大道，命工匠将宝月楼北移十余丈，原样重建，更名为新华门。

进了新华门，绕过一面大理石影壁，迎面而来的便是碧波滢滢的南海了。越过南海水面，正北端便是著名的瀛台。瀛台又名南台，东、南、西三面临水，北面有一汉白玉桥连接堤岸，为南海中的人工岛屿，四周碧水如画，岛上以太湖石垒作假山，奇峰峭壁，古木参天，绿荫蔽日，黄瓦朱墙，宫院幽深，风光迷人，一如海上蓬莱，故名瀛台。这里不仅是清皇室游幸避暑胜地，也是康熙、乾隆等皇帝居园理朝听政之所。由北岸过汉白玉桥上四十级台阶，是翔鸾阁，位于瀛台岛的最北端，为正门，有联云：商鼎周彝自典重，槛葩苑树相芬芳。

过了翔鸾阁，便是一平台庭院，迎面为涵元门，门内正南是涵元殿，为瀛台正殿，坐南朝北，气势雄伟，有联云：四面波光动襟袖，三山烟霭护壶洲。

涵元殿中有一木炕，戊戌变法事败后，光绪皇帝被母后慈禧幽囚于此。那时岛北无桥，太监每日替光绪帝送膳食，须小舟以渡。直到幽囚十年之后，光绪皇帝死在了这里。民国初年，副总统黎元洪亦曾在此居住，后来还接待过西藏来的班禅喇嘛。

涵元殿的东配殿为庆云殿，西配殿为景星殿，景星殿东有藻韵楼，庆云殿西有绮思楼。楼殿相接，花木扶疏，变化层出。

穿过涵元殿，正南面又有一华美宫院，曰蓬莱阁，又名香宸殿，有联云：亭台涵月镜，花木畅天机。

过眼寸阴求日益，关心万姓祝年荆。蓬莱阁前立有一「木化石」，为稀世之宝，高约二点八米。两旁各有小亭一座，高数丈，曲廊相接，迂回其间，美景天然。在此登高远眺，碧波秀色，琼楼玉宇，尽收眼底。有联云：亭台涵月镜，花木畅天机。

蓬莱阁之南即为明代南台旧址，东为春明楼，西为湛虚楼，再往下走，便到了瀛台的最南端，水中立有一亭，名迎熏亭，有小桥与南台旧址相连。迎熏亭隔海与新华门相望，亭中有联云：相于明月清风际，只在高山流水间。

以涵元殿为中心，瀛台岛东面还有补桐书屋，待月轩、镜光亭、及其立于水中的切鱼亭，补桐书屋为清代帝王读书处，有联云：摩空野鹤养真性，绕壑风泉清道心。

切鱼亭与南海东岸隔水相望，可遥望到东岸上的千尺雪、交芦馆、蕉雨轩、日知阁等宫院。

涵元殿西面还有长春书屋，八音克谐、怀抱爽等亭廊庭落，以及立于水岸上的人字柳碑。长春书屋内楹联达数十幅之多，均为历代帝王或书家翰墨。

返回南海北岸，回首瀛台，水色山光，殿宇嵯峨，古树参天，真正的蓬莱仙境了。

南海北岸上，正对着瀛台岛的是勤政殿。勤政殿为中南海正殿，五开间，坐南朝北，康熙皇帝题殿额「勤政」。殿前有门名德昌、朝向中海。

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在此垂帘听政。光绪皇帝在此主持过百日维新。民国初年袁世凯亦在殿内办公，据说袁世凯并将它改建成西式礼堂，会议大厅达三层楼高，气派非凡。四周为大、中、小会议室、演讲厅、宴会厅等。傅作义任华北剿总司令时，亦住在这里办公，并在这里与中共代表叶剑英将军举行了北平和平移交仪式。

勤政殿以东，有流水音、俯清泚、日知阁等名胜。

勤政殿以西，则是著名的丰泽园了。丰泽园建造于康熙年间，为清代帝王每岁仲春亥日演耕之所。正门匾额「丰泽园」为乾隆手书。进入丰泽园庭院，迎面为颐年堂，亦名惇叙殿，为园内正殿，有联云：

榴花照耀菖蒲岸，竹影扶疏翡翠亭。

彝训念贻谋，本支百世。

仙源长笃庆，华萼一堂。

颐年堂之后为澄怀堂，有联云：心田喜色先良玉，鼻观真香不数兰。

澄怀堂之后为遐瞩楼，有联云：千迭云峰空外回，三农雨露望中深。

颐年堂东侧，有过厅通往南北两座四合院，名「菊香书屋」。

院内有数株百年青松，碧绿海棠。康熙帝题联云：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霏清静香。

出丰泽园南门往西，有一亭名「荷风蕙露」。再向西，有一座汉白玉雕砌而成的园门，门额曰「静谷」，有门联云：胜赏寄云岩，万象总输奇秀。青荫留竹柏，四时不改青葱。

月地云阶，别向华林开静境。

屏山镜水，时从芳径探幽踪。

静谷素有「园中之园」的称誉，园内正殿为崇雅殿。殿后华林芳径，山石奇秀，游廊曲回。有联云：

翠合三山连阆苑，波涵一镜俨蓬瀛。

水中楼阁浮青岛，天上笙歌绕碧城。

静谷的名胜景观还有纯一斋、听鸿楼、含和堂、植秀轩、虚白石、万字廊、春藕斋等等，匾额楹联甚多，难以一一记述。其中不能不提的是春藕斋，前有戏台，斋内有各类堂舍，为历代君王秘戏处，性娱乐场地。

民国初年，袁世凯、段祺瑞在这里召开过财经会议，民国八、九年，这里还做过徐东海、曹锟两位短命总统的办公室。

以上是南海的主要景观。中海的景观主要有西岸上的怀仁堂、海宴堂、游泳池、紫光阁，西花厅，以及中海东岸上的蕉园、万善殿、千圣殿、水云榭等等。

怀仁堂的前身名仪銮殿，系慈禧太后的寝宫。仪銮殿于一九〇〇年被八国联军放火烧毁。慈禧太后挈光绪皇帝西逃返京后，在仪銮殿

的废墟上建造起一座西式佛照楼。民国初年，袁世凯执政，改名为怀仁堂。

海宴堂位于怀仁堂东南，为清末所建一组西式楼院，系慈禧接待女宾之所。堂中陈设皆模仿路易十五所用家具样式，由巴黎生产。民国以后，改名居仁堂，曾为袁世凯的会客之处。民国十六年，东北军阀张作霖入主中南海，曾以它为「大元帅府」。

从海宴堂沿中海西岸北行不远，与东岸的水云榭隔海相望者，是游泳池。游泳池建造于民国初年，设备较为简陋，曾向公众开放。

中海西北岸上，有一重要古建筑——紫光阁，原名平台，是明代武宗皇帝观看骑射演武的地方，阁高数丈，殿宇威严。清代曾予整修，沿袭旧用，并在殿内悬挂历代功臣画像，每岁正月十九日，皇帝在此设功臣宴，大宴群臣，不忘先杰。有联云：

乾羽两阶崇礼乐，车书万里集冠裳。

天衢翊运风云会，策府铭勋日月光。

紫光阁后有武成殿。

在中南海园林的西北角上，有一座占地颇大的花房，名西花厅，亦名西华厅，为明、清两朝宫室所用鲜花的培育场地。当年这儿盛产牡丹、芍药、月季、菊花等教百种时蔬花卉，皇帝后妃亦于这里吟诗赏花，国色天香，风光无限。

从紫光阁东朝中海方向走去，水边有迎春堂。从迎春堂登舟，可渡至中海东北岸上的蕉园。蕉园又名淑园，林木茂盛，殿宇重迭，为明代崇智殿旧址，是明、清两朝教习小太监之所。每岁七月十五中元节之夜，后宫嫔妃在此举行「盂兰盆会」时，小太监们点起千百盏宫灯，浮漂水中，与天上闪烁的群星上下争辉，一直飘流到南海瀛台沿岸去，蔚为舒观。

蕉园内还有著名的万善殿和千圣殿。万善殿为明代遗构，大清乾隆时重修，殿内供有三大士及十八罗汉塑像，栩栩如生。殿后有南海慈航观世音像。联云：

万象证圆通，金轮妙转。三乘皈定慧，华海长涵。

了悟彻声闻，花拈妙谛。净因空色相，月印明心。

万善殿后院连接着千圣殿，千圣殿内，有一座八面七级檀香塔，名千佛塔，为稀世珍宝。殿东有迎祥馆、朗心楼，又东有大悲坛；殿西有悦性楼、集瑞馆。朗心楼有联云：楼出轻烟横翡翠，池生新水彻琉璃。

悦性楼有联云：耆崛鸟吟都送喜，香林花色总无尘。

偌大一座蕉园内，殿、堂、楼、馆历代楹联甚多，无法一一记述。万善殿西门外，有一立于水中的凉亭，与中海西岸上的迎春堂隔水相望，曰水云榭。亭中立有一块高约三米的石碣，上刻乾隆御笔「太液秋风」，为燕京八景之一。

中南海北宫墙东段，有一座鳌角玉崇汉白玉桥，桥下碧水与北海相通，桥的北面，自然就是北海公园了。原桥为明世宗时建造，桥两端各有一座汉白玉牌坊，桥西牌坊名「金鞮」，桥东牌坊名「玉崇」，因此得名。

民国初年改名北海大桥，全桥九孔，长数百步，白石为栏，饰以雕镂，美轮美奂。有桥联云：玉宇琼楼天上下，方壶圆桥水中央。

绣縠纹开环月珥，锦澜绮皱焕霞标。

好了，我们神游过中南海旧貌，且看中共政权如何在这里展新颜，行新政，演出新式大剧。

一九四九年二月初，周恩来派遣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率领一个精悍小组前来接收中南海时，四面红墙上的五座大门全敞开着。整座皇家林园共有两千多间房间，只在南海与中海之间的勤政殿里住着傅作义的一个留守连队，幽暗空旷的殿堂中闪烁着几盏孤灯，景象甚为凄凉。中共的一个加强连开了进来，让傅作义的留守连队放下武器，拉出城外接受改编去了。

此时的中南海一派破败萧条，满目疮痍：太液池结着紫黑色的冰甲，即便是开春冰化，也是满湖紫黑色的臭水，散发出难闻的气息。堤岸四处坍塌，树木东倒西歪，胡乱伸出各自光秃秃的枝丫，显然是长久乏人修剪培护。大小宫殿、亭台、楼院、堂馆，油漆剥落，门窗破烂，廊柱腐朽，四处是废弃的桌椅家具，成捆的报纸、杂志，落叶、纸屑随风飘舞，还有一堆堆不堪入目的腐臭垃圾，蝇蚊群集。

无数的甬道路面，不是地砖被挖走，坑洞密布，就是地砖一排排上拱，成为障碍物似的，令人想起「穷途末路」一词。尤其在东北角的「蕉园」一带，由于花木茂密，荒草没膝，已经鼠兔成群，仿佛几十年没有人烟了。

北门一位曾经给傅作义将军烧过茶水的守门老人说：这样大一座西苑再不来整修、维护，可真要狐狸成精，闹神闹鬼了。

齐燕铭手下的人马，入驻中南海后的头件事，是清扫垃圾，洗刷庭院，平整路面，培护花木。他们请来工匠，对宫殿建筑物进行修整、油漆。

第一期工程集中于怀仁堂、勤政殿、紫光阁、丰泽园四处。怀仁堂已被定为新政协会议的会场，勤政殿为筹组中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务会议会堂，紫光阁为未来的政务院总理办公地，丰泽园的二十七座大小庭院预备给中共主要领导人作会议期间的休憩处。其余古建筑原样保存，一匾一联均不予动。

令中共官兵吃惊的是，中南海园林内苍蝇、老鼠、麻雀、蚊虫之乡，到了除之不尽，挥之不去的地步。以致毛泽东入住中南海七年之后的一九五六年，还要以中南海的苍蝇，蚊虫为出发点，号召全国开展「除四害」运动。毛泽东并身体力行，经常挥动巨掌，将苍蝇、蚊虫拍毙于他菊香书屋的粉墙上。苍蝇、蚊虫粉身碎骨，尸迹血污涂墙上，很是过瘾似的，不许卫士、服务人员当了他的面擦洗了去。毛泽东打苍蝇，从来不用苍蝇拍，而习惯直接挥起手掌追逐扑击，成为他的一项室内运动。有时为追扑一只苍蝇，而健步奔走于丰泽园内外，自有大群服务人员为他喝彩助阵。

他的这一嗜好，一直延续到他文化大革命的晚年。

中南海「四害」之源出自中海、南海那两湖臭水，以及湖岸四周的荒草鼠洞。三月份，湖中冰雪消融，进入第二期整修工程，由中南海原管理人员找到了湖底的泄水口，边泄水边网鱼。水脏鱼肥，士兵们吆喝喧天，开展捕鱼比赛，天天煮鱼下饭，吃了整整两个月倒了胃口。名贵鱼鲜自然要送至香山各处，归领导人享用。一个意外的收获，是中南、南海里发现了大大小小数百只金龟，皆为明、清两代的皇妃、

公主们祈福放生。几只老寿龟估计已在千岁以上，曾送往香山呈毛泽东、周恩来们观赏。周恩来下令大小金龟全部养回池内，一只也不许伤害。周恩来并笑称，这正是中南海祥瑞之气所在。

南海、中海湖水放干后，湖底的污泥很快被风干。士兵们组织挖泥比赛，又在泥坯中挖出不少珍贵的珠宝——当年那些骄奢淫逸的皇室成员们丢弃之物。周恩来从华北军区调来数十辆大卡车，日日夜夜城外运走垃圾污泥块。紧接着也清理了北面的北海、什刹海。说是许多年后，北京城里几位以收破烂为业的老头老太，在东郊的垃圾场中发现了一项奥秘：四九年春从中南海运出来的垃圾泥土中，尚有许多许多的珠宝呢。

经过数百名军人及能工巧匠们三个多月的辛勤劳动，进入风和日丽的夏季，中海、南海重新注水，碧波盈盈，万象更新，绿柳拂岸，花木繁盛，又恢复为当年帝王林苑的富丽风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南海是迄今世界上，所保存下来的一座历史最悠久、占地最广大、风光最绮丽的皇家林园。

中南海新貌迎新主。这里即将演出的是直令历代帝王们自叹弗如的悲喜大剧。

第十三章 周恩来留置和谈代表

就在中共首脑机关进驻北平香山的同一天——三月二十五日，李宗仁代总统名下的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也抵达了北平。首席代表张治中，成员为邵力子、黄绍宏、章士钊、李蒸、刘斐，代表团顾问有屈武、柳亚子等二十人。

中共进城伊始，为表示和谈诚意，亦立即组织起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成员为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

周恩来开出的和谈条件仍是毛泽东于一月十四日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及的八项：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共的八项和谈条件，无异于命令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双方谈判于四月一日开始，地点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周恩来制订下的谈判方式也真叫绝，不是谈判桌上各据一方的对谈，而是一对一的个别交谈。说是为了充分交换意见，谈深谈透。周恩来与张治中谈，叶剑英与黄绍宏谈，林伯渠与章士钊谈，李维汉与邵力子谈，聂荣臻与李蒸谈，林彪与刘斐谈。

名为个别交谈，实为分化瓦解，政策攻心，各个击破。能策反几个算几个。此为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谈判形式与策略。尤其滑稽的一对，林彪与刘斐。刘斐长期任职南京政府军令部次长，本是中共潜伏于国民党军事核心的一名战略情报人员，此次竟然派来担任和谈代表，对手又是中共名将林彪，两位「党内同志」能「和谈」的，不过是由刘斐直接向林彪详尽提供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机密罢了。

国共双方在北平和谈的同时，中共中央加紧布置渡江战役，成立了由邓小平任书记的总前线委员会，统辖中共第二野战军与第三野战军的一百多万大军，形成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攻击阵线。

「引咎下野」的蒋介石则退居在浙江老家奉化溪口，幕后指挥嫡系人马向台湾诸岛的海空大撤退，以保存最后的军力财力，去卧薪尝胆，绝地逢生，静观国际大局变化，以期卷土重来，光复大陆。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世事如棋，谁知道呢？

唯留在南京的代总统李宗仁一心求和，希冀划江而治，再成立联合政府，以保持住一位政治人物最低的尊严局面。可是共产党胜券在握，分寸不让，坚持共军一定渡江，国军只能放下武器，接受改编。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团作了最大的让步，几经往返，终于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八条二十四款。周恩来并另派李宗仁的心腹黄君汉返回南京，向李宗仁秘密传话，要求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并保护好自己。只要李先生摆脱了蒋介石，那怕无一兵一卒，中共都是愿意与之合作的。

四月十五日，双方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最后一次和谈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共下了「最后通知」：南京政府还有五天时间去接受这份〈和平协定〉，五天之后的四月二十一日凌晨，即是人民解放军向长江南岸发起总攻击之时。

这最后的〈和平协定〉由黄绍宏带回南京，连李宗仁的桂系心腹白崇禧都没法接受，隐居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更是拍桌大怒。二十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钦电复尚在北平的张治中并各位代表，拒绝接受该协定。张治中立即将南京的答复通知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当天子夜，部署在长江北岸五百公里战线上的中共大军随即发起渡江战役，一举击溃了国军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于二十三日占领了南京。李宗仁没有留在南京，去了广州，随后脱离了国民党政府，经由香港赴美国当了「寓公」。忠诚于国民党的白崇禧、何应钦等人则先后撤退去了台湾。

和谈破裂了，周恩来却要替中共取得最后的一批「果实」，给气息奄奄的国民党政权政治上致命的一击：力劝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人员全部留下，归顺中共新政权，为新政府、新国家服务，并允诺五位谈判代表及其顾问屈武、柳亚子等人参加即将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

且看周恩来是如何强行留置国府首席代表张治中的：四月二十二

日，张治中向中共方面提出，和谈既已结束，他和代表团成员应返回南京「复命」。国民党政府亦已决定派专机来将代表团接回。

张治中将军毕竟算个「儒将」，党国元老，他需要保持自己的名节。他说，代表团是为和谈而来，和谈既已破裂，自无继续留在北平的必要。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遣的，任务终了，安得不返？况且家小都在南京，亲生骨肉，安得不顾？别人回不回去，那是各人的选择，他是首席代表，论情论理都不能不回去。自古两军交战，不留难来使，相信中共方面会有雅量，会讲信义放行的。

周恩来得知张治中要求回南京复命的决心后，立即报告了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按原计划行事。当晚，周恩来放下别的事务，赶到六国饭店拜望张治中，与张紧紧握手之后，说：「文白先生，谈判席上，你我是对手，唇枪舌战、脸红脖子粗都曾经有过；谈判席下，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当年在黄埔军校，我是政治部主任，你是学生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老同事了嘛。抗战时期我长住重庆，你是党国重臣，兼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我兼副部长，你给了我多少关照。特别是四五年重庆谈判，你为了毛泽东主席的安全，竭尽心力。毛主席至今感念不已，称你为他家乡的父母官哪^③。他还记得当年在中统、军统的严密监视下，你向他出示你写在自己手心的那个「走」字。是毛主席委托我，恳请你留下来，与我们合作共事。」

周恩来强调的是毛、周与张治中先生之间的私谊，张治中似乎并不为之所动。国之重臣，各事其主，区区个人私谊，岂可代替国家政治？何况，当年在重庆，如果蒋先生不讲信义，撕破脸皮，把你周恩来和毛泽东统统强行扣下，不放虎归山，你们共产党未必这么快就可以形成今日的气候。

周恩来目光深邃，仿佛看到了张治中先生的内心深处。他拉着张治中的手在沙发上坐下，对症下药地说：「这次二十天的和谈虽然以破裂告终，但活动安排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双方代表团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是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和谈失败的责任不在我们，

③张治中曾于抗战初期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火烧长沙即为「政绩」之一。

也不在你们几位谈判代表身上。内战的责任，仍在国民党政府身上。战火因此重燃，你、我只有感到遗憾的。目前形势发展迅猛，国民党四分五裂，已成全面崩溃之势。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下到，亦可能出现一些局部地区的和平，这个协定还是用得着的。我以为，你、我的努力并没有前功尽弃。」

张治中仍然不为所动，再次严肃地说明他要回南京复命的理由。

周恩来耐着性子听完张治中先生的「理由」之后，语气尖锐地问：「文白先生，你为什么不相信毛主席和我本人挽留你的诚意呢？为什么一定要去追随蒋介石一条黑道走到底？现在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光明与黑暗两条出路：你为什么要选择黑暗的路？」

张治中说：「我自投身国民革命那天起，追随的就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忠诚的也是三民主义。至于我跟蒋先生的关系，我不说，你们也是清楚的。」

周恩来没想到张治中的态度这样固执。但他要比张治中更固执，一定要完成毛主席交下的「挽留住南京谈判代表」的指示。张治中是首席，留住了张治中，其它代表本为亲共人士，就不成问题了。于是，周恩来情辞恳切地继续劝导说：「南京你们是回不去了，根据刚收到的我军前线战报，昨天我大军突破长江天险，完成对南京的包围，并占领了钟山、紫金山一带，我先锋部队今晨突进到了雨花台。南京已无险可守。我还可以告诉文白先生，南京城防司令，蒋介石警卫团团团长，陈诚警卫团团团长等将领，均已向我投诚……。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率领南京政府机构，已撤离南京，去了广州。上海也指日可下。」

张治中先生眼里溢出了泪花：一边是泰山压顶，势如破竹；一边是兵败如山，众叛亲离……。

周恩来进一步说：「我能理解文白先生对国民党的感情，毕竟是为三民主义奋斗了大半生啊！你和代表团一定要回去，也只能回到上海或广州。不管你们回到哪里，国民党的特务都随时可能对你们采取行动，甚至加以杀害。因为蒋介石、何应钦们已把你们视为降将、叛

逆……。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文白先生正好也姓张。有消息说，张汉卿已被蒋介石送去台湾继续拘禁。当年，汉卿就是不肯听我一句话，凭着他一个正直军人的侠义心肠，上了那架送蒋介石回南京的飞机。英雄失算，千古遗憾啊！而我们的另一位好朋友杨虎城将军及其夫人、孩子加上秘书，至今被关押在贵州熄烽监狱，随时可能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周恩来说着，眼睛也红了。这是他的政治撒手锏，刺中了张治中先生内心要害。只要想起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遭遇，国民党内非蒋介石嫡系的军政大员，就没有不寒心的。张治中什么都不怕，只怕去做屈死鬼。

张治中无话可说。沉吟了一会，他终于改了口：「毛主席有没有提过，我要是留在你们这里，还能做些什么？」

周恩来心里一阵轻松的窃喜：原来是要官要位啊！他不动声色，精神平和地说：「这个，文白先生完全可以放心。毛主席说了，只要文白先生留下来，他可以自己选择在军队里、政府里、全国政协里做事，可以在中央，也可以在地方做事。」

张治中释怀了，但面子上仍然有些疑虑：「我可以考虑留下，但代表团的其它成员，他们愿不愿留下？」

周恩来笑了：「他们就等着首席代表的这句话了。现在可以告诉文白先生，当初我们制订一对一个别交谈这种谈判方式时，就有了一旦和谈破裂把你们全部挽留下来的考虑。」

张治中将军久经沙场政坛摔打，此时不由得浑身打了个冷噤：「周副主席乃今日中国第一谈判高手，谈判席上，国民党的任何一位人物都没有能斗得过你啊！你是智勇双全，刚柔并济啊！」

周恩来连忙晃了晃手：「过奖过奖。恩来才疏学浅，今后还盼文白先生多加指教，共同为建设新国家出力。文白先生还有什么别的想法？恩来愿意效劳。」

张治中忽然紧了紧眉头，说：「有一点，我是万不肯做的，你和毛主席不必要求我们五位和谈代表发表通电声明吧？」

周恩来坦然地哈哈大笑：「文白先生过虑了。你们的行动本身已是最好的通电声明了，何必多此一举？我们为国家民族办事，这点气量还是有的！想想看，你们五位代表和顾问们还有什么当务之急？只要能办到的，恩来一定竭尽全力。」

张治中见周恩来态度诚恳，于是提出一个潜伏于他心中的大问题：「我们的家室怎么办？每家都有老有小，骨肉至情。他们可千万不要被蒋先生手下的人劫持去台湾当人质啊！」

周恩来胸有成竹似地说：「难得文白先生一身正气，先公后私。放心，我们早已作了安排。我们在上海、南京两地的地下党组织，最近采取了措施，乘国民党军队溃败逃走混乱之机，把诸位的家室统统保护起来了。也是白崇禧先生通达人情，睁眼闭眼了。相信先生的家人很快就会来跟先生团聚。到时候给先生一个惊喜。」

就在周恩来找张治中先生作彻夜长谈之后的第三天——四月二十五日，白崇禧从上海派来的专机飞抵北平，名为接和谈代表团南归。专机上却下来张治中将军的夫人及亲属子女共九人，连同送〈和平协定〉回南京的代表黄绍宏也一起返抵北平。

张治中将军见到夫人及家人前来团聚，果然惊讶万分、欣喜万分：共产党厉害，周恩来神通广大啊！可他心里，也难免有些五味杂陈：你们把我的家人保护起来并送来北平团聚，固然是件大好事，可事先也该跟我本人打声招呼啊！岂不也是一种变相的「劫持」？

和谈代表团顾问柳亚子先生，是为诗坛领袖，亦是毛泽东的词友，留置北平后最初被安排在颐和园内居住可是「出无车，食无鱼」，养尊处优惯了的老先生一时适应不了中共的艰苦朴素。他写下一首七律，请来周恩来呈送毛泽东，实为发泄对生活待遇上的不满意：感事呈毛主席。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璫。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毛泽东接到柳亚子的七律，也写下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

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毛泽东让周恩来把自己的和诗去转交柳亚子：「恩来，柳先生发牢骚、闹待遇了。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意思是他想回他的浙江富春江老家去隐居钓鱼，不想留在北平给我们捧场你看该怎么办？」

周恩来说：「亚子先生未必真想回老家去。主席的诗里也写了，莫道昆明湖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嘛。新政治协商会议需要柳亚子这样的国民党名流老前辈参加。他有牢骚，我有责任。筹备开国，千头万绪，没有及时照顾好一批知名人士，是我工作的疏忽。我马上派人解决他们的车马待遇等问题。宁愿我们自己的同志骑自行车或是步行，也要让他们「出有车、食有鱼」。」

毛泽东说：「既要给他们解决生活待遇，也要适当批评他们的臭架子。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今后跟这批元老名流、民主人士打交道，是要讲点我们的原则的，既团结利用，也思想改造。」

周恩来说：「那我就红脸白脸一起唱吧。当然最近几年，还是应以红脸主唱为好。」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难得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事务的大能人。但对周恩来日益扩张、膨胀的权力，也不能不有所顾忌，有所设限呢。

国民党的另一名谈判代表黄绍宏先生的遭遇就惨多了。黄绍宏先生后来去了浙江工作，挂名省人民政府主席。一九五七年因向中共鸣放，被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划为右派分子，后含冤去世。

张治中先生的待遇要好许多。他一直受到毛、周的青睐，曾与傅作义一起被授予中共上将军衔，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虚职。一九六六年毛氏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中，他曾经被抄过家，受过恐吓，于一九六九年病逝。此系后话。

第十四章 国号之争

接收香山、整修中南海的同时，周恩来让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和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调派施工队伍，在复兴门外万寿路日夜赶工，为中央五大书记修建「新六所」。「新六所」为六栋西式二层楼院，毛、朱、刘、周、任一人一栋，依次称为一号院，二号院，三号院，四号院，五号院，六号院。每院以矮墙花木相隔，错落有致，相对独立。六号院则房间最多，设备最简单，为值班人员及警卫人员住处。

有了「新六所」，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人员确是方便了许多。为着筹备新政协会议，筹组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政务院机构，筹办开国大典，中央领导人几乎每天都要进城出席大会小会，接见各界代表，商讨各种问题。然而车队往返于香山与中南海之间，单是路上就要花去两、三个小时。往返途中的安全警卫也是个麻烦问题。「新六所」则比香山短了四分之三的路程。从「新六所」赴中南海，车队只要东行十几分钟。

五月初，周恩来入住整修一新的中南海。他已经忙得离不开中南海了。

他首先看中的是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亦称为紫云轩，原为清代帝王每年春天在丰泽园前举行演耕仪式时的小憩庭院，亦做过乾隆皇上的西苑书房。菊香书屋内本已临时住着具体负责筹办开国大典的林伯渠秘书长。林伯渠于国共两党都是元老，一九二二年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时，就操办过孙中山先生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就职盛典。林伯渠虽然比周恩来年长十二岁，见周喜欢于会议间隙来菊香书屋小憩，便主动让出，另找庭院去休息。周恩来心里有数，这菊香书屋自己也是临时住住，它的适合主人应是毛泽东主席。整个丰泽园内共有二十几座大小宫院房舍，就数菊香书屋最宽敞、气派，且是南北两座四合院相连，院内古柏参天，菊花环伺，海棠怒放。

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分工，周恩来住在中南海具体统筹负责三件大事，一是筹办开国大典，二是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筹组中央人民政府，三是筹备新政协会议，组织学者专家拟定国号、国旗、国歌、

国徽。

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率中共领导人出席开幕式。周恩来当选为筹委会临时主席。随后他将一百多名筹备委员分成若干小组，分头负责党派协调、财经、政法、军事、文教、群众团体各项工作。周恩来又在筹委会会内组成中共党组干事会，以行使共产党的领导权力。党组干事会由周恩来任书记，会内责任分工：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齐燕铭负责党派协调；陈云、薄一波负责财经；董必武、陈绍禹（王明）负责政法；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负责军事；胡乔木、徐冰、周扬负责文教，李立三、蔡畅负责工、青、妇群众团体；连贯、杨静仁负责农民和民族工作。

为了拟定国号、国旗、国歌、国徽，政协筹委会内专门成立了一个第六组的机构，由叶剑英将军为召集人，大量吸收学者、专家、民主党派人士参加。第六组下设两个初选委员会：由翦伯赞、蔡畅、马叙伦、李立三、田汉、郑振铎、廖承志、张奚若组成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三位专家为顾问；由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四位专家为顾问。

七月十日，周恩来签发了政协筹委会关于〈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故事〉。这则由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三位文化巨擘起草的仅有两百余字的启事，周恩来动笔改动、增添了一十四处，最重要的一处改动是第三条国歌歌词内容应注意包括「毛泽东思想」一词改为「新民主主义」。周恩来敢于这样改动，可见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毛泽东思想一词尚未进入他的灵魂深处，他尚能坚持西柏坡二中全会通过的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集体决议。当然，他也是无意中戳了毛泽东的痛痒。

经过两个月的广泛征集、筛选，反复研究讨论，并经毛泽东同意，国旗定为五星红旗，国歌由原〈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都定在北平，复名北京，新国家的纪元采用公元年号。以上，待提请政协大会通过后正式颁布。

唯至为重要的国号，却争论不休，迟迟未能定下。

自三月二十五日中共领导人入住香山起，在多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五大书记即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毛泽东提出：「国号就用中华民国，现成的，国内国外都叫顺了口，习惯了，我们取代了国民党政权，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华民国，把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从国内政治、国际交往上除名。中华民国又是联合国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中苏美英法，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一个，拥有议案否决权，何乐不为？」

朱德和任弼时却发表不同的看法。

朱德说：「我们党打了几十年的江山，今天夺得政权，成立新家，用旧国号不大好吧？党内、军内都会有相当多的人想不通，以为我们换汤不换药，阻力会很大。」

任弼时咳着、喘着，说：「我们确实不宜用中华民国这一国号。容易在国内国外引起混乱，我们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跟腐败的国民党旧政权有什么区别？北京政府跟南京政府有什么区别？这一国号，只怕我们的最大邻邦苏联和史达林同志都难以接受。」

反对的理由铁硬。不给台阶，不给商榷的余地？毛泽东看看刘少奇和周恩来。刘、周二人却保持沉默，貌似不偏不倚。这是很少有过的，刘、周二位从来对他这党主席说一不二的。

毛泽东瞪着眼睛问病号任弼时：「依你高见，我们用个什么国号为宜？」

任弼时说：「我们要在国号上旗帜鲜明地突出三点，一是人民，二是民主，三是共和。因此，我主张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朱德点头，刘少奇、周恩来面露笑容。三人的表情象在说，弼时够水平，说出个道理来总是能服人，可惜肺病越闹越严重，恐怕不是个长寿之人。

毛泽东自一九四五年「七大」后很少在书记处会议上成为少数派，而且是单干户。但他有恃无恐。作为书记处主席，他可以改变书记处会议的决定。当然也不是任意就可以改变的。他尤其不高兴看到刘、周二位脸上的笑容。但他不动声色地问：「少奇，说说你的高见？你

也同意弼时的主张？」

刘少奇外貌笨拙，腹有经纶。他谦恭地笑笑，才说：「国号国旗，一个叫在嘴上，一个看在眼里，使用率最高，是特别的重要，也要求我们要特别的慎重。主席提出沿用「中华民国」这一现成国号，是具深谋远虑，有战略眼光，把正在逃往台湾岛的国民党政权，一下子从国内外政治生活中除了名，使其名不正，言不顺，难以立足……。但总司令和弼时同志提到的党内军内，以及民主党派、进步人士、青年学生、工人农民的接受问题，还有苏共史达林同志他们的看法，也确是需要预先考虑到的……。」

毛泽东笑了笑，打断了刘少奇的话：「你这是两面光的意见。我想听到你自己的主张。」

刘少奇说：「我在基本同意主席的提法的同时，建议把这事暂时搁一搁。中央已经决定派我访问苏联，我也正好趁便去征求一下史达林同志的看法。再者，我们更可以比较广泛地征求一下在京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学者专家们的意见。」

毛泽东仍然面带不悦，尖锐地说：「国号问题，纯属我们的内政，中国的家务事，你不要去跟史达林同志打商量，跟任何兄弟党都没有关系，人家管不着。至于征求一下党外民主人士、学者专家们的意见，集思广益，开张视听，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交恩来去办吧。」

周恩来连连点头，答应将国号问题提交政协筹委会议第六组去商议。

毛泽东问：「为什么单单是第六组？别的组就商议不得？」

周恩来赶忙解释：「第六组集中了党内外学者专家、社会名流，如郭沫若、沈雁冰、田汉、马寅初、翦伯赞、张奚若、徐悲鸿等等。当然，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征求一下几位辛亥革命老人的意见？比方张澜、黄炎培、何香凝、沈钧儒，还有爱国华侨陈嘉庚等等。」

毛泽东仍不放过周恩来：「恩来，你自己的看法哪？你不可能没有看法的呀？」

周恩来温和而恭敬地望望毛泽东，又周到地看了看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才说：「主席，我有个权宜的想法，提出来供参考……，下过

很不成熟，仅仅是个参考意见，是否可行，请各位定……。」

朱德嘻嘻笑了：「病急等不得慢郎中，恩来，你就直说了吧！」

毛泽东也笑了笑：「恩来啊，书记处会议，五人对五面，你用不着迟迟疑疑罗。」

周恩来脸膛稍稍红了红：「国号问题拖不得。书记处分工我具体抓政协会议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筹备工作，许多文件、简报、通知、启事上都必然要提及和书写。我看是不是这样，暂时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加个括号，简称为中华民国？」

刘少奇首先称妙：「恩来，你提出的真是个聪明法子，两全其美，两全其美。」

朱德和任弼时也连连称善。

毛泽东心里有数，刘、周二人是在跟自己搞迂回战术。但他心里不能不暗中叹服，周恩来确是党内一名综合平衡大能人。难怪重庆时有那么多的人称赞周恩来为共产党的诸葛亮，智多星。事已至此，毛泽东只好摆摆手，表示宽和地说：「也好，先行恩来的权宜之计吧！注意，只是权宜，不是结论。诸位的高见，还不能说服我改变初衷。」

七月二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成员有高岗、王稼祥，师哲。他们一行乘火车先到旅顺，然后改乘苏联军机飞往莫斯科。刘少奇等在莫斯科向史达林及苏共中央领导们报告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介绍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红色政权的体制、外交方针，并就建国建政问题向史达林求教。由于毛泽东有言在先，刘少奇没有提到国号问题。史达林对刘少奇一行的接待非常热情，破例地亲自与刘少奇会谈六次。对于中共的要求，史达林几乎是有求必应。双方达成的具体成果是：「安排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共新国家的外交承认，苏联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并向中国派出技术专家，苏联同意卖给中国一百架空军飞机，中共派飞行员到苏联接受培训等等。」

八月二十八日，刘少奇一行回到北京。随同中共代表团来的，还有九十六名苏联各行业专家，主要是经济工作者，来手把手地向中共传授按计划经济体制建设新中国的奥秘。

刘少奇访苏期间，中共最高层关于国号问题的分歧仍然没有取得统一意见。毛泽东仍然偏爱国号为中华民国。周恩来则在一系列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的文件上，一律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建国三大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呈送毛泽东主席审阅时，毛泽东将所有涉及国号的地方，一律改写成中华民国。一时，在国号使用上颇为混乱。

几乎所有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委员以及中共中央的文秘人员，都反映国号文字太长，加个括号更是烦琐，使用不便。

九月二十一日，筹备了整整半年时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出席代表为六百三十四人，来宾三百人。

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照片，由于新的国旗还没有最后确定，两旁悬挂的是人民解放军军旗。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程潜、何香凝，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周恩来等。毛泽东致开幕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中华民国）」成立。他振臂高呼了三句口号，其中一句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中华民国）万岁」。

呼喊起来是不大顺口，而且语音语意含混。新的国家已宣告成立，国号却没有定下。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再召开一次党外人士包括二十几位辛亥革命老人的座谈会，来作最后的商定。

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召开国号专题座谈会。出席座谈的七十老翁即有近三十位。周恩来首先说，马上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关于国家的名称却还没有确定下来。现在有三个提法，政协会议的文件上在暂时使用着。一是中华民国，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加括号简称中华民国，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用哪个好？请各位各抒己见，拿出一个比较一致的意见来，提交政协委员全体会议去议决通过。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发言说：「本人要重申一下在政协筹备小组会上讲过的意见。有几位老先生也嫌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和国的名字太长，建议去掉民主两个字。我看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因为有了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 **democracy** 来自希腊文，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两字从字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

燕京大学女教授雷洁琼接着发表她的不同看法：「我们刚从黑暗的专制制度中走出来，刚刚看到民主自由的曙光，我看国名中的民主二字还是保留为好。如果嫌名字太长，非正式的文件和口语中，使用简称中华民国即可以了。中华民国这一简称还应保留。」

话题渐渐集中到了简称的去留问题。主持人周恩来说：「各位在讨论三大文件时，都看到了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个括号简称中华民国（他不便说明毛泽东坚持了什么），关于这个简称，有两种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政协会议主席团党委会特地叫我来请教各位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们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有点旧感情，是不是？」

会场上发出轻松的笑声。

接下来发言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先生。他曾在江南乡试中举，也曾加入过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窃国的斗争。他认为：「由于中国老百姓文化落后，思想保守，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

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老人则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那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辛亥革命后归隐三十年的前清进士周致祥老先生却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群众对它没有好感的名称，已经被弄得不堪言状。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下相同。」

这时辛亥革命元老司徒美堂站起来说：「我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要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

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为什么还要用旧国号？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示天下百姓？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们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先生语音洪亮，会场上发出热烈的掌声。

接着发言的人口学家马寅初，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法律学家沈钧儒，清末翰林陈叔通，新加坡侨领陈嘉庚等，都主张删去简称，而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号。

问题又回到了中共的权力核心——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只有毛、朱、刘、周四人。任弼时因去了苏联莫斯科治疗肺病而缺席。周恩来详细汇报了党外民主人士及辛亥革命老人们的意见。朱德、刘少奇没有新的看法。毛泽东无奈地说：「看来我又当了一回右倾罗，现在是党外人士、专家学者、辛亥革命老人们中的多数左倾，比共产党人还革命，还激进。本人的右倾抵挡不住，只好服从大多数，落得皆大欢喜，一团和气。但我们不坚持使用中华民国这一称号，只怕日后要后悔的罗。」

国号问题争持半年，终于尘埃落定。毛泽东说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

但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被毛泽东不幸言中。二十二年后的一九七一年，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数次大会辩论、表决关于恢复中国大陆在联合国席位的不结盟国家提案时，就遇上了国号问题。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也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议案要将台湾的中华民国除名，改为接纳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光是在这名称上，就要对联合国的一百五十多个会员国以几十国语言文字去费多少唇舌！

一九七一年，刘少奇已被毛泽东整死，朱德则垂垂老矣，只有周恩来仍然是国家总理。毛泽东说：「恩来，你当年是面面俱到，和了稀泥，这在你是几十年一贯制。可我好后悔，后悔晚矣！当时为什么就没有力排众议，独裁一下，坚持使用中华民国这一国号呢？不动一兵一卒，光一个国号，就使台湾的蒋某人成为了非法政权啊！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呢，不能事事都搞什么少数服从多数呢。」

周恩来不得不慑服于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只有唯唯诺诺认错的分。

第十五章 重用高岗是着妙棋

在筹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人民政府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人事安排领导小组」，毛泽东亲任组长，刘少奇任副组长，成员为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陈云。任弼时已去莫斯科治疗肺结核，在小组里只是挂个名。此时刻，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关系又悄悄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于无声处听惊雷。

毛泽东指派周恩来负责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同时，委托刘少奇筹组中央人民政府，原曾拟名为「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说，还是一步到位吧，蒋介石的政府曾叫中央政府，现在跑到台湾去了，我们才是中央政府啊，加上人民二字，以示区别。

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是个空架子，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诞生之前，象征性的最高国家权力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则暂代宪法，成为新国家的法统。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政协会议嘛，热热闹闹，说说笑笑，大事管不了，小事常争吵，举手一边倒。」

刘少奇负责筹组的中央人民政府，才是政权实体，真正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半点马虎不得的。如果说，新中国开国前夕，毛泽东对刘少奇持有八成乃至九成的政治信任，对周恩来则至多持有六成的政治信任。按照毛泽东的意愿，周恩来适宜抓抓外交，管管统战，以及打理些中央机关的日常事务。

周恩来向中共中央人事安排领导小组提交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名单草案中，毛泽东为当然主席，朱德、刘少奇代表共产党为副主席。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中的副主席参考名单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程潜、沉钧儒、郭沫若、陈叔通。委员则有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李富春、李立三、彭德怀、彭真、林彪、张治中、傅作义、龙云、蔡廷锴、何香凝、李德全、邵力子、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沉雁冰、马叙伦、马寅初等一百五十一人。出席政协会议的各党派代表拟为六百余人，列席人员拟为二百余人。

在中央人事安排领导小组会议上，周恩来对上述名单草案作了说明，特别强调：作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应以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

占多数，尽量照顾到各行业各界别有代表性的知名人物。因此，在共产党内，除毛主席是当然主席外，只提出朱、刘二位为副主席，其余包括本人和弼时同志，以及陈云、彭真、张闻天、李立三、李富春等，加上各大军区的一、二把手彭德怀、刘伯承、高岗、林彪、陈毅、邓小平、贺龙、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等等，就只能做委员了。这样安排，有利于全局，有利于全国人心归向。但并不会削弱本党的领导地位。全国政协每年只开一、两次会议，通过些决议、法案。本党的领导地位，应当在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政务院的组成人员名单中去体现。中央人民政府，才是真正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毛泽东吸着烟，一面仔细审阅著名单，一面听着周恩来的说明，不住地点着头，心想：周恩来主动表示不做全国政协副主席，意思是一定要去做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了？不要虚名，而要实权。此人从来八面玲珑，广结善缘，不动声色，能量大着哩……听完周恩来所作的说明，毛泽东喝了口浓茶，清了清喉咙，才说：「恩来虑事周详，有全局观念，名单也基本上拟得准确。当然还要集思广益，看看有无遗漏，尽量把各行各业有代表性的人物囊括进来。做政协委员嘛，我们甚至可以不要去计较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比如我的老朋友梁漱冥，过去在山东搞过乡村自治的，就很有他的代表性。只要不是民愤极大的反共顽固分子，特务头子，只要他现在表示愿意跟我们合作，我们就可以给他挂个政协委员的名誉。给张饭票、添一双筷子、一个杯子嘛，有什么大不了的。今后政协既要议政，也要养士。养他一批，总比放在社会上或是关在班房里好。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恐怕还是出在我们中央书记处内部。我是说，弼时去莫斯科治病，请假全休，我们可以暂不考虑。但以恩来在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中的声望和影响，不做政协副主席，只怕党内党外，都会有人进言和声援，到时候，其言铮铮，其势汹汹，怎样办？」

朱德、刘少奇、董必武、陈云频频点头。刘少奇望着周恩来，说：「这就要看恩来自己了。我个人看法，恩来长期在国统区从事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比我更有资格做政协副主席，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周恩来毫不迟疑地说：「可以由我本人出面，去做民主党派和无

党派人士的工作，说明我们共产党人的苦衷。我们党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如果都当了全国政协的主席、副主席，容易给人造成一党包办的错觉，确是个政治影响问题。至于我个人，在政协挂个委员或者加个秘书长名份，多分管些具体事务就可以了。况且我们筹组中的中央人民政府，虽然不再称为民主联合政府，但仍然应当保持多党派联合管理国家事务的性质。这一点，是我们在一系列的座谈会上，都一再做了说明的。因此，全国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两套班子，除了主席、朱德、少奇三位代表我们党的主导地位外，其它人员包括民主人士在内，都不宜同时两边挂职。多腾出些位置，多安排些头面人物，有利于新中国、新局面的团结，和谐。」

周恩来的发言滴水不漏。毛泽东仍听出来了，恩来是巧妙地亮出底牌来了，原来他要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政务院总理的实职。

毛泽东却有毛泽东的打算。这些日子，他脑子里总有一个高岗，陕北根据地的代表，现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高岗。当年江西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马，破衣烂衫，简直溃不成军。要是没有陕甘宁这块根据地，中央红军到哪里去落脚？很可能一路逃到蒙古甚至苏联境内去，成为流亡队伍。所以说，没有陕甘宁根据地，就没有共产党的今天。

没有延安，就没有北平。我们可不能忘了这个本啊！陕甘宁的代表就是高岗，年轻，有才干。更有最大的优点，是他对毛泽东本人忠心耿耿。在党中央，他只认一个毛主席。除了毛主席，他谁也不放在眼里。

一直微笑着的朱德总司令这时开了口：「我看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人选，既然恩来代表中央搞了个腹案，就可以考虑先放一放了。毕竟要先把会议开起来，与各党派人士进行沟通，协商，再来确定为好。名为政治协商会议，领导人选更应当协商产生……。我个人还有个请求，政协会议的会堂，不要再挂我的画像了，我的身分是军人。挂孙中山和毛润芝二位的，才有代表性。这样，也可以体现一下我们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和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国民革命运动，有着某种意义上的连续性和继承性。」

毛泽东笑了：「总司令的高见很好。朱、毛从来不分家，我看只挂孙逸仙一人的画像就可以了。董老、陈云，你们的意见如何？」

董必武说：「润芝的像还是少不得的。新政协会议毕竟是由我们党所领导并主持召开的喽，这里面有个革命阶段和革命性质问题。」

陈云说：「我同意朱德、少奇、董老三位的意见。政协会议的开幕式已定九月二十一日下午，在怀仁堂礼堂举行。眼下有个具体问题，如果领导人选不能初步确定下来，哪些人士上主席台就座？」

毛泽东笑嘻嘻了：「不是有个筹委会主席团吗？我们调整一下，不就可以称为大会主席团？多请些人到台上去坐坐，也好热闹点罗。记住，一定请上傅作义、张治中二位，他们暂时当不上副主席，上台坐坐，做一回主席团成员，也是一种安慰、鼓励罗。」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陈云都表示赞同。

毛泽东问：「恩来，主席团的事就这样定了，是不是请你把政协会议的主要议程再说？」

周恩来说：「主要议程，一、讨论、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二、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国号、国旗、国歌、国徽、国都议案；三、通过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及酝酿推举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选；四、协商、选举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主席、副主席、秘书长，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

毛泽东说：「这就对了，政协会议的最后一天，才搞选举好。委员暂定一百五十一人？我看人数还可以酌量增加些，有酒大家喝，有席大家坐嘛。还是这样安排好。免得会议伊始，各党派就来争论人事问题，谁多谁少，闹不好意思一大堆，摆不平。有的人在过去南京政府的国民代表大会上吵闹惯了，来到共产党的庙堂，更不会温良恭俭让，甚至演出全武行。」

朱、刘、周、董、陈都跟着笑了。

刘少奇负责筹组的中央人民政府及领导人员名单，暂时还来不及在人事安排领导小组会议上提请讨论。关于政府组成人员名单，毛泽东主席相当关注，刘少奇相当棘手。毛泽东已经个别地商谈过多次。他不能不尊重、领会并且贯彻毛主席的各种意图。

在刘少奇草拟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名单中，共产党方面，毛泽东是当然主席，副主席则提出了朱德、周恩来二位。刘少奇谦逊地没有提出自己。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方面的副主席，则提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程潜四位。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先生夫人，长期同情、支助共产党的地下斗争，其地位是无庸置疑的；李济深先生是孙中山先生最早的军事助手，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一九三三年领导第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给过当时的中共中央江西苏区很大的支持，后又与何香凝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担任主席，是一位坚决反蒋的国民党元老；张澜先生一八七二年生，是硕果仅存的既参与过晚清戊戌变法、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革命老人，可以说，现在国共两党的领导人，都是他的晚辈；程潜一八八一年生，早年留学日本，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抗战时期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竞选过南京政府的副总统，并长期任职湖南省政府主席，于本年八月间率部起义，宣布湖南和平解放，给了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南地区的迅速溃败致命一击。

名单提交毛泽东主席个别审阅时，又在程潜之后加上了彭德怀。刘少奇确是出以公心，觉得论资排辈也好，论功行赏也罢，都应当有彭德怀的名字。

名单草案顺序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程潜、彭德怀。

毛泽东却以红铅笔将名单上的周恩来圈掉了，换上了刘少奇的大名。

再又把程潜和彭德怀的名字圈掉了，换上了高岗的大名，并批注了一句：程拟转全国政协任副主席，彭宜在中央政府国防委员会挂职？

刘少奇不能不暗自吃惊了：「毛泽东主席有可能把周恩来的名字圈掉换上自己的名字，他心里早有准备；但是把彭德怀的名字圈掉，而换上高岗，却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高岗，仅是一名大军区负责人，怎么够格呢？其它六大军区的负责人怎么摆？」

因警觉到毛泽东主席正在默默注视着自己，刘少奇尽可能地保持

住沉稳和平静。

果然，毛泽东发话了：「这名单，暂放在我这里。你如果需要，可抄下一份……怎么样？少奇啊，是不是有些出乎你的意料？」

刘少奇诚实地点点头：「主席的意图，我要努力来领会、理解，然后贯彻……。我觉得既然圈掉周，也没有必要换上我。中央分工，我的主要精力还是协助主席抓党的建设，党的组织管理。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两百多万名党员的执政大党，刚接手整个国家事务，各级党组织，每一名党员，都有一个从头适应、重新学习、从头做起的问题……。至于程潜先生转往全国政协任职，倒是不无可以。相信彭老总那里也不致有什么问题。比较麻烦的恐怕还在于恩来、高岗二位的安排，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党内、党外都要说服许多人才行。当然，我明白，主席的这项人事安排，是从全局出发，从长远着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毛泽东啾啾地吸着烟，说：「少奇，毛遂还自荐呢！你自己就不必谦让了。我做主席，不胜烦扰，得有个人代我主持中央政府的国务会议……。我们也是水泊梁山排座次？弄不好也会有李逵式的人物跳出来大闹忠义堂？我们是中南海的怀仁堂，勤政殿啊！」

毛泽东说罢，又默默地注视着刘少奇。刘少奇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不免暗自发毛。毛蓄意不让周恩来担任中央政府副主席，只让周任政务院总理，主要负责外交和统战，他是早有预感的。对于毛主席如此破格提升、重用高岗，他不仅大感突然，而且简直就是对自己的威胁。理性上不可思议，感性上也无法接受。论资历、论功绩、学识、水平，彭德怀、董必武、陈云、陈毅、刘伯承、贺龙、王稼祥，甚至李富春、彭真、邓子恢、邓小平、薄一波，都比高岗强到哪里去了。高岗其人，年轻气盛，专横拔扈，在他眼睛里，党中央只认一个毛主席，其余人都不算老几。

刘少奇是一九四二年回到延安中央机关工作后，才真正认识高岗的。

高岗陕西横山人，一九〇五年生，一九二六年入党，一九三三年与刘志丹一起创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成为陕北红军的领导人。一九

三三年，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率中央红军残部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逃窜到陕北。「陕北救中央」这话，最初是由毛泽东说出来的。毛泽东第一次见到陕北红军领袖高岗时，高岗正在病中，发着高烧。毛泽东亲自给高岗喂药，擦身子，倒尿盆，换洗臭烘烘的内衣内裤。高岗感动得直流眼泪。病愈后，高岗江湖义士似的对毛泽东拍着胸口起了誓言：「毛主席，今后我就是你的保镖，你的卫士！你指向哪里，我打向哪里，你叫我去干掉谁，我就替你去干掉谁！」

中共中央在陕北一住一十二年。身胚高大、感情外露、一身草莽气息的高岗，表现出了杰出的组织才干与军事才干，把陕甘宁边区经营成全国的模范根据地，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撑起中共中央机构。毛泽东视高岗为心腹爱将，高岗对毛泽东更是尊为师长，忠心耿耿。毛、高二人建立起了异乎寻常的私人情谊。议党议政，包括议论评点党内干部，两人无话不谈。十二年间，毛泽东刻意栽培、倚重高岗，将他次第提拔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理政委。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更提名高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朱、刘、周、任、林（伯渠）、高（岗）、董（必武）、张（闻天）、陈（云）、王（明）等十一人。这样，高岗在党内的地位便被摆在了彭德怀、陈毅、林彪、贺龙等人之上。

一九四六年冬，国、共重开内战，两党大军全力抢占东北三省，毛泽东任命高岗为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兼第一副司令员，成为司令员林彪的最佳拍档。一九四八年末林彪、罗荣桓率东北野战军进关作战后，高岗成为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当上独当一面的「东北王」。应当说，高岗在东北卓有政绩，有魄力，有干劲，极具开拓精神。短短两年内，他背靠苏联老大哥，在东三省境内完成了农村土改，肃清了土匪，恢复了城乡生产，特别是城市工业生产，把东北三省建设成了中共的战略物资大后方，有力地支撑了全国各大战场。高岗在东北地区的干部、群众中享有了崇高威望，称他为「高主席」。在某些大型集会上，甚至出现了「高主席万岁」的口

号。苏联革命导师史达林也都对他另眼相看，称他为中共最有前途的年轻领袖。

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高岗、王稼祥、师哲三人为成员。高岗对党中央未任命他为代表团副团长大感不满，认作是刘少奇对他的排斥贬抑。他从骨子里看不起刘少奇这种靠白区地下工作起家的领导人，没有指挥过大军，没有打过一次像样的战役，没有一寸军功，能混到党内第二把手的高位，完全靠耍嘴皮，是历史的误会。而且刘在历史上多次被捕过，政治贞操也很可疑……。代表团访苏期间，由于团长刘少奇大权独揽，掌管一切，高岗显得格格不入，憋着一肚子气，借口东北军区有要务等着他处理，而提前回了国。他却先不回沈阳，而直接到了北京，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刘少奇在莫斯科死教条，假谦虚，不懂外交礼仪，给我党中央丢脸，以致发生了「史达林祝酒、刘少奇坚拒不喝的外交事件」。

那是八月上旬，史达林在他的莫斯科郊外别墅里，第四次接见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苏共领导们接见客人，总是离不开酒，且总是烈性的伏特加。他们的政治局委员简直个个是酒桶，能豪饮。这次刘少奇动了动心计，把正在莫斯科养病的毛夫人江青也请来了，并鼓励江青向史达林同志敬酒。江青先问过了刘少奇，她可不可以代表毛泽东主席敬酒？刘少奇说主席没有交代呢，你还是直接向史达林同志敬酒，反正翻译同志会介绍你的身分的。江青倒是不怯场，不慌不忙地向史达林举起酒杯，自命甚有风度地说：「我向您——史达林同志敬一杯，祝福您健康长寿！您的健康长寿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幸福！」史达林一向被人歌颂惯了，听了江青的话却很为惊喜：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竟然是你们的幸福！接下来，史达林兴致勃勃地夸赞了中国兄弟党，夸赞了中共领导人，并说，世界革命的中心从欧洲移到苏联，以后还会移到中国，希望小弟弟超过老大哥，中国超过苏联，并为此向刘少奇祝酒。刘少奇听了非常紧张，国内战争尚未结束，中共政权尚未建立，经济上、军事上、外交上一切仰仗老大哥的支持帮助，怎么就谈得上小弟弟超过老大哥呢？因此，他怕此举表现出对苏联老大哥的不恭，怕中共代表团表现出不知天高地厚，怕回到国内受

到毛主席的痛斥。史达林却不理解刘少奇此刻的复杂心情，通过翻译解释说：「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你们的历史责任加重了，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刘少奇还是不敢接受，说：「老大哥就是老大哥，小弟弟还是小弟弟。」在旁的苏共政治局委员见刘少奇不肯接受史达林的祝酒，怕拂了他们伟大领袖的面子，纷纷劝说：「小弟弟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是规律，史达林同志的祝酒应该接受。」双方相互推让了半小时之久，刘少奇却硬是没敢喝下那杯酒。

听了高岗的汇报，毛泽东一脸的不高兴：「刘少奇这人，太死板、太不灵活了！连杯酒都不敢喝。你高岗在场，为什么不替他把酒喝了，喝了才痛快，才算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高岗说：「我当时是很生气，是想从少奇同志手里夺过酒杯，一口干了。可我要顾全我们党中央代表团的团结形象，也就是顾全我党中央的面子。少奇同志这次表现很差劲，很没有水平，简直不像个党中央的领导人。」

毛泽东拧了拧眉头，轻轻叹了口气：「蓝苹也向史达林同志敬了酒？听说史达林同志还很高兴？」

高岗说：「也真是难为她了。她本想代表您向史达林敬酒，但刘少奇不答应，说事关党的纪律。我看刘少奇是故意让人难堪呢。他自己那年轻漂亮的小夫人王光美，却每次都以他夫人的名义，向史达林和他们的政治局委员们一一敬酒呢！王光美这次在莫斯科，可是压了江青同志一头呢……？」

毛泽东不耐烦地晃了晃手，表示不要再听这类长长短短的事，而问：「你什么时候回沈阳？你上回告诉我的那方子，试了试，好象还管用，只是要从人身上去弄，很麻烦，影响也不太好……。你今后还是要少动这方面的脑筋，和尚道士的方子，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人吃五谷杂粮，才是最主要的……。有你在东北，我是比较放心的。中央也正在考虑增加几位新面孔，你也要有些思想准备……。」

高岗立即不失时机地表示：「主席！您放心，过去在陕北，在延安，我是您的卫士，今后到北京，我还是您的卫士！我替您指挥御林军，谁要对您有个三心二意，我高岗就对他不客气！」

对高岗的态度，毛泽东是又爱又恨。他正色道：「北京不是延安了，你今后讲话要注意哪。要做京官，先要读点历史。你回去找一套《资治通鉴》来读，认真读，做点笔记，也可以找个大学里的教书先生个别辅导。记住，下回来北京开会，我可要考考你呢。从一个大区领导到中央来做领导，你还要走一段路。这段路，就是读历史，读政治。《礼记》上说，张而不驰，文武弗能也；驰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这话讲的是治国之道，也是从政之道，刚柔相济，宽严结合。这是政治智能，你要加紧学习呢。」

……如此这般，毛泽东主席要擢升高岗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用意，刘少奇是心知肚明了。毛泽东从来用将如用棋，动一子，已预留下未来的三、五步。重用高岗，首要的目标是冲着周恩来的，并预备着日后取代周恩来。其次，也是用来制衡他刘少奇的。刘少奇隐隐觉得，高岗如同一头政治野牛，将是很难对付的呢。

摆在眼前的棘手问题是：他刘少奇还必须代毛泽东主席出面，去摆平周、高之间的升降。说好说歹，工作怎么做？名单半公开之后，党内党外反应必然强烈，会不会被人误解为他刘少奇刻意排挤周恩来？到时候鉴于党内外反对声浪过大，毛泽东主席临时变卦，对名单态度含糊，甚至不认账，怎么办？他刘少奇不就成了众矢之的，平白的当一回替罪羊？

第十六章 中央政府周委员

毛泽东意欲在筹组中的中央人民政府中贬斥周恩来，可说是权衡再三，用心良苦。

虽然早在三月上旬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经公开许诺「新中国人民政府，恩来是一定要参加，其性质是内阁总理」；但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后，毛泽东着手筹组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前身——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时，却忘记了周恩来，而委托刘少奇率一组人马，去起草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并负责物色人选。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上述文件，宣布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内设六个局，后扩充为二十一个部和直属局。此即后来的中央人民政府机构。七月，正式挂牌办公，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随后又增加李富春、马寅初、曾山、贾拓夫、叶季壮为副主任。毛泽东根本没让周恩来沾上边。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制度样式，毛泽东更是匠心独具。他既没有照搬苏联老大哥的部长会议主席制，亦没有抄袭英联邦式内阁首相制，以及美式总统制，而创造出一个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新政制：中央人民政府之下，设立政务院和财经委员会两大平行机构。这一来，周恩来名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其职责却类似美国的国务卿，主司外交事务。名义上，政务院还兼管国防、公安、司法、文教，实际上这些部门均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执掌或派亲信大将执掌；而陈云属下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下属二十一个部和直属局，领导着全国工业、农业、财贸、金融、邮政、交通、劳动、人事等要害命脉，是为政权的实体。

周恩来作为一名失去财政经济大权的政务院总理，上面还压着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及其六位副主席，其不尴不尬的地位、处境，是可想而知了。

话题还是应当回到刘少奇负责筹组中央人民政府时遇到的棘手问题上来。

果然，毛泽东主席委托刘少奇去找周恩来个别谈心，交底：以高

岗取代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候选人，看看周恩来本人的反应。

刘少奇来到周恩来的住处西花厅后院书房、闭门长谈，态度诚恳。他首先回顾了党的近三十年来的血火征途，苦难历程。能够创下今日局面，夺得全国政权，实在是千百万共产党人，志士仁人血流成河，尸骨成山换来的。我们这些至今还活着的人，都是流血牺牲剩下来的人，是幸存者啊。我们图的是什么？图的民族翻身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国家富强民主！

我们是为人民服务，替全中国人民谋福利，而绝不是为个人谋官位。当然，新国家、新政府成立在即，需要我们这些人来承当各种职务，担负各种工作。仍然是为革命吃大苦、耐大劳。而绝不是谋我们个人的高官厚禄。

因此毛泽东同志最近一再强调，革命胜利，进了城，坐江山，我们共产党人一定不要忘记本，不要忘记井冈山，不要忘记陕甘宁，不要忘记延安窑洞。他特别指出，没有陕甘宁，没有延安，就没有共产党人的今天，就没有今天的北平。也因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一个设想，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人选中，应当有一名陕甘宁根据地的代表人物，以示我们不忘本……。

周恩来一脸的谦恭俭让，仔心地品味着少奇同志的谈话，咀嚼着他话里的弦外之音。此时，他雨雾一般的心绪忽然透亮了，明澈了。他没让少奇同志继续费口舌，直截了当地问：「少奇同志，是不是主席在安排中央政府的领导人选方面，有什么设想或是困难？你就说出来，我保证服从主席的安排，决无丝毫个人的打算。」

周恩来话出突然，刘少奇仿佛还要想上一想。

周恩来又说：「少奇同志，你、我都是一八九八年的同龄人哩。我们又都是一九二二年入党，党龄也相同哩。共事这么多年了，你是了解我的嘛。」

刘少奇倒是敬重周恩来的为人品格：党内军内，从来谦虚有礼，总是任劳任怨，不争名，不争利，守纪律，顾大体，从未见他闹过什么个人意气。而且能上能下，江西苏区时期曾为毛泽东同志的上级，到延安后也安于做毛泽东同志的下级。单是此一点，就是多数人难以

做到和适应的。当然恩来的不足之处也是较为明显的：在党内长期跟风跑，谁当一把手他都拥戴，都进入角色，努力效命。为人太过圆熟。高岗在延安整风时就公开指责他为老牌机会主义。

刘少奇不紧不慢地燃了一支烟，才说：「恩来，你上回提出全国政协领导人员名单草案时遇到的问题，在主席委托我草拟中央政府负责人名单时，也出现了。正如你谈到过的，我们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仍具民主联合政府的性质，联合各民主党派共同管理国家事务。因此，除了毛泽东同志是当然主席、朱总司令是当然副主席之外，我们中央书记处的其它三位书记，就不好人人都安排副主席了，否则就像是我們一党包办政府了……。」

周恩来见刘少奇话到口边又打住，有难言之隐，便干脆挑明了问：「是不是主席拟下名单了？可不可以交给我看看？」

话已至此，刘少奇只得将那份重抄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名单拿了出来，交周恩来过目。

周恩来眼睛亮了亮，盯着名单，脸上的笑容纹丝未动。倒是刘少奇指著名单上自己那名字处，推心置腹地说：「我原来草拟的，这地方本来是你，主席亲自作了改动。这最后一名，也是主席添上去的。」

周恩来将名单递回到刘少奇手里，感激似地回敬了一眼，之后坦然地笑了：「少奇同志，谢谢。你可是什么都没有对我说，我也什么都不知道啊，哈哈……很好！请你转告主席，我完全拥护这份名单，这也正是我本人的意愿。中央分工我今后负责政务院工作，不挂副主席，才有利于中央政府对政务院工作的领导和督察。我的这个意见，我自己也会在适当时候，向主席面告。」

刘少奇原先只料到周恩来不会有什么负面反应，倒没料到周恩来如此豁达痛快，而且表现得够交情，够朋友。他轻松地舒一口长气，说：「恩来，你几十年兢兢业业，立党为公，我要向你学习，中直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应向你学习。你的意见，我会如实向主席反映，主席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当然，如你所说，你自己更应主动找主席表明心迹，越快越主动，这比我的汇报更有说服力……下面，我个人想向你征询一下，关于名单上的最后一位，看法怎样？当然，这跟主席的

指示无关，仅仅是我个人向你征询意见。」

周恩来两手一摊，哈哈大笑：「他？少奇同志，你不比我更了解？好同志嘛！比主席的年纪整整小了一轮，可算是晚一辈嘛。比你、我也小了八岁嘛。年轻，工作有干劲，有魄力，过去经营陕甘宁边区成为模范根据地，近几年在东北三省开创出新局面，成为全党全军的战略大后方，天才，天才。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主席慧眼识英杰，具长远的战略眼光啊。」

刘少奇却说：「东北三省能有今天的局面，功劳不能算在一、两位同志身上。四五年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你陪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我在延安主持日常工作，当即提出「率先下手独霸东北」的口号，主席马上回电报批准。我们从延安动员十万干部赴东北。中央政治局下了最大的决心，派了多少人物去啊，东北中央局最初由彭真挂帅，林彪、高岗、陈云、罗荣桓、张闻天、李立三、王稼祥、杨尚昆、何凯丰、黄克诚、宋任穷、邓华、陶铸等等，统统去了东北局！延安去的，加上罗荣桓从山东解放区渡海过去的部队，加上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四师，我们一下子向东北调去了三十万干部和军队。我们比南京的老蒋他们早动手了两个多月。加上有苏联红军的明帮、暗助……所以东北三省能有后来的局面，是全党动员、独霸东北这一方针的结果。当然也不能忽略了几位主要负责人的杰出努力。」

周恩来听着，点着头。他心里完全同意少奇同志的分析。他忽然伸手拉了拉办公桌的抽屉，拉出一半，却又推了回去。抽屉里有份东北局党校学员的告状信，揭发东北局第一把手私生活腐败，搞了多少年轻女子，有名有姓者达三十几人。还接受一老道士所传长生秘方，从年轻卫士身上吮吸精液，强壮体力。简直就是头色魔……。可是这类材料，犹如子弹不能乱射。必须等待时机、选准目标呢。

刘少奇注意到了周恩来拉抽屉又关抽屉这一动作，但不便深问。恩来这人，一谈到某些敏感话题，就总是滴水不漏，十足圆熟。刘少奇继续说：「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党组集体努力的成果，集中到某个负责人身上去，归功于个人，可是个不健康的现象，违背了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又比如把陕甘宁边区经营成模范根据地，林伯渠同志长期

担任边区人民政府主席，徐特立办教育，陈云同志抓经济，搞边区货币改革，或许贡献更大呢。一味的突出个人，迟早要犯错误，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

周恩来暗自吃惊，少奇同志今天怎么啦？他平日表现得那么严谨，四平八稳；在党内以谦虚稳舰不出锋头著称，原来对中央人事，他有很深刻、尖锐的看法。周恩来试探似地问：「你是单指东北局的这位一把手？」

刘少奇听这一问，才警觉自己说多了，要走火了，连忙打住了说：「是啊，他是难得的人才。做为一名年轻能干的高级干部，春风得意之时，有些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还是毛泽东同志常说的那句话：「风物长宜放眼量。」相信他今后到中央来担负重任，能禁得起新环境、新岗位的考验，不会辜负主席和大家的期望。」

谈话结束时，周恩来紧紧握住刘少奇的手：「保重身体啊，开国在即，百业待举，单是开创外交新局面，争取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外交承认，就够我忙上两、三年了。今后政务院和外交部的事，主席和你要多过问啊！」

在周恩来这方面，算顺利通关。

经毛泽东主席授意，刘少奇把草拟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名单向外透了透风，以测试一下党内外的反映。果然上上下下，议论纷纷。在京的党内军内高级干部、高级将领，都为周恩来抱不平，对高岗的突然窜升则大不以为然。反应尤为激烈的，又是民主党派那些倚老卖老的元老们。他们对高岗的窜升不置一词，认为那是共产党内的家务事；对于不安排周恩来出任中央政府副主席，却直言毛泽东主席有失明察。何香凝、黄炎培、沈钧儒几位老人，加上毛泽东的亲戚王季范先生，都分别找毛泽东主席「讨教」，替周恩来说项。毛泽东对这些民主党派老人，共产党的铮友，倒是表现出了十足的敬重，执礼甚恭，虚怀若谷地解释中央政府领导人选名单仅仅是个草案，他正在征询各方面的意见，会尽力做到一碗水端平。恩来和我，二十多年的交情，他的处事能力，行政领导才干，外交才干，在我们中央几位同事中间，是首屈一指、无人匹敌的。新国家、新气象，我们一定做到

人尽其才、物尽其力、地尽其利，放心，放心，放心。

可是对于党内、军内的高级干部，也来找他毛泽东，替周恩来说话，或是表示难以理解，难以接受的，他就不管对方的资格再老，功劳再大，也不假以辞色，毫不客气了。包括对朱老总、董必武、徐特立、叶剑英这些人物，他都明显地表示出自己的不悦，直指曹营的事情难办啊，党内高层空气不大正常啊，存在着一股争官争位的风气。大家替恩来说项，是要置恩来于尴尬、于不利啊！个别人名为替恩来争，实为替自己争啊，要特别小心你们周围的人啊！面对着党内党外的各种议论，周恩来本人倒是真要捏两手冷汗了。幸而刘少奇找他个别谈心、交底的第二日，他就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自己的想法，主动且诚恳地提出自己将来担任政务院总理一职，的确不宜再挂中央政府副主席，以利于接受党内的民主监督。相信此事也会在党内外引起些议论，他本人愿意出面做些工作，说明中央的这一安排，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请求。毛泽东当即大加赞赏，称他做事最多，休息最少，任劳任怨，堪为中央高级干部的楷模。

刘少奇也心里很不踏实。中央政府领导人员的名单毕竟是由他草拟的，现在议论这样大，反应这样强烈，很容易引起党内党外对自己的误解，已经有人背地里骂他架空主席，妒贤忌能，玩弄权术。

两天之后的晚上，在有董必武、陈云、林伯渠列席的书记处碰头会上，刘少奇当着毛泽东、朱老总、周恩来的面提议：「关于中央政府领导人员名单草案的事，现在上上下下、内内外外议论热烈，闲话不少，声音嘈杂。是不是召开一次在京的政治局成员扩大会议，把中直、军直机关部、军级以上的负责人找齐了，先在党内统一一下认识，澄一些模糊的观念？」

毛泽东一一看过朱、刘、周、董、林、陈各一眼之后，不见有异议，才说：「很好嘛！议论多，热气高嘛。我们也干脆就汤下面，打铁趁热，把事情公开了，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团结。政治局扩大会议，明天下午就开，由少奇主持。少奇先说明一下名单草拟的经过，来个开诚布公，打开天窗说亮话；再由恩来说明一下他本人的请求。如果还有人高岗同志的位置有兴趣，可以直接对我

提出来讨论。总司令、董老、林老、陈云同志，是不是也都在会上讲几句？最后我也讲几句。你们先唱红脸，我后唱白脸，怎么样？就这么定了。曹营的事，说难办，真难办，说好办，也好办，不信胜不过诸葛亮。」

翌日下午三时，在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的住所——万寿路新六所小礼堂，召开了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及中直、军直各部门负责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毛、朱、刘、周四位中央书记，还有陈云、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李富春、李维汉、李立三、叶剑英、陆定一、彭真、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李克农等一百余人。

毛泽东主席指示，请刘少奇同志主持会议并讲话。

刘少奇先说了说中央机关进城后，工作开展顺利，稳定了人心，打开了局面，工业生产正在恢复，形势是大好的。也有不够的地方，即是中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共产党人的自我修养、戒骄戒躁、警惕个人主义等问题上有所松懈，甚至忽略。因而导致近来冒出了一些问题的苗头，如名利思想、争官争位、计较个人得失、贪图个人享乐等等。他重申了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中指出的：「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我们的一些共产党人，过去在战场上不愧为英雄的称号，在和平的日子里，却有可能禁不起资产阶级以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他进而引伸说，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在哪里？不单是在社会上，也常常就在我们每个革命同志的脑子里！比如居功骄傲，比如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老子天下第一，比如以各种方式向组织伸手，闹名誉地位，不负责任地传递各种大道小道消息，肆无忌惮地议论中央人事等等。这实在是一股不正之风，一种危险的苗头，必须敲起警钟。如何来克服？来防微杜渐？就是我们每一名中高级干部要加强理论学习，一时一刻也不可以忘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我们在得到物质粮食的同时，绝对不可丢了精神粮食。在和平的环境里，两种粮食缺一下可，相辅相成。

刘少奇就如一位思想牧师，年复一年，不厌其烦地在党内的中高级干部中间进行政治布道，理论说教。虽然枯燥乏味，但时间久了，

也就容易使人灵魂麻醉。毋庸置疑，刘少奇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组织者，治国者，实干家。他接下来，才讲到全国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人选酝酿问题。中央是有两个班子的名单草案，征询各方面意见用的。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从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为两个名单费尽心血，反复推敲，力求做到全面、客观、公允。今天在座的，都是党内军内的高级干部，我们千万不能有「老子昨天打天下，老子今日坐江山」思想。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讲的是在我党主导下，各党派、各民族、各人民团体共同协商国家大事；中央人民政府，原拟名为民主联合政府，讲的是民主联合，亦即在我党领导下，有各民主党派，各民族代表参加，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现在，南方还有战事，云、贵、川、康、藏，海南岛、台湾等大片国土还有待我们去解放。革命尚未成功，战争尚未结束，我们绝对不可以形成一党包办政协、一党包办政府的局面。饭要一口一口来吃，路要一步一步来走，革命要分阶段来进行。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站得高，看得远，胸怀全局，放眼五湖四海……下面，请我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筹委会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同志讲话。

会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掌声既是对刘少奇讲话的认同，也是对周恩来即将讲话的欢迎。

周恩来略带淮安口音的北方话，一如既往的温和、谦逊、清晰：「同志们，刚才少奇同志的讲话，就像给我们上了一堂简洁的、寓意深刻的党课。我个人，就一直是个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需要的正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什么呢？首要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们才能在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面前，不会忘乎所以，居功自傲，昏头昏脑，以致迷失方向。进入北京快半年了，我一直在协助毛主席、党中央筹备新政协会议，筹备成立新国家，确是大忙特忙，乐在其中了。因此在理论学习上，就有所松懈。我在多次党的会议上，尤其是在延安整风学习期间，回顾过自己所走过的道路。自己确是为党为革命做了些工作，但一路上跌跌踉踉，犯了各种大小错误过来的。在几次重要的党内路线问题上，我都站错过队，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然而，我一直在为党工作，至

今没有被革命队伍拉下，是因为有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感召，有毛主席、朱总司令、少奇同志等的热情关心帮助，有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理论武器的挽救。所以，今天，值此新政协、新中国即将揭开历史新页之际，本人扪心自问：党和人民即将付予自己新的重任的时刻，如何自处自励，如何接受党组织的监督，人民的督察？同志们也许都知道了，党中央、毛主席已内定我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我经过反复的、慎重的考虑，而主动向党中央提出来，为了担起政务院总理这一重任，我坚决要求不要再被推荐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候选人。我是诚心诚意这么请求的。为了这件事，最近一段，党内党外，议论很多，声音颇杂。党外人士，民主党派的前辈们那里，我自己会出面去做些解释，说明情况。在党内，特别是在高级革干部中间，我们务必要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不要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妄议中央的人事安排。这里，我要借这个机会，向在座的每一位老同事、老战友，敬个礼，请大家高抬贵手，放我一马：议论到此为止，妄言下不为例。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为建设新中国，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进步！]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从座位上站起，带头鼓掌。会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坐在前排的董必武、陈云、林伯渠、李富春、聂荣臻、陆定一、李维汉等人，眼里都闪着亮光，边鼓掌边擦眼睛。

直等掌声落定，刘少奇看了看手表，问了一问朱德总司令什么话，才又宣布：「下面，请毛泽东同志作重要讲话。」

掌声又起。毛泽东平伸出双手，巴掌朝下压了压，再端起茶缸喝了口浓茶，转身问了问朱德，以及坐在台下的董必武、林伯渠、陈云诸位：「你们还要不要讲几句？」董、林、陈连连晃手：「请主席讲，请主席讲。」

毛泽东说：「好，你们讲客气，我就不客气了。方才少奇、恩来二位的发言很好，各具特色。少奇讲到了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我要补充一句，叫做：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会场气氛转趋活跃。坐在后排有未听清楚的，要求再说一遍。

毛泽东说，好，我再重复一次：「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我这不是哗众取宠，更不是危言耸听。本人的由衷之言也。少奇同志的好学、善学、钻研精神，堪为表率。我们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比如过去白区党的组织路线问题，党员自我修养问题，党内斗争问题，背靠苏联独霸东北问题，党的组织建设问题，近年来关于党的新民主主义新阶段问题，都是经他研读马列著作、认真思考探索、深入调查研究之后提出来的。当然，他今天提到的学习问题，讲得并不深刻，浅尝辄止。算是蜻蜓点水、鸡毛蒜皮、隔靴搔痒吧！」（众笑）「恩来的发言，则更是情辞恳切，发自肺腑，很有人情味，是不是？过去，我很少在公开场合称赞恩来。因为恩来无论在组织行政、外交统战、军事情报等等方面，都在你、我之上，要想称赞他，首先还得考虑一下自己够不够哪个资格？自己算老几？」（众笑）「恩来年纪小我八岁，资历却要比我高，官也曾经做得比我大，大了不止三级五级。」（众笑）「出家人不打妄语。我在延安自称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那是对蒋委员长重庆政府而言。平心而论，我至多算得半个居士吧？本人酷爱红烧肉，湖南腊肉，本人也不打妄语。」（众大笑）「恩来一九二四年就做到了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升了主任，跟蒋校长只差半步，就平起平坐了。」（众笑）「而我老毛，当时只在广州主持农民讲习所，训练两广、两湖的农运骨干，恭请多次，才请动周大主任去讲了一堂课，反应强烈。」（众笑）「一九二七年蒋某人清党，对共产党人赶尽杀绝，搞白色恐怖。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本人一怒为工农，在湘北湘东掀起一支农军，上井冈山落草去了，被尊为「毛匪」。

恩来在南昌率部起义，是朱总、贺总的正规部队，声势浩大。不久被打败，朱老总也上山来结伙，被尊为「朱毛」，蒋某人要「杀猪拔毛」，结果怎样？猪未杀，毛未拔，总司令至今跟我坐在一起，朱毛不分家嘛！」（全场大笑）「一九三七年国共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战。蒋委员长又把恩来请了回去，任命他为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同中将衔。部长是现在台湾的行政院长陈诚。我等在延安，在太行山，在各个根据地，一个个土八路，小米加步枪，哪能当得上中将？做个校官人家都不会承认！」（众笑）「所以，以恩来在党内党外的资历，影

响力，补充一句——他还是朱总司令的入党介绍人，是轮不到你、我来表扬奖励、说三道四、评头品足的！」（众笑）毛泽东说，「尽管如此，我仍要斗胆放言：恩来同志的一个最大的长处，是他的谦虚礼让，他的任劳任怨，他的自我批评精神，是他的自知之明。子曰：「人贵有自知之明。」正如他自己所说，将近三十年来他走过一条跌跌踉踉、左左右右的革命道路。《吕氏春秋》上有言：「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在这一点上，恩来比我和今天在座的大多数人，的确不止高明了三尺二尺，说一丈有些夸张，五尺左右，比较合适。」（众大笑）「我们进城至今，快半年了吧？新政协会议、新中央政府、新中国开国大典，三桩大事，也筹办得差不多了。八月二十八日，我和同事们去前门火车站，迎接了孙夫人宋庆龄先生到京，九月七日，我和同事们再次到火车站，迎接国民党元老、敝省和平起义的程潜先生到京，加上早已云集在北平的各民主党派元老、领袖，是很有一点天下诸侯聚会、五湖豪杰来归的气象了。套用一句《水游传》上的话：皇上轮流做，今年到我家了。」（全场大笑）

「各位同志，话到此地，本主席不能不重提一下，今年三月下旬中央机关进北京之前，我在西柏坡村说过多次的事，要求全党中高级干部重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吸取李自成起义军进北京称帝一个月，即被赶了出来并迅速败亡的历史教训。在西柏坡村，本人还半玩笑半认真地说，我不做李自成，你们不做牛金星、刘宗敏。更不要有人做吴三桂。进城半年来，总的情况是好的，健康的，没有出过什么大乱子。但问题的苗头却是有的。近一段大家都忙于筹备开国，事务繁缛，日理万机，而忽略了抓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这一忽略不得了，近些日子非议纷纭，暗涛汹涌。名为替恩来同志鸣不平，实为替自己争名争利。党外民主人士说项，进言，没有什么了不得；党内也带头起哄，给人印象是中央处事不公，瓜分爵位，分赃不均！这可是了不得呢。我们主持中央工作的同事，要是装聋卖傻，麻木不仁，甚至各有算盘，任其发展下去，有朝一日，上下结合，四方呼应，八面埋伏，就可能激起类似太平天国在南京闹过的天京之变呢！洪秀全腐败得一塌糊涂自不消说，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

就都会出来呢！你们不信？反正我信。这类事，从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韩非子·喻老》篇说：「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是以白圭无水难，丈人无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者也。」韩非子这段话的意思，是告诫世人，要提高警惕，防微杜渐，把诱发大灾难的小苗头及时消灭掉。

「这里，各位同志，各位朋友，本主席丑话说在前面，对于中央的人事安排，如果有意见的，可以公开讨论，我们无任欢迎；有要求的，更是恭请站出来，要部长，我们给部长；要副主席、副总理的，我们给副主席，副总理；包括主席、主任、总理、总司令，我们统统开放，虚位以待，明码实价，保证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双手奉送，如何？」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了。毛泽东威严地注视着台下的高级干部、高级将领们，目光又不停留在某一人身上，而且有意停顿了一刻。

刘少奇适时地在毛泽东耳朵边说了两句什么。

毛泽东说：「方才少奇同志对我咬耳朵，说并没有发生什么异常情况，我们的干部队伍，特别是高级干部队伍，是一支受得住考验的好队伍。我举双手赞成。谢谢少奇同志提醒。我也还没有糊涂到无端怀疑我们干部队伍基本素质的地步。通过在延安的整风学习运动，我们党确是建立起了一支较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干部队伍，一支经风雨、见世面，胜不骄、败不馁、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全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好队伍！」

刘少奇、周恩来带头鼓掌。全体热烈鼓掌。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进了城，绝不当李自成，牛金星，刘宗敏！」（热烈鼓掌）「我们更不做太平天国，不做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热烈鼓掌）「我们是无产者，工人阶级的政党。列宁说，无产阶级挣脱的只是锁链，赢得的是整个世界！」（热烈鼓掌）毛泽东说：「好了，我今天既唱了红脸，也唱了白脸。语有不恭，仰仗诸位海涵海量。恩来，最近不是出了两支新歌？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你来打拍子，指挥大家唱。」

周恩来当即起身，招呼全体起立，之后挥动他一长一短的双臂打拍子，指挥全场大合唱。

毛泽东则在朱德、刘少奇等的陪同下，边哼唱着边退场。三位领袖，三种风格。以毛泽东最为幽默风趣，说古论今，旁征博引，魅力无穷。如果说，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等，讲话作报告，均有许多顾忌，要遵许多规矩；唯毛泽东讲话，海阔天空，生动活泼，喜笑怒骂，百无禁忌，集言论自由于一身了。

第十七章 西花厅宴请南归女

周恩来变被动为主动，谦恭地提出不担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反倒在内党外、军内外获得新的声誉，新的爱戴，拥有了更广泛的人缘。人们仍然尊称他为周副主席，亦有人开始称呼他为总理，而无人称他为「周委员」。

乔冠华、龚澎夫妇从香港地下工委返回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到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拜访周恩来和邓大姐。邓颖超亲自到中南海北门警卫室迎接，并在来宾登记簿上的「接待人」一栏里签名。邓颖超紧拉着龚澎的手，边走边说笑：「如今规矩大了，不是？才搬进来不久，各方面的工作还没有上路，警卫工作尤其死板。前天还闹了笑话哪。少奇同志和他夫人王光美晚饭后在南海东岸上散步，还有警卫员跟着。少奇同志见东南角上有座土山，树木茂盛，就想上去看看，可走到土山下就被站岗的战士喝住了，不准上。少奇同志问：「有什么情况？」战士回答：「上面是军事禁区，谢绝参观。」少奇同志怪了，中南海里还有军事禁区？搞的什么名堂？

倒是一定要上去看看了。战士喝令站住！少奇同志的警卫员这时挺身而出：「不得无理，这是中央首长！」战士脾气挺倔，口气也很冲：「中央首长？俺只认得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俺只执行俺团长的命令，军事禁地，谢绝参观！」后来是少奇同志打了退堂鼓，还表扬了那战士几句，并对王光美说：「是啊，我们要带头遵守纪律……。」

龚澎好奇地问：「那土山上能有什么秘密？连刘副主席都不准参观？」

邓颖超说：「后来少奇同志才问清楚，是警卫部队在那里隐蔽了几门高射炮，高射机枪，防止美蒋飞机空袭的。」

乔冠华说：「也难怪，少奇副主席长期从事党务工作，部队里的事情比较生疏。」

不一会，进到西花厅院子里，周恩来已站在门口等候，相互热烈握手、问好，客厅里已经摆着红枣、蜜桃、海棠果等等。龚澎心细，发现这院子并不清静，都听得到北边院墙外文津街上、西边院墙外府

右街上车辆开过的声音。

周恩来设家宴款待自己心爱的老部属。有一刻，龚澎大大方方地盯住他，仿佛要看清楚他脸上是否添了皱纹，两鬓是否添了白发。他比几年前稍稍胖了些，却显得更潇洒、健美了。周恩来则频频向乔冠华让酒，干杯，询问些香港地下工委的情况。在周恩来眼里，龚、乔仍是一对佳人才子。

乔冠华说：「多数的香港人现在害怕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开过去，怕被斗争，被共产。」

邓颖超不解地问：「多数？香港也是穷人多，富人少吧？穷人也怕我们过去？」

乔冠华说：「香港的报纸、电台、电视、杂志，绝大多数都在做反共、防共、恐共宣传，简直是疲劳轰炸，加上黄色工会、黑社会势力都不小，港英当局又大量收容从内地逃亡去的地主、资本家，基本上去者不拒。这些逃难的地主、资本家带去的也都是些恐怖的消息。以上，对香港的人心影响极大。」

邓颖超望望周恩来，不以为然地对龚澎说：「总还是有些人欢迎我们过去的吧？」

龚澎以茶代酒，向周恩来和邓大姐举了举杯：「地下工委的同志们，地下工会的成员，盼望着子弟兵跨过深圳河，踏平铁丝网，成立人民政府，提前结束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

一直在静静听着的周恩来，这才问：「南乔，你和小龚自己的看法呢？」

乔冠华笑笑说：「我和她的看法不一致，常有争论的。」

周恩来慈爱地看了龚澎一眼，再向乔冠华：「那就谈谈你个人的看法吧。来，干了这杯。」

乔冠华双手举杯，干了，掏出洁白的手绢擦擦嘴：「我的看法比较矛盾，有时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恨不能明天就把英国殖民统治者赶走！哪怕由国民党来占领，也算是中国人的内部纷争。可真的让国民党反动派来占领呢，又肯定会成为反共基地，反攻大陆的桥头堡，也受不了。有时从现实主义、务实主义出发，又觉得应当

忍一忍，继续租借给英国管理，保持它的国际自由港地位……。可是这后面一条，我根本不可能在地下工委提出来，那肯定要被孤立、被围攻。后面一条，我承认是受了龚澎的影响。」

龚澎这时要插言，却被周恩来以目光劝阻住了。周恩来举了举手里的杯子，又停下了：「南乔，香港问题，地下工委要防止左倾冒险主义和左派幼稚病，民族主义不能等同于爱国主义。而且极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个很危险的东西。爱国主义首先要讲的是国家利益，包括近期的、中期的和长远的国家利益。当然，这也不能怪你们，许多问题和观念部还没有来得及澄清。中央同志也有过不同意见的讨论。中央书记处的对港方针也是前不久才确定下来，还没有来得及传达给你们。香港主权暂不收回，继续租借给英国，保留它的国际自由港地位，使其成为新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渠道，便利对外交往，对外贸易，人员进出，有利于内地的经济建设。还有台湾问题，现在由蒋介石的军队占领着，估计美国军方也已经介入。因此必须保留武力解放与和平谈判两手解决办法。如果采用后一种办法，保持香港现状，不就使得国、共双方有了接触之地？毕竟是中国人的领土嘛。」

乔冠华点着头，自豪而欣慰地看着自己的妻子：「这倒是我们龚澎的先见之明了。她早跟我争论过，香港问题，要着眼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否则派部队解放个弹丸之地，算得什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她还说了，只要周副主席主持外交事务，香港问题就会冷处理，而不会热处理。」

周恩来心头一热，并且隐隐一痛，身子也动了一动。但他很快克制住了自己，只在心里说：知我者，此女也；痛我者，此女也。他平静地看了一眼美丽而贞静的龚澎，又看一眼自己的眼皮已经耷拉的夫人邓颖超，两相对照，天壤之别矣。他说：「小龚、南乔，香港话题暂且打住，中央的方针，你们暂不外传，以中央正式文件为准吧。你们回来了，对于工作、生活上的安排，有什么设想、要求？」

乔冠华和龚澎几乎同时回答：「我们听老领导的，愿意在老领导手下做事。」

周恩来高兴了：「中央已决定我做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你们

英语能力好，又到香港考验了这么些年，就都到外交部来工作吧。南乔当我的助理，小龚去新闻司，是不是还做新闻发言人，北京不是重庆，我个人不宜决定。」

龚澎很兴奋，脸蛋像绽开的花朵。邓颖超望着她，心里又起了一阵疑云闷雨：这女子，三十出头了，都两个孩子了，大的七、八岁了吧，小模样儿却一点没改，反而出落得更水灵、更娇艳了。

乔冠华一时有点心不在焉，与周恩来干过一杯后，忽然问：「你们这住处，好象太不安静，都听得到北面、西面两条街上的嘈杂声音。」

龚澎也插嘴说：「这么大座中南海，就偏偏选了座西北角的院子来住？」

邓颖超指着周恩来笑笑：「他呀，如今当着大管家。本来在丰泽园菊香书屋住了三、四个月。原来主席不肯进中南海，说是不要做皇帝。后来政治局的同事们说服主席搬进来，菊香书屋有北院和南院两座院子，北院靠近中海，南院靠近南海，前清时候是乾隆皇上的书斋哪，当然由毛主席一家住最合适。我们住到这西花厅来，是恩来自己喜欢，自己挑的，我只有服从的份。」

周恩来说：「你们说这里不太清静？我倒是觉得它于西北角上独处一隅，另有一种清静。」

乔冠华思维敏捷，脑门一拍，说：「噢，明白了。听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刘副主席，还有陈云、林伯渠、李维汉、陆定一、李富春、杨尚昆、陈伯达、胡乔木，以及主席的几位大秘书，都住在丰泽园的那些大小院子里……。从这西花厅步行到丰泽园，大约要十来分钟吧？所以另有一种清静，高明，高明。」

周恩来摇摇头，面色稍带不悦：「南乔啊，你是太过聪明罗！我哪能想到你这么多呢？」

龚澎瞟了丈夫一眼。乔冠华自知失言，忙掩饰道：「老上级，你和主席都称我为南乔，那北乔呢？胡乔木同志文采风流，辞章华美，听讲中央的许多大块文章，多出自他的手笔。我和他仅见过两面，邓大姐什么时候引见引见？」

周恩来不等邓颖超答话，举起杯子邀乔冠华干杯：「来来，见乔

木同志不难，机会多得很。他最近升任为毛主席办公室主任，也是大忙特忙。北京毕竟不是延安，更不是重庆啊，我倒是奉劝你们，今后多做工作，少作交游……。」

一时，乔冠华、龚澎，连带邓颖超都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倒是周恩来觉得有点冷场，便问：「小龚、南乔，你们一路北来，对于新国家，新政府，都听到些什么反映？」

龚澎眼睛亮了亮，仿佛迟疑了一下，才反问：「是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反映是听到一些，有些还是我们自己的，也不知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

周恩来看龚澎一眼，看似妩媚稚气呢，就又跟乔冠华干了杯。心想这丫头，代她男人反击我了咧，于是哈哈笑着：「你这丫头，去香港几年，回来就见生分了？在重庆的那些年，你什么话不敢对我说？从宗教信仰到个人感情，什么没有说过？」

乔冠华以手臂轻轻触了触娇妻：「就痛快说吧！用英文说也行，如果图方便的话。」

龚澎瞟了丈夫一眼：「用英文？诺喂！」再又目光清澈地盯着周恩来：「我是想说呀，这次中央人事安排，好象有失公允，下面也有许多的议论，全国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你怎么都只是委员，连高岗都当了副主席？」

话就这么出来了，邓颖超以眼神制止也没来得及。席间出现了短暂的寂静。

周恩来看杯子的左手有些微抖，慢慢就眼睛都红了：「龚澎同志！你，还有那些发议论的人，也太不理解，或是太不了解我周恩来了！难道恩来自青少年时代起投身革命，出生入死，就是为了争个什么副主席？那不成了个人野心家了？那跟明末的牛金星、刘宗敏辈，跟太平天国天京之变的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辈，还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你们都是党员，但并不了解党的历史啊！历史上，我犯过各式各样的错误，包括左右倾路线错误。唯独没有犯过的错误，是从未向党伸手要官要位，或是跟人争官争位。这有历史可查，诸多证人健在。党中央、毛主席为什么这样信任我？就是因为我忠诚、坦白，没有什

么私心杂念。这次，是经我本人多次请求，不担任上述两项副主席职务的。你明不明白？你还不明白？」

龚澎、乔冠华很少见老上司这么激动过。龚澎仿佛从周恩来的表白里听出了另外的声音，两汪清泉似的眼睛也泛红了，并且很快噙出了珠玉：「我，我，我们明白，明白了。对不起，我不该问。不该问这个愚蠢的问题，这么愚蠢……。」

邓颖超拉起了龚澎的手，劝慰道：「你别见怪。他呀，为这事也批评过我，比这还厉害哪。我是从不替他计较什么官呀位呀的，只要能够为党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什么都有了，也就什么都够了。你们小两口，不也都是这样吗？」

周恩来却意犹未尽，继续严肃地说：「小龚、冠华，我不会见怪你们。但今后遇事，要多观察，多用脑筋想，少用嘴巴说。言多必失，古今一理。特别是小龚，今后，你来中南海，就只来西花厅，或者去紫光阁找我。其它地方要尽量少去，不要凑热闹。凡热闹处多有是非。想跳舞，就在外交部组织舞会，你们自己跳去……冠华，你要替我好好照顾她。我是当年在桂林受过她父亲龚老先生的嘱托……。她还不够成熟，还太单纯，太善良，我不放心，不放心……。」

乔冠华挺了挺胸脯，伸手搂住了自己那满眼泪花的妻子：「是！老领导，请放心，我会照顾好龚澎同志。」

邓颖超说：「别在意，别在意。你们回来，恩来和我，如见亲人，就和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你们在香港几年，他就念叨了几年。他平日忙得呀，也很少回来吃饭，有时我都几天见不着他的面，在紫光阁那办公室里摆了张行军床……。一听你们回来了，他高兴得嚷嚷，提出要在家里喝酒，招待你们。他有酒量，平日很难醉的……。对了，你们临时住在六园饭店？两个孩子，一家四口，加上阿姨，不大方便吧？要不要搬来家里先住住？这西花厅虽然听得到些外面街上的声音，院子倒还宽敞，还空着三间西厢房，恩来准备将来做个小书库的。」

一听说西厢房，乔冠华立即来了诗兴，以他的江浙口音念道：「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龚澎拍了他一掌，破涕为笑：「大姐！看我们把他惯的。把普济寺

搬到西花厅来了！还想当一回风流公子张生？可惜暂时找不到崔莺莺小姐。」

乔冠华乘着酒兴，率性也疯一疯了，站起身子，两手在身上一拂，随即躬身拱礼：「龚莺莺小姐，小生这厢请了——」

周恩来、邓颖超哈哈大笑。这一笑，周恩来很快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转而平静地说：「我看呀，你们还是不搬来为好。这里出进太不方便。」

还是一次到位吧！我会立即通知中央办公厅杨尚昆同志，请他派人尽快替你们在东四牌楼附近找到一所房子。外交部就设在东四牌楼朝内大街上，你们上下班方便。我们去看望你们也方便。」

第十八章 发落贺子贞上海备冷宫

毛泽东搬进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不久，他的从未办过结婚手续、亦未办过离婚手续的妻子贺子贞，领着女儿娇娇到了天津，要求进北京与毛泽东团聚。

这无异于毛家后院起火。一山难容二虎。奉行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的共产党领袖，岂可一夫多妻？贺子贞要进北京，江青一反温柔恭顺、小鸟依人的常态，显露峥嵘，豁出去了，又哭又闹，大耍雌风，扬言不惜跟贺子贞对簿公堂，不惜在党内公开老板的重婚问题，也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地位。

毛泽东从来文韬武略，大气磅礴，运筹帷幄；每逢遇到这类鸡零狗碎、哭哭闹闹，一团乱麻似的家务纠纷，就不胜烦扰、不胜厌倦，而且底气不足似的，就想到要请周恩来替他排忧解难，处理「内乱」。

周恩来接到菊香书屋值班卫士的电话，没有坐车，而坚持步行，以便边走边构想解决毛主席家室不宁的初步方案。他不紧不慢，花了十几分钟，过紫光阁南院山坡，沿林荫小径向东，至中海西岸上的迎春堂，折向右边，沿堤岸一路南行，过游泳池东墙，再南行百十步，再沿堤岸向东不远，即是丰泽园的小北门了。卫士、服务人员多由此门出入。进门之后是一条南北方向的巷子，巷子右手的一溜房子是菊香书屋的厨房、储藏室、卫士值班室、秘书值班室等。过卫士值班室，就是菊香书屋北院的东厢房过厅。

周恩来没像往常那样，见到江青出来招呼。他问值班卫士：「蓝苹呢？」卫士放低声音报告：「昨晚上吵了一通宵，躺进大北房「罢工」、「罢食」了，谁也不敢去招惹。主席也一夜没睡，一直在书房里吸烟，生气。」周恩来轻声问：「蓝苹都吵了些什么？」卫士回答：「首长，我不敢学舌。」周恩来说：「学给我听不要紧，我是来解决问题的，会替你保密。」卫士说：「她还能吵些啥呢？无非是说，老板，你听着！贺子贞跟了你十年，我已经跟了你十二年！贺子贞给你生了个女儿，我也跟你生了个女儿！贺子贞陪你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我陪你转战陕北、华北！她比我漂亮，有教养，有学问？哎呀，首长，我不再

说下去了，再说就犯错误了！」周恩来笑笑：「好好，记住，你再不要跟第二个人说这事了，事关领袖形象，党的威信，懂吗？主席的几个大秘呢？师哲，乔木，家英，叶子龙，家里闹成这样，他们都不露面？」卫士回答：「主席有规定，秘书是替他管公家事的，不准介入他的家务，而且他们平日都躲着江青同志似的。」周恩来又问：「少奇同志来过没有？」卫士回答：「刘副主席和光美同志来过两次，他们住得近。主席见了他们，只说了四个字，鲜明对比，其余就什么都不说了。光美同志去看江青，人家不肯开门。刘副主席不放心，让打电话给您，说处理这事，得您和邓大姐出面才行。周副主席，您说主席见了刘副主席和王光美，就说「鲜明对比」，是啥意思呢？」

周恩来笑了：「别乱问了，我也不懂呢。」

周恩来当然懂。主席见自己家里闹成这样，却见刘副主席老夫少妻，夫人王光美又年轻又漂亮又有教养，对少奇同志体贴入微，一家老小十多口人和和睦睦，两相对比，能不鲜明？

他在毛泽东的书房门口停了停，轻轻敲了敲虚掩着的房门。毛在屋里咳嗽，颇不耐烦地问：「谁呀？」卫士代为回答：「是周副主席来看您。」

推开门，但见烟雾腾腾，气味呛人。

周恩来说：「主席，我是走路过来的，来迟了。」

毛泽东说：「恩来啊，不迟不迟。坐，坐。我是暂无外患，唯有内忧啊！」

周恩来笑了。他嘱卫士把门窗统统打开，换换空气。卫士犹豫着：「主席不让开门开窗的……。」周恩来说：「还是开开吧，换了空气再关上嘛。」

毛泽东说：「他们脑筋笨！门窗紧闭，为防蓝苹啊！江上一青峰，镇在烟雾中，寻常不相见，偶尔露峥嵘哩！这是她替自己写的释名诗。」说着，毛泽东自己先苦笑了。

周恩来跟着笑了：「蓝苹是个才女。做为女同志，她还是比较全面的。」

毛泽东待卫士开过门窗，退出后，才说：「子曰：女子无才便是

德，当然是屁话。但一个人自恃有点小聪明，就自以为是，好卖弄，好表现，不能容人，辄铢必较，也很糟糕呢。你知道贺子贞的消息吗？」

周恩来问：「是不是子贞同志领着娇娇到了天津，要求进北京？」

毛泽东重燃起一支烟，语调缓慢地说：「对子贞，我是有些内疚的。

一九三七年她执意跟了洛甫的妻子几位，去莫斯科养病，我本来要她秘密去上海，她不听。那时也是吵吵闹闹，拍桌打椅，我横直劝她不听。她是带着娇娇走的，娃娃才一岁零几个月，在瓦窑堡生下的。后来她和娇娇在苏联吃了大苦头，被人家关进疯人院，我是一点不知道。人家不把她当毛泽东的婆娘了。老大哥那边办事，有时就是走极端，井冈山时期的红军女英雄，也不肯照顾一下，还是亏了老朋友王稼祥和他夫人朱瑞华，一九四六年去做驻苏代表团团长，才替我打听出来，子贞和娇娇已在疯人院里关了六年。娇娇还被丢进过太平间，是子贞硬去抱了回来救活的。经过王稼祥交涉，把人接出来。四七年底送回到哈尔滨，高岗也费了些心。

我要求她母女俩先住在哈尔滨，一边养病，一边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她倒是听话，出席了在那里举行的七届人大。给我来了许多信。她说她知道我身边已经有了蓝苹，表示可以理解，愿意接受事实。去年底她领着娇娇到了沈阳，上个月到了天津，离我越来越近了。她托人带信给我，问她该怎么办？我该把她怎么摆放？安排到哪里？她要求到北京来见我一面，要亲手把娇娇交给我……我也愿意接她来，找个四合院给她住。说没有情份是假的，毕竟是共过患难生死来的。蓝苹就做不了她的酸辣汤，炒什么菜都脱不开那股子上海味。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了，红军女英雄哩，十七岁就拉队伍上井冈山，比我还早三个月哩，我领湖南农军是去投奔她，还有王佐、袁文才他们哩。没有功劳有苦劳，给个部级待遇，相信大家通得过呢。可是，这事，我先得说服蓝苹呀。蓝苹却高低不答应，我一开口，她就要泼，又哭又闹，寻死寻活。她的心胸只有针眼那么大……我可以指挥大军打战，却拿这两个女人没办法。我又处在这个位置上，又是党，又是国家，还有军队，要注意影响呢。恩来，你是解决疑难问题的能人，你来替

我想想办法。《大学》上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齐家一关，我还没有过呢。」

周恩来恭敬地听着。看来，毛泽东同志是憋了一肚子话，要找个适当的人倾诉。屋里空气清洁了，周恩来起身去关了窗，掩了门，回到毛泽东对面的藤围椅上坐下，才试探着说：「这事，我倒是有点不成熟的意见，说出来供主席参考。我对贺子贞同志，一向是敬重的。像她这种资历、功绩而又党性坚强的红军女将，在党内已找不出几个了，应该说，是党的宝贵财富，生活上、工作上受到组织上的爱护照顾，是怎么说都不为过分的。」

毛泽东不喜欢周恩来说话绕弯子：「还是说说你的具体的建议吧。」

周恩来推心置腹地：「主席，处理这事，的确要顾及党内的影响，领袖的形象。我要先请示，如果你身边只宜留住一位，是蓝苹，还是子贞？」

毛泽东倒也态度坦诚：「还消问？子贞离开我已经十二年，娇娇都十三岁了，记忆虽犹新，但到底是生疏些了，听说子贞精神上也确实有些症兆，在哈尔滨，在沈阳都多次犯过毛病，狂躁不已，不能自己。」

周恩来总算揣摸到了毛泽东心里的底线：「那我建议，对照顾和安排贺子贞同志的生活、工作、医疗，可以有热处理，也可以有冷处理。」

毛泽东颇为欣赏似地看了周恩来一眼，仿佛在说，还是你点子多。嘴上却问：「怎样算热处理？」

周恩来放低些声音：「热处理，就要求蓝苹大度些……。就如主席所说，在北京城里替贺子贞同志安排一座四合院，配备服务员、医生、护士，好好照顾。并可考虑在党内或人民团体组织内安排个适当的闲职，如此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任个副主席，平日不用上班，开会露露面，享受正部级待遇。」

毛泽东问：「在你们编列的编制中，正部级相当于军队里的哪一级？」

周恩来解释：「党、政、军级别编制归少奇同志管，记得审订中央

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时，少奇同志有一个说明材料，正部级属军队里的正兵团级，在党内则与省委第一书记并列。大军区正职相当于政务院副总理，再往上，就算党和国家领导人了。」

毛泽东眼睛眯缝起来了，这是他认真思考问题时的习惯表情：「你们是想摒弃供给制，照抄苏联老大哥的官僚体制……。安排子贞住在北京，有什么不妥当之处没有？」

周恩来一脸认真：「有利自然就有弊。弊就是蓝苹一时难以安静。子贞同志那方面也不会安静。蓝苹不安静无非哭哭闹闹，影响出不了丰泽园，她是党员，会守纪律。子贞同志若长住北京嘛，就会树欲静而风不止。」

当年井冈山红一方面军，现在留在北京工作的老同志，老战友，正部级以上高干，总怕有几十位之多吧？能不经常去子贞同志那里走动走动？全国各地，党政军务方面，红一方面军的老人更不少啊，都是省委书记、兵团司令、政委什么的，各路诸侯哩，他们能不一年来北京开几次会？进了北京，能不去拜访老战友、老大姐贺子贞同志？那时，就怕各方面的关系摆不平，各种议论也难以平息……。」

毛泽东的眉头拧到了一起。显然，周恩来说中了他的心病。他感激地看了周恩来一眼：「恩来啊，那你说说第二个法子，冷处理呢？」

周恩来说：「冷处理，则有些委屈贺子贞同志了……我只是个参考意见，行不行，自然是主席酌定。子贞同志不是有个哥哥叫贺敏，在江西省委工作？对了，是在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可否考虑，中央通知贺敏同志来一趟，先做通他的工作，再派他去天津，代表他妹妹，把娇娇送到你身边来？中央另派适当的人选，去劝导并陪同子贞同志，先去上海治病……在上海，可以安排一栋环境清静的花园别墅，给予贞同志长住，给她配备好医护、服务人员。主席以后去南方视察，也方便经常去探望……只有她长住上海，才能避免她长住在北京的那些人物往来，种种影响和麻烦。」

毛泽东的眉头舒展了。恩来真是善于考虑问题，处理疑难。毛泽东说，子贞也可以考虑住在南昌，那是她的家乡省城。夏天上庐山避暑也方便。你觉得怎样？

周恩来说：「还是上海条件好些，从医疗条件、生活照顾方便来考虑的话。」

毛泽东深深叹了口气，仿佛他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难怪在重庆时候，人家就称你是共产党内的小诸葛。每遇疑难，我第一个就想到你，几乎成了习惯。让中办通知江西省委贺敏同志来一趟好办。不大好办的是派谁去天津开导、说服贺子贞？并陪同去上海治病？当然不说去长住，只是先治病。说不定我自己也会变主意，接她回北京的。子贞与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啊！」

周恩来说：「只好请小超走一趟了，还有总司令夫人康克清大姐。我回去做做工作，就说中央给她的任务，只准知难而上，保证圆满完成。我也会给华东区和上海市委的柯庆施，陈毅二位个别交代一下。」

毛泽东已经面带笑容：「这回真要多谢你和小超了，还有康克清。蓝苹再闹的话，我也只好给她另找地方去住，做个单身汉，图个清静。」

周恩来回到西花厅，把中央委托给邓颖超和康克清的特殊使命、绝密任务说了说。

邓颖超表示服从党性，接受任务。但跟着就说：「你们对贺子贞同志也太心狠、太不公平了。一位当年井冈山上的女红军领导人，就这样被打入现代冷宫？」

周恩来板起了脸孔：「小超！你在瞎说些什么？讲话要注意原则，不要犯自由主义。现代冷宫这话能随便说？传出去可要犯大错误的！我为什么选了西北角上这西花厅来住？为什么？」

邓颖超嘟起了脸，转过背去。

周恩来知道话说得重了，走近去，双手扳住了发妻的肩头：「小超，对不起，我应该批评你，但不应该发火……。」

「你以为，我参与处理这类事情，心里就没有负疚吗？就那么平静吗？可是，为了革命，为了领袖，为了党的事业，从全局利益出发，有时心肠不能不硬一些啊，大慈大悲，是行不通的，有时还要吃大亏、受大的损失啊！当然，今后进入和平时期了，我们硬了心肠做了某些工作，只好用别的办法，别的机会，来尽力做些弥补了。比方，我如去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贺子贞同志。」

邓颖超转过身来，目光坚毅地盯着自己的丈夫：「中央委托的事，我会去尽力完成。子贞和我，还有康克清，在江西苏区，在延安，关系都挺不错的，很谈得来。但是我有话要对你说出来，你现在身边是美女如云了，旧友新知，都集合到北京，都羡慕得要死，恨不能个个都想替你生养出后代！而且又都认你为中国美男子。汪精卫也曾经是美男子哩，结局又怎样？我告诉你，恩来，有朝一日，你要是敢对我也来这一手，像他对贺子贞这样，你就别想看到我活着离开这西花厅！」

周恩来心头一震，一把搂住了发妻：「小超，求求你，别说这些了。我对你发过多少次誓愿了？我们在一九二四年广州结婚那天起，就说好白头到老，好合百年了！」

邓颖超回转身，恨恨地以双拳在丈夫肩上捶了捶，忽又笑了：「延安，重庆，历史教训，记忆犹新。我量你也是有那个心，没那个胆。」

邓颖超也是话里有话，延安指的孙维世，重庆指的龚澎。两只金凤凰，如今都进了北京。

几天之后，贺子贞的女儿娇娇，由江西来的舅舅、舅妈领着进了北平，进了中南海，进了丰泽园菊香书屋。十三岁的女儿娇娇，一见到毛泽东，就叫着「爸爸、爸爸」扑了过去。毛泽东一把搂住了在莫斯科郊外疯人院里长大的女儿，也是激动地大叫着，流着眼泪：「娇娇！我的好娃娃！好娇娇，都长这么高、这么大了！想死爸爸了，想死爸爸了……。」

娇娇在爸爸怀里，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爸爸！爸爸！我还要妈妈，我还要妈妈！」

女儿的哭叫，撕心裂肺。舅父、舅母在旁哭泣。在场的卫士、护士、服务人员也都背过身子去垂泪。

在这同时，党中央代表邓颖超、康克清则领着一小组女工作人员，带着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抵达天津拜望贺子贞。毛泽东的信写道：志珍：向您问好，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喜欢她。

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随后贺子贞由邓颖超、康克清一路陪同，乘津浦铁路火车南下上海，被永久性地安置在一栋高墙深院里。毛泽东替她改名为「志珍」，

意即应有志气，善自珍重，别找麻烦。

第十九章 妙解「空前绝后」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等人筹备了半年之久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整修、装饰一新的中南海怀仁堂开幕。

出席开幕式的会议代表六百三十四人，列席来宾三百人。推举出毛泽东等八十九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周恩来为主席团成员。主席台天幕中央并排悬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照片。由于新的国旗方案还有待大会决议通过，领袖像两侧悬挂的竟是斧头镰刀加「八一」二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尽管有军、国不分之嫌，也有人提出异议，并由周恩来汇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却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天下就是靠工农子弟兵打出来的，不挂军旗，还能挂青天白日满地红？

由于国歌方案也还需会议通过批准，开幕式上军乐队奏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又涉及到军、国不分的问题。本来曾经有人提出变通方案，大会开幕后，先进行一次关于国旗、国歌议案的表决，办个手续而已，然后将通过后的国旗悬挂上去，演奏的也是国歌了。但周恩来怕招致毛主席不悦，坚持军旗、军歌暂代，以示不忘我们的政权是哪里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哩。

军乐声中，场外鸣放礼炮五十四响。毛泽东致开幕词。他以终生不改又硬又亮的湘潭乡音宣告：「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自由。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毛泽东的开幕词里充满了豪言壮语，雄心万丈，气冲霄汉。他谈到了和平自由，唯独不谈民主、民权。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没有民主、民权，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和平自由。

会议中间休息时，周恩来、刘少奇等陪同毛泽东，步出怀仁堂，来到记者们中间。记者们不失时机，众星捧月地将毛、刘、周三人团团围住，毛泽东与记者们一一握手。毛泽东接过记者们递上来的名片，对《解放日报》的林淡秋说：你的大名很风雅。又对《文汇报》记者唐海说：唐朝的海？不是中南海啊！唐朝的海应该在长安，叫大明湖，唐玄宗修建的大明宫，比中南海要大出好多倍啊！

毛泽东谈笑风生，相比之下，刘少奇、周恩来则显得比较拘谨。有的记者也想找刘少奇、周恩来谈几句，两人却谦恭地晃晃手，朝毛泽东方面努努嘴，意思是大家集中到毛主席那里去，不要形成第二中心、第三中心。

这时，《大公报》女记者高汾挤到了毛泽东跟前，说「主席，您今天的开幕词棒极了，简直是空前绝后了！」毛泽东注视了衣着入时的高汾一眼，问：「尊姓大名？高汾？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高汾兴奋地说：「见过的，一九四五年你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时候，我们采访过您！」毛泽东饶有兴味地笑了笑：「我记起来了，那天《新华日报》刊出了我的诗作〈沁园春•咏雪〉，你也说过空前绝后是不是？空前不敢当，绝后可是不大妙罗！」

记者们都笑了起来，毛主席真是位谦逊的伟人。忽然，毛泽东又发现了什么似的指着高汾脚下穿的半高跟空花皮鞋，问道：「你不知道，上海对你这种皮鞋叫什么？」高汾一时竟答不上来，双颊绯红，甚为窘迫。毛泽东于是来了个自问自答：「在上海，这种皮鞋叫做「空前绝后」！」

在场的记者们和卫士们哄堂大笑，纷纷鼓掌叫绝。思想左倾的《大公报》女记者高汾后来写道：「毛泽东主席不仅雄韬伟略，而且幽默风趣，平易近人，他那妙语连珠的谈吐、风度，实在令我为之倾倒。」

第二天的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程潜、张澜等当选为主席团执行主席，周恩来则当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他代表大会主席团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实为一份具宪法性质的建国大纲。他颇有远见地依据刘

少奇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新阶段理论，强调新中国成立后，不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会实行一段相当时日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富庶民生。

为此，他对《共同纲领》作了以下的说明：新民主主义的总纲问题。在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以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度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确地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问题。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它完全不同于旧民主的议会制度，而是属于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代表大会制度的范畴之内的。但是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制度，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而我们则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问题。基本精神是照顾四面八方，就是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的构成中（个体经济、私营工商业、民族资本家经济、合作社经济、国营经济），国营经济是领导的成分。在逐步地实现计划经济的要求下，使全社会都能各得其所，以收分工合作之效，这是一个艰巨而必须实现的任务。

应当说，这时候的周恩来对于国家的建设大计，是颇为冷静而客观的。便是毛泽东的头脑亦尚未进入昏热阶段。周恩来在《共同纲领》中所以反复强调，新国家现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至于将来走向社会主义这一前途，则要由全国人民的实践来决定；而且坚持不把这一前途写入总纲中。他仿佛已经预料到，这一建国大纲将会遭到党内左倾势力的窜改，这一窜改将会来自毛泽东主席本人。在战争年代，为

了适应瞬息万变的紧急军情，在中央书记处集体决策的同时，委托一位领导人为「军事上的最后下决心者」。江西中央苏区时期以及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周恩来曾长期担任此一角色，实际上为中共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者。一九三六年初发生了「西安事变」之后，毛泽东才取代周恩来，成为「在党内受委托军事上下最后下决心者」。初时毛泽东还较谦虚，常说「你们听我的，我听大家的」，后来打了许多年胜仗，渐渐变成「你们听我的，大家都听我的」了，以至变成习惯，毛泽东主席有权改变党中央的任何集体决策。

九月三十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最后一天大会上，代表们投票选举领导人。毛泽东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陈叔通、沈钧儒、郭沫若等当选为副主席，周恩来等一百八十人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李维汉当选为秘书长。紧接着进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选举，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等六人当选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五十六人当选政府委员，林伯渠当选为秘书长。

两项选举的候选人，均由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共中央人事安排领导小组等额提出，全部无异议获得通过。一个奇特的现象是，出席这第一届政协代表大会的代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占有三分之二的多数。这些人士过去在南京政府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上也好，政治协商会议上也好，大都热中于独立提案，甚至叫叫骂骂，拍桌打椅，唯恐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如今到了共产党主持的全国政协会议，却一个个谦谦君子，笑笑微微，温文尔雅，投票、举手如仪，只差没有膜拜顶礼。毛泽东在两项主席选举中得了全票，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乐队高奏「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周恩来在两项委员选举中也得的是全票，全场更是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乐队奏的是〈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选举之后，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决议：翌日——亦即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而盛大的开国典礼。

大会的最后一项内容，为全体代表乘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纪念碑将耸立于天安门与前门之间的中轴线上。

下午六时，奠基仪式开始。毛泽东要求刚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含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两百多人，按年龄长幼面南而立，排成整齐的两列。但见毛泽东自己亦以立正姿势站好，精神抖擞，两手紧贴裤缝，用他又亮又硬的湘潭土腔，喊出了合乎《步兵操典》要求的「口令」：「立——正！」

「向右看——齐！」

「向前——看！」

「稍息！」

在毛泽东威严的「口令」下，老先生们、女士们闻令而动，一个个神情严肃认真，动作却很难整齐划一。清末最后一届举人、刚当选为政协副主席的著名法学家沈钧儒老人事后笑称：平生第一次接受操练，毛泽东是我司令；刚获委任为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长的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乃器先生则私下里说：把政协委员和政府委员们当作士卒来号令，毛泽东比过去的蒋某人厉害多哩，空前绝后，确是空前绝后了。

毛泽东呼过「口令」之后，周恩来在肃穆的气氛中，代表政协大会主席团致词：「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一百多年来为新中国的诞生而英勇献身的人民英雄们，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下午六时，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礼。」

周恩来致词后，全体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委员脱帽静默致哀。接着，毛泽东宣读他本人所撰写的纪念碑碑文：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念罢碑文，毛泽东跨步向前，从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手中

接过一柄扎有红绸带的铁锹，挥锹铲土，投入基坑。接下来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周恩来、陈毅等两百多名政协、政府副主席及委员们一一依次铲土，投入基坑。说是高岗将铁锹传给周恩来时，得意地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周委员，你的右臂不方便，要好好接锹啊！」周恩来则平静而坦然地回答：「高副主席，来日方长，来日方长。」

人民英雄纪念碑后于一九五二年八月动工兴建，一九五八年四月落成，建造了整整六年零八个月。它距天安门城楼墙基四百六十三米，处于天安门广场正中央位置。碑高三七点九四米。双层基座达三千平方米，由一万三千块巨型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东西宽五〇点四四米，南北长六一点五〇米。碑身呈方形，由大小不等的四百一十三块花岗石组成，正面向北，朝向天安门，嵌一块高一四点七米、宽二点九米、宽一米、重达一百零三吨的碑心石，上刻毛泽东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

碑心背面朝南，为周恩来手书的毛泽东碑文。周恩来从来无争无求，却争到了手书毛泽东碑文的荣耀，被永久性地镌刻了上去。说是后来高岗曾酸溜溜的对彭德怀说：「周恩来老奸巨滑，朱德、刘少奇没想到做的事，被他做去了，想以此不朽了呢。」

第二十章 开国大典惊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正在中南海怀仁堂进行之际，负责筹办开国大典的周恩来、林伯渠却捏两手冷汗，为一桩尚未侦破的敌特爆破阴谋案而焦头烂额。周恩来的老部属——中共中央社会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只获知了一个要命的简短信息；十月一日上午，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之时，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共领导人及其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将受到火炮轰击。

事出突然、时间紧迫又关系重大，李克农曾经向周恩来请示报告，建议中央将开国大典延期，待案情水落石出之后再说。周恩来严肃批评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谁为谁让路？就算这个案子破了，再又出来一个案子怎么办？这种念头，你连想都不应该想。开国大典的日子，早经全国政协筹委会决议，党政军内各部门亦已下了通知，能随便改期？我代表中央给你和你的部门下个军令状：「限九月三十日晚上十二时前破案？」」

周恩来与刘少奇、朱德、林伯渠等人商议，决定此事不到万不得已，不去惊动毛泽东主席；并命令中央保卫局、中央警卫团、中央社会情报部由罗瑞卿、李克农二人统一指挥，一抓侦破，二抓警卫。

开国前夕，北京城区已被保护得铁桶一般坚固，谁能炮击天安门城楼呢？「营垒最易从内部攻破」，李克农先想到的是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将在庆典上接受检阅的部队。可是当李克农去找到第十九兵团政委罗瑞卿、司令员杨得志时，罗瑞卿已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杨二位竟哈哈大笑：「克农同志，你开什么高级玩笑？我们兵团的前身是井冈山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率领过的英雄部队，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副师长以上干部，都是老红军，团以上干部都是老八路，排、连以上干部都是解放战争中的战斗英雄。这次庆典上接受检阅的四个师，炮兵师、步兵师、骑兵师、装甲师，已经封闭式操演了整整三月。我们考核了每一名官兵的五服三代，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民子弟，干干净净。稍有一点旧瓜葛的，我们一个不剩地调离了。何况接受检阅的官兵，更有一项铁的纪

律，任何武器均无子弹，哪里谈得上炮弹的？」

李克农部长却依然排除不了内部隐患的可能性。几乎可以肯定，敌特是钻进我们的心脏地带来了。他将侦察焦点集中到国民党潜伏特务人员身上，真有如大海里捞针了。轰击天安门城楼的炮弹，可能来自天上？中央已经下了禁空令，亦已请得驻辽东半岛旅顺口的苏联红军空军部队强有力的保证，十月一日全天北京上空不可能出现任何飞行物体；来自天安门城楼的后方——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早由中央警卫团实施军事管制，原留下的工作人员已一个不剩地放了假；天安门城楼东面的太庙（后来改名为劳动人民文化宫），西面的中山公园，亦由中央警卫团驻守着，原工作人员也都放了假。炮击，看来只可能来自天安门城楼的前方，即广场西南、正南、东南方向的那些建筑物。广场西南面的几栋高层建筑物原为北平银行办公楼及员工宿舍，已被新成立的中央银行接管，亦属军管单位；广场正南方为箭楼和正阳门，已由中央警卫团镇守；广场东南面是一大片四合院，有几栋楼房亦不过三、四层高，属于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为公安人员宿舍。上述区域，由中央警卫团与中央社会情报部人员日夜警戒，并进行过多次搜索，但毫无结果。

事实上，自九月二十一日全国政协会议开幕那天起，中南海四周，故宫博物院四周，天安门广场四周就已实施宵禁，九月三十日凌晨起更实施戒严，非中央党政军特殊批准的车辆人员，已不得进入上述地段。

莫非「盛典十时，炮轰天安门城楼」，是敌特分子放出的谣言？以干扰、破坏我开国盛典的如期举行？凭着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李克农有一个直觉，敌特分子几乎可以肯定是潜伏于我党、政、军的某个部门。

九月三十日晚上，当周恩来、林伯渠参加完庆祝全国政协会议胜利闭幕而举行的盛宴之后，听取李克农汇报有关爆破阴谋案的侦察进展时，发现一向机智沉稳、铁骨铮铮的李克农，两眼深陷发红，人整个的瘦下一圈去，哭丧苦脸，只差没向老首长周恩来下跪请罪了。

不用说，李克农对案情仍然一筹莫展。都什么时候了？肩负着事

关党和国家命运、声誉的重大特殊使命！立下军令状也可以不兑现？周恩来目光灼灼，直要发火，但他克制住了。每逢他要发火之时，他心里就会默念一句自警之言：「我就是为了解决各类疑难活在这世界上的。」自己眼前的这位老下级，又确实是位文武全才，二十多年来在一条特殊战线上，屡建奇勋，使得国民党军统、中统的老对手们一败再败，闻风胆寒。李克农早已是传奇人物，特工英雄，他跟钱壮飞、胡底三人被誉为中共特科的「三剑客」呢！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那次，要不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潜伏于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内，形成一个严密的情报网络，及时获取了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情报，报告周恩来，使得周恩来连夜组织了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的紧急撤退疏散，并亲自带领邓颖超、康生、陈云在内的特种好汉们以斧头、铁棍处死了顾顺章一家老小七人灭口，中共中央领导人物们早被国民党特工部队一锅端了呢……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李克农又参与指挥了对东北军、西北军官兵的策反，促成了「西安事变」，等等。

周恩来亦已连续三十几个小时没有合过眼了，两眼睛熬得布满血丝。他仍然保持住有条不紊，从容不迫的风度。他问李克农：「你还留有最后一手吧？」

李克农苦笑说：「已经是下策了，明天凌晨五时，再对广场西南、正南、东南方向的所有建筑物进行一次突击搜索；不果，上午九时半，进行第二次……。」

周恩来安慰说，只好如此了。我也不能真的为了军令状要了你的脑袋吧。有时，下策也可转变为上策呢。

为了给老部下的「下策」做好铺垫，周恩来立即把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罗瑞卿、李克农、汪东兴、谢富治等人召集到一起，开了个紧急碰头会。他首先肯定了，天安门广场及其周围地区的警卫工作由中央警卫局、中央警卫团与中央社会情报部联手负责，并无其它单位参与，安全问题应是万无一失的。开国盛典，如期举行。明天早上，参加庆典活动的首都市民、工人、农民、学生，八点半开始进场。至于中央人民政府、全国政协及人民团体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典礼

开始的时间，对外仍旧宣布为上午十点钟吧！真正的时间，听候临时通知。就算有敌特分子混在群众队伍，进了天安门广场，我们也来得及去发现和处理的。在这方面，彭真同志和北京市委各级党组织，已经做了十分周全的准备。我提醒一句，我们的便衣人员，应当特别注意那些以记者身分，携带照相器材进场的人物，以及给广场上的群众提供饮水饮料的车辆，尽管他们已经申请登记并发有牌照。

会后，周恩来再又把李克农单独留下来。

周恩来说：「克农，你有几天没睡过觉了？」

李克农听此关切的问，铁打的汉子，差点要哭出来了：「周副主席，对不起中央，对不起你，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任务……。」

周恩来替李克农重新泡上一杯茶：「今后叫我周委员吧，我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总理。你急有什么用？你、我都是男子汉，泰山石敢当嘛！过去我们在上海地下党中央特科的时候，共同经受过国民党白色恐怖的考验。特别是顾顺章叛变那次，要不是钱壮飞、你，还有胡底三人及时提供了信息，我地下党中央就可能被人一网打尽……那是什么样的艰险？可惜胡底、钱壮飞两位都牺牲了。你、我却熬过来了。今日政权在手，还怕这点子困难？」

李克农挺了挺腰板，目光坚定地望着自己跟了二十多年的中央特科创始人。

周恩来问：「你能肯定，问题只会出现在广场的西南、正南、东南三个方位上？」

李克农回答：「天安门城楼背后的故宫、东侧的太庙、西侧的中山公园，都由中央警卫团驻守着，可说是每一寸土地都搜查过不止一次了。而且从火炮射击的角度分析，这三个地方也是不可取的。」

周恩来点点头，又问：「现在你手上直接指挥的人马是多少？」

李克农回答：「五个行动组，每组十八人。」

周恩来说：「啊，每组十八条好汉。都是延安过来的？有没有本地人？」

李克农回答：「都是陕甘宁边区的老同志，人人过得硬。进入河北之后，没有选拔过新人。」

周恩来说：「噢，知道了。这样吧，你回去，立即通知你的五个行动组的同志们，集中休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算几个小时，彼此不准再谈论案情。包括你本人在内。明日凌晨五时前，我会通知罗瑞卿同志，派中央警卫团的一个连队配合你，由你的五个行动组，对广场东南、正南、西南三方向所有面朝广场的建筑物，同时进行一次突击搜查。如无结果，再于明日上午九时半，对上述建筑物进行第二次突击搜查。我们不是宣布明天上午十时举行开国大典吗？再狡猾的敌人，总需要半个小时来架设他们的罪恶武器。就这么定了，这本来也是你自己设想下的最后行动方案。」

李克农腾地站起身子，双脚跟一并，向周恩来行了个举手礼。

周恩来交代：「两次行动，均由你单独操作，不要再告他人。行动之后，你立即向我报告结果。」

李克农告辞，紧紧握住老首长的双手：「周副主席，你也应当阖一阖眼睛啊！」

十月一日凌晨五点半钟，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三人都还聚在菊香书屋北院毛泽东的书房兼办公室里说说笑笑。他们都太高兴、太激动了。都毫无睡意。几个钟头之后，毛泽东就要率领大家登上天安门城楼，由毛泽东按动电钮，在军乐团演奏的新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乐曲声中，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向聚集在广场上的数十万军民，以及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此时此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四位最高领导人，怎么睡得着觉？

还是周恩来记着六点钟后，应回到西花厅家中去等李克农的电话，于是提议：「我们还是各自回去休息一下，要好好睡一觉。就依主席平日的习惯，睡到下午二时起来，好吗？三时上城楼就可以了。回头我跟卫士长小黎交代一下。总司令和少奇同志，这些日子也是大忙特忙，也需要好好休息几个小时。三时上城楼，晚上看焰火和文艺演出，也是很辛苦的。」

毛泽东笑笑说：「也好，就照恩来说的办吧！下午两点半，不是要在勤政殿先开个中央人民政府的短会，再上城楼？平心而论，我们几

位，恩来是最周到又最辛苦的，眼睛都熬红了，也快回去睡一觉吧。不然，小超可要给我提意见了。」

周恩来回到西花厅，恰好是六点正。邓颖超早入梦乡了。他留在后院客厅里。客厅离卧室还隔着饭厅、书房及走廊。不一会，李克农来了电话，报告突击搜查的结果：「一无所获。」周恩来稍带倦意地吩咐：「不要紧，先睡两个小时觉，九点半采行第二方案，不信那些家伙是土行孙。」

一位面目姣好的女兵，周恩来夫妇的保健护士，端着杯热牛奶，出现在客厅里，柔声说：「首长，您都几天没上床了。已替您放好了热水，先洗个澡吧。阿姨吩咐了，一定让您进去睡个觉。待会儿要不要替您做做按摩？」

周恩来接过牛奶，三口两口就喝下了，递还杯子时，仰头望着那张正朝下俯视着他的美丽面容，温和地笑了：「小李，谢谢，你也休息去吧。在我们这些夜猫子家里值班，年轻人也要跟着熬瞌睡。去吧去吧，我会照顾好自己呢。」

洗过澡，换上睡衣，周恩来并没有进卧室，而是进到书房里，拿起办公桌上的一份份文件来认真批阅。他的目光停留在一份铅印的名单上：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名单。除了主席、副主席，他的名字是政府委员的第一名，之后是彭德怀、陈毅等五十六人。他要记住这五十六个名字……忽然，他眼睛热辣辣的，心里涌出来一股莫名的委屈：我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是应该不争不求，不朝前面挤，应该淡泊名利，全心全意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工作，工作……我喜欢做事，我不怕麻烦，我知难而进，并乐此不疲。我常对自己说，正是为着解决各类疑难，我才活在这世上品味出生活、生命的意义。我甚至愿做一枝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可这样对待我，贬抑我，从政协到政府都把我摆在委员名单里，算公平吗？

合理吗？润芝兄，多少年了，我早已对你心悦诚服了，推心置腹了，甚至是俯首称臣了；你却总是结记着江西中央苏区时期的陈芝麻辣烂谷子，那些老故事，老情节……。可你自己，润芝兄，集多少个「主席」于一身了？

党、政、军、民，正式的，临时的，凡有「主席」，你从来当仁不让，绝无谦让：从中华苏维埃主席、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整风学习委员会主席、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党报党刊编辑委员会主席、中国土地改革委员会主席，到如今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主席、主席团主席、共同纲领起草委员会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国防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多少个主席了？数都数不过来呢？你却费多少心血把我安排成全国政协和中央政府的委员，高岗昨天下午称我为周委员。你却破格提拔高岗做副主席，凌驾我之上。

让高岗来进逼我，制衡我？有朝一日取代我？高岗成你的私人保镖了。他口口声声保卫中央保卫你。他确有才干，魄力，担任政务院总理无问题……。他的问题是大气盛，骄横，草莽英雄，除了毛泽东主席，他谁都不认。他的一套，在一个大区当土皇帝还行；搬到中央来就很难行得通。高岗至今不懂从政之道，伸屈之术，疏于韬晦，不能容人，只热中于三朋四友，而不是五湖四海。还无所顾忌地玩女人，玩男卫士，追求什么长生之术。另外，跟苏联专家打得太过火热，跟苏共领导人太过亲密。种种，都犯着大的禁忌……。

哈哈，伍豪啊伍豪，你今天是怎么了？你竟把高岗当对手？高岗配做你的对手？你不成了降格以求？高岗呀，我敢说，十年之内，你还练不到伍豪的火候。不信等着瞧，只怕攀得越高，摔得越重。此为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首长，都七点半钟了，您还要工作？阿姨会批评我的，真的，会批评的……。」

那个美丽的女兵，又悄无声地出现在书房里。

周恩来揉揉酸涩的眼睛，幸而没有泪滴：「小李，你也没有听话啊？怎么还没去睡？」

女兵小李眼睛里闪起了泪光，温柔中带着些些抱怨：「我是替首长服务的，首长不休息，就是我的工作失职！」

周恩来轻轻摇摇头：「你替我服务，我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为

党工作，为全中国人民谋幸福，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没有上下之别，是下是？」

小李羞涩地笑了：「是，是，首长批评教育得是。我替您做做按摩吧？」

周恩来轻声说：「既是工作，你就坐下来吧，先把你那梨花带露的脸蛋擦干净……。告诉你吧，我在等一个电话，顶重要的电话，知道吗？只有接到这个电话，我才放得下心，才可以休息一会。」

小李问：「还要等多久？」

周恩来说：「还有一两个小时吧？走，你替我抱上那张毛毯，我们回到客厅去说话，等电话，同意吗？」

小李噘了噘可爱的小嘴：「您是领导，我能有不同意的吗？」

周恩来站起身来，拉住了小李的手：「小鬼，不要总是分出上下级，我们首先是革命同志，好不好？」

小李抱着那张旧毛毯，随周恩来回到客厅里。客厅四面皆为红漆镂空花木墙，四角是四根龙翻凤舞、嵌金镶银的梁柱，显得高阔，有些凉飕飕的。

周恩来仰坐进一张垫有棉垫子的矮背木沙发里。小李将旧毛毯盖在他身上，之后站到他身后去，替他在肩部、颈部上上下下、来来回回的拿捏、推搓。

周恩来感到一种隐隐带着疼痛的轻松、舒适。他说：「小李，你一双纤纤玉手，还很有力道呢。」

小李说：「首长，俺的工作，全凭了这双手哩。有次贪嘴，削梨，拉了一道口子，直流血，疼的俺值掉泪。」

周恩来说：「今后是要小心了，防止细菌感染呢。你一天要掉几次眼泪？」

小李说：「首长又取笑人了，担心俺掐痛你。俺掐人可疼了。参加部队后，俺就少有掉泪了。」

周恩来说：「是妈？吹牛，刚才还见你梨花带露。」

「掐你，掐你，看你还取笑人。」

「掐重些，对，掐重些，疼些才舒服。」

渐次，周恩来感到一阵朦胧的困意：「小李，好了，你也坐下歇歇吧。」

小护士轻声说：「那我就坐在您对面，陪着您。或是，我去端早点？」

周恩来晃晃手：「坐下。现在什么都不想吃。我就看着你吧。小鬼，你很甜静，我喜欢看到你呢，你是我的白衣天使呢。」

小护士规规矩矩地坐着，双手巴掌插进双膝之间，脸蛋红艳艳的，声音柔和得近似催眠曲：「我也喜欢看着您。都说您是美男子。真的，不怕您批评，您是我看到过的最好看的男子汉……。我呢，一个闺女家，说这话，怪臊的……。」

周恩来眯缝上眼睛笑了：「谢谢，傻丫头。我现在身上披着条旧毛毯，也好看吗？这毛毯还是在江西苏区时候，朱总司令送我的战利品。那时你还没有出世吧。它随我快二十年了。你来我这里工作也快两年了吧？人和东西一样，相处久了，就会生出特殊感情呢。你的手呢？手，让我来牵住你的小手……。」

不知为什么，小护士眼睛里又噙着泪花，又梨花带露了。她对周副主席以及老一辈革命家，有着衷心的爱戴和崇敬。对面，周副主席捏着她柔软的小手，瘫软在沙发里，发出了均匀的鼾声。听说毛主席睡觉鼾声如雷，气势雄浑；周副主席则连鼾声都斯斯文文，小心翼翼。

小护士轻轻地将自己的手抽出来，直想去抚抚那方方正正的脸庞……她轻轻出到院子里，以手指放在嘴唇上，嘘声告诫着每一个前来上班的工作人员：「首长客厅里打盹呢！」

上午十时，客厅里电话铃声响起。周恩来一觉醒来，见小护士已把话筒拿起，正想说什么，只好递到他手里。

是李克农的声音，声音很兴奋：「报告老领导，目标找到了，破获了！该死的家伙，果然是九点半点钟，把一尊轻型追击炮架在广场西南面银行顶层的一个窗口，正瞄准着天安门城楼！我们的人冲进去，抓个正着，原来是两名混进银行军管小组里的坏蛋。但已经迟了一步，两个家伙咬破了藏在衣领口上的什么药物，还没有被押出银行大楼，就归了西天，死球……。」

周恩来平静地听着汇报，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李克农在电话里太兴奋，喋喋不休。周恩来打断了他，发出新的指令：「搜查还要继续，防止敌特的后续行动，一定要保证今天的盛典万无一失。」李克农回答：「是！中午一时，我们会再进行一次突击搜查。」周恩来问：「现在广场上，群众的队伍都到齐了吧？」李克农回答：「到齐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一片人海，旗海，花海……一个一个的单位、团体，正在相互拉歌比赛：〈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东方红〉、〈南泥湾〉、〈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还有秧歌，花鼓……。」

周恩来对着话筒，温和地说：「克农，你们完成了任务，你的话怎么没个完了？你们不要放松警惕，敌特分子的破坏活动不会是孤立的、个别的，而是有他们的潜伏组织在指挥、调度。我们暂时不谈许多了，我还要把你们完成任务的消息报告给少奇同志、朱总司令、伯渠同志。」

刚放下电话，邓颖超进来了：「你呀，没日没夜的，真是个国家总理了。去漱个口，擦把脸吧，我陪你吃早点。今天是大喜日子，你要修修面呢。反正主席也要中午两点才起床，你还可以抓紧时间休息。」

周恩来却门口招招手，唤来了秘书：「小何，你去给少奇同志，还有总司令两家的值班室挂个电话，就说一句话：李克农同志他们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中午一时，周恩来衣着整齐，神清气爽，赶到了丰泽园菊香书屋的秘书值班室。卫士长报告：「江青同志到颐和园摄影去了，说反正今天也没有她的活动。」周恩来点点头，就在值班室坐下，边批阅几份紧急文件，边守候着毛泽东主席起床。毛泽东仍在呼呼大睡，隔着四、五间房间，都听得到那鼻息如雷，威风如虎。过了一会，卫士长来请示周副主席，要不要把主席唤醒。周恩来看了看手表，交代说：「小黎呀，主席今天会很辛苦呢，还是让他多睡一刻钟吧。」

中午一时二十分，卫士长不再请示，将一缸泡好的浓茶，几份报纸送进毛泽东的卧室，轻轻推醒了伟大领袖，并将其扶了起来，仰靠在垫有两只大枕头的床头上。毛泽东喝着浓茶，批阅着报纸。有女护士托着一迭热毛巾进来，替换着，替伟大领袖擦脸、擦脖子及前胸、后背，还有大腿、脚肚、脚掌。浴室里本已安装有浴缸，但毛泽东不

肯躺进去洗，说那像被泡在福尔马林防腐哩。要洗澡，就要去江河湖海，迎风搏浪才够意思。至少，也得进游泳池，才像个样子。

平日，毛泽东要在床上喝茶看报批文件，整两个小时之后才下床吃早点。今日是个特殊的大喜庆日子，卫士长又进来了，见毛主席仍在慢条斯理地看报纸，不禁有些犯急，提醒说：「主席，周副主席已经在值班室等您半个多小时了，现在已快两点钟了，原定两点二十分在勤政殿举行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三点钟上天安门城楼，您可不能迟到啊！」

毛泽东仿佛这才想起了什么似的，双脚伸到了床沿，让卫士长替他穿袜子，套裤管，穿鞋子。之后他站起来，由卫士长替他系好皮带，扣好裤扣。之后他自己去了洗手间解决内急。马桶前也摆有厚厚的一摞书籍。之后他回到餐室用早餐。他用餐的速度唏哩呼噜，从来很快。

周恩来在确知毛泽东主席已在用餐了，并不进来打扰，而先去了会议地点勤政殿，以便向少奇同志、朱总司令等及时通报主席的行止。一般来说，只要周恩来出现了，就是预告着毛主席要莅临了。

毛泽东由卫士长、秘书、护士、保健医生陪同，出菊香书屋，出颐年堂，出丰泽园南正门，折向东，步行百来步，即进入勤政殿。殿内会议厅的长桌两旁，已经整整齐齐地坐着中央人民政府的六位副主席及几十位在京的政府委员，以及全国政协的常务委员们。毛泽东进来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迎毛主席主持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只说了一句开场白：「今天在勤政殿开头一次会，算开张发市，今后在座的每一位都要勤政，不要偷懒！」大家笑了。接下来，毛泽东念着一份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名单，他念一个名字，下面应一声到，像点名似的。念完，即算全体政府委员就职上任，免去了宣誓仪式那些资产阶级的俗套。跟着，他又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名义，任命政府委员周恩来同志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全体政府委员和政协常委们热烈鼓掌。会议结束。

二时五十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们，在勤政殿北门外分别乘坐汽车，出中南海东门，过中山公园，数分钟后抵达天安门城楼后院。此时刻，五十六岁的毛

泽东，没有尊老敬贤的礼仪了，开始第一个登楼，左右两边由卫士长和护士搀扶。共有台阶一百级。其它领导人尾随其后。

三时正，已在天安门广场上等候了六、七个小时的数十万军民，见到了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等领导人。毛泽东站立在城楼正中央位置，两旁分别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毛泽东回头看了看，见周恩来跟政府委员们站在后排，忽然招了招手：「恩来，站到我这边来。」于是周恩来连忙趋前，站在了毛泽东、高岗之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请毛泽东主席升国旗。于是全体文职脱帽，武职行举手礼，毛泽东按动电钮，金水桥下，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军乐队奏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接着，毛泽东拖长了又亮又硬、微微颤抖的嗓门，以一口终生不改的湘潭官话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广场上万众欢腾，高呼万岁、万万岁。五十四门礼炮鸣放二十八响。五十四门礼炮代表全国五十四个兄弟民族。二十八响代表中共自一九二一年成立到一九四九年夺得政权，浴血奋斗了二十八年。

接下来是阅兵式。由朱德总司令及代表第一野战军的贺龙将军、代表第二野战军的刘伯承将军、代表第三野战军的陈毅将军、代表第四野战军的罗荣桓将军，下天安门城楼，乘坐吉普车检阅在广场上列成方阵的步兵、炮兵、骑兵、装甲兵部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周恩来，怕毛泽东主席和宋庆龄、张澜、程潜几位老先生站立久了会累，便恭请他们到城楼后侧的休息室喝茶、抽烟。于是毛泽东拉着程潜老先生的手，转到休息室聊天去了。周恩来则留在前边，继续陪刘少奇、高岗、张治中、傅作义们观礼。

阅兵之后，是首都军民游行。休息室内，毛泽东和程潜先生聊的正高兴，周恩来匆匆赶来，说：「主席，你还是要出去站一下，游行队伍现在停留在金水桥下，见不到你，光喊毛主席万岁，不肯走了。」毛泽东对程潜说：「颂云兄，我就被人捧出来的罗！」程潜尊敬地看看周恩来，说：「润芝兄，贤相在侧，你这是登基……。」

第二十一章 张闻天蒙羞周恩来受辱

新中国成立不久，一次毛泽东出席、刘少奇主持的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在完成原订议题之后，刘少奇一一询问委员们（连毛、刘、朱、周在内共十一位）还有没有别的事需要议议。一向文质彬彬、学者风范的前中央总书记张闻天说，他随中央机关住进北京半年多了，基本上是位赋闲「院士」，值此开国之初，眼看着老同事们大忙特忙，自己只是闭门读书，实在于心不安，是否请中央给安排个具体工作，让自己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为建设新中国尽点绵薄之力。

毛泽东主席没大听清楚他的话：「洛甫，你是什么赋闲院士呀？」

张闻天笑笑：「进城后我住了四合院，我是四合院的院士……。」

会场上发出一阵轻松的笑声。

毛泽东却脸色一沉：「洛甫，我看你呀，情绪不大对头啊！已经安排你做了全国政协的常务委员，加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还嫌不够，还要伸手，人的欲望真是难以满足罗。」

斯斯文文的张闻天，脸庞胀的通红，争辩说：「毛泽东同志！我不是伸手要官，我只是想做事，想做点具体工作。我不能看到大家这么忙，尤其是少奇、恩来、陈云，听说他们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我一个人却在赋闲……。」

毛泽东不屑一顾地挥挥手：「那好吧！你的事，这里不谈了，交给恩来去考虑，看看他能不能在政务院给你安个职位。做事和做官，两位一体罗。」

张闻天当众蒙羞，再好的涵养，也忍受不住了。他慎重其事地举起了右手，说：「毛主席，刘副主席，我有个意见，可不可以说说？」

毛泽东仍是一脸的不悦：「你的意见有几箩筐啊？要不要叫辆马车来帮帮忙？」

其他人都不敢笑，唯刘少奇笑了笑说：「洛甫同志，你就尽量简洁扼要些，如何？」

张闻天眼睛望着周恩来。周恩来以为他关于工作的事有什么具体要求，便鼓励说：「洛甫，在党的会议上，你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大

家商量嘛。」

张闻天的眼镜起了一层雾水似的，他摘下来擦着，边说：「我们党已经成为了执政党。执一国之权的政党，应当建立起相应的权力监督与制衡，也就是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所肯定、所赞赏的巴黎公社原则。应当避免权力过度集中。权力过度集中，利少弊多，容易忙中出错，容易产生一言堂，不利于群策群力，走群众路线，不利于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

周恩来没想到张闻天谈起理论问题来了。他内心里是赞同的，觉得张闻天谈的很及时，很有必要。

毛泽东却不耐烦的看了两次手表，忽然打断张闻天的话，说：「洛甫，你的意见很好，可是题目太大。今天的马拉松会议已开了七个钟头，总得让大家回家喘口气，吃口饭吧？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我提议，下次专门召开一个会议，由你主讲党内民主生活问题，怎么样？少奇，下面，宣布散会！」

大家也确是有些累，有些饿了。一阵椅子响动，与会者纷纷站起来，相互谦让着退席。但见周恩来步子最快，一晃眼已经出颐年堂南门去了。

毛泽东向来行动较缓慢，在颐年堂通向菊香书屋的过道上，由他的卫士、护士、秘书一干人接着。他忽又转过身去，指着已经走出颐年堂南门的张闻天，大声说：「你们看清楚了吗？就是那个人，在江西苏区，曾经要害死我！」

毛泽东的服务人员都惊呆了，没想到他们所尊敬的首长张闻天同志，曾经是这样的人！站立在门外台阶上的张闻天，更是惊呆了。他缓缓地转过身来，眼含泪水颤着声音说：「润芝兄！这是你说的话吗？真是难以置信。我张闻天活了五十岁了，犯有各种错误，但什么时候害死过人？要是我在江西苏区、长征路上就那么坏，我还能够有今天，还能坐到颐年堂来开会？」

毛泽东却不要听他的辩解，赶蚊子似地挥了挥手，被卫士护士们簇拥着，经西过厅进菊香书屋庭院去了。

张闻天蒙受奇耻大辱，回到家里吃不进饭，睡不着觉，便向党中

央写信，要求政治局开会，澄清历史真相，还他以人格清白。

张闻天，又名洛甫，一九〇〇年生，上海南汇人。早年参加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时，加入陈独秀的「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苏州一带从事地下工作。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兼职共产国际执行局东方部工作。通晓俄文。熟谙马列理论。一九三〇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一九三二年转至江西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常委。一九三四年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同年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其党内地位已在毛泽东之上。同年十月，与秦邦宪、周恩来、朱德、李德^④等一起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及中央红军举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遵义会议上，他与王稼祥、毛泽东三人联手，说服周恩来，发动「会议政变」，撤销了秦邦宪、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补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红军继续长征。也是在这次会议不久，他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直到一九四五年的中共「七大」。

延安十年，张闻天自知军事上不如毛泽东高明，而专职党务，并处处表现出对长他七岁的毛泽东的尊重与谦让，甚至常常将中央书记处的有关会议，都移到毛的住处去召开。张闻天对毛泽东，表现出来一种难得的「禅让」。也是在延安的十年期间。口口声声要求全党「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搞山头，要搞五湖四海」的毛泽东，却处心积虑地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三人排除在外，组建起自己的一套党务军务班底，亲信骨干为刘少奇、高岗、康生、彭真、陈伯达等。在中共「七大」上，张闻天虽仍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但不久即被毛泽东免去了他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而派他去东北解放区工作，将其降格为中央派出机构的代表，曾任中共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等。一九四九年初，张闻天从辽宁回到河北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机构，名为协助刘少奇做些党务方面的工作，实际上被闲置了起来。张闻天的马列修养，学识人品，民主作风，均在毛泽东、刘少奇之上，但他不谙军事，注定成不了中共中央的最高

④李德，德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为共产国际派来中共江西苏区任军事顾问。

领导人。反过来，毛泽东和刘少奇二人，仍然对他十分忌讳，有意贬斥，只是毛泽东比刘少奇表现得更为露骨、更为肆无忌惮罢了。

张闻天给党中央的辨诬信，送达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手里。刘少奇不便转送当事人毛泽东，而找周恩来出面当和事佬：「恩来，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避免一场无谓的争端吧！而且就事论事，这次确是毛泽东同志心情欠佳，出言不慎，伤了洛甫的颜面。我看，主席的那些话在多大范围说的，就在多大范围内消除一下影响，严禁扩散。」

周恩来赞同少奇同志的处理方式，说：「洛甫的信，那就存放在你这里吧。主席和洛甫两头，我负责跑跑腿，沟通好。主席气头上的话，也是作不得数的。反正主席也说了，洛甫归政务院安排具体的职位，倒是个好事。少奇同志，你是管干部人事的，他是政治局委员，你看安排个什么职务才适合呢？」

刘少奇点着头：「很好，这次连带着把洛甫的工作也落实了，算给他个安慰。本来按他的资历，至少得挂个政务院副总理吧？但报送到主席那里又很难通过。对了，恩来，洛甫的俄语能力强，马列的书也读得多，读得好，能不能在你的外交部挂个第一副部长，再派他出任驻苏大使，住到莫斯科去，过几年舒适点的日子，怎样？」

周恩来有些犹豫：「政治局委员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于洛甫来说职位不够，于外交部来说又摆得太重……。安排他出任驻苏大使，倒是很适当的，体现了我们对苏联关系的高度重视，老大哥方面也一定高兴，会表示欢迎。」

刘少奇说：「能行！我看主席那里能通过，洛甫本人也会乐于赴任。洛甫为人，优点是好钻研理论，处世淡泊，不热衷名位；缺点是书卷气重，遇上问题穷认真。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召开党的白区工作会议时，在评价白区地下党路线是非问题上跟我闹别扭，差点让我下不来台，亏了毛泽东同志挺身而出，支持我的观点，扭转了会议方向，他才认了输。」

周恩来说：「现在的驻苏大使是王稼祥同志。主席已经定了今年十二月上旬出访苏联，自然是由王稼祥陪同为宜。洛甫出使的事，当

在主席返国之后。这又牵出一个重新安排王稼祥的问题。稼祥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就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长征时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年轻，资格老，水平高，工作能力强。延安时期，他跟润芝有过分歧，他坚持洛甫管党，润芝专责军事，少过问些党务。对后来提出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旗帜，他也认识不足……。」

刘少奇佩服周恩来，对党内干部的底细，来龙去脉，相互间的微妙关系，摸得清清楚楚。周的特点是能够以毛泽东主席的态度为准绳，随时调整对人对事的亲疏程度。刘少奇说：「若论资历水平，洛甫和稼祥，都可以做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罗，但那很难通得过。我看呀，稼祥同志回来，也先摆到你外交部，挂个副部长怎样？主席已经同意把党的对外联络工作，从统战部分出来，成立一个新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到时候，我来提议稼祥同志任部长，专责国际共运工运，兄弟党关系，使他有英雄用武之地。」

周恩来点着头，觉得幸而有少奇同志分管组织人事、干部任免，处事公正，量才适用，使得大家心悦诚服。

由于刘少奇居中周旋，周恩来出面和稀泥，张闻天向毛泽东主席要求辨诬的事，在很小范围内平息了下来。主席政治秘书田家英告诉少奇同志，主席愿在菊香书屋第一党小组生活会上检讨一下。刘少奇将此话转告周恩来，并请周恩来代表中央去找张闻天谈话。

周恩来来到东城区一条安静的胡同里的四合院内，看望张闻天并谈及工作安排。张闻天含着泪水对老同事、老朋友说：「这样安排好，住到莫斯科去，今后尽量少跟他见面，少惹他讨嫌。我只是担心我们这个党啊，迟早会出毛病，集党、政、军、情大权于一人，君临天下，刚愎自用，发展下去就是专断独行了。党内两位最敢讲话的人，任弼时请了长假治病，彭老总又远离中央，在兰州坐镇，连开国大典都不来出席。现在是谁也不能批评他，甚至是善意提醒他。他却可以随心所欲，瞪起眼睛批评人，喝斥人，而且是当着他手下的那批服务人员。此风不可长，不可长啊！可又没有人能劝阻他，更正他。大家都已经习惯于看他的脸色行事。长此以往，总有一天，我们党要栽大的跟头，老百姓跟着我们吃大的苦头……。」

周恩来对张闻天的牢骚言论，未予肯定，也未予批评。其实许多话，任弼时早就说过了。任弼时在转战陕北的那段时间，跟毛泽东同志吵架，当面吵得再凶，事后也只有服从。

或许，张闻天的身边，早安排有内线人物。他的「反毛言论」及周恩来的暧昧态度，很快被汇报到毛泽东主席那里。

几天后，中央书记处在颐年堂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毛泽东主席率领党政代表团出访苏联的相关事宜。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邀请函里，亦邀请周恩来总理陪同毛泽东主席到访。会上，朱德、刘少奇以及扩大进来的董必武、陈云、林伯渠、彭真，都同意周恩来任代表团副团长，以便打理些代表团的的具体事务和主持与苏方的会谈事宜。

毛泽东却始终没有松口。他一九四八年即提出过赴苏联访问，以消除史达林同志对他的种种误解。但史达林认为中国内战正激烈进行中，局势尚待明朗，毛泽东访苏时机尚不成熟。毛泽东为此憋过一肚子恶气。现在新中国成立了，总算可以出访了，又提出让周恩来陪同，真是岂有之理。

离了姓周的，老毛就办不成外交？与其让周恩来陪同，还不如由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陪同呢。高岗还兼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起码名份上高过周恩来呢。当然，毛泽东的这些话，只是闷在心里，不便在会上提出。

书记处扩大会议最后遵照毛泽东的意愿，不搞什么团长副团长，轻装简行，成员只包括王稼祥（已在莫斯科）、陈伯达、师哲，随行人员则有负责警卫工作的公安部副部长杨清奇，主席卫士长汪东兴，主席机要秘书叶子龙，以及翻译文秘医护人员若干。周恩来则待代表团抵苏后，视具体情况再决定是否出访。

散会时，毛泽东忽又一脸的不高兴。这次周恩来却没有快步离场，而是留在后边，仿佛还想跟毛主席谈个什么事。毛泽东在颐年堂通往菊香书屋的过道上停下来，车转身子，当着几个迎候他的卫士、护士、秘书的面，指着周恩来说：「告诉你们吧！在江西苏区，他也是反对我的！特别是富田事件前后，他执行王明路线，打击、排挤、压迫我，

好厉害的啊！所以你们对他，也要心里有数。」

周恩来倒是没有像张闻天那样大惊失色，而表现出了惊人的自制力。

他只是哭笑不得的站在那里，说：「主席，江西中央苏区时期我所犯的错误，早在党内会议上，特别是在延安整风学习期间，检讨了，认错了，今后也还会继续检查、认错，你何必说给下边的这些年轻同志听呢？会令他们很为难，不好工作啊！主席，请你今后多个别批评我，我一定虚心接受的。」

看到周恩来难堪、狼狈的样子，毛泽东倒是动了动恻隐之心似的，笑了笑说：「我手下的这些同志，都是我最亲近的人，我的许多话，对江青、对子女都不能说的，却从来不瞒他们。你是总理，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周恩来没有退缩，不像彭德怀、任弼时那样与毛泽东对吵或是拂袖而去，反而恭敬地走近毛泽东：「主席，你开会开得很累了，还是先回去休息，好吗？关于我的缺点，错误，我另外找个时间，向你交心，谈心，汇报一次，好吗？」

毛泽东挥了挥手，又拍拍脑门：「确是有点累了，你说得很对。交心、谈心，无任欢迎。我们都各自多做自我批评。」

周恩来向毛泽东伸过手去，毛泽东稍作迟疑，仿佛在说，天天见面，还用握手？只是碍于周恩来的手伸着，没有缩回，他只得也伸出手去，使劲握了握。便是在场的那些服务人员，无不暗暗佩服周总理为人宽和大度，谦逊稳重。真是公侯头上跑得马，宰相肚里可撑船啊！

第二十二章 需要精神自我调节

周恩来脸色发白，回到西花厅，快步穿过前院，见了谁都不理睬，直抵后院书房，插上门，才开始生闷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精神自我调节：太难太难太难了！任我怎么小心翼翼，恭恭敬敬，诚诚恳恳，兢兢业业，他还是不满意！不放心！当着他的卫士、护士、秘书的面，一会说洛甫曾经想害死他，一会说我曾经反对过他，打击过他！怎么可以这样？可以这样？你是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全国政协主席，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军委主席，九五至尊，一言九鼎！党、政、军、情，工、农、商、学，你集最高权力于一身……我周恩来心悦诚服，衷心拥戴，任劳任怨。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胜利，为了建立新的中国，我们的确需要一位英明领袖。延安时期，我们选择了你，寄希望于你，众星捧月，齐心协力，把你捧上了领袖地位。因为事实证明，只有你文韬武略，呼风唤雨，气吞山河；只有把你捧起来，才能跟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相抗衡，打擂台，争天下。国民党有个蒋介石，共产党就必须有个毛泽东。毛泽东要成为一面旗帜，一种精神，一个象征，以带领全党去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毛泽东是钟馗，共产党要用毛泽东来驱魔打鬼。所以刘少奇同志率先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政治思想工作的指导方针，跟随毛泽东的旗帜胜利前进。俄国革命的胜利是因为有伟大导师列宁及其领导下的俄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因为伟大领袖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这是革命的大道理，总纲领。大道理管小道理，总纲领管各项具体的政策方针。也可以说，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现代中国的「周礼」，悠悠万事，唯此唯大，我们人人都必须克己复礼。

在延安的那些年，毛泽东同志表现得谦逊，多随和，多幽默风趣！没有架子，不讲排场，生活简朴，对同事对下属和蔼可亲，很少很少发脾气，耍蛮横。那时，他说，大家把我推向一把手这个位置，无非是选我当个班长。我们的十一位政治局委员，五、六位书记处书记，就是一个领导班子，领导集体，有事大家办，有仗大家打，有饭大家吃，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我搞一言堂，听不得不同意见，

你们随时把我轰下来，另选班长主事。总之，我们需要的是一群领袖，而不是一名君王……。这些话，绕梁数载，余音在耳。可是润芝兄，你自己还记得说过这些话吗？自从到了河北西柏坡，又进了北京，你的脾气越来越大了。在你，成为一国之主，却好象越来越不顺心了，大事不放手，小事也计较，开始疑虑重重，防范起自己周围的老同事来了……。其实，你今日的地位，是历史所形成，所铸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朱总司令，少奇同志，还有我和全党的高级干部，谁还想反对你？谁又能反对你呢？军队只有你可以调用，北京卫戍区、中南海警卫团唯你是命，公安、司法也归你亲自掌控，社会情报也交给了你信得过的罗瑞卿、谢富治。少奇、朱总，还有我，都尽量回避这些敏感部门，不得到你的委托，就都不去沾边的啊！

恩来啊！你是不是也应当检讨一下自己呢？自己是不是在党中央机关、中央政府机关，揽事太多，太过突出，太过活跃，太过抢眼了？人们一声声呼唤着总理，总理，是不是太过令人刺耳、震耳了？你是不是有过疏忽的时刻，没有摆正自己和毛泽东主席之间的主从位置？对了，那天晚上在怀仁堂看戏，后来又到处藕斋跳舞，那么多的女演员围住自己，是不是比围在主席身边的还要多，而喧宾夺主似的，把主席给冷落了？

说心里话，他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的主从位置，早在十多年前就摆定了，摆正了。

那是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与周恩来整日长谈，相当秘密，决定第二天由周恩来率领二十余人，坐军用敞篷卡车赴西安，与国民党的代表顾祝同、张冲会面并会谈，然后上江西庐山晋见蒋介石，会商国共合作，红军部队接受改编，开赴抗日前线等事宜。四月二十五日，周恩来等乘坐的军用卡车，却在延安、甘泉两县交界的劳山遭到一百多名土匪部队的伏击，周恩来的随行警卫人员仓促应战，连同司机、副官等十一人被打死。周恩来在其余随行人员掩护下弃车逃脱，步行返回延安南部的三十里铺。事出突然，中央社会情报部的陈赓、李克农很快查明，所谓的「土匪部队」，原来是曾经接受过高岗的陕北红军改编的李清伍部，为红二十六军甘泉县独立营，亲自指挥

此次伏击的即为独立营政委李清伍。而李清伍又是从潜伏于延安城内的坐探——冯长斗处接获周恩来一行的出行时间及路线的。于是问题就出来了：「毛、周之间的整日长谈及行期均是极端保密的，是谁把消息透给了冯长斗？究竟是什么人物安排了此次伏击？」

周恩来却指示他的两位当年上海地下党中央特科出身的老部属陈赓、李克农，立即派精锐部队将「土匪队伍」李清伍部消灭掉，坐探冯长斗也不要再审讯，立即杀掉，事情到此为止，不要再追查下去了。陈赓、李克农领会了老领导的意思，若还追查下去，很可能扯上陕北红军领袖高岗，而高岗又已经跟毛泽东同志称兄道弟，情同手足……。周恩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当天晚上，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替周恩来摆酒压惊，高岗也赶来作陪。第二天，周恩来又率领起补充好的人马，重新坐车奔赴西安，奔赴庐山。

另有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一日，周恩来率领一百多名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分乘三辆军用卡车，也是从延安出发，经洛川、西安、宝鸡、凤县，过秦岭，入四川，经过二十来天的长途跋涉，于五月三十一日抵达陪都重庆。此行为的充实、健全设立于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及中共南方局机构。

周恩来本是中共特科的创始人，心里自然明白，这批工作人员中，肯定有毛泽东的亲信耳目。因之在二十来天的行程里，路过西安附近时，他没有去参观汉高祖陵和汉武帝陵，路过咸阳也没有参观秦始皇陵；但穿越秦岭时，却专门去参观了西汉留侯张良庙，并对随行人员大讲张良辅助汉王刘邦打天下，统一全中国，功成身退的事迹。他说：「刘邦得天下，主要靠的萧何、张良、韩信三人。萧何是宰相，张良是军师，韩信是大将军。张良不是帅才，却是最优秀的军师，军师就是现在的参谋长。刘邦百战百败，却屡败屡起，靠的就是萧何为相，张良为军师，经营关中根据地，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人有人。项羽百战百胜，却经不起一败，一败就亡，原因就是没有萧何这样的宰相，张良这样的军师。有了也不肯重用，看不上，留不住，项羽为人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目空一切。」

周恩来接着说：「有一回，汉王刘邦被楚霸王项羽打败，连他父

亲和老婆都被项羽俘虏走了。刘邦一筹莫展。张良就给他分析局势，出主意：「九江王黥布是楚国猛将，但与项羽矛盾很深；猛将彭越正在梁地反楚；汉王你自己的将帅中只有韩信大将军可以独当一面，托付大事。如果你把潼关以东的地方作为赏地封赏给这三个人，楚国就可以被打败了。」刘邦采行了张良的谋略，收买了上述三人，共同反楚，立刻变战略被动为战略主动，变劣势为优势。项羽打了一百个胜仗，顶不住张良一个计谋。项羽只得求和，提出以「鸿沟」这条运河划定楚河汉界、平分天下。于是双方议定，各自休战退兵。汉王本想从此过上太平日子。张良又出主意：「下能退兵，这次若放走楚军，必然养虎为患。」刘邦又听了他的主意，撕毁协议，调动大军追击项羽，不给喘息机会。垓下一役，楚军被围，四面楚歌，刘邦把项羽彻底打败了。这就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刘邦夺得天下后，韩信功高震主被杀。只有留侯张良急流勇退，不做官，不领封地，而躲进秦岭来做神仙，保全了性命。」

随行人员都被周副主席渊博的历史知识迷住了。几天之后，周恩来一行路经成都时，周恩来又特意去参观了武侯祠，对随行人员大讲诸葛亮一生忠诚于刘备父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并背诵出诸葛亮的〈前出师表〉……。

应当说，除了周恩来确是从内心里崇敬着张良、诸葛亮这两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之外，也是有意识地向延安的毛泽东主席传回一个强烈的信息：「放心吧！我已自我定位，我不是帅才，只是一名辅佐人才，愿学张良、诸葛亮，辅佐你争天下，坐天下。」

周恩来正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进行「精神自我调节」，邓颖超发现周恩来今天情绪异常，正和几位工作人员守候在书房门口一筹莫展……因为周恩来立下过严格的规矩，凡是独自在书房内思考重大问题时，若不是毛主席传唤或国内外发生大事，其它任何人均不得干扰他。

幸而这时，周恩来夫妇的干女儿孙维世，穿戴得朴素大方，楚楚动人地进入了西花厅。邓颖超像见了救星似地将干女儿拉到一边去，放低声音说：「闺女，你都快把我们忘了吧？多少日子没见你人影儿

了？你爸爸都问起过好几次了。」

孙维世一见书房门紧闭，以及工作人员们的不安神色，就知道爸爸正把自己关在里头生闷气，这可是很少有过的呢。她伏在妈妈耳边说：「放心，我这就进去逗他开开心！」

说着，孙维世快步来到书房门前，嗒嗒嗒地敲着。周恩来在房内问了一声：「谁呀？」孙维世嗓音甜亮地答道：「是我啦，爸！想您啦，来看您，您闭门谢客呀？」

干女儿的娇声真灵，书房门开了，周恩来慈祥地笑着，站在门里，向干女儿伸出了双臂：「维维啊，你还会想我吗？多少天都见不到你的倩影啊！」

孙维世撒娇地一头扎进爸爸的怀抱里，没忘了腿朝后一踢，将房门掩上了。周恩来本欲引干女儿到沙发上坐下，好好说会儿话。但干女儿的两条柔软的长臂缠住了他，在他身上抚上抚下，他不得不说：「好了，好了，都这么大个闺女了，还这样疯，影响不好哪！」孙维世却娇嗔说：「我不怕！谁叫您是我爸爸？我亲热亲热爸爸还犯着党纪国法？我们华大话剧团^⑤的大姐们，都说您是美男子哪。」

两人亲昵了一会，手拉着手坐下来，周恩来才又面带忧虑地问：「听说你最近常去主席哪里？是吗？维维啊，你呀，就是不听话，蓝苹早就对你不高兴了。主席毕竟是她的老公嘛。大家还是和和气气，相安无事的为好。」

孙维世一听到蓝苹，就面含春威，气不打一处来似的：「主席成了谁的私人财产啦？别人就不能去见见啦？说到底，只是个三、四流的演员而已。何况，也是主席高兴我去见他，都是谈的戏剧的创作和演出问题。前两个月，她也一直在莫斯科动手术、养病。您知道她害的什么病？子宫长瘤子，把女人的那个器官全割掉了，您说她今后还能算个女人吗？主席还能喜欢她吗？味同嚼蜡，味同嚼蜡，这是主席亲口对我说的。」

周恩来的一双浓眉拧了拢来，低声喝道：「维维！你都胡说了些什么？这么尖酸刻薄？幸灾乐祸，趁人之危，很没有风度教养，说得

⑤即华北大学文艺部话剧团，为中央戏剧学院的前身。

难听点，是庸俗。你来看望我，也不问问我有什么烦心事，换个轻松愉快点的话题……都怪我，近两年太忙，对你关心得不够，你邓妈妈也总是顺着你，放松了对你的要求……。」

孙维世一见爸爸生气，疾言厉色，马上收敛了，乖乖女似地靠了上来：「爸！对不起，我这人一高兴，就爱瞎说……。也是您惯的嘛！也只是对您才这么瞎说的嘛。对了，刚才在门口见到妈妈和几位工作人员，说您在屋子里生闷气。爸！您是政府总理，还犯得着跟谁生气呀？谁哪么讨厌，来惹您生气呀？给他们批评，教育，再不行，给个处分走人，不就结了？」

周恩来望着干女儿，好气又好笑，真是长不大的丫头。他本想对干女儿诉说一番心事，话到嘴边，又忍住了。这丫头不比龚澎，龚澎内秀含蓄，任什么话跟她说了，她只装在肚里。知我者龚澎，疼我者龚澎啊，每回单独来汇报工作，都是眼睛水汪汪的，总有话欲言又止，欲言又止啊！维维这丫头却是个没嘴葫芦，心里藏不住事，还净爱惹是生非……。

他抚着干女儿的柔欲无骨的小手，还有那闭月羞花的面庞，身上却似乎再没有了当年在武汉、在延安、在西安、在重庆时的那股奔放的热力。也是太忙太累，每天只能睡个两、三个钟头，别的都顾不上了。他深深叹了口气，说：「维维，你若再去看望主席，方便的时候，你替我说几句客气话，总可以做到吧？但要趁他高兴的时候，尽量说得艺术些。不要让他以为你是在替我当说客，明白吗？」

孙维世仰起面庞，仿佛看到爸爸的眼睛发潮，心里一闪，马上品味出什么来了：一定又是主席说下难听的话来了，主席也是，一口湘潭土腔又亮又硬，还不爱刷牙，隔不远就闻到他的胃气，又爱跟人亲嘴，每回都要事先做好深呼吸……爸爸又总是礼让，从不回嘴辩解，总是回来家里关起房门生闷气，还叫做什么精神自我调节。

孙维世柔声说：「爸，放心，我会说话。我是学导演和表演艺术的，当然懂一些揣摩人物心理。正巧，今天主席值班室给我电话，通知今晚十点去春藕斋陪主席跳舞。每次跳舞间歇，主席都会拉舞伴进休息室谈谈话，问些情况什么的。主席不像您，可懂得享受生活了。」

自进城以来，周恩来即替自己立下规矩，尽量少去春藕斋跳舞。他一般都到北京饭店去跳舞，有时也在紫光阁组织舞会。春藕斋舞场是非多，他必须绕开走。且他不愿再见到文工团的女孩子们围着自己转，置毛主席于不顾。周恩来也不愿意听干女儿说起春藕斋舞场的那些事。望着干女儿，他忽然心里一阵凄凉：看来，维维是注定要陷进中海、南海之间万字廊下的藕池污泥里去了，你想拔她出来，她都不愿出来了。芙蓉品格，出污泥而不染，难罗。

周恩来沉默了一小会，望望手表，说：「维维，看，都快八点钟了。走，陪我吃晚饭，陪你邓妈妈喝一杯，看看有什么开胃的。晚上，我还要开两个小会，听一些汇报。你嘛，人面桃红相掩，正好去赶春藕斋的舞会啊！」

第二十三章 主席，我不是帅才

第二天下午，周恩来在西花厅后院小会议室召集中央办公厅的杨尚昆、主席办公室的胡乔木等人开会，商议十二月份主席率团访问苏联时的礼品礼单等，忽然接到毛泽东亲自打来的电话：「恩来呀，还在生我的气吗？你来我这里一下好不好？让我当面向你致歉啊！」

捧着话筒，周恩来明白这回是小维维帮上他的忙了，声音都有些微微发颤：「主席，我马上就来。你任何时候批评我，都是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马上就到。」

放下电话，周恩来立即布置杨尚昆、胡乔木等人：「你们先回去准备吧，可能还要随主席的专列带些大白菜、大葱、白萝卜、红萝卜等蔬菜去，主席的厨师也带去。莫斯科的冬天只有土豆和牛排，以及各种鱼子酱，主席肯定吃不惯的。」

杨尚昆、胡乔木等相陪着出了西花厅院门，周恩来摆摆手，就快步走到前头去了。他从来走路像小跑，又快又轻捷。以致每回换了警卫员，邓颖超都要交代一番，总理走路很快，你们要注意跟上，不然一下子就走丢了，找不着你们的警卫对象了。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的院子里迎着，一见周恩来，就伸过手去拉着：「恩来，我也给洛甫打过电话了，作了自我批评……。江西苏区时期的那些是是非非，已经作了历史结论，我是不该旧事重提，提之无益罗。」

两人进到毛泽东的宽大书房。书房四壁，从墙根到墙顶，全部摆满了书架，是为名副其实的书屋了。书，一大部分是从中南海北边的北京图书馆「借」来的，一小部分从延安辗转而来，还有一小部分是那些逃跑了的国民党达官贵人的府第抄没来的。大都为古籍善本，甚至是稀世珍宝。

坐下后，江青进来给总理上了茶，并问候了邓大姐，之后退下。毛泽东则拿出一张字条来给周恩来看，原来是主席的年轻秘书田家英写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昔子路人告之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

周恩来看过字条，感动地说：「主席身边能有这样好的年轻助手，

是主席的福气，也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表现啊！]

他们都注意回避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名字：孙维世。

毛泽东燃着烟，点点头：「我是喜欢田家英的。年轻，聪明，好学，又善于思考，文字能力也不错。更难得的，他敢于在我面前讲出他自己的看法，敢提反对意见，有较坚定的党性。若论对马列理论的熟悉，他当然不如陈伯达，陈伯达的毛病是缺乏某种坚定性。若论文字水平，他比胡乔木也要逊色些，但胡乔木书生一个，文章做得好，组织行政能力却差，跟蓝苹的关系也不融洽。比较起来，田家英是较为全面的了。我的五位大秘书，师哲已经放了政治局办公室主任，江青只管管生活杂物，陈伯达、胡乔木二位，我准备安排他们去中宣部兼个副部长，做做我的耳朵，便利工作。田家英嘛，还有一个汪东兴，跟了我这么些年，抓警卫服务工作，我想让他们都兼个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这事，我已经和少奇打了招呼，搞个任命书。恩来，你看怎样？」

周恩来说：「主席是当今的伯乐，知人善任，所以统帅全党全军全国。」

毛泽东说：「过誉了。恩来你不识人？不知人善任？你也是个帅才啊。」

周恩来赶忙晃手，一脸真诚地表白：「主席，我不是帅才，的确不是。历史已经证明，不是个统帅之才。学识、胆识、气魄都不够。每到历史的紧要关头，我缺乏力挽狂澜反潮流的大智大勇，而容易随大流……所以我只适于做参谋辅佐，以及办理具体事务。」

毛泽东有些惊讶地抬了抬眉头，边滋滋地吸着烟，说：「哦？你不是帅才？我还是头回听说罗。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你领导南昌起义，向国民党蒋介石打响了工农革命的第一枪，怎么不是力挽狂澜反潮流之举？一九三三年、三四年，在江西苏区，组织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以及二万五千里的前期，你都是事实上的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指挥者，怎么不是帅才啊？你那个帅才比我这个帅才，还要帅得早啊！」

周恩来心里暗暗发急，只好进而自我贬抑，辩解：「我那时指挥军队，胜仗打的少，败仗打的多。八一南昌起义，一万多人马拉到广

东汕头地区，本欲建立根据地，尚未立足，就被陈济棠的粤军包围、分割，溃不成军。幸而朱总、陈毅率领一部分人马避开包围，转战粤北、湘南，后来被你接上井冈山会师。而我和聂荣臻等，则于重围中将身边不多的人马化整为零，转入地下，自己再潜往香港，转回到上海地下党中央。所以说，八一南昌起义只留下了历史意义，军事上是失败了的。至于在江西中央苏区，我执行的是王明、秦邦宪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参与了排斥主席的正确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失败，最后被迫撤离江西苏区，进行长征。长征初期，也是一路打败仗。幸而到了贵州遵义会议上，洛甫、稼祥来劝说我，主张请你重新出来指挥红军，我们才在军事上、政治上一步步，一年年顺当了起来……，所以，历史确是一再证明，我周某人不是才。

我是会办事，有些行政组织能力。但我需要我的上面还有人来统领，做主心骨，自己才能在下面发挥一点才智。长征抵陕北后，党中央派我到西安，后又到武汉，后又长驻重庆，跟国民党打交道，搞统一战线，以及负责党的地下情报工作，我自己的位置就已经确定下来了。今天在党内做到第四把手的高位，已是党和人民对我的最大信任和勉励了。」

毛泽东眼睛眯缝起来了：「真是这样吗？看来，你是一番肺腑之言。到目前为止，我也只能相信一半。要是有人公开说，周总理不是帅才，不被群起而攻之，才怪呢……遵义会议，你，洛甫，稼祥三位，起了关键作用，结束秦邦宪、李德的瞎指挥，功不可没。我给洛甫打电话，就说了，我没想忘记他在遵义会议时的历史功绩。都是老同事、老朋友了，平日有点唇齿相磕的事，大家不要往心里去……。哦，对了，少奇说，你提议安排洛甫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出使苏联，我没有意见，是个适当的安排，正好也发挥了他的俄文专长。他本人同意了吗？不会感到委屈吧？」

看看这个少奇同志，明明是他自己提出的，却推到我这个政务院总理头上来，好在扯不上任人唯亲，周恩来也就没有多做解释了，而说：「是少奇通知我，主席已同意了对洛甫的工作安排之后，我才给他谈了。他很乐意赴任，时间当然是等主席从苏联访问回来之后。他

还说了，历史已证明他不是什么大才，在延安挂了十来年总书记的虚名，其实后来党内主要工作，都是主席提出大计方针，并领着少奇、弼时同志他们干的。

毛泽东继续眯缝着眼睛，看着周恩来，问：「你和洛甫都宣称自己不是帅才，那么，在党内，还有哪几位同志，算得上帅才？」

问题太过重大了，应当怎样回答？此时此刻，说出谁是帅才来，似乎都不太妙，今后前程堪虑……。周恩来微笑着，眼睛望着自己的膝头，他想改变话题。

但毛泽东却不放过，而追着问：「少奇同志算不算？」

既然回避不了，毛主席又明察秋毫，周恩来只好实话实说了：「少奇同志是主席亲自选定的，他的地位也已经是党的历史所确立了的。他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旗帜，为全党的统一、团结立下大功劳……。」

毛泽东插话说：「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最早的发明人是我的两个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他们首先提出时，叫做毛泽东主义。少奇同志接受了这个概念，并修正为毛泽东思想，几次到杨家岭中央党校演讲时使用出来，一下子就叫响了。我本人也觉得，毛泽东思想比毛泽东主义要顺口，响亮。起初几年，我信心不很足，说过多次不存在什么毛泽东主义，我们只奉行马列主义。但在少奇等人的带动下，全党也都叫顺了口，如今已习定成俗……你继续讲。」

周恩来说：「少奇同志是我们党优秀的理论家，组织活动家，水平高，原则性很强，人又厚道，对主席忠心耿耿。他外观素实，生活严谨，工作深入，是大智惹愚，才华装在了肚子里！」

毛泽东笑了：「他结婚五次，子女九名，比本人多出两次。他比他现在的夫人王光美年长二十四岁，还生活严谨，大智若愚？是大智惹愚，你说得很准。若还鸡蛋里面挑骨头，也可以算是表里不一喽！那么还有谁，在少奇之外，算得上帅才呢？」

周恩来心里麻麻，却跟着笑了。他决定不主动说出某人的名字来，而恭候毛主席提问。

果然，毛泽东又问了：「彭老总呢？我的老乡彭德怀怎样？算不

算得上帅才？」

周恩来又迟疑了一下，才说：「在主席这里，向主席汇报对干部的看法，不算自由主义吧？」

毛泽东点点头，鼓励说：「怎么是自由主义？我是一把手，不全面掌握党内干部的情况怎么行？也是集思广益嘛。何况，又是我问起你来的。放心，在我这里的谈话，许多是出不了这书房门的。我也经常告戒我身边的工作人员，要他们学会当聋子，充哑子，即便听到了什么，也是严禁外传的。」

周恩来说：「是的，这是工作纪律。我自江西苏区起，就很尊敬彭老总，吃得大苦，耐得大劳，作战勇猛，一身正气。在我们军队里，除了主席和总司令，就数他威望高，声望大了。战士们很爱他，干部们却都很怕他。他从来骂官不骂兵。他的不足之处是太爱骂人，骂得又凶。抗战时期在山西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他是副总司令，曾经把陈赓、罗瑞卿、杨成武、谢富治这些著名将领都骂得狗血喷头。不过事后他就忘了，对事不对人，从不往心里去。平常人缘不怎么好，一旦国家有难，他却是个最靠得住，肯打肯拼的。可以这样说吧，彭老总嘛，可以独当一面，独树一帜；统驭全军全局嘛，却还算不上。他是属于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可以共患难的。」

毛泽东有所感触地说：「老彭是个忠臣，猛张飞，也有人讲他的性格里有魏延式的反骨。我倒是还没有看得出。他喜欢骂人，全军有名。喉咙又大又粗，如同狮吼。他哪里只是骂过陈、罗、杨、谢？在太行山上，连刘伯承、林彪等人都被他吼过。延安撤退那次，连我，连你，也被他吼了，骂骂咧咧，说我不离开窑洞，就派担架来抬走！对了，陈毅怎样？算不算得一个帅才？」

见毛泽东问到陈毅，周恩来心里倒是轻松了些，说：「陈老总喜欢诗词，却是个粗人，坦率热情。江西苏区时期也执行过王明路线，反对过主席。他的好处是知错就改，光明磊落，干净彻底。而且能上能下，爱憎分明。帅才嘛，也是缺了点什么，说不清楚。」

毛泽东笑了：「太过坦率，爱憎分明，不行。帅才要胸有乾坤，喜怒不容于色，错了也要错到底！坚持错误到底，正确就会出来。这才

是帅才。」

周恩来不禁有些瞠目结舌。他伸手抹一把脸，仿佛抹去脸上的惊讶之色：「坚持错误到底，正确就会出来？这也是辩证法？这话，只有主席这种超凡卓绝的人才说得出来。」

毛泽东谈兴正浓，再又问：「还有比我们小一轮的高岗、林彪、邓小平三位，你也说说，他们谁是帅才？」

周恩来仿佛又见到了延安时期的那个热情爽朗而又风趣的领袖毛泽东了，自己可以无话不说了：「高岗同志是大才，全才，过去经营陕甘宁边区，现在领导东北人民政府，都很有政声、政绩，相信再经过些年月的磨练，政治上再成熟些，老练些，将来做主席的左右手，是很合适的；林彪同志的才华主要在军事上，战术上，他是我军的小诸葛啊，率领东北野战军，从黑龙江一路打到海南岛，解放战争的功绩，无人可以比拟。当然历史上嘛，他也有过种种不足……。」

毛泽东插进来说：「你是指他在江西苏区时期，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问红旗能够打多久？长征路上，遵义会议之后，他给中央军委拍电报，提出由彭德怀来指挥全军，反对我的作战方针；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他又反对中央红军东征山西、河北，而提出要带部队去陕南开辟根据地；解放战争打辽沈战役，他迟迟不攻锦州，不敢一举切断国军在关外的咽喉。为此，我给他发了六十七封电报……。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成大问题啊，好在四野政委罗荣桓贯彻我的指示，最后说服了他……。有过有功，功大于过，算九分功，一分过吧？好好，你继续讲，继续讲。」

周恩来说：「林彪同志性格孤僻，平日沉默寡言，很少与人交往。这大约是他负伤过多，身体太弱。今后一段时间，恐怕应以休养身体为主，不宜担负过重的党政工作。再者，他一直在军队里工作，几乎没有接触过地方党政方面的事务，作为一名领导人才，不能不是一个缺陷，将来需要补课；至于邓小平同志，主席比我更了解，他是个真正的帅才！无论政治、军事、党务、地方工作，他都拿得起、放得下。二野的老同志都说，司令员刘伯承是举轻若重，政委邓小平是举重若轻。这举重若轻是很难的，只有主席，还有小平做得到。我是做不到

的。我比较像刘伯承同志，是举轻若重，大事小事，都习惯于亲自抓，才放心。最近从西南局回来的人，说起邓小平作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第一把手，办公桌上从无隔夜公文，事情总是处理得又快又好又准。因为他只管大政方针，只管大事。他敢分权放权，许多事就让下边去做，绝不包办。他就是放得下心。所以，别的大区的一、二把手无不忙得焦头烂额，他却还有时间打牌。他爱打桥牌，年轻时候到法国勤工俭学时学会的。

看得出来，毛泽东很满意这次的谈话。毛泽东说：「曹孟德是青梅煮酒论英雄，我们今天是抽烟品茶论帅才。还有叶剑英、罗荣桓、徐向前、贺龙、聂荣臻他们呢？似乎又差着一级半级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谈笑到晚饭时间。毛泽东留下客人陪他吃红烧肉，长沙臭豆腐，喝绍兴状元红：「敝省省委特意从长沙火宫殿挑选了一名厨师，推荐到我的厨房里来传艺，做长沙特产臭豆腐和红焖猪蹄。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啊，也有辩证法罗……恩来，你说你不是帅才，这回我倒是有几分相信了。可你也很能识人，对我们的同事、老朋友，看得准，好眼力啊！当然，在你我去见马克思之前，大约是轮不到他们之中的某一位来挂帅罗。至于你我百年之后，谁来挂印，就要看他们的运气和本领了。我们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主义，不是过去现在未来佛嘛，哈哈……。」

毛泽东一阵大笑。周恩来也陪着大笑：心里却隐隐有些吃惊。看来毛主席并没有把少奇同志当作自己的权力接班人，起码他还需要观察，需要考验。

第二十四章 千里谋杀毛泽东——出访失态

十月九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九日，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获补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此时的周恩来，除了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外交部的繁褥事务，还兼管着两件要务：一是为十二月上旬毛泽东一行访问苏联做各种准备，二是指挥中央社会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等全力侦破潜伏于北京城里的美蒋特务组织及其秘密电台。

为毛泽东出访而从各地调运来京集中的生活用品及礼物将包括：山东大黄芽白菜五千斤、大萝卜五千斤、大葱五千斤、大鸭梨五千斤；江西南丰蜜桔一千斤；湖南冬笋五百斤、湖南腊肉两百斤，以及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器一箱、湖南湘绣被面三十条、湘绣枕套六十个、浙江特级龙井茶三百听、上海大中华香烟五百听、贵州茅台酒二百瓶、浙江绍兴花雕酒一百瓶等等。以上物资礼品，都将装入专列，与毛泽东主席一行同行。

十二月六日深夜，毛泽东、陈伯达、师哲、杨奇清一行悄悄离开中南海丰泽园，至西直门火车站，登上即将开赴苏联的九〇〇二次专列。离开丰泽园之前，毛泽东特意找来负责此行安全保卫工作的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询问：「国民党的地下电台在哪里？你们还没有搞落实？究竟是些什么人物，如此神通广大？」杨奇清举手行礼：「报告主席，基本上落实了，跟十月一日图谋炮击天安门城楼的特务组织是一伙。李克农部长说，这次会来个干净彻底，把敌特一网打尽，说不定我们到达莫斯科之后，就会听到好消息的。」

杨奇清奉周恩来的指示，并没有把案情细节报告给毛泽东主席。尽管毛泽东为周、刘对他隐瞒「十月一日炮击天安门城楼阴谋案」一事发过火，严责过他们。然而这回，是国民党情报机关正通过其北京城内的潜伏组织，策划着趁毛泽东出访之机，把毛泽东谋杀在半道上。周恩来、刘少奇则代表党中央，对毛泽东此行的安全警卫工作，做了万全的准备：一是派出铁道部长滕代远，公安部长罗瑞卿，搭乘专列护送毛主席至满洲里；二是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到黑龙江省满洲里边

境火车站，专列经过的时段，沿途每一华里派驻一名解放军士兵站岗值勤，每十华里派驻一支巡逻小队；三是专列行驶区间，沿途一切车辆停驶，铁路、公路道口一律关闭；四是专列火车上配备两个加强连的精锐兵力，一旦途中出现突袭事件，可独立作战半小时至一小时，以待大部队增援；五是专列上配备铁甲车厢一节，供紧急情况发生时主席避弹。

由于属秘密出访，到西直门站送行的只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聂荣臻、李克农、彭真等少数领导人，不发表任何新闻消息。

毛泽东的专列火车分为前卫车、主列车、后卫车三部分，前卫车由五个车皮组成，装载着五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几十名铁道抢修工人；中间的主列车由十节车厢组成，前面的几节车厢载着一个加强连的部队，之后才分别为毛泽东的书房、小会议室、卧室以及其它成员的卧室，还有餐车、医务车、通讯车、行李车等；后卫车亦由五个车皮组成，装载着五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以及毛泽东主席给史达林贺寿的礼品、代表团自己食用的蔬菜水果等。

专列经过山海关时，天已大亮，毛泽东下车走了走：天下第一关啊，孟姜女哭倒长城，离这里不远；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在这里放清兵入关，满人入主中原，统治全国两百六十七年罗！由于天气奇寒，罗瑞卿、滕代远赶快跑来劝主席上车。

专列经过沈阳时，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上车拜望毛主席。因为都了解毛、高二人的亲密关系，其它人均自觉回避，好让他们单独叙谈。毛泽东亲昵地称高岗为「东北王」：东北称王，你比张作霖父子既神气又有运气罗。高岗连说不敢，东北永远做主席的战略大后方。并说：「主席若在北京有事，我立即挥师入关，收拾他王八蛋！」毛泽东笑说：「现在党中央很团结，你怎么火气总是旺得很？」高岗说：「我是主席的保镖，职责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毛泽东说：「那好，有你镇守东北，我在北京就吃得香，睡得安了。」两人相谈一小时，甚欢。高岗提出要护送主席到满洲里。毛泽东没有答应：你还是坐镇沈阳指挥吧，由滕代远、罗瑞卿二位陪我到满洲里，把我交给苏联老大哥，你就放心吧。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一行的专列抵达「国门」满洲里。由于中国铁路为欧美制，路轨比苏联的窄，因此毛泽东一行人要换乘苏联政府等候在这里的豪华专列。苏式专列宽敞、豪华、舒适，暖气烧得很足，并配备有盆浴与淋浴设施。苏方派来一名外交部副部长作迎宾特使，在满洲里火车站苏联一侧铺有红地毯，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至此，滕代远、罗瑞卿等完成了护送任务，告辞毛泽东，率中央警卫部队返回北京。毛泽东一行则须穿越西伯利亚大雪原，穿越欧亚大陆分界线的乌拉尔山脉，一星期后才能抵达莫斯科。

就在十二月六日深夜，毛泽东一行秘密离开中南海丰泽园不久，潜伏于天安门城楼东南池子大街一座古色古香四合院内的国民党地下电台台长计兆祥，即发报给台北中央保密局机要值班室：「贼乘火车今夜出行，估计三天两夜后抵满洲里。入俄境后，其安全归俄方负责。若有行动，以贼返回时为宜。」

说是七日清晨，在台北国民党中央保密局局长官邸，毛人凤局座正与美方顾问布莱德上校共进早餐，机要秘书送上一封来自中共首都北平的绝密电文。毛人凤阅后，喜形于色，将电文递给美方顾问。布莱德上校懂中文，盯着电报差点高兴得大叫。但这名资深的美国远东战略特工平静地、居高临下地说：「这是你们干掉毛泽东的最好时机。你们不是有句古语，叫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们要立刻选派最优秀的行动人员去东北地区执行原订任务。这很重要。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北韓正在结集大量兵力，使用苏联红军的武器装备，准备随时侵占南韩。我们当然不能坐视南韩成为共产党天下，威胁到日本和我们在远东地区的生命线。南北韩之战已无可避免。毛泽东选在此时访问俄国，跟史达林见面，中俄联手介入南北韩局势，肯定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这对南韩、台湾都是极大的危险。你们过去在正面战场上虽然失败了，但今后在情报活动方面可以给我们共同的敌人以意想不到的打击。我们曾经成功地以情报活动的方式更换过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物。这次，我们希望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之前或是之后，看到你们的成功。」

毛人凤对这个美国顾问大爷很不以为然，什么玩艺？区区一个大

鼻头上校，竟对他一位国军二级上将指手划脚，不成体统。但他还是向布莱德上校通报了自己的具体计划：「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之前动手，时间上显然是来不及了。我们只能选在毛泽东返回，途经东北地区时下手。按原方案，派赴东北的人员以空投方式到达目的地。我们的东北地下技术纵队将采用三套作战方案，一是在哈尔滨火车站内埋设定炸弹，炸毁毛泽东的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二是破坏长春郊外第十四号桥梁，让毛的专列跌下几十米深的河谷里去；三是若上述二项方案均未成功，则组成突袭兵力，在吉林省境内从铁路两翼包抄围歼毛的专列，务求将其击毙。总之，毛泽东此行逃不出我们的手心！」

布莱德上校听后，竖起了大拇指：「好，很好！有毛局长用兵如神，你手下的人马这次一定会取得成功！」

毛人凤当即按铃唤来机要秘书，口述命令：「电告计兆祥，通知XX国驻苏办事处协助侦察毛泽东在俄活动及回国的时间、路线；命令计兆祥即日起，每日定时报告情况；嘉奖计兆祥二千美金，并由国军中校台长晋升为上校台长。」

旋即，机要秘书将整理打印好的命令文书呈交毛人凤局长签字生效。

毛起座转而对布莱德上校说：「这回共产党的李克农们大约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们中南海不远，大小官员集中的南池子，有我们的潜伏电台，正在大展拳脚，大显神威。」

布莱德上校说：「这我相信。仅就技术装备方面而言，共产党早就不是你们的对手。」

毛泽东所乘坐的专列火车在西伯利亚大雪原上整整奔驰了五天，才穿过了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的分界岭——乌拉尔山脉。专列抵达雅罗夫斯基车站时，专程从莫斯科赶来迎接的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登上专列，陪同毛泽东走完最后半天的路程。这里距莫斯科还有两百公里。

王稼祥和毛泽东是江西中央苏区时期的老战友了。王稼祥，安徽泾县人，一九〇六年生。一九二五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

〇年回国，为王明赐封的「中共二十八个半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属于毛泽东所深恶痛绝的「国际派」。在江西中央苏区，曾任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失败，被迫长征，一路打败仗。红军主力部队进入湘南、强渡湘江一役，兵员从十来万人一下子锐减到三万来人。红军高级将领们对秦邦宪、周恩来、李德组成的军事三人团的指挥，日益不满。倒是被撤销了军事职务的毛泽东无官一身轻，他跟中央书记张闻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各坐一副担架，由士兵们轮流抬着行军，走在了一起。在担架上，毛泽东日夜与张、王二人交谈，终于说服了他们，并取得一致意见，促成了抵达贵州遵义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改组领导班子，撤销了秦邦宪在党内负总责的地位，以张闻天代之；撤销以秦邦宪、周恩来、李德组成的军事三人团，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军事指挥三人团。毛泽东被补选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则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又由于毛泽东在战略战术上确有主见、决断，新三人团本以周恩来居首，逐步过渡到毛泽东说了算，周、王二人辅佐之。因之，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三人，实为毛泽东取得中共军事最高指挥权的关键人物。红军长征抵陕北后不久，国共两党联合抗战，王稼祥被派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将原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换回国内。康生到延安即背叛王明，投靠毛泽东。一九三八年九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延安汇报工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局指示：中共领导机关今后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应当说，此为王稼祥被派驻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执行局全力推荐毛泽东的结果，从而奠定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名份与地位。王稼祥虽然年龄上比毛泽东小了十三岁，政治上却实在是毛泽东的恩友。一九四〇年后，由于王稼祥质疑刘少奇等人提出的「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之类的名词，而逐渐被毛泽东疏远。一九四三年五月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局宣布解散，王稼祥被改派任为中共驻苏联代表。一九四七年回国，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已被排斥于中共中央决策层之外。新中国成立前夕，王稼祥又被派回莫斯科，出任首届驻苏大使。

在前往莫斯科的专列上，毛泽东和王稼祥老友相聚，谈话却不十分融洽。毛泽东吸着烟，颇有牢骚地说：记得史达林同志六十岁生日时，我们还在延安窑洞里，我们党还不怎么强大，人家也看不起我们。当时我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史达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莫斯科的报纸也不肯转载。他们还怀疑我是什么民族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后，苏方又背着我们，跟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同盟友好条约。一九四六年冬季国共重开内战，起初他们采取中间路线，对我们毫无信心，而对蒋介石的「三个月内打败共产党」有信心。到了一九四八年夏季，我们已经转入战略反攻，史达林还给发来指示，让我们打到长江北岸为止，实行南北分治，长江以南归国民党统治。史达林同志真是实行分治的高手啊，在德国搞了东德、西德，在朝鲜搞了北朝鲜、南朝鲜，在中国竟要搞北中国、南中国！据说他还设想要搞北越南、南越南，东马来、西马来。亏他想得出来！我们中国党没有理会他的一套，我和朱总司令立即发布进军口号：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本来一九四八年我就提出到莫斯科来，跟史达林同志会面，交换彼此的想法，消除一些猜忌、误解。但史达林同志回话说，中国内仗正处于关键时刻，毛不宜离开，由他们先派人来。一九四九年二月他派了米高扬来西柏坡村，我、朱总、少奇、恩来跟米高扬谈了整整一星期，详谈我们的建国计划，外交方针。可是四月二十三日，我人民解放军部队打过长江，占领了南京，那个苏联驻南京的大使馆，竟然还奉命随国民党逃亡政府到了广州！奉陪到底，多么讲义气啊！你说他们糊涂不糊涂，像话不像话？今年七月，我们派少奇同志秘密访问莫斯科，和史达林举行了四次会谈，双方关系才算走上正轨。……没想到罗，没想到他七十岁生日时，我们已经建立起全国政权，我是代表新中国来替他贺寿罗！这叫做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啊！

王稼祥作为中共的首席苏联问题专家，驻苏大使，耐心恭听着毛泽东的一番诉说：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天啊，就快要到莫斯科了，作为中国党、政、军最高领袖第一次到访，怎样都结记着这么一本老帐，带着这么一股子情绪？」王稼祥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

也是从尚未立稳脚跟的新中国的外交利益出发，不能不提出自己的规劝：「是啊，正如主席曾经说过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从一九二〇年三月，共产国际为帮助中国革命，派出第一位使者魏金斯基来华，协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成立我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到一九二一年我们党宣告成立以来，苏联党和政府一直在为我们训练干部，提供经费和武器，向我们派出各类顾问，把我们的革命当作他们自己的事业来做，已经整整三十年过去了。可以说，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从来都是外国侵犯我们，欺凌我们，瓜分我们，唯有苏联是个例外，真心实意的帮助了我们。如果没有苏联长时期的无私援助，我们的革命不可能这样快就取得全国胜利，我们党也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和地位……。一个最近的例子是东北战场，如果不是苏联红军把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坦克、大炮、枪枝弹药全部移交给我们，林彪、罗荣桓同志绝无可能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在没有后勤生产基地提供装备供应的情况下，武装起百万大军，打败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精锐部队的……不说这些了，我记得主席在庆祝史达林六十诞辰的那篇文章里这样写道：「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嚶其鸣声，求其友声。」我们正处在这种时候。是史达林同志和他领导的苏联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局，对中国党和革命从理论指导到人力物力的无私援助……。」主席，你的文章我读过多遍，至今还背得出来呢！」

两人的谈话，真是南辕北辙，格格不入，甚至针锋相对。使毛泽东哭笑不得的，是王稼祥竟然引用了他本人的话来反驳他，规劝他。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毛泽东成了卖矛又卖盾。王稼祥这人也太过聪明，太过亲苏了吧？

此后的路程，除了王稼祥不时向毛泽东主席介绍些苏联的地理、人口、民族、历史、军事、政治、经济、物产资源、工农业生产以及文化艺术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很少开口，只是点着头，专注地听着。

十二月十六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驶入莫斯科火车站，迎接他的是零下三十几度的奇寒。车站月台上，恭候着他的是苏联部长会议副

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以及外交部、外贸部的部级官员。连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国防部长，还有史达林的接班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林可夫都没有出现。这也符合欢迎新中国元首的礼仪吗？

由于毛泽东有言在先，不住克里姆林宫，不用苏方提供餐饮服务，代表团被安置到莫斯科郊外姐妹河史达林的私人别墅里，过小集体生活。

安顿下来之后，莫洛托夫眼王稼祥大使乌里哇啦说了好一阵俄文。王稼祥译成中文说：莫洛托夫同志请毛主席好好休息，睡一觉，坐了十来天的火车，一路上一定很辛苦了。下午六时整，史达林同志约毛主席在克里姆林宫会面。

毛泽东表面上不说什么，心里却不是滋味。自己万里迢迢来访，主人不来拜望客人，反要客人去拜望主人？今后我们一定不搞他们这一套大国主义作风。只要有兄弟国家的元首到访，我一定率同朱德、少奇、恩来等去机场迎接，一定要表现出我新中国的待客之道，我中华民族乃诗书之族，礼仪之邦。

毛泽东头脑清晰，看来史达林是有意要先冷淡一下自己了。直到自己来苏联前夕，据说史达林仍在担忧共产党新中国会不会是另一个「南斯拉夫」，毛泽东会不会是东方的「铁托」。史达林甚至忧虑新中国的领导人可能选择一条中间偏西方的外交路线。他手头有一份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报告。

毛泽东此次到访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清除史达林同志心里的这个疑团，向苏共表明新中国愿意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做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新中国的外交路线是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下午五时二十分，史达林派自己的卫队队长前来迎接毛泽东去克里姆林宫。毛泽东穿戴整齐，只带了驻苏大使王稼祥和自己的顾问兼翻译师哲两人上车。

克里姆林宫由一座座金碧辉煌的教堂和宫殿组成，庄严、壮丽而神秘。车队顺着伊万大帝钟楼的右首，从斯帕斯门驶入，经过一座很大的圆型花坛，前方是气派非凡的大理石游廊，游廊的顶部，绘有罗

曼诺夫王朝历代皇帝的画像。一道护城河与红墙环护着这座十二世纪修建的帝俄皇宫。

十月革命成功后，这里成为苏联的党政首脑机关。这点倒是跟北京中南海的历史与现状十分相似，不同的只是建筑风格，克里姆林宫是一座城堡，中南海是一座风光绮丽的皇家园林。

毛泽东、王稼祥、师哲三人被送进史达林的会客厅里。会客厅高阔华美，大理石墙壁光可鉴人。毛泽东原以为史达林起码会率领他的助手们在大厅门口迎接。大厅里却只有他们三位客人，显得冷清孤零。毛泽东不禁生出一种莫名的失落感。他看了看墙上的大挂钟：五点五十七分，原来早到了三分钟。他恼火地看了王稼祥一眼，仿佛在说：「看看，你这大使都替我做了些什么安排！我是一个属国的郡主、番王？前来等候晋见伟大无边、万寿无强的新沙皇？！」

好在这时，史达林的女秘书在一名翻译的陪同下走了出来，她请毛主席、王大使和师哲同志到她的值班室去稍候，并说明史达林同志是十分守时的，她立即就进去报告。毛、王、师三人只好跟着女秘书走向客厅尽头，去到一间不很宽大的值班室。毛泽东更为窝火了，差点骂出来：「老子今天是来走麦城了。」

当大挂钟「当当当」响过六下，里间的大门开了，女秘书立在门口招手。毛泽东领着王稼祥、师哲大步走进了史达林的办公室。但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已经站成一排，鼓掌欢迎中国贵宾。史达林站在最前面，向毛泽东伸出了他巨人的双手。史达林边握手边端详着毛泽东，说：好！好！太好了，真想不到你这样年轻，这样健壮，我见过的东方人很少有你这样高大的呢！

史达林比毛泽东年长十三岁。握手之后，他向客人一一介绍了他的政治局成员们：马林可夫、莫洛托夫、贝利亚、布尔加宁、米高扬、赫鲁晓夫、维辛斯基……。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

史达林率政治局成员们在会谈桌的一方坐下，毛泽东则率王稼祥、师哲在另一方坐下。桌的中央摆有各种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和伏特加酒，以及各类水果、面包、鱼子酱、切成薄片的熏肉等等。史达林虽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但表现出来由衷的喜悦，就像一位衰老的长者

见到了年轻有为的晚辈一样。他望着毛泽东，直夸赞：「伟大，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真诚地祝你身体健康！」

毛泽东没想到史达林会这样喜爱他、夸赞他。一股暖流流通了他周身。他忽然心头一热，像个饱受委屈的晚辈，终于见到了慈祥而有力量的长辈那样，眼睛都红了，说：「史达林同志，我可是个在我们党内长期受打击、受迫害、受排挤的人喔，有话无处说，有苦无处诉……。」

王稼祥吓了一跳，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主席头一回跟史达林见面，竟会说出这样一番话。这既不符合外交礼仪，也有损中国党和政府的颜面，不成了老子和儿子的关系了？诉委屈诉到莫斯科来了，诉到兄弟党的领袖们面前来了。便是师哲也毫无思想准备，一时张口结舌，不知道怎样翻译，该不该翻译。场面哑了一会，还是由坐在史达林身后的苏联汉学家费德林教授翻译过去了。

史达林一时深受感动似的，问：「毛泽东同志，能不能告诉我，在你们党内，都是哪些人打击、排斥过你？他们采用的是何种方式？」

毛泽东侧过身子，指着身边的王稼祥大使说：「就是他！他们国际派，从陈独秀，到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

「不不不！」史达林没有等翻译把话译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捏着烟斗的手习惯而威严地晃了晃，之后笑着说：「毛泽东同志，过去的事已经成了历史，就让他过去吧。首先要向你表示歉意的应当是我，由于我对中国了解得不够，对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对中国党的领导人的情况，了解得不够全面，以致我们之间产生过一些误解……。今天，你作为中国领袖、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来到了莫斯科，你已经是一位胜利者。胜利者应该宽容和高姿态。我们谁也不用去谴责一位失败者。来来来，我们大家一起，为胜利者干一杯！」

史达林虽然被西方舆论称为红色屠夫，经常引用他的一句名言「死一个人是一个悲剧，死一百万人只是一个统计数字」来印证他是一位暴君；但他却也的确不愧为列宁之后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他的这番幽默的谈话，既有自我批评，又有对「胜利者」

的批评。在场的苏联领导人都笑了起来，频频向客人举杯。毛泽东也举起了手里的酒杯，跟着笑了。

只有王稼祥大使一人笑不出来。

第二十五章 千里谋杀毛泽东——秘戏孙维世

十二月二十一日，为史达林七十诞辰。毛泽东率陈伯达、王稼祥、师哲等人，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领袖们一起，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祝寿盛典。

之后，毛泽东与史达林及苏共政治局委员们会谈两次，皆不得要领。

史达林问毛泽东这次到访莫斯科，有什么具体的打算或要求没有？毛泽东说，想和苏联领导人共同搞一个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师哲很吃力地把毛泽东的话翻译过去，史达林和他的同事们仍然不懂，毛泽东的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是什么？毛泽东说，就是签订一个协定，这个协定好比席上的一道菜，摆在上面好看，叉起来放进嘴里又好吃。师哲这才算是听懂了，翻译过去说，我们毛主席提议两党两国共同签订一个条约，好看，指的这个条约是给全世界、主要又是给西方帝国主义看的，中苏两国亲如兄弟，团结一致；好吃，是指这个条约不是空泛的，要有具体内容，如在互助互利、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向新中国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帮助新中国进行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毛泽东又补充说：还应当包括归还中长铁路主权、苏联租用大连和旅顺港口的期限等内容。

苏联老大哥总算明白了中国小老弟的要求，原来是要面子，要主权也要实惠。史达林倒是一门心事地要笼络住这个东方的红色巨人，而显得慷慨大方，表示愿意尊重中方意愿，可以考虑归还东北中长铁路主权，大连和旅顺口海军基地的租用也可以定出期限。

双方在讨论经济技术援助时，史达林问毛泽东：「中国目前有无经济建设计划？国防、重工业、农业、水利、电力、交通、采矿，准备上哪些项目？都是多大的规模？需要哪些方面的技术专家？需要多少资金？多少机器设备？」

天啊！毛泽东哪里想到过这些具体的经济问题？他满脑子装的是战争问题和权力掌控大计，以及中国古代帝制文化经典，对经济建设考虑得少而又少。对于史达林提出的问题，他一筹莫展，一问三不知。

面对着一位会谈对手，史达林倒是很有风度，说：「毛泽东同志，我知道你是优秀的军事家，政治家，刚刚取得政权，还来不及熟悉经济事务。但你的代表团里，总该有你们的经济专家吧？」

毛泽东摇摇头，很坦然地说：「我带来的是几名我们党内的哲学家，比如我身边的这位陈伯达同志。我想跟你们讨论几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

史达林晃了晃手里的烟斗，不无惊讶地问：「来讨论哲学问题？可就弄不出你的那个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来罗。不过，我的翻译费德林同志，还有我们外交部的尤金同志，罗高寿同志，都是不错的哲学家，他们可以陪你讨论。经济援助问题，我看还是等你们的周恩来总理来了再谈。米高扬同志告诉我，你们的刘少奇、周恩来，懂经济，懂国家管理、国家建设。周恩来是难得的总理人才。」

史达林不懂新中国的政体，他以为中国的总理相当于他这个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其实周恩来只是一名中央人民政府属下的政务院总理，在中央人民政府里，他只是一名政府委员，他的头上还压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六位副主席。毛泽东在中国政府里的职位才是相当于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这是毛泽东煞费心机才弄出来的一套独特政体。

尽管双方又握手又敬酒又拥抱的，两次会谈却都有些不欢而散。史达林认为毛泽东是个经济草包。毛泽东则认为史达林越俎代庖，竟然事先不征求他毛泽东的意见，就直接提出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参加会谈，也太自作主张，不尊重人了。别忘了，周恩来是中共干部，归我毛泽东调遣哪。

还有一件使毛泽东大感不悦的事，是史达林亲手交给毛泽东一只大信封，内装一份以俄文书写的关于中共党内领导层政治思想倾向的分析报告。史达林说：「这份东西留在我这里没有什么用处，还是交给你去看看吧。」回到姐妹河别墅，师哲将那份报告译成中文，毛泽东一看，气得脸都发青，立刻告诉师哲，这件事暂时到此为止，不准外传！原来是苏联派往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门的高级专家柯瓦廖夫写给史达林的汇报信，对中共中央领导人逐一进行了评价、分析，其中

谈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李维汉等人，都不同程度的接受过西方文化的教育，有的人还到英、法、德等国留过学，今后有可能出现亲西方倾向……。」毛泽东抖着一迭译稿，恨恨地说：「家贼难防罗！东北局里头，肯定有人向人家提供了这类东西，告洋状，卖身求荣，投靠老大哥啊！」

史达林没有再找毛泽东会谈，也没有会见。他在等待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到来。

毛泽东住在莫斯科郊外姐妹河别墅里，每天除了冒着酷寒外出赏雪，大部分时间就是在他宽大的主卧室里读书，以及处理国内发来的电文。史达林特意派人送来一部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手稿》，毛泽东并不太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王稼祥从大使馆带来的一批已译成中文的俄国历史地理书籍，包括亚历山大、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等等。他的阅读量大，速度快，记忆力惊人。还有就是观看一堆反映俄国十月革命及卫国战争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别墅里有小型电影放映室，原为史达林同志所设。

其间，还是陈伯达提醒，毛泽东才派自己的卫士长汪东兴代表他，去探望了一次在莫斯科结核疗养院治病的任弼时。毛泽东确是忘记了他的这位与他共艰苦患难，一起打下江山的湖南老乡、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了。

苏方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敬重与关怀，从克里姆林宫派来两位年轻漂亮的女护士，专职照料毛主席的起居。中方几次婉言辞谢，苏方都不予撤回，只是一再说明，女护士是史达林同志亲自挑选，很健康，主要的兄弟党领袖到莫斯科做客，都有这项服务安排的。

毛泽东开初也有些不太习惯，但也没有表示反感，毕竟接触过的洋娃娃不多。女护士金发碧眼，面目秀丽，皮肤洁白，身材修长，见了毛泽东就笑出脸蛋上的酒窝，百般娇媚。跟国内女子不同的是，人家高鼻梁，深眼窝，长睫毛，阔嘴巴，长腿，另是一番美。虽然语言不通，但动作轻柔，步态婀娜，服务细心而周到。自一九四五年「七大」之后，毛泽东已经习惯了每天由卫士扶他起床，按摩身体，擦澡，穿衣裤，穿鞋袜。现在史达林同志派来两位女护士轮流值日，毛泽东

带来的随身卫士倒插不上手了，不听传唤，又任何人都不敢擅自进入他的卧室。多数时候，是毛泽东亲自来到代表团工作人员的房间，发出指示，或是聊天。一次，毛泽东说：「你们大都是年轻小伙，一定要遵守纪律，苏联的女孩子对中国同志又大方又热情，又很漂亮很开放，我们千万不要在这里出问题，犯错误，要提高警惕性。」

其时，代表团有一个临时党支部，成员们最担心的正是毛主席本人。两名那么娇嫩的女护士每天轮番着伺候他起床，擦身子，穿衣裤，一弄就是两个小时，谁也不敢进他的房间去。倒不是担心老大哥方面会对毛主席施什么美人计，也不是说伟大领袖就碰不得洋妞，而是害怕毛主席染病，回去无法向党中央负责，作交代！此时此刻，向中央提出让江青赶来陪伴主席吧，江青又正在北京养病，做的又是那种妇科摘除手术，来了又有何用？主席本人也不会同意的。

幸而不久，孙维世随中国青年艺术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并访问保加利亚、东德之后，来到了莫斯科。孙维世和艺术团团团长萧华将军前来看望毛主席。毛主席搂住了小维维，说没想到在莫斯科见面，稀客，稀客哩。师哲就以孙维世俄语流畅，代表团需要翻译为名，把小维维留下了。萧华将军走后，代表团党支部当然不便出面，而由工作人员找孙维世聊天，谈心：「小孙啊，现在主席每天由克里姆林宫来的两名小护士照料着，我们又打发不走，怎么办？你知道，苏联的女孩子在这方面都比较开放、随便，人家也是出于一番好意。可就是担心主席可能染病啊，回去没法子向中央交代啊！」孙维世虽然被称作小维维，但已经二十八岁，她是何等聪明，心有灵犀一点就通，又是极为热爱主席、富于组织观念和民族观念的，想了想，便胸脯一挺：「要是大家不乱议论，主席就由我来照顾好了！我来用俄语通知她们，我是中方派定的翻译兼护士，今后照顾毛主席的起居，是我的责任，她们的责任只是医药方面和打扫卫生。」

这样，孙维世于每天中午进入到毛泽东主席的卧室照顾起他的起居来了。还兼上了主席的俄语教员。再过了些天，小孙干脆搬了进去，全天候地陪同毛主席。从一九三八年延安相识相倾慕，一十二年的漫长岁月过去，终于龙飞凤舞，如愿以偿。怎么着，总比被洋妞勾引了

去来得卫生、安全。再说不知为什么，孙维世一直忌恨着江青，正跟江青一直忌恨着她一样。她要报复江青，耍弄江青，凭什么由你一个上海滩鬼混出来的女人占有咱毛主席？咱现在也是一种占有。毛主席的感情已经表露得很清楚，他贪恋自己，讨嫌蓝苹，他打算回到北京后，就去克服阻力，跟蓝苹脱离。

有了孙维世陪伴，毛泽东主席兴致好了许多，一天到晚有讲有笑，不发脾气，吃得香，睡得甜。也是天赐良缘，阴差阳错，竟然跑到老大哥的首都莫斯科来游龙戏凤，暂结连理。真是一部现代浪漫传奇。

北京。南池子大街。古色古香的四合院。

李克农的中共中央社会情报部即将一分为三：分别组成中共中央调查部、中央人民政府内政部、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这是李克农领着中央社会情报部的人马完成最后一次侦破任务，之后他将去政务院外交部任副部长，专职国际情报工作。对于美蒋特务的潜伏电台，社会情报部特别行动科的人马的侦测手段，也太落后太原始了，起初两个月，只是分别扮成老头、老太、大婶、大爷、街头二流子，去各处蹲墙根，晒太阳。北京胡同里的居民每逢冬天，就有裹着大棉袄蹲在墙根晒太阳的癖好。当然，特别行动科的高手们，晒太阳是假，屏声静气地听动静是真的。他们恨不得人人都浑身长出耳朵来，以便捕捉到某座四合院内发出那微弱的电台发报的「嘟嘟」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早就给李克农下了限期破案命令。

但要在诺大一座北京城，两百多万居民，上万栋四合院，去捕捉到那个微弱的信号，真如大海里捞针。而且敌人的潜伏电台，又往往就隐藏在革命机关内部，大家平日见面都客客气气，笑笑微微，科长、处长、局长的，各忙各的公务，谁又料得到谁，到了门窗紧闭夜深人静之时，禁卫森严之中，蒙在被窝里操作起一部神鬼不测之物呢？

直到十二月上旬，毛泽东主席启程出访苏联前夕，李克农的社会情报部才得到了苏联老大哥内务部的宝贵技术援助：五部手提式电子侦测器。

老大哥的仪器笨是笨了点，可还算灵敏。李克农的老部下曹处长终于侦测出来，电波讯号出自南池子大街一座四合院的南墙内，并很

快弄清了那屋子的主人。

李克农领着曹处长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后院书房里，关上房门，向周恩来汇报案情。周恩来高兴地说：「老大哥的技术援助立竿见影了吧！南池子离天安门、中南海都很近啊，这回是敌人学了孙悟空，钻进我们的心脏地带来了，是个什么人物？」

李克农让曹处长向周总理报告：「那家伙姓计，叫计兆祥，天津人，一九四二年上大学时混入地下党，四三年加入八路军游击队，立过功，目前是首都卫戍区后勤部特供处的一名科长，持有中南海的丙级通行证。现在看来，他是一名国民党的战略特工，他的线放得很长很远。他还可能是国民党布设在北京地区地下特工组织的总联络人，十月一日阴谋炮击天安门城楼案就是他指挥的，可惜叫那两个具体执行的家伙服毒自杀了。」

周恩来平静地听着汇报，尽管汇报的内容十足的惊心动魄。待曹处长汇报完毕，周恩来才问：「克农，你认识这个姓计的吗？」

李克农回答：「认识，我平日喊他小计。没想到这家伙表现上老实实，工作勤勤勉勉，生活上也很朴素，却是一名战略特工。真是不叫的狗咬人哩。」

周恩来说：「克农啊，事实证明，我们进了北京，进了中南海，决不可以高枕无忧，掉以轻心。姓计的可以出入中南海，说明他颇有神通。你们不要忙于动手，打草惊蛇。再观察他几天，看看在中南海内外，他都跟些什么人往来。还有，你们要充分利用老大哥送我们的先进仪器，把北京地区那些可疑的电台信号，统统侦测出来，最后来次大扫除，一网打尽。记住了，你们这次再不能大意了。抓他时，不要在南池子那四合院里，而要利用他外出时，在某条僻静的胡同里下手。既然是条大鱼，就千万不能让他自杀灭口。我们要政策攻心，争取他的合作，把这出好戏演好，演完。这次台湾的图谋，很可能跟我们毛泽东主席的出访有关。一个政党，搞了几十年的暗杀，丢了江山，就更要疯狂了。」

莫斯科郊外，冰天雪地，姐妹河别墅。

整整有十来天，毛泽东和他的随行人员都被晾在了这里似的，无

所事事。偶尔有苏方的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来问候，打个照面，史达林却再也没有约见、约谈。便是中国自己的驻苏大使、老朋友王稼祥，也因毛泽东当着史达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面，说王在历史上排挤、打击过他，全然不给特命全权大使颜面，而闹情绪，不来姐妹河别墅汇报请示工作。

毛泽东作为中国党政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访友邦，就受到这种冷遇，且是内外夹攻，气不打一处来了。他对陈伯达、师哲等人发脾气：「我们到莫斯科干什么来了？来赏雪？来读书？看影片？做政治经济乞丐？这算怎么回事？半个多月了，我只给人家拜了一次寿！还有往国内发回了几封电报，命令林彪部队抓住战机解放海南岛，命令刘邓大军着手准备进军西藏！除了这些，还干了什么？」

更为气人的是，据代表团里懂英语、法语的工作人员报告，说英国、法国的报纸、电台正在造谣，说他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因跟共产大独裁者史达林意见不合，闹下矛盾，已被史达林下令软禁起来了！我屌她挨驰！哪个敢软禁老子？造谣污蔑，老子有五百万人民子弟兵，老子发了猛气，也可以做成吉思汗的！」

毛泽东连湘潭乡下骂娘的粗话都出来了。当然都是一时的气头上的话，毛泽东想做成吉思汗？显然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六百多年前的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率领数十万蒙古铁骑，东征西讨，首先灭了南宋王朝，之后横扫欧亚大陆，包括灭了都城设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大帝国，建立起幅员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元帝国。俱往矣！一代天骄，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自视再高，也难及成吉思汗的一根小指头了。

还是长期担任他的政治秘书的陈伯达提醒：「主席，派人去把王稼祥同志请来吧！主席到这里访问，他是大使，闹什么情绪？养兵千日，正是需要他去和苏方领导人沟通的时候呢。」

生气归生气，毛泽东心里明白，王稼祥闹情绪，确是自己出言不逊，当着史达林的面揭了他的老底，人家这大使不好当下去哩。解铃还须系铃人，那就派自己的卫士长去把大使大人接来吧。他有气，也不能在这种时候出。要出，回北京开政治局生活会去吧。

王稼祥大使被接来了，见了毛泽东主席的面，只说自己患了点轻

感冒，几天没有露面，是怕把感冒细菌传染给主席和代表团的同志们。

毛泽东没有理会王稼祥的外交官式托词，开门见山地说：「稼祥啊，你比我小十三岁吧？我又比史达林同志小十三岁，在西方，十三是个不吉祥的数字，我们相互冲着呢！现在我是被陷在这里了，英法的报纸广播，说我被史达林软禁起来了啊！」

王稼祥、陈伯达、孙维世和其它在场的人，都被毛泽东说得笑了起来。王稼祥心里有数，毛泽东在国内嬉笑怒骂，叱咤风云，乾纲独断，一言九鼎；但他这一套到了莫斯科，却未被人放在眼里，对治理国家的经济大计又一窍不通，而遭到冷遇，陷于被动。打道回国吧，又什么收获都没有，条约无一纸，援助无一文，怎么向党内党外做交代？继续留下去吧，人家又不冷不热，史达林同志已无意单独与他举行会谈。连他提出要谈谈哲学，苏方都未派出一两名哲学家来敷衍……。

王稼祥说：「主席，你经常教导全党干部学习辩证法，变被动为主动，转劣势为优势。我建议你采行以下措施：一是接受一次苏联塔斯社和《真理报》的记者访问，公开回答有关中苏关系和你这次访问的问题，西方舆论的谣言便不攻自破；二是同意他们邀请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来莫斯科，代表我国负责主持中苏友好条约的谈判。他们认定，只有周总理来，才能真正了解到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需求，他们也只能制订出各项援助计划；三是我们在等待周恩来总理抵达莫斯科这段时间，去一次列宁格勒，参观访问，那里是旧俄的首都，革命的发源地，有冬宫，十月革命博物馆，还有很好的歌剧舞剧院。主席知道，列宁格勒还是一座英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她被纳粹德国的军队包围了两年零四个月之久，德军始终未能占领她，她成了俄罗斯民族屹立不倒的象征，是全体苏联人民的骄傲。」

毛泽东听了王稼祥提出的三条建议，顿时心情开朗起来。他拉住王稼祥的手说：「稼祥啊，你年纪比我小了一轮，脑筋比我灵罗。」

在旁的陈伯达、师哲说：「主席，我们去一趟列宁格勒吧！十月革命的圣地，我们应当去学习取经啊！」

一直安安静静地站在毛泽东身后侧的孙维世，这时也说：「我去

过那里，夏天漂亮极了，是苏联最大的海港，冬天街道上也不积雪。还有那里的芭蕾舞剧院，世界第一流。」

毛泽东笑了笑，仿佛下了什么决心似的，右手手掌习惯性地向前一推：「好！我们到彼得堡去。我还是喜欢彼得堡这个老名字。以后，我们国家的城市，一律不许改名，搞什么朱德城，毛泽东城……。稼祥大使，现在到了你的码头上，只好暂时服从你的安排罗。你去以我的名义给周恩来发封电报，让他立即准备，多带经济贸易、工业农业方面的人才，尽快到莫斯科来。看来，今后在对外事务上，我是离不开周恩来和你们这些外交大员罗。」

第二十六章 千里谋杀周恩来——智倾莫斯科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专列火车离京赴莫斯科访问。代表团团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政府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以及各行业专家赖亚力、欧阳钦、柴树藩、常彦卿、沈鸿、王勋、聂春荣、何谦、苏农官等，还有新疆地区的负责人赛福鼎，邓力群。代表团还包括了已经随毛泽东在莫斯科的陈伯达、王稼祥、师哲等人。

一月十三日，周恩来一行乘坐的专列火车驶抵满洲里，正要过境换乘苏方的迎宾列车，却遇上了萧华和他率领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团员们都惊呼起来：「周总理！周总理！」

在贵宾休息室，萧华向周总理汇报了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简况，并说自己是计算好了日子，在这里等候总理的。周恩来也很高兴见到萧华。

萧华江西兴国人，一九一六年生，一九二八年十二岁时上井冈山参加红军，十七岁时已是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抗战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进北京之前为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委，是一位著名的青年将领。他性格活泼，勤奋好学，喜爱诗词，进城后被任命为空军政委，之后转任空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周恩来看着萧华身后那群花花朵朵的青年艺术家——大都为部队文工团团员，说：「萧华啊，中央这回派你当孩子头，女娃娃又这样多，你当得怎样？闯没闯什么祸？」

萧华说：「报告总理，我很高兴率领这支文艺兵。都是第一次出国，开了眼界，世界真是大得很！团员们也都很争气，守纪律，没有捅什么楼子，还得了金奖银奖，替祖国争了光荣。」

周恩来笑着，提高了声音说：「很好啊！你们的出访，是替我这个外交部长做了宣传，通过观看你们的演出，人家知道了，现在世界的东方有了一个新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嘴上说笑着，眼睛却一直在团员们中间寻找着什么人。他忽然问：「怎么没见到维世

啊？这丫头，还躲着，不来见我？」

萧华这才明白过来，总理是在找自己的干女儿。看来莫斯科姐妹河别墅那边，还没有把他们留下孙维世的事，报告给总理：「我们路过莫斯科时，大家听说主席也在，就都想去见见。通过大使馆联络，结果只通知我和孙维世去看望主席。主席很喜欢维世，直夸她有风度，有出息。师哲同志就把她留下了。师哲说她俄语好，翻译组正需要。她本人也高兴留在主席身边工作一段，是个难得的幸福机会。」

周恩来脸上仍然笑笑微微：心里却很不是滋味。这丫头，就是不肯听劝告，总是要朝那怀里投，不撞南墙不回头，她迟早要吃亏的。却又无法阻止她和主席往来。这回，江青也不在，她更是直接替主席服务……。他隐隐觉得，干女儿要有什么事了。什么事？是祸躲不脱，躲脱不是祸，只好由她去了。

萧华望着总理，仿佛还有什么话要讲。周恩来拍拍脑门，让团员们退到另外的候车室去，只留下萧华，才问：「主席跟史达林同志谈得怎样？」

萧华摇摇头，放低了嗓门说：「好象不大顺利。我只听师哲简单介绍了几句，并让在路上遇到总理时，先汇个报，通个气。」

周恩来早预料到了毛泽东和史达林两人很难谈得到一起。毛泽东一向谈话又是即兴式、散文式，旁征博引，诗词典故一齐上，很难翻译，翻译过去也很难懂，人家听了会乏味。尤其是谈到两国两党之间的具体问题，更可能出现分歧：「师哲怎么讲的？你声音再小一点。」

萧华再次降低了嗓门：「师哲说，史达林同志和主席正式会谈了两次。史达林问主席许多具体经济问题，主席都答不上来。外交方面和国内建设方面的情况主席都说不清，要求苏方援建的项目也讲不清。史达林说，可以请他带的经济专家来谈。主席说他只带了陈伯达，是搞哲学的，原先准备和苏方讨论一些哲学问题。史达林急了，说你不行，你讲不清，你叫周恩来来谈，周恩来能讲清。后来史达林就再没有跟毛主席举行会谈了。」

周恩来蹙了蹙他的一双浓眉：「史达林同志怎么这样子讲话？这样子招待我们毛主席？」

萧华说：「看样子，人家老大哥是真想帮助我们搞建设。师哲说，只要是我們提出来，史达林同志都会答应。他是跟毛主席谈不下去，才这么讲的。说你们人很多嘛，叫周恩来来谈谈。」

周恩来仿佛在心里权衡着什么，停了一停，才又问：「主席现在都做些什么？」

萧华说：「师哲也简单介绍了几句，让先向你通气，主席前一段大部分时间在看书，一大摞一大摞的看。有时晚上和大家一起看一些反映苏联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题材的电影。还是早上睡觉，下午起床。每天起床就外出去赏雪，在树林里走上半个小时，主席不怕冷。负责保卫工作的苏方上校想阻止，但主席不听。莫斯科的雪下得真大，比北京的大多了。因为事情不大顺利，主席心情不大好，发过几回脾气。又因为史达林同志说要等你到了再会谈，他们就先安排主席参观工厂和看些文艺演出，芭蕾舞什么的。听讲这几天由王大使他们陪着，到列宁格勒参观去了。」

周恩来点点头，没有再问别的，而嘱咐萧：「刚才提到这些，你回到北京后，跟任何人都不得提起，事关主席威信。这是党的纪律。你年纪轻，资格老，官做得大，要经得起新考验。」

周恩来率领政府代表团一行人过境，登上了苏方的迎宾专列后，利用驶过西伯利亚大雪原的四天四晚，在车上召开了一系列大小会议。他有一个工作节目单：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为总条约；总约之下，分条约还有：关于东北中长铁路从两国共管过渡到主权归还；关于大连、旅顺口海军基地的租借期限；关于新疆矿业主权归还；关于苏方向中方派遣各行业技术专家的协议；关于援建及贷款的协议。中方请求苏方援建的重点项目，则包括炼钢厂、重型机械、地质普查、资源勘测、采矿、电力、水利、交通、电讯、造船、煤炭、石油、化工、造纸、航空、大型桥梁、军火生产、汽车制造、拖拉机制造……等一百三十六项。

周恩来日夜陶醉于自己的「工作节目」中，孜孜不倦。困了，就喝两杯茅台酒、嚼一小碟花生米提神。由于各行各业的专家都带齐了，工作进展顺利。他不止一次地拍着手里的文件说：看看，这才是真正

的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精神，老大哥的无私援助。主权，我们将会一项项要回来；援助，从人力物力财力，我们将会一项项得到真正的同志加兄弟，所以我们在外交上要一边倒，我们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毛主席指出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团结，将会坚如盘石。这话说得多好。

车过乌拉尔山、在斯维尔德洛夫车站，周恩来向已经从列宁格勒返回莫斯科的毛泽东挂了电话，告上还有一天半，就可以见到主席了。电话里，毛泽东也很高兴，说就等着你来，好重开会谈，把条约谈成。维世也在我这里，她很乖，听说你要来，她很兴奋。云云。

专列顶风冒雪，继续西行。在雅罗斯拉夫车站，专程从莫斯科赶来迎接的王稼祥大使，登上了周恩来的专列。两位老同事、老战友见面，分外亲热。他们一直在周恩来的卧室兼书房里交谈，不时把某个部门的专家召来一起谈，多数时间却是他们两人单独谈。王稼祥自江西中央苏区时期起就把周恩来当兄长，不免谈及去年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他陪毛泽东主席第一次去见史达林，主席当着史达林的面指责、羞辱他的事。王稼祥说：「这事他怎么也想不通，无论从中苏关系、外交礼仪、党的纪律、党的尊严，还有历史事实，毛泽东同志都不应该说那些话，不应该在史达林和全体苏共政治局委员们面前失态，使他丢脸。所以，他决定在完成这次陪访任务后，要求中央批准他回国，他这大使是怎么也当不下去了。同时，他也会在适当的时候，在党的会议上澄清毛泽东同志对他的毫无依据的指责，看看王稼祥是个怎样的国际派？难道当年受党派遣，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局东方部工作过的中共党员，就统统不是好人了吗？」

周恩来仔细地倾听着老朋友的陈述，嘟着脸好一刻没有吱声。他没有告诉王稼祥，毛泽东同志近来是有多次失态了，曾经当着手下工作人员的面，无理指责过张闻天，后又无理指责过自己。看样子，毛泽东同志大约到了男性更年期……。

周恩来离开座椅，去倒上两小杯茅台，才过来跟王稼祥并排坐在长沙发上，边品酒边缓缓说：「历史上的那些事，早该放下了，可总也放不下哪。其实，在江西中央苏区开始长征那年，李富春同志病了，

你代替他，当了红军政治部主任。要说排挤、打击过毛泽东同志的，是李立三，瞿秋白，王明，秦邦宪，李德，加上我。跟他有过工作分歧的，是陈毅、项英、朱总、洛甫、谭震林。真还轮不上你。许多话，早在延安整风学习运动中就说过了，检讨了，认识了。主席在作整风总结报告时也说了：是非已有公论，旧话不要重提。可为什么又要重提？不懂。何况，长征路上，遵义会议，你和洛甫两人是起了关键作用的，这历史不能否定。一九三七年中央派你到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把王明换回了国内。你在共产国际做了大量的工作，介绍、推荐了毛泽东同志，让共产国际认可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党内的地位，记得还是你回延安在政治局会议上做的传达。这是你立下的第二大功劳……放心，这些历史，我没有忘记，相信朱总司令，少奇同志他们，都没有忘记。稼祥啊，个人情绪，个人委屈，你有，我也有哪！可是，我们党流血奋斗了二十几年，死了几百万上千万的同志，才取得了政权，有了今天的局面。每当想起那些死去了的战友、先烈，我们今天还活着的人，还能继续工作，沐浴在胜利阳光里的人，那点个人的情绪、个人的委屈，就算不得什么了，芥豆之微，粉尘之轻喽！我有一条，说出来和你共勉吧：相让为党，相忍为国，服从领袖，热爱工作，任劳任怨，鞠躬尽瘁。」

王稼祥小周恩来八岁。他向来敬重周恩来的学识涵养。兄长一席话，确使他郁积心中的怨气消解了不少。但他还是不同意放弃原则和稀泥。他信赖周恩来，进而推心置腹地说：「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也是为了毛泽东主席本人，我觉得我们党的高层还是应当有正常的组织生活，应当有健康的、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任何人都不应凌驾于党组织之上，而应遵守党章和党的纪律。不然，我们人人相忍相让，而放纵一人，就很可能制造出一位新的君王。任弼时同志在莫斯科养病，多次跟我谈到他的这种担忧，担忧我们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不健康，最后导致全党走大的弯路……。」

主席到莫斯科快一个月了，也不是天天都忙，可他只派他的卫士长去探望过一次。弼时同志也没有来看望主席，说自己患的是传染病，不要传染给别人。看得出来，主席对他已经很冷淡。」

周恩来深深地看了王稼祥一眼，过了一刻，才说：「稼祥呀，许多话，就到此为止吧。你是老同志了，有的事，不可书生生意气，还是放在心里慢慢思考吧。我同意你回国，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中央已决定由洛甫来接替你，你就先到我的外交部挂职，怎样？少奇同志管干部，很快会对你有新的工作安排的。弼时的病情怎样？咳血止住了没有？到了莫斯科，我一定挤时间去看他。你要记得提醒我，我们一起去。他比我还小四岁啊，多么坦率、正直、有本领的一位同志。一九四七年三月撤出延安，转战陕北，为了过不过黄河，他跟主席那个吵啊，两人拍桌打椅，大吼大叫，我真怕他们两位老乡动手……。你说我不打圆场不和稀泥，怎么办？既要维护主席，又不能伤了弼时。少奇同志说过多次，弼时是我们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最佳人选，可偏偏就得了这个病还抽烟抽得很凶。我劝过他多次，就是戒不掉。现在戒掉了？」

一月二十日中午，周恩来的专列抵达莫斯科。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米高扬等到车站迎接。周恩来在李富春、王稼祥的陪同下，在车站发表了一个十分简短而得体的讲话：「我这次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兄弟邦交的会谈。」他的讲话由王稼祥大使亲自翻译，受到热烈欢迎。其实，周恩来也懂俄语，只是说得不太流利。他说得流利的是英语、法语、德语。在一大群土包子出身的中共领袖中，他的多国语言能力，确是无人可以比拟的了。

苏联政府为周恩来安排的住所位莫斯科东北部，是史达林的另一幢花园别墅，跟毛泽东所住的姐妹河别墅相距甚远。由于代表团人数众多，一部分成员被安排住在市内的莫斯科大饭店。周恩来只在东北郊别墅住了一晚。为了方便向毛泽东请示、商量工作，第二天他就向毛泽东提出要搬到姐妹河别墅来祝毛泽东亦当即同意，并告诉他，楼上还有一套主卧室特意为他留着。周恩来这算亲眼看到了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跟毛主席的亲密无间、形影不离。当着毛泽东的面，他自然不好表示什么。等到孙维世单独来他的房间时，他就没给干女儿好脸色了，恨恨地说：「你都二十八岁了，已近而立之年，怎么还这样不成

熟？我和你邓妈妈劝过你的那些话，你都当成耳边风？现在和主席的关系发展成这样，都半公开化了，回到北京怎么办？」

孙维世却人面桃花，青春焕发。她娇嗔地撅了撅嘴，也是恨恨地说：「两个多月不见，你见到我就不顺眼？你不要吃醋好不好？我不是一样对你好过？」周恩来脸都气得发白，扬了扬巴掌，又放下了。干女儿凑近身去，大放嗲声：「你从前喜欢抱我，现在想打我？就打吧！送给你打！打呀。」

周恩来推开了干女儿，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胡闹吧！他是你的长辈，你叫他伯伯，他比你大了整整二十九岁！」孙维世却不以为然：「大了二十九岁又怎样？我跟王光美同龄，王光美还不是嫁给了刘副主席？现在不是照样生活得很美满？你们不是谁也没有表示过反对？共产党人反对封建婚姻，提倡婚姻自主，自由恋爱，结婚自由，离婚也自由……。」

周恩来听她一阵胡搅蛮缠，反而冷静下来了：「维维，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对你发了脾气。我还是要问你，会谈完毕，我们大家都要回到北京，都要面对现实，你怎么办？如果没有人发给你特别通行证，你连中南海的大门都进不了，也根本见不到主席。这些，你想过没有？」孙维世回答：「他说过了，他要跟蓝苹脱离，他已经很讨厌那个女人，演戏是她的生活，生活也是在演戏。他还说了，他和我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

周恩来却连连摇头：「只怕不那么简单啊，主席跟蓝苹的关系，中央政治局有过决议。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不是轻易就可以改变的。而且也不可以轻看了蓝苹，她有她的能量。我敢说，在某些方面，你还不是她的对手。不要忘记，她曾是你的老师。信不信由你。」孙维世听爸爸这么一说，有些傻了，眼里有了泪花：「那么，党主席就没有婚姻自由了？就不许谈恋爱，谈离婚了？」

周恩来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权衡轻重，想起了什么，于是走近去，拉起了干女儿的手：「维维，我都是为你好。有些事，我们另找时间慢慢商量吧。这次，就谈到这里吧。我只要求你，不要在主席面前表示出什么。一如既往吧。你知道，我这次是来会谈的，来办国家大事，

事关几亿人口的利益，绝不能把你和主席之间的感情纠葛搅和了进去！千万不要因此影响了主席和我的关系。这是大局。我知道，我维维的优缺点，个人感情上或有糊涂，政治是非上却从来头脑清醒。」

孙维世的脑袋在爸爸的胸前靠了靠，说：「知道了，我都入党十多年了。」

从一月十二日开始，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及其助手们，与苏方会谈代表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及其助手们，开始分成若干谈判小组，日夜翻译资料，起草文件，相互讨价还价，妥协让步。为了加快步伐，周恩来提出「分题会谈，齐头并进，统筹兼顾」的工作方法，受到苏方的赞赏与采纳。周恩来并任命师哲为负总责的翻译综合组组长（包括文字、资料和口译），孙维世则为口译组组长，实际上是负责毛泽东和史达林之间的语言交流。

由于史达林表现出了罕见的慷慨，一门心事地要对中国兄弟施予援助；由于周恩来灵活务实的谈判风格，潇洒机智的外交风度，对中国经济困境的精明把握，双方的工作量虽然相当繁巨，各分组会谈却相当顺利。苏方对中方的要求，基本上是有求必应。双方很快起草出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关于中苏双边贸易协定》，《关于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技术专家的协定》。

周恩来率领助手们大忙特忙的日子里，毛泽东除了发出过几次诸如《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应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方面的合作，新疆问题要在条约中一并解决；东北长春铁路及旅顺口、大连的租借应当写出一个单独的协定之类的指示外，其余时间都在读书、聊天、散步。他读了一堆研究旧俄彼得大帝、法国拿破仑的著作。他有孙维世陪同，醉心于自己的阅读，而无意过问太多的俗事俗务。会谈俗务是周恩来所长，就让周恩来们去发挥、去完成吧。他与孙维世同眠同起，周恩来则视而不见，实在也是忙得连睁只眼、闭只眼都顾不上了。遇有原则性的重大问题，他还得去到毛泽东的卧室里，当着穿一袭睡裙的干女儿的面，向主席请示汇报呢。

在双方会谈顺利进行之际，史达林热情邀请毛泽东领着身边的几

名工作人员入住克里姆林宫，大约是为着弥补一下前一段对毛泽东的怠慢。毛泽东这回倒也乐于给对方一个面子，况且中国代表团人数众多，住地分散，他搬出姐妹河别墅后，其它人员就可集中住到那里去，跟周恩来在一起，便利工作。

毛泽东领着孙维世住进克里姆林宫前沙皇的寝宫里。他对史达林说：「也好，你和我都做老太爷，具体的事让莫洛托夫和周恩来他们去闹。」

当孙维世把「老太爷」一词翻译给史达林听时，史达林哈哈笑了：「我七十岁了，当当老太爷不无可以，你才五十多岁，也当老太爷？」毛泽东说：「我们各当各的，你当苏联的，我当中国的。」史达林说：「我总算弄明白了，在你们中国，皇帝不管事，靠宰相当家，难怪前一段，我们会谈不顺利，现在你的宰相来了，就顺利了。」毛泽东不置可否，只是陪着史达林一阵哈哈大笑。

这也是史达林与毛泽东的不同之处。史达林虽为独裁者，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领域均十分精明，他本人即是一名出色的谈判者，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次与美国的罗斯福、英国的邱吉尔等人谈判并达成多项决定全人类命运的著名条约、协定，被西方人士称为伟大的暴君，红色老狐狸。

二月十四日上午，中苏双方在克里姆林宫举行隆重的条约签字仪式。

史达林、毛泽东出席。如此一来，毛泽东虽然于双方会谈平庸无能，却一下子与史达林处在了平起平坐的地位上。由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互换文本。同时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至迟不过一九五二年年底，苏联将交还他们在中长铁路及旅顺口、大连的一切权益；还有《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规定苏联将提供三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帮助新中国的建设，年利率为百分之一。中方则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十年内，逐年还本付息。等等。

为了感念及回报苏联老大哥的无私援助，为了中苏两党两国人民

世世代代兄弟般友好下去，毛泽东、周恩来并向史达林承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县级以上各级行政单位均成立半官方性质的团体——中苏友好协会，省以上大中城市则建立「中苏友好馆」，毛泽东将亲任全国中苏友好协会荣誉会长，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将任会长、副会长。

以虚对实，毛泽东、周恩来给了史达林及其苏共政治局成员们以极大的心理满足和精神享受。这个「以虚对实」的策略由周恩来提出：「我们基本上不用拿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只要高举「兄弟友谊」之旗，就能做到皆大欢喜。」毛泽东当即表示首肯：「开张友谊支票，何乐不为？」

毛泽东于中苏两国两党的会谈碌碌无功，却于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告别宴会上演出一出压轴好戏。他坚持中方的答谢告别宴会要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大都会饭店举行。史达林说：「我在莫斯科从来只在克里姆林宫宴会厅赴宴，你们的答谢宴会为什么要到外边去举行？」毛泽东说：「我们是个主权国家，不能在你们的党、政机关内举行宴会。」史达林又说：「你们不是说过签了条约，友好同盟，就是同志加兄弟，亲如一家人了？」毛泽东说：「史达林同志，那是个表示友谊牢不可破的比喻，在中国，兄弟分了家，就属于两个独立的家庭，何况我们是两个国家？如果我们的答谢宴会没有您的出席，将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毛泽东的话里带有明显的胁迫意味，表示他决心已定，甘冒史达林不出席的风险。倒是史达林几经犹豫，着眼于苏联共产党的全球战略，他太需要东方的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盟友了，最后作出让步，破例出席了二月十四日晚上在大都会饭店举行的盛大宴会。他们都是各自党和国家的独裁者。这回却是久经拼搏、日暮西山的老独裁者，让步于旭日东升、崭露锋芒的新独裁者。中国政府代表团此行既获得了经济上、政治上的实惠，又挣得了大面子。周恩来兴奋地对同事们说：「还是我们毛主席行啊，史达林同志那样德高望重，都没能拗得过他，换了我，就没有这胆识，这气魄的。」

二月十七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莫斯科，满载而归。毛泽东、

周恩来一行兴致极高，同意了苏方的安排，冒着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沿着西伯利亚大铁道，一路参观工厂、军营、学校、农庄的从容归去。

在北京，中央社会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手下的特工高手们，早已对南池子大街那座古色古香四合院内的计兆祥及其秘密电台——称为北平万能台的，布下了天罗地网。他所发出和接收到的密码，均被截获并破译。所以还没有抓他，是周恩来临离京时交代的：「抓一个计兆祥意义不大，重要的是要通过他的秘密电台，破获全国性的敌特组织，务求一个不漏，一网打尽。」

大祸临头，踌躇满志的计兆祥却毫无察觉，照常天天发报。到了二月上旬，他终于获知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即将返回的信息。他立即将信息发给台北中央保密局。保密局长毛人凤立即回电命令他通知哈尔滨市的东北技术纵队马司令，准备「接客」，并告知台北的特派员将于二月八日晚上空降至哈尔滨市松花江北岸太阳岛东侧那片树林里。一切行动服从特派员的指挥。

一天晚饭后，计兆祥像往常一样到胡同尽头的小店铺去买香烟抽时，突然被两名武林高手扭住，并点了他的穴道，使得他来不及咬破藏于衣领内的剧毒胶丸杀身成仁。

待计兆祥苏醒过来，已是坐在威名赫赫的李克农部长面前。李克农倒是一派儒将风范，和蔼可亲，把一迭被破译了的电报稿递给他过目，才轻言细语地说：「小计，我认得你已经有日子了吧？你的特殊身分我们也早已了若指掌。看看，这些都是你跟台北上司的往来宝贝吧？对我们来说，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我们就是等着截获到你们台北的特派员在松花江北岸太阳岛树林空降的时间、地点，以及他们与东北技术纵队的马司令在哈尔滨松花江饭店碰头的房间号码等信息之后，才将你「请」来的。我们也算是同行了吧？我比你年纪大，资格老。本来，有你不有你，对我们来说已意思不大。但念及你才三十出头，不忍心看到你这么早就离开这么美好的人间。你都还没有成家吧？现在，我只问你一句：「愿不愿意跟我们合作？你的出路还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有奖，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我还可以加上一句：「愉快合作，既往不咎，继续工作，前途光明。」

计兆祥浑身冷汗淋漓。他明白他面对的，是二十年来使得国民党中统、军统两系人马屡斗屡输、闻之丧胆的人物。他有好一刻没有吱声。李克农并没有催逼他。计兆祥知道自己面对的并不是生与死的简单选择，要是有那么干脆、利落就好了。吃上这碗饭的人，一旦落到对方手里，若还不从你牙缝里刮出些东西来，那精神和肉体的不死不活的折磨，将是没完没了的……。计兆祥终于哭丧着脸说：「报告李部长，我愿意改过自新，将功赎罪，替你们效劳，重新做人。」

李克农部长很痛快，站起来说：「好！我们握手成交。你的任务是，按我们的要求，依你一贯的口气、方式，向你的台北上司发报并收报。任务完成之后，我保送你去华北政治大学洗脑、深造。」

于是，在黑龙江省（当时称为松江省）省会哈尔滨北郊的太阳岛上，李克农手下的人马于深夜的雪地里，点起一住篝火，准时「迎接」到了从一架没有国籍标志的飞机上空投下来的两名台北保密局的「特派员」。经过突击审讯，中共的两名特工化装成两位「特派员」，手持保密局的委任嘉奖文书，如约前赴哈尔滨市松花江饭店某房间，对上了联络暗号，跟代号为「二〇五」的反共救国军东北技术纵队司令员马耐「见面密谈」。当「特派员」出示保密局的委任文书，马耐被晋升为东北地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中将衔，并递上一大笔「奖金」时，马中将总司令无疑有它，向「特派员」交上了自己的东北技术纵队的成员联络图，共一百七十人名单，以供「特派员」一一封赏。马耐中将总司令并吹嘘，自己布设的谋杀毛泽东、周恩来一行的计划，拟在满洲里、哈尔滨、长春进行三次，天衣无缝，一定不让毛、周活着回北平，云云。

李克农手下的人马，还通过捕获的两名台北空投来的「特派员」，获知国民党保密局在大陆共有三支反共救国军特别技术纵队，一在哈尔滨，一在南京，一在广州。均由潜伏于北京南池子四合院内的万能台指挥。所有成员均经过了中美合作所严格的全能技术训练，专门从事重大的暗杀、爆破活动。这三支人马，均于一九四九年之前，通过各种途径，打入中共各级党政军机构内部。

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周恩来一行抵达中苏边境站满洲里，过

境换乘已经等候在那里的北京的专列，仍是铁道部长滕代远、公安部长罗瑞卿恭迎，还有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毛泽东亲自拟定了发给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的电报稿：我们一行已抵满洲里，尔后拟于海拉尔、哈尔滨、长春、四平、铁岭各停车一至三小时，到沈阳拟停留一至两天。请通知各地负责同志保守秘密，不要公开发表消息……到北京下车时，亦只要少数党内人士（一百人左右）到车站迎接，此后再发表消息。

三月四日，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

第二十七章 江青上书陈情

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的前夕，江青已将一封「陈情信」呈送中央书记处，恭请朱总司令、少奇副主席、恩来总理及毛泽东主席本人阅。江青在信末附记一言：如果书记处不便回复她，她则会同样的信呈送政治局的每一位成员，要求政治局重新决议，确定她和毛泽东主席的婚姻关系。

江青的蝇头小楷，清秀工整，是很下过一番功夫练就的。这回她甚有心计，在「陈情信」中根本不提及情敌孙维世的名字，毛、孙于莫斯科的种种；而娓娓诉说自己一九三八年以来，如何伴随毛泽东，热爱毛泽东，忠诚毛泽东，照料毛泽东。她是作为毛泽东的生活伴侣、毛泽东子女的母亲，来热爱、忠诚于自己的丈夫。她对毛泽东的感情是坚贞不渝、海枯石烂、天日可表的。自进城后，特别是住进中南海之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人都可能发生变化。她和毛泽东主席的家庭生活已经受到了某些不健康因素的干扰。她作为一名党员，革命队伍里的一名女兵，为了维护党的事业，为了维护领袖的道德形象和崇高威望，本着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恳切而坚决地要求中央书记处或政治局正视毛泽东主席家庭生活中所遭遇到的困难，防范不利于党的事业和领袖形象的事情发生及恶性发展。

刘少奇已对毛泽东和孙维世在莫斯科「临时同居」的事有所风闻，看过江青的「陈情信」后，对夫人王光美说：「不可小看蓝苹，这回不哭不闹，却比哭闹厉害多呢。看来润芝兄也想当家庭改组派，休江娶孙，不那么容易罗。在党内不那么好交代。关键就看恩来的态度。这回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王光美笑说：「孙维世和我同岁，又是个戏剧家，主席是跟文艺舞台有缘份了。主席要真的娶了小孙，那不是跟周家结了亲戚？虽说不是亲生的，辈份上不是乱套了？」

朱德总司令看过江青的「陈情信」后，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眉批下一句：「建议维持一九三八年政治局约法三章[®]不变，可否书记处

[®]即：江青只在生活上照顾毛泽东同志；江青不能被称为毛泽东夫人；江青不参与党内政治生活。

会上一议？」一天晚餐时，朱德趁服务人员不在身边，就跟夫人康克清说了说毛泽东和孙维世在莫斯科住在一起的事。康克清江西万年人，一九二八年十七岁时上井冈山参加红军，不久跟她二十四岁的朱德结婚，成为朱德最后的生活伴侣。康克清听老总讲完，叹了口气：「主席也是，年近花甲，还喜欢年轻的，老牛吃嫩草……。」朱德耳朵有点背，问：「你说什么啊，哪个是老牛？」

康克清说：「老夫少妻，我们江西乡下人叫做老牛吃嫩草！」朱德哈哈笑：「我比你大二十四岁，少奇比光美大二十三岁，主席比蓝苹大二十三岁，比维世大二十八岁，都是，都是，就一个恩来不是。这话你莫到外面去说，犯自由主义错误啊！」

周恩来回到西花厅后院书房，才在办公桌上看到了江青的信。由于信封上写着「周总理亲启」，又落款为江青，因之值班秘书未便拆阅。至于邓颖超，则从来少进丈夫的办公室，不主动过问「公家事情」。周恩来看过江青的信，直觉得此信写得好，及时，有智能，不动声色，不点孙维世的名，却点中了问题的要害。江青不把孙维世当情敌——尽管是表面上的，实在是高明之举。这就避免了跟毛泽东公开反目，否则毛泽东破罐破摔，事情就没有了转圜的余地。此事，他无论从感情上，道义上，都要站在江青一边。他决不能去参与拆散毛、江，而成全毛、孙。他绝不愿干女儿在自己跟毛泽东之间搅和得不明不白，落下笑柄。干女儿真要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不就成了自己的干女婿，这像话吗？荒唐！滑稽！到时候，只怕谁都闹得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没有好果子吃的。再者，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烈士比他周恩来还小两岁，干女儿怎么可以去找一个比生身父亲年纪还大十岁的人成亲？如果这要成为事实，日后便是九泉之下，也要对不起自己的老战友了。

周恩来心里明白，要阻止毛泽东主席做他想做的某件事，却是个大难题，须动移山之力。毛泽东从来是个拗相公，越有人反对他越来劲。他把阻力当动力，叫做「越压迫越革命」。年轻时入读长沙师范就立下了志向：「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斗争成为嗜好，学问，并成为大师。因之二、三十年

下来，党内党外，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党派，谁也没有斗得过毛泽东。关于这一点，周恩来早就认识深刻，并服输服气。

可总得有人出面说话，打开个缺口呀？谁合适？少奇同志不行，少奇在主席面前从来就矮了半头似的，本身又结过五次婚，现在的太太王光美比少奇同志小那么多，主席早就开玩笑说少奇也是个改组派；让孙维世的母亲任锐出面？人微言轻啊，何况任锐也不会有那个勇气，为这事，只怕连丰泽园的大门都不敢进；让邓颖超出面？份量是重一些，但以什么身份说话？主席有耐心听？小超不行。自己出面更不行，会成为干涉干女儿的婚姻自主、干涉主席的个人感情生活，而招致干女儿的妒恨，招致毛主席的记恨。两面不讨好，得罪人。

不能让他们成。他们成了，不成体统。到时候他周恩来夹在中间，算个什么人？他想起了朱德总司令。朱老总长毛泽东七岁，为人温和宽厚，从不争功争权争名，处事公正，讲原则讲党性，是党内军内上上下下人人尊重的长者，毛泽东尊称为「玉阶兄」。朱老总出面合适。相信朱老总出于维护党中央领导人的道德形象，党内党外影响，会乐于出来讲几句有份量的话。不管毛泽东主席愿不愿意听，只要总司令开了口，就不能不给面子的。到时候，少奇同志和自己在书记处会议上附和，集体的阻力就形成，毛泽东同志就不得不三思而行了。

周恩来还摸准了最重要的一点：毛泽东厌倦蓝苹，还没有到达必欲唾弃而后快的地步；他喜欢孙维世，也还没有如唐明皇喜欢杨玉环似的，到达须臾离不开的境界。孙维世文化修养、政治修养都有其浅薄俗气的一面。她能提供给毛泽东的，不过是新鲜和刺激而已。毛泽东诗人气质，感情上还不如唐明皇专一。孙维世也不是杨贵妃。杨贵妃是个国色天香的尤物，孙维世则是位学有专长的戏剧家，有很强的事业心，很难想象她会是一位贤妻良母，对毛泽东百依百顺。

当然，要动摇毛泽东对孙维世的感情，还得由江青本人去进行一些适当的活动。过去地动辄哭闹，那是女人犯贱，撒娇。这回她面临到真正的危机，倒能沉着应付，不哭不闹，可见她还是分得清轻重利害的。这两天，江青肯定会来西花厅找他谈谈，求他帮她的忙。他说话不方便……但小超可以见见她，暗示她，提醒她，去找找什么人？

什么人合适？对了，徐特立！找徐特立老前辈。没错，徐特立老前辈可以出面劝诫自己的学生毛泽东。妙妙妙，真是一物降一物了。

徐特立，湖南长沙人，一八七七年生，早年留学日本。一九二一年创办长沙师范学校，任校长（一九一五年毛泽东入读长沙师范）。一九一九年赴法动工俭学时，已四十二岁，是为年岁最长的留法学生。一九二四年回到长沙又创办了长沙女子师范，后秘密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一九三四年参加长征，时年五十七岁。抵延安后任中宣部副部长，延安自然科学学院院长。一九三七年徐特立六十岁诞辰时，毛泽东曾经撰文称：徐特立同志过去是我的先生，今天仍是我的先生，将来还是我的先生。进北京后，毛泽东特意安排徐老住进中南海，执弟子之礼，甚是恭敬的。

想到可以让小超暗示江青去找徐特立老人出面，打消毛泽东休江娶孙的念头，周恩来心头豁然开朗了。

毛、江、孙三人的感情纠葛毕竟算私事。

毛泽东、周恩来回到中南海后，忙于召集一系列会议：中央书记处碰头会、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国政协在京委员会等等，报告此次访苏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以及中国党和政府如何回应苏联党和政府，特别是史达林同志兄长般的伟大情谊；全国政协应尽快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完成一道手续，立即批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由北京市政府出面，举行大规模集会并游行，热烈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诞生；部署筹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中苏友好协会」，各级党、政、军负责人都必须兼任同级「协会」的会长、副会长、理事，并通过这些协会，做好大批苏联专家来华援助各项建设的接待服务，等等。周恩来还多次听取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汇报，批准关于统一财经、稳定物价、保障供应、打击投机倒把的各项政策措施。

在繁忙的国务活动中，江青很识趣，没有公开找毛泽东纠缠莫斯科的事。她早跟毛泽东分床，进了中南海菊香书屋院子后更是分房，两人也已经不行什么周公之礼了。只是保留着一个家室名分。江青要的就是这名分。况且也是名不正、言不顺，不伦不类的名分。一九三八年至今，江青从未被称作「毛泽东夫人」。她一直只被党中央认作

毛泽东主席的「同居妻子」，半个夫人。可就为了这半个名分，她江青也得时刻提防，小心翼翼，才不致被废了去、夺了去。因为一旦离开了毛泽东，她就凤凰脱毛不如鸡，真正的一文不名，狗屁不值了！男权社会，仍然是该死的男权社会，封建大男子主义。

遵照邓颖超大姐的提示，江青去拜见了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拜见之先，她已派人将一封「陈情信」送达老人。徐老年逾七旬，鹤发童颜，身体健旺，住在中南海万字廊南边一座清静的宫院里。老人见到江青，就说：「蓝苹啊，你的陈情信写得好，差不多可以跟李密的〈陈情表〉媲美了。你的字也写得好，看得出来是下过功夫的。放心，我会去找润芝，带了这根手杖去。他已经约了我，等他忙过这两天就请我吃饭。我会问问他：「坐了党、政、军头把交椅，当了元首，就要休妻？」过去皇上休妻，还得下道诏书，摆出几条理由来。润芝摆不出几条来，我这一关他就通不过。我要问问他：「士有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这是《魏氏春秋》上的话，在长沙师范时我教过他的……。」当然，党和国家的大事，他是主席，我是党员，要守纪律，要服从他的领导。办这类家务事，就总还要讲个长幼秩序的，我就不管他是不是中央政府主席，既然是我的学生、晚辈，若不听长辈的忠告，那我手里的这根拐杖还是举得起的！」

江青感动得破涕为笑。她半蹲半跪在地板上，两手扶着老人的双膝，仰起清丽的脸蛋，真诚地说：「徐老！您学富五车，年高德劭，桃李满天下，您老人家要是不嫌弃，就收下我这个晚辈女弟子吧！」

徐特立老人连连晃手：「不可以，不可以，延安自然科学学院之后，老朽不再收徒，规矩已久，断不可破例的。过去嘛，学生倒是有过一些：毛润芝、刘少奇、何叔衡、蔡和森、任弼时、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罗荣桓、蔡畅、萧三……。」

一天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送朱总司令回到万字廊北面的含和堂。这又是一座清静而宽敞的四合院。朱老总儿孙满堂，的确需要这么个宽敞的住处。康克清见总理来了，连忙上来致候，上茶，知道总理和老总有事要谈，便退下了。

朱德长周恩来十二岁，二人都属狗。朱德曾说：「年龄上我是恩

来的兄长，政治上恩来是我的兄长。一九二二年朱德赴德国学习军事，经由当时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介绍入党。经周恩来介绍同期入党的还有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朱德行伍出身，讲究忠义二字，终身不忘自己的入党介绍人，称周恩来是他的革命领路人。后来周恩来的政治生涯出现多次危机，朱德均以总司令身分出面说话，予以关照。因之二人情谊，非比寻常了。

坐下之后，周恩来品着茶，表示歉意：「老总啊，开了整天会，你已经很累了，我却还想和你谈个事……。要不，你先休息，我改个时间再来。」

朱德说：「坐坐坐。你当总理的，中南海里头号大忙人，要累也是你累。我管事少，比你轻松多了。是不是想谈谈主席和孙炳文女儿的事？江青有封信在我这里，我已经批了一句话，还没有退回书记处去。」说着，朱德起身到书桌抽屉里找出了那封信，递给周恩来。

周恩来看到朱德的眉批：「建议维持一九三八年政治局约法三章不变。」他心里很为感动：「朱老总，真是一位慈祥的长者啊！」

朱德问：「恩来，你是去了莫斯科的，润芝和维世之间，是不是真有什么事啊？我只是灌了些耳边风，听了些悄悄话。」

周恩来点点头：「有。我到莫斯科的时候，他们已经住在一起了，都半公开了。我当然没法子拆散他们，男欢女爱嘛！现在的麻烦是，回到了北京，他们可能正式提出来，要求结合，名正言顺。维世是个大姑娘，润芝却还有蓝苹，不能弃之如破履。老总啊，润芝兄比孙炳文烈士大了整十岁，维世怎么可以嫁给比自己父亲大十岁的男人？你看这事该怎么办？」

朱德拧了拧眉头：「你这做义父的，还有小超，就没劝过维世？这丫头自进了北京，就少来我家里露面了，康克清也讲她疯得没有王法。我们要对得起孙炳文啊！再说，那一来，润芝不成了你们的干女婿？算怎么回事？你和小超也会很困难啊？」

周恩来说：「早劝过了，甚至骂过。可她总不听。主席去莫斯科之前，蓝苹外出治病，她就总往主席那里凑，往那怀里投……。这丫头贱气，越大越不叫人疼了。现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润芝。总司令一

句眉批批出了要害：「建议维持一九三八年政治局约法三章不变。」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朱德温和地笑了：「这事，这事啊，陕北老乡有个说法，一颗萝卜一个坑。没有萝卜，也就不在乎坑了……。可事情怎么提出来？要有个适当的机会、场合。所以我还没有把蓝苹的信批到书记处去。扩散了，都不雅呢，要慎重对待呢。」

周恩来听了朱老总颇为粗俗的比喻，没有笑得起。他又把上两次毛泽东当着手下工作人员的面，分别斥责张闻天和自己的事，以及这次在莫斯科，毛泽东当着史达林同志和全体苏共政治局委员的面，斥责我驻苏大使王稼祥为国际派的事，一并说了说。

朱德听得眼睛都睁大了：「有这些事？我都被蒙在鼓里。我看进了中南海，润芝是发生变化，不好的变化。可我们终归还有个党的纪律哪，组织生活原则哪！等王稼祥回来，政治局应当开一次生活会了，大家要坦率地、真诚地向润芝提醒提醒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与人为善，和风细雨。恩来，你看哪？要不要先跟少奇通个气？」

周恩来想了一想，手指在沙发扶手上轻轻弹着：「总司令，我看事情得一件一件分开来做。先跟少奇同志通个气？不好。开政治局生活会，范围是不是大了些？事情一并提出来，会不会令润芝产生误会，以为大家串通了来围攻他，算总账……。我想，还是先开个书记处生活会，任弼时还在莫斯科治病，也不要扩大林老、董老、彭真他们了，就你、我、少奇加上润芝本人四个人开会，不提孙维世的名字，只谈江青的陈情信。这次，江青也算聪明，信写得有理有节，颇为感人，也没有提到孙维世，无懈可击。就拿总司令的这句眉批做文章，避实就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朱德笑嘻嘻了：「怪不得人家国民党的那些元老早说了，你是我们共产党内的诸葛亮罗。为了保险，还应当有位德高望重之人去找润芝私下里谈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看，我看让蓝苹去求求几位湖南籍的革命老前辈，徐特立、林伯渠都行，还有谢觉哉。徐老最合适，他是润芝当年长沙师范读书时的校长、老师。」

周恩来也笑了：「总司令考虑得真周到。小超已经提醒过江青，

去拜见徐老。只要徐老出面替江青说话，主席又摆不出几条说得过去的休妻理由，中南海里的一出《罗蜜欧和朱丽叶》，只怕就难于演出了。」

周恩来从朱德家里出来，已经很晚了，只一名警卫员跟随着。走到中海西岸去，遇上踏着月色出来散步的刘少奇夫妇。刘少奇是中南海里的另一位大忙人，经常工作到深夜，才由夫人陪着出来散散步，活动活动筋骨。周恩来对刘少奇倒很随便，对王光美却又握手又问好，十足热情：「光美啊，都说你和少奇同志是我们中南海机关里，最幸福、最和谐的一对罗！」

刘少奇却不苟言笑，说：「恩来，正想着明天要找你谈件事，没想到月下相逢……。我们要不现在就谈谈？」

王光美说：「看你！真是见缝插针了，总理也累了一天了，有事不能明天谈？」

周恩来说：「月下交谈，不累不累。要紧不要紧？」

刘少奇说：「是件不大不小又不能不分心的事……。这样吧，光美，你和警卫员到后面去等等我，或者你先走走，我们只要几分钟。」

王光美暂时离开后，刘少奇见周恩来的警卫员也已经跟自己的警卫员远远地站在了一起，才说：「恩来，今天散会后，毛岸英来找我。岸英说他跟父亲吵了架，父亲差点要动手揍他，被卫士长拉开了。你道为了什么？岸英是坚决站在他继母蓝苹一边，反对父亲跟孙维世的不正当关系。岸英都哭了：家不像个家，上海还闲着个贺妈妈，又想要个孙维世，年纪比他还小，搞得这么复杂，不清不白，他真受不了。父亲要是固执己见，要休继母而娶个小后妈，他就要在菊香书屋党小组生活会上，把事情公开出来讨论……。」

周恩来心里暗暗叫好，肯定是蓝苹做了岸英的工作。这回真是得道者多助了。但他嘴里却说：「岸英这孩子也是，怎么可以这样对自己的父亲说话？他怎么不来看看我？少奇同志，你知道，自延安以来，岸英一向跟我和小超都是很亲近的。」

刘少奇说：「我也问过岸英，为什么不去找找周叔叔和邓妈妈呀？你父母亲的事，向来是他们二位当调解人、和事佬的。你猜岸

英怎么说？他说姓孙的是周叔叔的干女儿，中央机关谁不知道？为这事，周叔叔一定是伤透了脑筋，哭笑不得呀。又不是亲生的，周叔叔和邓妈妈能说什么话？」

周恩来说：「岸英从小懂事听话。都二十九岁的大小伙子了，也还没成家，谈了个对象，女方未满十八岁，主席不允许他们结婚……我真替主席高兴有这么个谦逊好学、正直善良的好儿子。少奇同志，你对主席和维世这事，怎么个看法？」

刘少奇打火点烟，深深吸了两口，仿佛思考一会，才说：「感情上我也同情蓝苹。这个女人毛病不少，历史上也不怎么样，但有她可怜可叹的一面；可理性上呢？我又觉得我们应该尊重润芝的个人感情。我在想，润芝近半年来，为什么常常发脾气，有时甚至表现得不很理智？就是因为他的家庭生活不和谐，夫妇生活不太正常。他已经厌倦了蓝苹是毫无疑问的。他甚至跟自己的卫士都说过，想起蓝苹当初在上海的那些事就厌恶，恨不能永远不要见到。润芝感情丰富，平日情绪起伏较大，他需要有新的倾诉……。所以我想，从党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着想，让润芝过上正常的幸福的夫妻生活，在中央领导层造成一种祥和安定和衷共济的工作气氛，是很有必要的。因此，也许润芝兄跟孙维世结合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恩来，中央分工我管干部，了解的情况稍多些。我还有个担心，一个女人长期受压抑，生活在一种惊惧不安的气氛里，是容易变态的。将来一旦有了机遇，掌控了某种权力，会成为十分暴戾的人物……也许，这是我的多虑，多虑……。」

周恩来倒是没有想到这一层。刘少奇思考问题，的确有他深刻、独到的一面，连主席都不得不承认呢。他也了解蓝苹不是盏省油的灯，有她很激烈、厉害的一面。但他相信，只要中央能维持一九三八年政治局的约法三章不变，蓝苹在政治上就绝不可能有所作为。何况蓝苹平日为人，小肚鸡肠，争风吃醋，好娱乐，好哭好闹，也实在是个俗物。他不禁问：「光美也是你一样的看法吗？对人对事，女性往往比我们男的来得细腻、敏感。」

刘少奇断然地晃了晃手：「我从来不跟她议论党内人事，这是原则。岸英来找我哭诉，她也不在场。光美有个好处，很自觉自律，从

来不问不谈她工作范围以外的事。好了，太晚了，这事我们就谈到这里吧。我怕岸英还是会去找你的，让你心里有个底。」

周恩来跟刘少奇紧紧握手，道晚安。

书记处会议，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由主席副主席加上总书记组成），是为中共的最高领导核心，亦即所谓的「党中央」也。由于任弼时养病去了，只有毛、朱、刘、周四位书记，书记处会议便经常在菊香书屋毛泽东的书房里举行。夏天图凉快，有时也在菊香书屋的院子里，树荫下开会。院子里几株翠柏合抱，几棵海棠蓬勃。那时，各人摇一把大蒲扇，脚边点着蚊香，连电风扇还没有呢，讨论国家大事也就有点像是农民饭后聊家闲。

这天的书记处碰头会，先讨论、通过了一个中苏友好协会全国总会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理事名单，以及各省市分会的组成办法，还有派驻二十来个已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国家的使节名单，大使馆建馆问题，等等。快要散会了，朱德总司令才拿出江青的那封陈情信来说：「润芝、少奇、恩来，在座只有我们四人，都是不分彼此的老同事、老战友了，既是一桩私事，也算一桩公事，我们一起来议一议，议过就了，严禁扩散，如何？」

毛泽东一见江青的陈情信，本来一脸微笑，忽地涨成红面关公：「这个臭婆娘，不是东西！我晓得她给你们每人送了一封，也给我留了一封，诉说她的委屈！她是受了我们这些封建男权主义者、大男子汉的压迫了。她不是要到政治局会议上去闹吗？让她这个蹩脚演员表演一番也好，我还怕她？」

刘少奇温和地率先表态：「我反对这事闹到政治局会议上去，影响不好，也不严肃，还是小范围解决吧。」

毛泽东说：「多谢少奇。人就一张脸，树就一张皮，这女人一不要脸，二不要皮，事情就难办。她唯恐事情不闹大。前天，她还请动了我的老师徐特立前辈，来教训我。徐老给我讲了《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里裴注所引的《魏氏春秋》：「许允妻阮氏贤明而丑，允始见愕然，交礼毕，无复入意。……允入，须臾便起，妻捉裾留之。允顾谓

妇曰：「妇有四德^⑦，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几？」许曰：「皆备。」妇曰：「士有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知其非凡，遂雅相亲重。……」这篇文章，当年在徐老门下做师范生时，是读过的。徐老前天重新给我开讲一堂，用意是很明显的了。」

朱德笑问：「润芝，徐特立老人是语重心长啊！看来，你和蓝苹的情份还不能断罗。何况蓝苹不丑，美貌依旧，又颇有些文彩。你是如何答复徐老的？」

毛泽东说：「德、言、容、功，所乏唯德。」

刘少奇说：「总司令，徐特立前辈也是我的老师。老师嘛，自然一管学生的学问，二管学生的做人。但这回的事，到底是他们夫妻失和。我看，我们也要尊重润芝本人的想法，不好强人所难的……。」

周恩来随即附和：「对，主席的事，还是主席自己作主。」

毛泽东的脸色由红转白，感激地望了刘少奇一眼：「不瞒各位，对蓝苹，我是一点兴趣也没有。早就不和她困觉了，嫌她不洁。自从四八年全军开展三忆三查运动，查出来地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影剧圈混出的那些糗事，我就对自己说：完了，我和这个女人完了，今后，至多只剩下个名份，顾全一个面子罢了……。」

朱德仍是一脸慈祥的微笑：「润芝兄，你个人感情上的事，我本不该插嘴。但你是党、政、军第一把手，最高领袖，众望所归，举国敬仰；我担心的是领袖形象，党的事业，是否受到影响。我们这些人，都被全国上上下下的眼睛所盯着啊，还是以家室安宁为好，给全国军民做个榜样。当然，你的个人感情上的需要，我们也要理解。必要的话，可以临时打打游击。你们不要笑。这不是我的发明。一九三九年，润芝介绍一位有名的女作家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去找我，好象还让替她介绍个对象。那时，彭德怀正好也打单身。我就跟彭老总提了提。彭老总瞪着眼睛说：「我敢要她？她是个游击主义者！」我没听懂，就说游击主义有什么不好？我们不都在太行山上打游击？彭老总说：

「人家是在个人感情上打游击！找男人打游击，还有什么杯水主

^⑦旧时指妇女的德、言、容、功为四德。

义……。」]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笑了。他们都心照不宣，明白这位名女作家是丁玲。朱德见气氛活跃、轻松了，便接着说：「润芝兄，为了大局，你就还是先委屈一下吧。对蓝苹，我们还是继续维持一九三八年政治局的那个决定吧。当然，也要和蓝苹说清楚，今后，她不得干涉主席和别的年轻女同志的正常交往、接触。少奇，恩来，你们还有没有别的意见？」

刘少奇立即改变初衷，顺着总司令的口吻说：「我看，这事暂时也只好这样办了，到此为止。古人说：「以天下为任者，不计小耻；以四海为量者，不计小节。」这话对润芝兄合适。」

周恩来说：「我同意总司令和少奇的。主席，你以为怎样？」

毛泽东一脸苦笑：「我的老师徐特立，加上你们三位，都是蓝苹一派的。这几天，小女儿李纳牵着我的衣袖眼泪汪汪的，爸爸爸爸的喊得人心酸；长子岸英，也找我来吵，替他继母说情。真是上上下下，老老少少总动员罗，把我包围了罗。我脾气再拗，这回也拗不过去……。少奇兄近来读书不少，《后汉书》上的名句，都背得出啊！」

周恩来尽量克制住，没有喜形于色……。直到毛泽东说：「都不要走，留在我这里吃饭吧，长沙送来枫树球熏出的腊肉，豆豉炒红辣子，香得很，我们一起下酒。」周恩来活跃起来，走出书房去，站在院子里喊：「蓝苹！蓝苹！主席留我们吃饭，你个女主人怎么不露面？快下厨房去，弄几个你拿手的上海小菜来！」

毛泽东望着周恩来站在门外的身影，叹着气，没头没尾的说了一句：「蓝苹后边有高人，有高人指点啊，存心不让我解脱。」

第二十八章 干女儿也说《清宫秘史》

周恩来终于使毛泽东打消了「休江娶孙」的念头。

稳住了毛泽东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还有矛盾的次要方面，要做好干女儿孙维世的工作。周恩来倒不是怕干女儿进中南海来撒贱，吵闹。不给她电话通知，北门值班室不发给她临时通行证，她连中南海的大门都进不了。二十八岁的大姑娘了，还不知分寸，不知厉害，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跟主席有了那层关系，以为主席随口许了个什么愿，她就真的可以取代蓝苹，搬进菊香书屋做女主角。幼稚愚蠢，异想天开，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菊香书屋的女主人那么好当？你跟毛岸英同岁，岸英肯称你为后妈？还有岸青、李敏、李纳，还有主席的亲侄子毛远新，都住在菊香书屋，他们哪一个会把你放在眼里？把你当敬老几？岸英、岸青是杨开慧生的，李敏是贺子贞生的，李纳是蓝苹生的，四个孩子，就有三个母亲，还不够复杂？

况且，你本身是个戏剧家，艺术工作者。你能丢得下舞台、耐得住寂寞，在菊香书屋里没没无闻，深居简出，做一位名副其实的贤妻良母？对不起，作为毛泽东的第五任妻子，你仅仅是一名小后妈，小继母。蓝苹能混到今天，能为毛家的子女们所接受，已经够她周旋，难能可贵的了。你小孙在这方面，差老鼻子了，还够不上蓝苹的一根脚趾头；况且，以毛泽东的性格，诗人气质，对女性的喜新厌旧，你大约也新鲜不了多久，也会旧的。如此循环下去，不久又会有更年轻更亮丽的人儿取代你的。那一来，既断送了你的前程，又坏了领袖的声誉、党的声誉，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所绝不允许……。

「在想什么哪？还不睡？」邓颖超身着睡袍，站在西花厅后院书房门口问。

原来夜已深。周恩来发觉自己是坐在大书案前，伏着一迭文件打了个盹。他站起身子，走向门口，甩了甩手说：「小超，我们到小客厅里去坐坐？有热奶吗？我想要一杯。」

工作人员早休了班，连保健护士都睡觉去了。邓颖超忙去厨房里煮出一杯热牛奶，拿到客厅，陪周恩来坐下。

「小超，我们好久没有坐下来说话了，」周恩来边喝着烫嘴的牛奶，边说，「我适才是在想维世的事。这孩子年纪越大，越教人烦心，差点惹出大事情来。」

邓颖超说：「我们也不要只是怪女儿。男女之事，从来一个巴掌拍不响，总是男的占主动。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只不过这回是个有妇之夫。论不是，有妇之夫的责任更大些。当然，因为是主席，又碰上了一个蓝苹，许多话就不好说了。」

周恩来忽然想起那晚上刘少奇说过的话，便问：「蓝苹这人在政治上怎么样？是不是很有上进心，权力欲什么的？」

邓颖超笑了：「你怎么问这个？我只是听她私下里讲过，她仍然留恋银幕和舞台，对政治运动反感，说今天整这个，明天整那个，整来整去，能有好人……。可能跟她被查出来三十年代初在上海的那些事有关。」

周恩来轻轻舒了口气，确是很难想象蓝苹今后在政治上能有什么大作为。他握了握小超的手，回到了原话题：「主席那头，现在算是稳定住了，暂时不会再提出什么跟蓝苹分手的事。我和总司令，也只好做到这一步了，算是对得起孙炳文烈士；剩下维世这头，怎么办？真是女大不中留啊。」

邓颖超说：「是呀，我们该替她操操心了，二十八岁大姑娘，还没个主，也不成回事。这次她和主席做了场白日梦，不知会气成什么样子。我们是不是把她接到家里来住两天，好好跟她谈谈。毕竟算我们的孩子。」

周恩来摇了摇头：「唉。她还有亲生母亲任锐嘛。当然，她和主席的事，也不一定能传到任锐耳朵里去。她本人也不会去讲。让她自己先去心灵苦斗一番吧，尝尝苦和辣的滋味也好。这十几年大家太宠着她了，她也太顺利了，二十八岁还不知厉害，还没有长大……。放心，她不会有事，心性高着哪，艺术上的事业心强着哪。我相信，过几天，她自己会找上门来，我们再来因势利导不迟。」

邓颖超拍拍脑门，想起什么事儿来了：「对啦，上个月初，你和主席还在莫斯科的时候，戏剧家金山来看望过我，说是让跟你说说，支

持一下他们的话剧事业。他说周扬、茅盾和夏衍、田汉都支持他筹办中央戏剧学院，还要成立中央实验话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大干一番罗。他说总理喜欢话剧，年轻时在南开中学还参加过演出，现在要请总理批个计划，并给他们中央戏剧学院题写院名。」

提起金山，周恩来来了精神：「金山啊，天才，我们的戏剧大才子。他不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主持工作，拍了部片子《松花江上》？也调进北京来了？很好，很好，老朋友了。还记得吗？一九四二年，他到重庆主演郭沫若的新编历史剧《屈原》，那个轰动哟，连国民党的报纸都不得不称他为伟大的演员。如今到了北京，开创新中国的话剧事业，我支持，主席也会支持的。你问没问他，太太、孩子都来了吗？」

邓颖超说：「问了，他太太当年也是陪都的几大美人之一。他说他和太太分手了，孩子也归了太太，留在了长春。现在是重做王老五，无牵无挂一身轻。」

周恩来摇摇头：「这个金山啊，天才是天才，就是风流些，才子佳人的艳闻不绝。艺术家啊，只怕今后也要思想改造改造了。成立中央戏剧学院，我当然高兴。题写校名，我的字不如主席。主席既喜欢京戏，也喜欢话剧，翰墨又好，请主席题写合适。」

邓颖超说：「你呀，也是一天到晚的忙，把别的事丢一边了。我有时想和你商量个事，都插不上……。你不觉得维维和金山，是挺合适的一对？」

周恩来沙发背一拍：「对呀！看我，真是忙晕头了，亏得你提个醒。金山，记得在重庆时问过他，是一九一一年的，比维世大十岁，年龄合适。又都是从事舞台艺术，专业也对口……。不过，这事不可操之过急。我看先跟夏衍打个招呼，安排维维也去中央戏剧学院，当不了副院长，先当个表演系主任，参加党委什么的，让他们先有些工作上的接触，相互熟悉熟悉。之后，你再看机会给金山提个词儿。但一定不是我们包办，只是牵个线，当个促进派而已。不然维世会反感的，她和主席的关系相信也还没有完全断……」

不觉到了四月初。一天凌晨，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话，问他有部香港影片叫《清宫秘史》的看了没有？周恩来回说：「听说了，是我们的港澳地下工委支持凤凰公司拍摄的。但回来后一直忙，还没顾上去欣赏，主席看过了？」毛泽东说：「看过，是蓝苹推荐的，说我非看不可。」周恩来说：「蓝苹是内行，是主席最好的艺术顾问啊！」毛泽东那头，却似乎对他夸赞蓝苹不感兴趣，而说：「有人讲这个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我看不是，大大的不是。为此，我给政治局的诸位大人写了几句话，会派人送上。恩来，你再忙，也应该抽时间看看，奇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啊！」

下午，机要秘书将一封毛泽东的书信，放在周恩来的书案上。由于要分送十来位政治局委员，信是由主席的秘书刻印的，毛泽东在信末签了名：「《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诸位以为如何？」

周恩来一时有些摸不清头尾，一部香港左派公司拍摄出来的历史题材影片，听说夏衍他们支持过的，主席怎么会如此反感，提出如此严重的斥责？有人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个「有人」是谁？起码是政治局委员吧？不然，主席为什么要写信给政治局的每一位成员？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杀鸡用牛刀？不不，主席对待问题，从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为了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周恩来给刘少奇挂了个电话，少奇同志或许了解主席写信的背景。刘少奇在电话里说：「我也是刚收到主席的信。影片我倒是看了。是上个月初，你和主席还在东北。那天晚上开完中央政府工作碰头会之后看的。看完出来，天都快亮了。后半截我没大看清楚，因为实在太困了。只记得拍了很多中南海里的实景，瀛台、丰泽园、勤政殿、海宴堂、怀仁堂、中南、南海都有。大约是我们住进来之前，人家来拍的实景……。恩来，我看现在事情太多，实在顾不过来，这事政治局就先放一放吧，让中宣部、文化部去讨论讨论嘛。」

看来刘少奇也不知底细。周恩来同意刘少奇的意见。的确，多少

国内国外的大事压在那里等着处理：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华东野战军正部署解放台湾、渡海作战，南方要剿匪反霸，全国要肃清反革命，老区要完成土地改革，刘、邓大军要进军西藏，全国要统一发行新货币（人民币），铁路、航运交通要恢复正常运转，几千名苏联专家即将来华援助，还有新区老区都要大抓春耕生产，几亿人口等着吃粮……国计民生，国家生存，哪一桩哪一项，不比评论一部影片要紧？的确是顾不上。国家大事，轻重缓急，少奇同志是对的。《清宫秘史》的好好歹歹，由中宣部和文化部去管吧。

关于刘少奇，周恩来也觉得有什么不妥当似的。他访苏回来后，看到中央办公厅的简报：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讲话。少奇是去年十二月下旬和今年一月上旬到天津视察的，是代表中央去指导工作。因是带着王光美去的，因此有些老同志开玩笑，说是新女婿上门。王光美的家族是天津的大资产阶级，少奇同志原本也是应该适当回避一下的。带着王光美回去，是有些招摇了。

天津的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大名黄敬。黄敬何许人？说起来还是周恩来的祖籍绍兴同乡，原名俞启威。李克农私下告诉过：「俞启威是江青在青岛读书时的第二个同居丈夫。」这位江青的首任同居者主持天津工作之后，却对手下的那批部队转业到市里的干部约束不力，任由他们去组织工人群众跟资本家斗争，搞什么工人自治，接管工厂、商店，逼得资本家关闭工厂、商店，导致工人阶级成批失业，连饭都吃不上，城市供应短缺，社会治安混乱。这在全国大中城市是个普遍现象。不少地方已经有失业工人上街游行，提出口号要工作，要活命。

刘少奇代表中央去天津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在出访苏联之前同意的，并委托刘少奇主持发一个党内文件，在接管大中城市后要坚决克服左倾急躁病，政治幼稚病，一切以恢复生产、保障供应、安定人心、维护治安为中心。刘少奇在天津召开了多次工商业者座谈会，认真听取了民族资本家们的意见，并作了一系列的讲话。由于刘少奇在天津阐明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民族资产阶级政策，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方针，天津的工厂开工，商店开门，局势很快稳定下来。天津经验也给全国大中城市恢复正常秩序，带来很好的影响。这是主

流。

周恩来看到的中央办公厅简报，刘少奇是在天津讲了些大实话，有些句子是走了火的，要是有人反映到主席那里是肯定不太妙。比如刘少奇说：「在现阶段，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要承认资本主义的剥削是进步的；现在工人的痛苦是工厂关闭、商店关闭、工人失业、店员失业、生活没有着落，造成社会治安不稳。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要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人就没法活。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是有功。……」中央办公厅在整理印这份简报前，交少奇同志本人审阅过没有？现在是王光美任少奇的秘书，大约也是粗心大意、忘乎所以了。要是在西花厅，就决不会允许这些句子上简报的。

干女儿孙维世经过电话联络，终于出现在西花厅。

这是自三月初从苏联回来后，干女儿第一次上门。周恩来、邓颖超见了，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只拉着干女儿的手嘘寒问暖，问她家里母亲、兄妹的身体、学习、工作情况。

比起在莫斯科有爱情滋润的那段时日，干女儿显然清瘦了些，眼眶也像描过一圈眼影，发青哩。她是喝了一杯人生的苦酒啊，这丫头。但对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周恩来坚定地相信。以干女儿的年轻、好胜，独立个性，强烈的事业上上进心，怎么可以去做毛泽东的生活伴侣？怎么胜任得了菊香书屋的女主人？她的拗性子跟毛的牛脾气正好针尖对麦芒，半斤八两。谈情说爱卿卿我我是一回事，朝夕厮守眼睛鼻子是另一回事。长痛不如短痛。没错，自己和总司令在这件事情上，配合得默契，处理得正确。

原来干女儿是顺道来看望他们的。晚上十点在怀仁堂礼堂有场电影，主席生活办公室通知孙维世来取入场券。周恩来问又演什么影片？干女儿说是《清宫秘史》，您没看过？周恩来说：「我哪能像你们那样轻松潇洒啊？每晚上都有两三个会见、谈话或是会议等着，而且都是在十点钟之后。」

干女儿说：「这个片子您一定要看，听讲在中宣部开会，江青只是名电影艺术委员会委员，却和陆定一、周扬、胡乔木都吵起来了，

像个泼妇似的，又哭又闹，硬说《清宫秘史》是坏影片，卖国主义大毒草，应当批判、禁演。陆定一部长不同意：「禁演？那是封建时代的事，我们新中国只怕不好开这个先例。」周扬也说：「有问题可以讨论，有错误可以批评，禁演不是好的文艺工作方式。」胡乔木是主席的政治秘书，也是中宣部副部长，这回却态度明确：「江青同志，怎么能说是大毒草，卖国主义？少奇同志看了，说是爱国主义的呢！」三位中宣部领导人哪里把她放在眼里？气得江青哭丧着脸，光流泪，挨了三大巴掌似的，讨没趣，受了大委屈。」

周恩来心里一震，原来是这么回事。难怪有主席的那封信，这回主席是要护着江青了。好在信的内容还没有透出去……这个电影，自己和小超，是一定不要去看了，不去看了，避免卷入纷争。军事、外交、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国内国外的大事还忙不过来，去争论一个电影，还大动肝火，不值。

吃过晚饭，周恩来看看手表，说自己还可以有二十分钟的空闲。邓颖超明白他的意思，对孙维世说：「维维呀，你爸爸从苏联回来，这是在家里吃的第三顿饭。平日他忙得我都难于打上照面。二十分钟，宝贵喽，你们就到小客厅去说说话吧，那里比较清静。」

周恩来拉着干女儿的手，进到小客厅。邓颖超亲自送来两杯清茶，退出去，带上门，并叫一名卫士在门外守着，不让人打扰。室内，周恩来既慈祥又严肃地盯住女儿问：「不说废话了，你该拿起你的业务来了。对于工作，有没有什么具体计划？要不要我帮帮忙？」

干女儿的微笑中带着苦涩：「我嘛，小人物一个，当然脱不开大人物的爱护……。我的志趣仍是在舞台上，想编戏导戏。别忘了，我是莫斯科大学戏剧系毕业的。夏公说：「我受过正规的艺术教育，算凤毛麟角，不要再去做什么俄语翻译，那方面的人才多的是，应当在新中国戏剧舞台上发光发热。」」

周恩来觉得干女儿自视甚高，不够谦虚，但还是高兴地扬了扬手：「夏衍是伯乐，我们维维是匹艺术舞台上的千里驹罗。很好很好。前两天，你妈妈还在说，金山同志正在筹建中央戏剧学院，维维可不可以去做个帮手啊？金山你认识吧？他可是我们国家的一位天才演员，

杰出的艺术家。」

干女儿说：「还能不认识金山！戏剧界的大才子，大人物，架子也不小……不过我不想去戏剧学院教书，跟学生、课本打交道。我向夏公请教过，夏公也基本上同意了，中央实验话剧院也正在筹办，夏公要提名我去做副院长和总导演。」

周恩来两眼放光：「行呀！维维，副院长兼总导演，你肩膀担得起重任？不过，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王稼祥、萧华他们，都是二十来岁，就当了解军的总政治部主任、组织部长啦！过去我们是从战争学习战争，现在你们是从舞台学习舞台。金山是我的老朋友，我会抽空跟他打个招呼，今后不要在我们维维面前摆大艺术家的谱了，要多予关照、帮助、指导。」

孙维世笑了笑：「谢谢啦。我一定虚心讨教。如果我排演出了大型话剧，您和妈妈一定要出席观看，批评指教。」

周恩来伸出手去，握住干女儿的纤纤玉手：「一言为定。我再忙，也要挤出时间，和你妈妈一起去看。说不定还能请动朱总司令和康妈妈也去。」

孙维世眼里一时又闪亮起泪花。周恩来抿了抿嘴角，终归是没有忍住，还是问了：「维维，苏联回来，你还去看过主席吗？」

干女儿掏出手绢来轻轻贴了贴眼睛，点了点头：「去过三次。他心里很苦，放不下我。见面就要，没个够。好可怜……。他告诉我，想提出跟蓝苹分手的事……。」

干爸爸问：「怪事了，你就不怕自己受孕？」

干女儿绯红了脸：「放心，医生给他化验过，他的精子一大半是死的，已不能使对方受孕……。是他自己告诉我的。他说：「他提出跟蓝苹分手的事，头一关中央书记处就通不过。党主席得服从党的大局，带头维护党的形象和威信。新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蜕变出来的，住进中南海里，处处有封建主义的阴影，挥之不去，有情人成不了眷属。……要造反，就成了造共产党自己的反了。蓝苹是盆剩菜残羹，如今一伙人硬是逼着他老毛吃这盆剩菜残羹……。」」

周恩来身子发冷似地晃了一下，问：「蓝苹是什么剩菜残羹？」

孙维世说：「主席讲的嘛，不是我编派的嘛。他说，四八年全党全军三忆三查运动，中央社会情报部李克农、潘汉年他们才查出来，江青历史上不干净，三十年代初在上海一段，男女关系十分混乱。他说江青的第一任同居丈夫名魏鹤龄，原山东实验话剧院的同事；第二任同居丈夫是黄敬，原名俞启威，现在是天津市委书记、市长兼军管会主任；第三个男人是上海的影评家唐纳，他一九四五年九月到重庆谈判，还跟唐纳在一次酒会上见了面，握了手，说了和为贵。现在唐纳逃去海外，下落不明；第四任男人也是上海的电影导演，叫章珉，现在是中央文化部电影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以上是公开同居过的。临时偷欢的还有史东山、袁牧之等等，保守的估计也是两个班以上……」。主席说：「这些情况，原先在延安时了解得很少，一九四八年三忆三查才搞清，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悔之晚矣！他这个党主席头上，扣着二、三十顶绿帽子，恶心不恶心？」

周恩来身上不再发冷，而有一种莫明的快意。他不动声色，告诫说：「维维！这些话不要再对第三者说了，会掉脑袋的！主席还说了些什么？」

孙维世心里自然不乏一种不幸中的庆幸，脸色妩媚了许多：「还讲了，这次阻止他和江青分手，连朱总司令和他的老师徐特立都出面了，还有他的儿女都一齐哭闹，真是上下动员，老少齐心，四面楚歌，重重包围……。他说江青后面有高人。」

周恩来瞪圆了眼睛：「主席怀疑谁？」

孙维世莞尔一笑：「他指刘少奇。我没有说话。我知道不是刘副主席。」

周恩来倒抽一口冷气，头脑简单啊，主席是在糊弄你啊，你是我的干女儿啊！他正色道：「维世！中央领导人之间的事，包括主席私下里谈过的话，你一个字也不能透出去。这是党纪国法，铁面无情的，否则谁也救不了你，明白吗？我们做人，有时要稳似泰山，有时要如履薄冰，这是辩证法，不懂利害关系不行。至于你和主席继续交往，我不会再管，你邓妈妈也不会再管。相信江青也管不了，明白吗？这话，点到为止，你自己去把握分寸。记住了，你要保重，保重。」

送走干女儿，周恩来匆匆起身，挟上公文包要去紫光阁开会。邓颖超赶上来，陪他走了几步，轻轻问：「你们谈得怎样？没事儿吧？」

周恩来笑笑：「放心，她已经过了最难的一关。有机会，多和金山联系。」

有一句话，周恩来装在了心里：「此女不可留，赶快嫁出去。不知死活，不知退出，怎么行？」

第二十九章 贪恋红尘

刘少奇一早就来了电话，告知周恩来：「主席要任命南乔——乔冠华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办公室主任。主席说，这样，北乔、南乔两位才子，就都到了他的名下，一个党主席办公室，一个中央政府主席办公室主任，珠联璧合。主席让你打个招呼，通个气，南乔不是还一直挂着你的外交部部长助理嘛？」

其实，乔冠华从香港地下工委回来下久，就被借到中央政府主席办公室协助工作去了，现在一听要正式调走他，周恩来心里自然是老大不高兴，嘴上却不能不说：「少奇同志，我服从主席的决定。不过，外交部这边也很需要南乔，我看还是让他继续兼任外交部的部长助理，行不行？要不要麻烦你请示一下主席？」

刘少奇在电话里停了一下，大约在思考什么，才又说：「这种事，一经请示肯定就不行了。我知道你想留个伏笔，以后好把人要回去。这样吧，我来通融一下，告诉中组部下中央政府主席办公室主任写任命书时，不要免去他的外交部部长助理职务，文字上含糊一下，不就仍兼任着部长助理？当然工作上要以前者为主。」

周恩来不能不佩服少奇同志处事老到通融：「太谢谢你了，真的，非常感谢。」

刘少奇说：「恩来，还有件事，主席倒是让和你商量一下，南乔的爱人龚澎是不是也在外交部工作？听说英文能力很强。主席身边现在少个英文秘书，兼做他的英文教员的。龚澎合不合适？这人我没有印象，她多大年纪？」

周恩来心里真是倒了一罐子五味汁，主席怎么就总是朝我这里挖人呢？特别是龚澎，怎么又叫他给看上了。龚澎可不是孙维世，有家有室有孩子。他说：「少奇同志，龚澎你肯定见过的，现在外交部新闻司任处长，大约三十出头吧，好象比蓝苹还小两岁，是个很优秀的女同志，当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英文秘书，新闻发言人。」

刘少奇问：「是不是那个什么「陪都金孔雀」？那时重庆左派右派的报纸都这么称呼它，董老也称她为南方局的仪表人物的？她来做

主席的英文秘书，很不容易的，合适不合适？」

周恩来捏着话筒想了想，说：「能到主席身边工作、学习，是我们下边每个青年干部的幸福，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不过，龚澎的两个孩子还小，一个三岁，一个五岁吧。如果做了主席的英文秘书和英文教员，就要随时陪着主席，跟随主席外出。所以对龚澎和南乔来说，他们个人生活上的困难比较大，毕竟孩子太小，离不开母亲嘛，这就需要组织上替她考虑了。」

刘少奇说：「明白了，我看这事，就不要去征求龚澎本人的意见了。主席的英文秘书和教员，看来还是委托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他们，物色一个男青年比较合适，你说呢？」

正中下怀，周恩来心里稍稍轻松了些。看来，少奇同志处理一些干部人事问题，还是分寸上拿捏得十分准确的。也不能谁看上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志，就都要朝谁那儿送。不然干脆替他设个变相的后宫好了。周恩来忽然问起了另一件事：「少奇同志，主席给政治局成员们信后，有没有提过要开会？」

刘少奇那头说：「我也正想问问你呢，主席没有向我另外打招呼，也没有和你提过？」「没有。很好。我看呀，现在等着我们处理的国内国外大事成堆成摞，那部片子是好是歹，就先放一放吧，还有宣传部和文化部嘛，属于陆定一、周扬、胡乔木他们的职责范围。」

没见刘少奇提到江青在中宣部跟陆定一、周扬、胡乔木吵闹哭鼻子的事，看来少奇还被蒙在鼓里呢。周恩来也就不便多说，只是表示同意少奇同志的高见，确是国内外大事成堆，有些超负荷了，少奇同志要保重身体啊！周恩来的一个律己原则，关系到中央领导人之间的事，多一句话、一个字都不说。一切以毛泽东主席的态度为基准。即便是有人对他说道三道四，他也只是听，绝不表态吭声，绝不惹事上身。

日日夜夜，文件电报、大会小会的忙忙碌碌，周恩来像一只上足了发条的座钟，切切察察，不知疲倦地运转着。他忙碌得得心应手，喜欢一群分管各行各业的男女秘书围着他转，争着挤着朝他面前送各种急件、要件。一天，几个月未见面的龚澎，忽然来了电话，说有事情要找总理汇报。

周恩来让值班秘书将电话转进他的办公室来，他很高兴的说：「龚澎啊，谢谢你还记得我。你不要也跟着人喊什么总理、总理好不好？在重庆时怎么称呼还怎么称呼……。这样吧，明天上午我要到新六所去开个政务院系统的会议，你中午到新六所四号院去，小李在那里值班，我会事先通知他。我们一起吃中饭，边谈谈，好吗？什么时候把你的两个小宝贝带到西花厅来玩玩？你邓大姐说要约个时间，请你们全家来吃顿饭，连保姆一起来。那好那好，明天见面谈。」

周恩来有个设想，在西花厅前院靠西墙的空地上，盖个可以容下百十号人的总理会议室。西花厅东边的一座大院已经做了政务院办公厅，再加个会议室，职工食堂，政务院就自成一体了。现在一召集属下的部长、主任们开会，西花厅坐不下，只好到万寿路新六所去，那里有个中型会议室，倒是很清静。他乐得换换地方，换换空气。中南海也不是没有场所。紫光阁本可以坐下百十号人，但四周都是文物字画，原样保存着，一不小心就会造成损毁；怀仁堂也有现成的中型会议室，但归主席名下的中央办公厅管，他尽量不去麻烦；至于勤政殿，则是中央政府主席召集会议的殿堂，有象征意味的，他更不便去启用了。

西郊万寿路新六所的六座西式楼房，依毛、朱、刘、周、任顺序，错落有致，掩映在绿荫里。以一号院最为阔大气派，卧室、厕所无不大一号，突出毛泽东的最高领袖地位。后来在全国各地建造的行宫，一律遵从此例。四号院为周恩来所有，一栋青灰色二层别墅，有坚固的防弹地下室。院子里沿墙种了一圈常青女贞，中央是花坛，以及几棵宝塔形冷杉。院前院后，大青砖铺出甬道，供主人散步活动筋骨什么的。别墅内，一楼有门厅，客厅兼小会议室，餐室，厨房，资料室，秘书值班室，警卫值班室；门厅内侧有一造型典雅的旋型扶梯。楼上过道宽敞，分别连通着书房兼办公室，两套宽大的主人房，一套保健护士值班房，以及可以跳舞健身的大露台。五座院落，各以长青柏树做为绿色屏障，互不相望的。

龚澎骑一辆自行车，后座上夹着公文包，于翌日中午十二时先到新六所东总门的警卫值班室出示证件，填写表格，再经值班人员与四

号院电话联系认可，才发给她临时出入证，一次性使用有效。由于有规定院内不许骑车，龚澎只好推着车走了好长一段路，又经过了两道岗哨，才抵达四号院。由周恩来的卫士之一的小李接着，彼此相识的。龚澎问：「总理还没有散会吧？」小李说：「快了，刚才还打电话回来，问你到了没有呢。」

龚澎把自行车在院墙边架好，说：「你们这里的规矩越来越大了，进来一趟还真不简单，层层岗哨。怎么上回我和冠华来，坐了辆中央政府的吉普车，门卫岗哨连问都没有问，还举手行礼，就放行了呢？」小李笑说：「这叫认车不认人，中央政府的吉普车牌号，就是通行证啦。前不久的晚上，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将军和警卫员一人骑一辆单车来看电影，门卫硬是堵着要证件，气得刘司令员大骂：「老子上井冈山的时候，你父母还没下你这个蛋呢！」后来警卫团报告主席，听说刘司令挨了批评……。龚澎姐下回坐外交部的车子来，门卫岗哨也不会拦。」龚澎说：「本想要车，但只一个人来汇报工作，怕总理批评啦。再说北京的路面平直，天气又好，踩单车是个享受。从前我在城里念书，几乎星期天都和同学踩着车上颐和园，逛圆明园，卧佛寺，最远去过芦沟桥。」

正说着，周恩来快步进了院子，身后没有人跟随。大约他的秘书、司机、警卫员都到六号院大食堂吃中午饭去了。周恩来先看到那辆自行车，后看到龚澎：「小龚呀，骑车来的？也是刚到？很好很好。我也要去弄辆自行车，在中南海上班、开会骑。既简便，又锻炼身体。可惜没法子像你们一样，在北京的大街小胡同到处转悠罗。」

小李在旁报告：「总理，厨房里说，饭菜都准备好了。要不要喝两杯？」

周恩来拉了龚澎的手：「请，请。肚子真还需要补充了。小李，有什么开胃的？小龚来汇报工作，是我的客人啦。」

小李笑答：「有，有，遵您的规定，四菜一汤，红烩白洋淀鲤鱼，奶油潮白河大闸蟹，干炒牛柳丝，素菜是炒茭白，汤是莲藕炖排骨。」

周恩来满意地朝龚澎点点头：「看看，我们小李把菜谱都背出来了。今天中午是特为招待你的。平日我哪有时间弄这复杂？两片烤面

包，一杯玉米糊糊，坐进车里边吃边上路，省事又省时。」

龚澎走在他稍后，拉下小半步，说：「知道你早餐中餐都是穷对付，外交部的开车师傅都在说，未见咱总理忙的，一上车就咬面包片！我看呀，今后只好动员部里各个司局的老大姐们分头来拜望你，汇报工作，好让你经常改善饮食。」

周恩来哈哈大笑：「小龚，拜托，那我可招待不起！小李替我管钱，可以作证，伙食费是我和你邓大姐工资里出的，没有大户吃呢！」

进到餐室，周恩来安排龚澎在小餐桌前坐下，自己却进厨房里去问候了两位大师傅，再亲自端了一海碗莲藕排骨汤出来，才坐下，用碟子里的小毛巾擦了脸，另换毛巾擦了手，举起了筷子：「小龚呀，中午不喝酒，喝了就犯困，会误事。老熟人了，我不替你夹菜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周恩来用餐，动作很快，也不再说话，吃得专心致志，有滋有味。龚澎慢嚼细咽，不时看他一眼，心里涌起一阵热浪，眼睛也有些发辣。因有工作人员在旁，她尽量克制住自己。眼前这位男士，虽然年龄上比自己大出近二十岁，但每次个别聚餐，就喜欢看他的吃相，原形毕露，一点不像他在大宴小宴上表现的那个绅士派头，温文尔雅，礼仪周全。

龚澎细心地挑去了鱼肉的细刺，再用小碟子盛了，推到周恩来面前去。就像她在家，每逢给两个宝贝儿子吃鱼时所做的那样：「喂，你不能慢点儿？好象跟人比赛哪，能品出人家大师傅的高超厨艺来？」

周恩来抬起头来，歉疚地朝龚澎笑笑：「对不起，失礼了。只要不是宴会，一般的工作午餐，我的速度总是比较快的。不过可以放心，我不像主席，长年吃他的几样湖南特色，百吃不厌。我是法式、中式通吃，古今土洋，高低贵贱并举。朱老总称我是美食家哪。」

龚澎自小有教养，懂得饮食节制，驻容养颜。生过两个儿子，仍然身材高挑，亭亭玉立，秀色可餐。

不到二十分钟，午餐完毕。周恩来擦手，擦脸，漱口，边说：「小李，天气暖和，春风习习，麻烦你替我搬两把藤椅到后院草坪去，再泡一壶龙井。之后你和大师傅吃饭午休去。我要和小龚边晒太阳边谈

工作。三点钟，你替我安排好车子，要赶回颐年堂去，有碰头会议。记住了，到时时你提个醒，别误了。」

后院草坪，周恩来和龚澎一人一把藤椅，一杯龙井，慢慢品着。柏树上，雪杉上有鸟雀啁啾，安静极了。龚澎明眸似水，盯住周恩来一动不动。周恩来也看着她，感慨万端似的，忽然叹了口气，轻声说：「澎，你有什么话，就说吧，公事私事都可以说说。」龚澎眼圈微红，眼波欲流，声音很轻：「我要说了，你不要骂人，好不？」周恩来慈爱地点点头：「好的好的，我很少批评你呢。」龚澎垂下眼睛，盯住手里的茶杯：「我呀，每天看到自己的两个小家伙，就总是在想，要是有人能替他生下个后代就好了，他那样一个男子，没有后代，真是太冤了。要是有人敢，你敢不敢？」

周恩来仿佛被什么击中似的身子一晃。他脸膛泛红，目光炯炯，只过了一会儿，脸一偏，声音就变硬了：「傻瓜！想傻事，说傻话。感激之余，要告诉你，此事绝无可能。我不要毁了人的声誉，那怕只是些污渍。你知道，我很看重个人的声誉。至于你，我要看到完美、白璧无瑕，明白吗？懂得我的苦衷吗？我和你邓大姐先后收养了十多个烈士孤儿，怎么没有后代？小封建脑袋瓜。非得自己亲生的才叫后代？我讲的是革命人生，革命后代。也许你认为我的人生不完整，有欠缺。我自己却从没这么想过呢。希望今后不要再听你说到此类傻话，下不为例。这事我是很严肃的……。告诉我，你和南乔，是不是感情上有了什么不谐？胜利了，进了城，为了党的事业，国家的大局，我们每一位干部，包括本人在内，应当尽量避免个人感情上的麻烦。小麻烦往往引发大麻烦的。」

龚澎很快地扬起脸庞：「不，南乔待我一片真心，我也很敬重南乔。生活很和谐的。主要的，他很多方面和你太相像了，有风度，好学问，善交际，爱读书，喜欢西洋古典音乐，能欣赏京戏、话剧、歌剧，还特别能喝茅台。在家里的吃相也像你，原形毕露。你们俩都不抽烟，在外边都是衣着整洁，君子风范……南乔也是个好父亲，每天下了班到家外套一脱，头件事就是跟两个儿子爬在地板上顶脑袋，玩斗牛。我说他没大小没规矩，他说革命者头皮要硬，要敢于顶牛。也

有些烦人，老是纠缠着，说趁年轻，要再生两个……。」

周恩来很动情地双手在藤椅扶手上击节着：「太好了，太好了，你和南乔生活得美满幸福，我心里也就幸福了。是又羡慕又满足。这是真的，信不信由你。」

龚澎羞涩地笑了：「信啦，你个精神上的柏拉图。」

周恩来也笑了：「柏拉图有什么不好？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我想做都做不上罗！南乔在主席那边，工作还顺手吗？每次都在会场上彼此点点头，没有来得及聊聊。外交部这边，还给他挂着部长助理，我想他心里有数的，给他留着退步。」

龚澎说：「他不傻，很感激老上司的。前天，他回家跟我说了两件事，让我千万别外传。但我觉得应当告诉你。这是我来约见的主要原因。」

周恩来将藤椅朝前移了移：「什么事？先说头一件。」

龚澎声音很轻却很清晰：「前天中午，中办杨尚昆同志找到南乔说，主席需要一位英语教员，每天授话一小时，你爱人小龚听讲英文顶呱呱，能不能帮帮主席的忙？主席自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开始请人教英文，已有相当的基础，只是他的湘潭口音很拗口，发音是大问题……。」

周恩来心里苦笑，还是盯住不放啊！他问：「南乔答应了没有？」

龚澎说：「南乔对杨主任强调了家里有两个孩子要照顾，再说也要征求小龚本人的意见。谁都想到主席身边去工作一段，就是孩子太小，家务事多，真遗憾。杨主任真奇怪，竟说：「我看这事，我去向主席替你们回了，另外找人吧。」南乔回到家里，拉我进到卧室关上门，才把事情说了：「决不能两口子都往一个人那里凑，不去倒好，去了再出来，就难了。决不去做那御前行走！」」

周恩来赞赏地点着头：「高明高明，你们在心里，也应当感谢杨主任，一位很正派的老同志。」

龚澎蹙了蹙眉头：「肯定是主席点的名，上回我来列席中央政府委员会，休息时主席还特意过来跟我握了手，问了英式发音和美式发音的异同……。我不肯去教他英文，会下会惹他不高兴？人家争着

抢着还挤不上呢，我是不是不识抬举？」

周恩来态度鲜明地说：「不是。南乔是对的，不要两口子——都往一个人那里凑，不去倒好，去了再出来，就难了。放心，主席没有公（龚）老师，还有母老师哪。」

龚澎一脸妩媚，笑得灿烂：「你呀，你呀，难得大总理说得那么俏皮。」

周恩来问：「还有第二件呢？往下说，我洗耳恭听。」

龚澎不笑了，声音更轻了些：「也是前天，下午时分，南乔去菊香书屋主席办公室送文件，站在门口没进去，因为高岗同志正在给主席汇报工作，先听高岗说上月初北韩领袖金日成托人捎信到沈阳，想就近来拜望毛主席，但主席已离开沈阳回北京了；再就是告刘少奇同志的状，什么天津讲话，完全站到他岳父老子大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弄不好，刘少奇要当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了。南乔听了几句，觉得不妥，赶快退回到颐年堂北面的自己的办公室去了，直到高岗走后，主席派人来找他。」

周恩来目光锐厉，问：「主席说什么没有？」

龚澎说：「主席什么都没说。南乔看得出来，他们关系融合。南乔说：「想不到高岗同志这么个大领导干部，草莽气十足，跟主席就像拜把兄弟似的。」南乔很有些忧虑……。再又，南乔无意中在主席那里看到一封北朝鲜金日成的信，中文的，说要向我们借一个兵团的人马，换上北朝鲜军服，去帮助他们解放南朝鲜……。南乔说：「军队怎么可以出借？我们不成了沙陀国了？」总理知不知道这事……。」

周恩来已经浓眉紧拧，脸上透出愠色。龚澎不知就里，住了嘴。

周恩来忽又叹了口气，脸上恢复为和颜悦色：「龚澎，你叫我怎么说呢？我为什么一再让你避开菊香书屋、春藕斋那些地方？白虎堂上的事，你知道得越少越好。万一知道了也要当做不知道，自己就把它吞掉，烂到肚子里头去。你要回去跟南乔说清楚（不要说我讲的），今后绝不可将菊香书屋的事带回家里来。家里还有保姆、通讯员、厨师对不对？都是机关事务局派给你们的是不是？弄不好，会把你和孩子的前程都毁掉。我决不是吓唬你。看来，南乔也不适合在那里工作，

太不适合了，文人气质，书生意气。陷得深了，到时候想拔出来都拔不出了。为了你和孩子，我会尽早设法调他回外交部来，明白吗？今后，你，龚澎同志，请注意，再也不要来给我传这烦事，有害无益。尤其对你们无益。我就鼓励所收养的烈士子弟们，都去读工科，学数理，长大了当科学家、工程师，对国家有更大的用处，明白吗？我的这些话，哪些可以对南乔说，哪些要换另一种方式说，你自己回去思考、拿捏吧。我这个人啊，一直生活在漩涡里，也从来不怕复杂和麻烦，但我也向往单纯、轻松，向往无忧无虑的日子。可惜我做不了留侯、做不了陶潜，我不行。功成身不退。我贪恋人世，贪恋红尘……以后，多带孩子去西花厅聊家闲、听音乐吧！大家都轻松明快些，好吗？不要让我来替你和南乔担心，好吗？」

龚澎仰起了明媚如春光的脸蛋，眼睛里波光闪闪。

周恩来攥紧了龚澎的小手。

第三十章 金日成密访借铁骑

四月十七日，林彪麾下的第四野战军渡海兵团，以木帆船作战舰，万船齐发，在海南岛东北部海岸抢滩登陆，瓦解了岛上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

正在这时，北韩领袖金日成将军秘密来到北京，入住中南海海晏堂一号院。海晏堂原为清末西太后慈禧招待女宾的场所，共有十来座宫式小庭院，现在用作中共中央接待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领导人的国宾招待所。毛、朱、刘、周都觉得新中国应当建造新的国宾馆，但眼下只好在海晏堂临时凑合。这些庭院虽然小巧，但也雕梁画栋，十分精致、幽静。

应当说，金日成为新中国成立半年时间以来，到访的第一位兄弟国家元首。因是秘密来访，公开亮相不得，也就不能有红地毯、仪仗队、国歌国宴等等。便是在中南海内部，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海晏堂住进了这么一位尊贵的客人。一切只能是静悄悄的暗中行事。况且毛、朱、刘、周对金日成此次密访的目的，也不太有兴趣，又不好明言谢绝。两个月前，毛泽东、周恩来逗留莫斯科期间，金日成也秘密到了莫斯科，并跟史达林同志多次会谈，却对中国同志封锁消息，也不提出跟毛泽东、周恩来见见面，连个起码的礼貌都不顾。毛泽东当时很不悦、远亲不如近邻啊，近邻却不理睬我们，总有一天，他会到北京求助我们的。

没想到只过了两个月，金日成果真登门。毛泽东不忙举行双边会谈，而是在菊香书屋自己的书房兼办公室里，像召见部属似的，先单独接见，只有周恩来一人作陪。金日成会说中国话，并且会读会写，因之双方都不用翻译人员。他呈上的礼物是五只长型锦盒，每盒内躺着一支一尺来长的高丽全参，中共五大书记一人一份。唯送给毛泽东主席的那一支是特大型的，足有两尺半长，像个小胖娃娃似的，称为高丽参王，据说价值连城。

献礼之后，金日成很坦率，开门见山向毛泽东提出：史达林同志已答应支持他解放南朝鲜，实现南北统一，愿无偿提供军火援助及空

中掩护，并要求他快速作战，地毯式推进，三个星期内结束战事，宣布成立统一的朝鲜共产党国家，让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想干涉都来不及。为此，北朝鲜党和政府经过认真考虑，只好来求告中国同志，借用一个兵团的军力，换上朝鲜服装，作为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开赴南朝鲜战场，待南北朝鲜统一后，立即奉还。朝鲜国党和政府会在首都平壤或是汉城建造永久性的朝中兄弟友谊之塔及功业纪念馆，世世代代感念中国同志的无私援助。

会见场合，本应双方客套，互道情谊，却成了金日成一人滔滔不绝的求告。毛泽东只是微笑、点头，表示知道了，知道了，却没有说话。直至金日成把一肚子计划、请求说完了，毛泽东才朝周恩来指了指，意思是由周恩来先予答复。

周恩来在一个本子上作着纪录，记下了金日成求助的要点。他很快地将手头的本子扫瞄了一遍，也是要用一点时间来考虑如何答复。因为他并不清楚毛泽东主席此刻的心情和意向，只能暂时先说几句表面上顺耳好听、实质上伸缩性大的活话：「尊敬的金日成同志，我们热烈欢迎你的到访。由于是秘密性质，我们没有举行隆重的仪式。我们虽然是两党两国，却是一衣带水，是一家兄弟一样的亲人。很感谢您让我们了解到，苏联老大哥特别是史达林同志大力支持你们进行南北统一之战。我们中国党和政府也肯定要大力支持你们的。至于以何种方式、手段支持？这恐怕要留点时间让我们来认真研究。」

借用一个兵团、就是三个军十多人马，是个很大的事情，虽然不久前您给毛主席有过一封信，但我们还没有认真研究。我们会尽快给予明确的答复。主席，金将军，你们看看，我们是不是暂时就先这样？过两天我们再谈？」

毛泽东很满意周恩来的这番话，既强调了兄弟情谊，又等于什么都没有答应，却也留给了对方一些希望。毛泽东说：「很好很好，打仗重要，吃饭更重要，我们先吃饭吧，我设家宴招待贵宾。」

说着，毛泽东站起身子，伸过手去跟金日成握着，且不放下：「金将军，你们高丽人都很能喝酒？恩来陪你喝茅台，如何？」

金日成意不在酒，不得不说：「毛主席，周总理，我在平壤的事很

急，不要让我在你们这里久等啊!」

毛泽东说：「不会的，不会的。我和你一样，也算好战分子。我们恩来办理紧急事务，从来快刀斩乱麻。」

金日成，一九二一年生于朝鲜平壤。一九二五年十三岁时，随父亲迁居中国吉林省抚松县，入读抚松第一小学。十四岁时秘密加入东北共产青年联盟。一九二六年入读吉林市毓文中学，并在学生中从事地下活动。一九二九年被军阀张学良属下的吉林省警察厅逮捕。一九三〇年获释后，潜往伊通县山区创建吉林省工农红军伊通支队。一九三二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他潜往中朝边境山区组建长白山抗日游击大队，任司令员兼政委。其时中共东北抗日联军任命他为抗联师长。一九三四年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局及中共北满地下省委支持下，以长白山抗日游击大队为基础，扩充组建朝鲜人民革命军，任总司令，游击于中、朝、苏三国边境地区，并受到苏联红军远东军区的庇护。一九三六年组建朝鲜祖国光复会，任首任会长。一九四五年夏季，苏联红军铁骑横扫盘踞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旋即进军朝鲜半岛；美国军队则在日本本土上投下两颗原子弹并登陆日本。

金日成率部队随苏军回到朝鲜北部，出任朝鲜共产党总书记。一九四七年二月任北朝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从此成为北朝鲜的党、政、军最高领袖。在这同时，由美国扶植的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亦成立了自己的政权，称为大韩民国，形成南北对峙局面。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正当国民党、共产党双方大军在东北地区激烈拼搏之际，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一路败退（林彪此时被讥为逃跑将军），北朝鲜成为中共败军的大庇护所。打不赢就跑，一跑跑进北朝鲜，国民党的大军追击至国境，徒乎奈何。因之可以说，北朝鲜金日成政权为林彪的东北共军免于被歼灭的厄运，得以保存实力，加上从苏联占领军手中取得大量武器弹药，一年后转入战略反攻，居功至伟。曾经率领部队逃入北朝鲜「暂避」的中共高级将领，无不感恩于朝鲜人民军领袖金日成，纷纷表示：「今后北朝鲜兄弟有难，我们一定鼎力相助，以报庇护之恩。一九四八年，作为美、苏两大国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内容之一，双方在远东地区的朝鲜半岛达成妥协，以半岛中

部的三八线为界，承认南北两个政权，美、苏均不在半岛上驻扎军队。由此，苏联红军撤回本国境内。整个朝鲜半岛军力空虚。北朝鲜金日成雄心勃勃，决心趁朝鲜李承晚政权立足未稳，以苏、中两位老大哥为强大后盾，一举拿下南朝鲜，实现国家山河一片红。

因之此番金日成秘密来访，提出借兵，霸气十足。他的话不用明说，毛泽东、周恩来也很清楚：「我金日成在中国东北地方干了二十年革命，三十年代初你们还在江西苏区的时候，我已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师长。你们抗战只八年，我可是在长白山区打了十五年小日本！后来你们跟国民党在东北大打，初时连吃败战，要不是我老金及时伸出援手，多次将林彪的几支主力接进北朝鲜「暂避」，保存下实力，你们在东北战场还能够咸鱼翻生？未必。」

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后的翌日，在颐年堂召集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把高岗从沈阳召来列席。毛泽东本也想要林彪从武汉赶来出席，但林彪夫人叶群在电话里向周恩来总理告假：育容身上的枪伤发了，躺在床上养着，医生说要考虑手术，将弹片取出，请总理代他报告主席，云云。

毛泽东主持会议。毛、朱、刘、周四位书记，加上高岗，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二位列席。除了毛、朱、高之外，刘少奇、周恩来、聂荣臻都有开会做笔记的习惯。毛泽东却宣布：「本次会议绝密，大家都只用脑子记，不做笔录。接着，他先扯出一段历史：朝鲜古称高丽国，朝鲜人古称鲜卑人，就是现在的朝鲜族。他们出产高丽参，类似长白山人参，世界闻名。高丽国成为中国的藩属国，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大唐时候，他们年年向唐天子进贡称臣，行四跪八拜九叩之礼。唐天子也向高丽国派去大臣使节，类似英式总督性质吧。那时日本国也年年来我大唐朝贡称臣的。有几年人家没有来长安朝贡，唐天子就指人家谋反，派出大军征讨，挂帅的是出身寒门的山西老乡薛仁贵，于是有了旧戏文和话本小说《薛仁贵征东》，炫耀大汉族武力，实际上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但高丽国和我国的关系，总的来说亲和的年代久远，兵戎相见的年代短暂。因为高丽国有一个很讨厌、很野蛮的近邻：倭寇国日本。高丽国只有依靠大中华的军事

保护，才能对抗日本，反抗入侵。所以自唐代起，中国历朝都在高丽国驻有大军。清王朝派驻高丽国的最后一位军事首长是袁世凯。此人初时打败过几次日本军队，曾为保卫汉城立过功。但后来的甲午海战，大清朝的海、陆军一败涂地，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把朝鲜、台湾、琉球群岛割让给了日本。袁氏被人骂作卖国贼。所以，从历史上看，朝鲜不分南北，人民都是亲中仇日的。近二、三十年来，朝鲜共产党和朝鲜人民军，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更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我们今天胜利了，对朝鲜人民的事业也就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毛泽东说：「今天我们的道义责任很具体，也很紧迫。昨天晚上我已和金日成同志谈过一次，他提出要借一个兵团三个军的人马，去帮他一举拿下南方，实现祖国统一。他说史达林同志已答应提供武器弹药，空中掩护，并要求他三个星期之内结束战事，造成既定事实，就是美国想插手也来不及。他想近两三个月内就动手。大家看看，该怎么答复他？我们愿不愿做一回沙陀国，高岗愿不愿做一回李克用？当然恩来不是郭子仪。总司令，怎么样啊？各位，好办不好办啊？」

事出突然，又关系重大，因之对毛泽东的幽默，大家不像往常那样发出轻松的笑声。

朱德搓了搓双手巴掌，说：「要慎重。我们自己还没有喘过气来，西藏、台湾、沿海岛屿、全国各地的土匪、反共救国军等等，都没有来得及解决。我们的士兵也不是泥捏的，一开口就是一个兵团，十多万人马，老虎借猪，仗一打起来，最后能剩下多少士兵回来？另外对他们三个星期内结束战事，速战速决，我很怀疑。」

刘少奇跟着说：「我和总司令有某些同感。朝鲜人民的解放战争，统一事业，我们当然要支持，并且义不容辞。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选择时机。我看我们先不忙借兵出去。可以考虑先派些朝鲜族的军队干部去做军事顾问，参谋指挥。我们还可以考虑在他们自己的部队打过三八线，占领南朝鲜大部分地方后，才借部队去帮他们打扫战场，巩固阵地，加强防卫。目前这段时间，我们全力办好自已的事情，拿下东、南沿海的一些重要岛屿，剿灭各地的土匪和反共救国军。」

毛泽东插话：「少奇也是先攘内，后对外。有一定道理。恩来呢？」

周恩来轻轻转动着手里那无所事事的铅笔，说：「我主持外事工作，可能对国际局势关注得多一些。我担心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会作出激烈的反应。苏联红军已经撤离朝鲜半岛。看史达林同志的意向，苏军不会再返回朝鲜。他肯定近期内不要在远东地区跟美国兵戎相见。因为苏联的战略要害从来在西线而不在东线。美国在日本驻有相当强大的海、陆、空三军。只要华盛顿有命令，他们几天之内即可登陆朝鲜半岛的任何港口。关于这种形势，我们自己应充分估计到，也应建议金日成将军予以充分考虑。他和史达林同志，似乎都低估了美国和西方国家插手朝鲜半岛局势的可能性。」

毛泽东插话：「你们三位意见大致相同，属慎重派。东北王高岗同志，东三省可是金日成同志的战略大后方啊，有何高见？」

高岗香烟不离嘴，一支又一支的抽得又快又猛。他掐灭了手头的烟蒂，又往嘴里添上一支，点上火，才说：「总司令、少奇、总理三位说词不一，实质一样，当然都有道理。我是在东北地区工作的，可能感受比在关内的同志有所不同。首先，我们不应忘记朝鲜党和人民当年对我东北战场的救命之恩，我绝不夸张。当年我南满地区的几个纵队，要不是及时退入北朝鲜境内，恐怕就被杜聿明的大军分割吃掉了。我们这次若不借兵，既有违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也不符我们中国人有恩必报的传统道德；第二，南北朝鲜统一了，朝鲜半岛一片红，等于把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前哨阵地一直推进到了日本海，隔海虎视小日本、何乐不为？这大大有利于我国的经济恢复与和平建设；第三，我以为集中优势兵力，以突然袭击、快速推进方法，三个星期内解决战事，是有可能的。东北地区很多朝鲜族的同志都知道，南朝鲜李承晚集团的军队都是近两年才招募来的乌合之众，根本没有打过仗，装备也不整齐，加上毫无士气，势必一击即溃；第四，美帝国主义当然要保卫他们在远东的生命线。但也不能高估他们作出反应的速度和激烈程度。据我在东北收到的外电报导，美国已准备放弃台湾海域防务，集中兵力于日本、琉球、关岛、菲律宾一线。美帝国主义要登陆朝鲜半岛就来吧！我们还没有跟他个纸老虎交过手呢，它的后勤供应线要

越过整个太平洋，半个地球之遥，才是真正的战略赌博呢；第五，革命和战争本身，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项充满冒险精神的事业，都是提了脑袋在干的。我们共产党人如果不是具有大无畏的冒险精神，一次又一次从血泊里爬起来，而让陈独秀之流四平八稳、按部就班式领导下去，只怕今天大家就都还在做奴隶，当亡国奴！]

高岗的发言，与朱、刘、周三位针锋相对，盛气凌人，咄咄逼人，却也充满了朝气和活力。高岗是属于进取型和进攻型人物，很对毛泽东的口味。

毛泽东手里捏着一支香烟，几次放在嘴里，不点火，又拔下。看得出来，他心里有什么意念在涌动。他看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一眼，却没叫他发言，而突然问：「朝鲜半岛的战火，会不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显然，毛泽东思虑的，比别人高了一着。

朱德和刘少奇的身子都动了一下。依照党内高层不成文的规矩，只要毛泽东主席不点名，刘少奇便是毛泽东之下的第一发言人。刘少奇说：「依目前的世界局势来看，只要代表两大阵营的苏联和美国不直接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可能爆发。」

毛泽东略微点了点头：「恩来，你能不能替少奇把理由说得充分、具体些？」

周恩来说：「少奇的看法，大致上是正确的。我也同意，美、苏双方不会因朝鲜半岛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前两次大战都在欧洲爆发。二战后，美、苏对峙的战略要害地带仍然在欧洲，在东德、西德，东柏林、西柏林则是个最易被引爆的火药桶。那里是他们最要命、最敏感的军事分界线，双方都摆下了最精锐的力量。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苏、美两国或者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都在二次大战中伤了元气，都还没有缓过气来，从普通百姓到政治人物，都不希望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美国人又从来喜欢由别人代理他们打仗，他坐收渔利，反正战争从来打不到他美国本土。即便是这样，一九三七年以后，英国人花了多少心机，使了多少计谋，做了多少手脚，都没有能把美国人拖入反纳粹德国的战争。美国人稳坐在北美洲，东面隔着大西洋，

西面隔着太平洋，观望着欧洲、亚洲的连天战火，只顾拼命的生产军火及供应各类战略物资，大发战争横财。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海军偷袭夏威夷珍珠港，几乎使美国太平洋舰队全军覆灭，这才激起全体美国民众的爱国热潮，美国总统罗斯福才乘机对德、对日宣战。尽管宣布了参战，美国最初两年也只是在欧洲战场和亚洲战场投入有限的空间支持及军火供应。在欧洲，是让苏联红军去跟德军主力正面激战；在亚洲，是让中国军民去跟日军主力作战。迟至一九四四年夏季，在苏、英等国的一再催逼之下，美国才正式投入大量兵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所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是如此，要想使美国人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战，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周恩来喝干了杯里的茶水，继续说：「再谈苏联方面。整个二次大战中，苏联始终处于跟德国主力正面较量，作出了最大的民族牺牲，死伤二千五百万人。现在史达林同志已七十高龄，身体和精力都已经大不如前，所以在短期内，亦不会愿意卷入新的世界大战，不会愿意自己的国土重新沦为世界大战的战场。而且美国已经有了原子弹，苏联的原子弹则正在研制中。除非美国出现战争狂人，逼迫他自卫反击。我刚才说了，苏军已撤出朝鲜半岛，已无意返回。这一点，相信美国情报机构已看得很清楚。这一来，如果朝鲜半岛燃起战火，只会是一场局部战争。对于苏联提供空中支持的承诺，我表示怀疑。因为出动了空军，实际上就是参战了。而当南朝鲜李承晚大韩民国政权行将覆灭之际，美国很可能从日本基地上直接出兵参战。对金日成同志来说，倒是个确实存在着的风险。」

毛泽东专注地听周恩来分析完国际局势，才点燃了手里的烟卷：「很好很好，放眼世界，胸怀全球，开诚布公，本人愿意再打一仗。原来准备花五到七年时间，解决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没想到人家不经打，只花了两年多时间，人家就土崩瓦解，逃到几座大小岛屿上去了。有什么办法？本帅战犹未酣，心里痒痒，美帝国主义敢在朝鲜半岛登陆，我们就跟汤姆大叔打一仗，又有何妨？高岗分析得对，它拖着条绕了半个地球的后勤供应线，我们怕什么？拖也把它拖垮了。当然，现在的局势，也还没有被逼到走这一步。但事先要有些思想准备。」

眼下，初步同意总司令、少奇、周恩来诸位的意见，抓紧解决国内问题，解放沿海岛屿，肃清土匪，镇压反革命，新区反霸反特，老区完成土改，南方北方都要大闹春耕生产，不误农时。怎样？对了，聂总长，你还没有讲话啊，有无新的高见？」

聂荣臻瘦高个子，文质彬彬，推推鼻梁上的眼镜，说：「我坚决服从中央的决策，执行军委主席的命令。」

毛泽东双臂上扬，伸了伸腰，说：「好了，这事就议到这里，严格保密。至于如何具体回复金日成同志，到底借不借兵，如何借，借多少，总司令年纪大了，就不劳神了；少奇也党务、政务大忙。交由我和恩来、高岗三人商定后，再与大家通气，如何？」

毛泽东是意欲借兵给金日成的。他也大致上欣赏高岗的几点看法。使他颇费思量的是军队借出去的方式方法，如何保密，不露蛛丝马迹，在国际上不留下话柄。起码在亚洲国家中不要陷于外交上的孤立。

毛泽东又跟金日成将军晤谈了两次，只有周恩来、高岗两人陪同。金日成详细报告了自己的作战方案，兵力配置，以及苏联红军已经留下的大量坦克、大炮、卡车、弹药等。金日成说，只要肯借给他军队，统统换上朝鲜人民军服装，轻重武器也入朝后再配备。他相信，对付李承晚的那点破部队，北朝鲜人民军甚至不用三个星期，就可以推进到釜山海岸，拿下济州岛，与日本鬼子隔海相望。

毛泽东问：「金将军，要是美国陆海军从你们半岛的中部登陆，甚至把你们拦腰截断，你们准备怎么办？」

金日成哈哈笑了：「毛主席，此事我们早研究过了，美国目前驻扎在日本四岛加上琉球群岛上的部队，海陆空三军不过二十几万人。真正能够动用的至多只有一个集团军。就算他能调两个军的兵力来登陆，我们也能关门打狗，一口把它吃掉，叫它有来无回。因为美军登陆我半岛，就是入侵我国领土，我南、北双方的人民都有反侵略的传统，到时候必然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它派再多的人马登陆，也会陷入我人民战争的火海。」

高岗叫好。毛泽东也说：「好，有这个准备就好。到时候，只要美国出了兵，我们就宣布以一切手段支持你们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

就名正言顺，师出有名了。」

周恩来不动声色。他跟着毛泽东、高岗朝金日成将军微笑点头，内心里即甚为忧虑。

双方再又谈了一次。对于如何借兵，如何不被人抓住把柄（比如俘虏的语言可能暴露出国籍问题），仍然谈不出子丑寅卯。毛泽东嘱高岗先回沈阳抓工作，部署练兵。

金日成在中南海住到第五日，正欲急着返回平壤之际，办法终于叫周恩来想出来了。他去菊香书屋报告毛泽东：高岗手下的东北军区不是有很多朝鲜族官兵吗？加上会讲朝鲜话的汉族士兵，把他们集中起来，一个集团军或许不够，组编成一个朝鲜族裔的五、六万人的加强军应无问题。当然要做好政治动员工作。目前部队的士气很旺，让他们换上北朝鲜人民军的全体装备，去解放南方，相信都会踊跃报名，决心参战的。

毛泽东眉开眼笑了，拉起周恩来的手：「绍兴师爷，你真是个好师爷罗！快去通知金日成，来我这里吃饭，他个高丽棒子，真该敬你三大杯啊。」

第三十一章 陈赓请缨横扫东南亚

五十年代初叶，除京、津、沪、宁少数大城市之外，新中国还没有自己的长途电话网络。北京与各省市地方的联系，主要依靠电报收发传递。

电报分为明码、密码、绝密三级。绝密电报主要用于军事指挥及军情请示汇报。

西南军区（原第二野战军）副司令员、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将军，率大军在云南省境内进剿国民党军队残部及多如牛毛的地方土匪。战斗推进至中越、中寮、中缅边境的丛林地带时，陈赓麾下的大军伤亡累累，阻力重重。因为敌方官兵多为本地人，熟悉气候地理地形。边境地带又尽为高山密林，人烟稀少的无人管辖地带，敌方部队可以进出自如。

于是你打他跑，并且跑过国境。你刚宿营，他又过来偷袭。完全是学了当年共产党游击队的一套。陈赓的部队却奉令不得越过国境，偶尔越境追击亦必须当日返回，不许境外过夜。因而时时处于挨打受气的境地。官兵们怨气冲天，整天叫骂这号鸟仗没法打，纷纷要求陈赓司令员请示中央，改颁军令，允许部队越境作战直至完成歼敌任务再返回。

被称为「二野猛虎」的陈赓将军，湖南湘乡人，一九〇三年生，黄埔军校一期高材生，为学生军连长。一九二五年九月蒋介石校长率学生军进行第二次东征战役时，蒋校长于炮火中失马落水，为学生连连长陈赓拼死相救。陈赓身背蒋介石攀上河岸脱险，传为黄埔忠义美谈；一九二八年陈赓在上海中共地下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被国民党特工捕获，因是中共大员，报送南京蒋介石委员长处置。不意蒋委员长却嘱将陈赓送至南京，亲予接见，重叙师生情谊，之后说：一九二五年九月你救过我一命，今日我也还你一命，放你走人，这样我们就两清了。记住，下回你再被我下面的人抓获，我就不便出面搭救了。果然，陈赓大摇大摆回到上海，重返地下党中央工作。一报还一报，蒋某人讲的是忠孝仁义，也是江湖节义，在当时国共两党的血腥恶斗

中，留下一段佳话。

一九五〇年春夏之交，云南前线人民解放军最高指挥官陈赓大将军豪气干云，雄心万丈，拍给北京党中央一封绝密电报：中央军委、毛主席，边境战局，日夜胶着。长痛不如短痛，请批准我率第四兵团十余万人马，横扫东南亚，配合各国共产党组织及其游击队，一举解放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寮国、柬埔寨、越南诸国！

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读到陈赓的电报，哈哈大笑：「好一个陈赓，想做今日成吉思汗，横扫东南亚，建千秋伟业，留万世英名！」

大笑之后，毛泽东让自己的军事秘书将陈赓的电报送交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过目；又让卫士替他找来一幅世界地图、一幅亚洲地图，挂在靠墙的书架上。他眼睛盯住花花绿绿的东南亚，思考起自己的亚洲战略来。

对，苏联老大哥在东欧搞了七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七颗卫星国啊，环卫着苏联的西部领土，形成了一条宽阔的军事缓冲地带，实际上为一种扩大了的新型边界；我中华人民共和国雄踞亚洲，东南亚各国的反动统治势力相当薄弱，也适宜于建成我们的卫星国，拱卫我神州大地，形成大军事缓冲区，形同扩大了的新型边界……。

接着，他将亚洲地图摘下，平展在地板上。他又像两三年前指挥全国各个战场那样，双膝跪地，身子爬伏于地图上，挥动着手中的红蓝两色铅笔，在云南边境地界，朝外冲出数道只有他自己明白的红箭头、蓝箭头。

三支红色箭头大约是代表陈赓统率下的第四兵团三个军的兵力，如同三股铁流，同时南下穿越缅甸全境，再折向东分指不同国度：一股沿安达曼海岸指向马来亚半岛；一股沿内陆横贯泰国国境，进入柬埔寨，直抵越南南部的湄公河出海口；一股穿越寮国全境，进入越南北部。蓝色箭头大约代表东南亚各国的反动势力，地方武装，大圈之中套小圈，线条十分紊乱。

倒也是铁画银钩，犹如他喜爱、师法的唐代大书法家怀素、张颠的行书狂草。

每当毛泽东双膝跪地，身子爬伏于某幅大地形图上，专心致志、

神采飞扬地挥动红蓝两色铅笔，笔走龙蛇之时，除了身边的卫士、护士静悄悄的送烟送茶，就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打扰他了。当年，他在转战陕北时的一处处秘密的窑洞暖炕上，也是双膝跪着，爬在一幅东北地形图上，以红蓝铅笔画了改，改了画，终于画出了辽沈战役：北面包围长春，围而不打；东面置沈阳之敌于不顾；而在南面集中优势兵力强攻锦州，一举截断东北国军与华北国军相呼应的咽喉，也就堵住了东北国军经海上南逃之路。为了迫令林彪下决心拿下锦州，他先后发了六十七封电报，才促成了锦州会战、决胜了东北战局；之后他到了河北省西柏坡村，住进一座精致的四合院，也是在大暖炕上，同时铺下了两张地形图，挥舞红蓝色铅笔，划出了平津战役：天津强攻，唐沽分割，北平逼和；还有淮海战役，以小个子邓小平为前线总指挥，六十万人民解放军对八十万国民党大军，进行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使得国民党丧失了在中国南方进行军事对抗的能力。

毛泽东最近一次爬在地图上作业，是刚从苏联回来，画出了海南岛战役。面对波涛汹涌的琼州海峡，体弱伤重的林彪也是几经迟疑，对以木帆船渡海作战信心不足。后来还是晏福生、文年生、杨梅生三员四野虎将主动请战，筹集到八千多艘木帆船，利用风向、潮水，沿百余华里的宽阔海岸搞万船齐发，人海战术，渡海强攻，以木船打败铁舰，登上了海南岛的。

现在，毛泽东又双膝跪在东南亚地形图上作业了，结果又将如何呢？

四月上旬，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苏特命全权大使张闻天，赴莫斯科上任。四月下旬，原驻苏大使王稼祥回到北京，旋即受命组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并任部长。该部专责与世界各国共产党（分为公开的、地下的两种）的联络，包括理论指导、经费援助、骨干训练、人员派遣等等，实为一从事国际共运、工运的情报机构；在这同时，周恩来的情报爱将李克农获任三大要职：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中央政府外交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专职党内情报及外国军事情报，其中一项主要任务为效法苏联，帮助、指导亚洲各国的共产党地下武装，实施军事割据，建立地方政权。东南亚国家为其工作重

点区域。

此时的王稼祥、李克农，均直接听命于毛泽东本人。

五月一日，海南岛战役结束。第四野战军渡海兵团在岛上的地下武装琼崖纵队配合下，歼敌三万余人。岛上的国民党守军主力精锐，并未认真组织抵抗，而从海上撤往台湾去了。不管怎样，拿下了海南岛，除了台湾澎湖及浙闽沿海一些小岛之外，南方基本无战事了。这天下午，毛泽东起床后，又想起了陈赓的电报，不忘东南亚战略问题。他让值班卫士给王稼祥、李克农二人打电话，通知立即来谈工作。

中共高层已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也是习惯，凡是毛泽东主席找人谈话办事，包括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内的任何干部，均必须放下手头的事务或会议，立即赶到。在外地的重要干部，则由空军派飞机接来。叫做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毛泽东主席。

王稼祥、李克农来到菊香书屋，由卫士领入毛泽东的书房兼办公室时，大白天室内也灯火通明。毛泽东又正蹲在地板上，俯视着一幅专门为他绘制的东南亚地形图。他只是仰起脸来看了看，算是打了招呼，并示意二人随他蹲下看图：「稼祥，克农，你们是我的股肱大员啊！陈赓大将军从云南前线给我拍来电报，要求中央军委批准他率第四兵团三个军的人马，去横扫东南亚。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寮国、柬埔寨、越南一片红，一举建立东南亚六个共产党国家！前景诱人，值得一干。陈大将军的脾气和我差不多，在军事上敢想敢干，干大事，打大仗。当然，这要克服一些困难，解决一些麻烦。比方说后勤供应，通讯联络、兵员补充、交通工具、语言交流、当地革命力量的配合、宗教文化信仰等等。请二位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高见。」

异想天开！王稼祥差点就要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了。他拼命忍住，才没有使自己哑然失笑。

李克农看在眼里。他的手指在地形图上移动着，说：「陈赓司令员是我的老上级，我指的是一九二八年上海地下党中央特科的时候。那时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厉害。他曾经被捕，蒋介石假仁假义，把他放了。一九三一年我和他都转入到了主席开创的江西中央苏区。」

毛泽东不高兴了：「李克农，陈赓是我的湖南老乡。今天我不是

请你来谈他的光荣历史。」

李克农环顾历史而言它，是在清理自己的思路：「我的老上级是要立新功，为亚洲革命创下丰功伟业……，横扫东南亚六国，光是第四兵团的人马，只怕不够，当然主要依靠各国地下党组织、地下武装力量的积极配合。」

毛泽东身子朝后稍仰，屁股着地，双腿交叉一盘，像个陕北老农似地坐在了地板上。他说：「李眼镜，你讲话不要走题，不要在我面前耍计谋，好不好？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这里基本上是言者无罪，百无禁忌。关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特别是游击队的武装斗争情况，你的部门了解掌握得怎样？」

王稼祥、李克农跟随毛泽东盘坐于地板上。

李克农说：「报告主席，东南亚各国地下党和游击队都有我们派的人，有的领导人则到过延安学习训练，所以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下面，我一个一个的来简报一下。首先是缅甸，老百姓绝大多数信奉佛教，总统吴努，国防部长耐温，都是民族独立运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有功之人，在缅甸人民中有一定的威信，也有军事背景。他们的统治，相对的稳固，在短时间内，缅甸共产党不可能发起全国性的武装起义。目前只在北部山区，建立起了几块小的根据地，游击武装七、八千人，依靠种植大麻、鸦片来筹措活动经费；再一个是泰国，是个封建王国，以佛教为国教，极端仇共反共，外交上军事上均亲美。主席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泰国的北部和中南部山区，泰共游击队已经建立起成片的红色根据地，拥有多个县级革命政权。特别是在中南部的马来半岛山区，泰共游击队与马共游击队联合抗敌，武装斗争已有相当的规模，我们派去的同志也最多；第三是马来西亚，是个回教国家。全马来西亚人口百分之四十五为华人，基本上控制了国家经济。其余为本地的巫人，比较懒散，不如华人勤奋。但巫族人在上层政治占有绝对的优势，长期排斥华人、欺压华人。马来半岛已有五分之三的地区掌握在马共游击队手中，根据地是连成片的，很有希望建立起永久性的红色政权。在这里，我们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和物力；第四是寮国，亦是个信奉佛教的王国，首相苏发努冯亲王政治

上较开明，较进步，可以算得上左倾，这是我们可以对其中立友好的国家，不需动兵；第五是柬埔寨，又称为高棉，情况类似寮国，国王名叫西哈努克，还不到三十岁，受的法国教育，是个花花公子，但政治上富于民族主义，主张独立自主，反对西方势力，也是我们可以对其中立友好的国家，目前不需考虑动兵；第六是越南，为法国殖民地，胡志明同志领导下的越南共产党及其地下武装，已有了相当的基础，这是东南亚六国中，最有希望夺得全国政权，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新成员的地方，也是必要时，我们可以出兵相助的地方。」

王稼祥暗暗佩服李克农，分析东南亚六国情况，冷静、客观、实事求是。不像陈赓将军那样，牛气冲天，轻言横扫，代替别国革命，狂而不实。有成吉思汗之雄心，无成吉思汗之实力。

毛泽东眯缝起眼睛坐在地板上，吸着烟，陷入了沉思。王稼祥、李克农相视而笑，趁机轻轻起身，去上了一趟厕所。返回来，仍旧轻轻坐下。

毛泽东启开眼睛，望着李克农问：「李眼镜，李大部长，你们方便过了？现在继续问你，在东南亚六国中建立共产政权，哪个最难？哪个最易？为什么难？为什么易？你可不可以替我理出个顺序？」

李克农习惯地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框，爬回到地图上边看边说：「主席，我就从难到易来说吧。我以为，缅甸革命最难，国土大，人口少，人民不好斗，军事上较强大，领导人又都是领导民族独立、摆脱殖民统治的英雄，有相当的威信，政权也相对稳定。缅共游击队的活动局限于北部克钦族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泰国次难，秦王在臣民中是个精神偶像，根基很深，武装力量的指挥官都接受过西方军事院校的正规培训，素质较高。士兵的待遇、装备也较好。泰共的根据地集中于跟马来亚接壤的马来半岛地区，实行红色割据是有可能的；马来半岛有希望建立起类似我们过去在江西那种苏区政权，并可巩固扩大下去。马共主要成分为华人。华人都较亲近祖国。但富有的华人害怕共产分地；寮国和柬埔寨，我认为我们应当主动表示友好、争取团结的两个国家，他们政治上中间偏左，外交上走中立路线，我们不宜也绝无必要与之兵戎相见；越南，在胡志明的越共领导下，几乎

可以肯定是东南亚六国中，最早的红色政权国家。因为外来的法国的殖民主义统治，最能激起民族主义的革命热情和仇恨，一致向外，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矛盾，就提供了最好的全民武装起义的契机。」

毛泽东听完李克农的汇报，也回到地形图上爬着，看着。他仿佛这才认真地看了王稼祥一眼，问：「稼祥，你个中联部首任部长，专司国际共运、工运的，对李克农同志的分析报告，有何高见？」

王稼祥说：「我是下车伊始，刚刚到任，还没有来得及研究过东南亚六国的革命局势。我觉得克农部长刚才的分析，评论，冷静客观，有理有据，不事浮夸，没有言过其实。主席历来提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跟各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他人不可包办代替才行得通。」

毛泽东苦笑了一下：「稼祥，你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啊，是个东南亚革命的促退派。你认为陈赓将军的雄心大志不客观，不实际？李大部长，你是不是也认为，你的老上级陈赓率第四兵团三个军的人马，出征东南亚，兵力不足？估计要动用多少人马？」

李克农双脚盘地，坐直了身子：「报告主席，恕我直言，真欲横扫东南亚，起码出动七、八个兵团，百万大军。这就有个交通运输、后勤供应、防病防疫、各国的人民群众是否有觉悟表示欢迎，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财政目前可否负担的问题，等等。」

王稼祥忍不住插言补充：「就算我们出动百万雄师去拿下来，都帮他们建立起红色政权，还有个守得住守不住的问题。而且我们开国伊始，各行各业尚待起步，本身经济还未恢复，能够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背得起东南亚六国这个大包袱？」

毛泽东脸呈不悦，却也莫可奈何：「你们二位倒是意见一致。我和你们，是性相近，习相远啊！从来的革命斗争，都是以非常之手段，开非常之功业……。对了，你们知不知道，周总理近两天忙些什么去了？」

李克农说：「报告主席，总理刚开完东北、华北两大区春耕春播紧急动员会议，就赶往上海去了。在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陈毅同志和饶漱石、柯庆施二位又吵起来了，陈老总主张保护，饶政

委主张管制，柯副政委主张工人自治。」

毛泽东说：「这个我知道。他们都告状告到我这里，华东局三巨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问少奇，少奇也主张现阶段我们应当保护民族资产阶级，以尽快恢复生产，维护社会治安。是我让恩来去上海一趟的。现在，能不能跟恩来通个电话？」

王稼祥立即去卫士值班室，「通知中央办公厅机要室，让找到在上海的周恩来总理，请总理尽快给主席家里挂电话，主席有事找他。」

毛泽东领着李克农、王稼祥坐回到藤围椅上，喝茶抽烟，交谈有关中央调查部与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分工合作事宜。毛泽东称这两个部是他的哼哈二将，是亚洲各国共产党及地下武装的参谋部和后勤部，今后要走出去，请进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叱咤国际风云，呼唤革命雷雨，天地广阔，大有可为的。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毛泽东大书案上的一部扬声电话就响了，一一是缴获来的美国最新式电话机，不用拿起话筒，就可以与对方通话，而且可以几个人同时说话：「是主席吗，我是周恩来。我在上海，工作一切顺利，要后天才赶得回来。请问主席有什么吩咐？」

毛泽东说：「恩来啊，陈赓大将军的那封电报，你圈阅了吧？还没有听到你的意见啊！你是个促进派还是个促退派？」

周恩来说：「主席，我的看法，一言难尽。建议主席是不是先找王稼祥、李克农二位谈谈？他们是专家，比较熟悉有关的情况。」

毛泽东说：「你猜得不错，他们二位就在我这里，陪我爬了半天地形图了。他们是保守主义者。现在让他们跟你说几句。」

李克农说：「总理，我是克农。我没有什么高见，只是向主席汇报了一些相关情况。下面，稼祥同志眼你讲。」

事实上，周恩来离京前，已跟李克农商谈过陈赓的电报了，都觉得不切实际，很难认同。只是当着毛泽东的面，不好说两人已经交换过意见了。

王稼祥说：「总理，我是稼祥。我的意见归结起来只是一句话，即主席历来提倡的，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

周恩来说：「好，现在我来跟主席谈点自己的看法。陈赓同志雄

心可嘉，是个方面军统帅之材，要肯定他的革命热情。的确，他这些年来从西北到华北，从华北出师东北，又从东北回师华北，率四兵团挥师南下，渡江作战，经湖北、湖南挺进大西南，解放云南全境，是一支钢铁之旅，威镇南天。他这次要求中央批准他率第四兵团继续远征的事，也不能完全被认作是胡思乱想。要是国内国外，各方面条件俱备，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主席，我估计北方邻邦，即将有大的动作。到时候我们有可能身不由己的卷进去。因为一衣带水，无法坐视。所以南方暂不宜有大的行动，应集中力量于北方。不宜陷于南北两面作战。人力物力财力都不允许。陈赓想打仗，把他调回北京来，到时候派他出征嘛。」

毛泽东说：「恩来啊，你算是心有全局，我基本上可以认同。可是东南方向怎么办？弃之不顾？让那里的丛林星火自生自灭？我们的老大哥可是搞了个东欧七国做战略缓冲地带啊！」

周恩来说：「主席，具体的，我还要想一想。容我后天回来，再拉上稼祥、克农二位，一起来向你汇报，详谈一次，如何？」

因是长途电话，大家都避免了「东南亚国家」这个字眼。

隔天，周恩来风尘仆仆回到北京中南海。在西花厅书房审批了一批急件，即率同王稼祥、李克农前来菊香书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其时毛泽东书房内灯光雪亮，又见他爬在地板上审看着地形图。不过这回看的是两幅图：一幅东南亚，一幅朝鲜半岛。

见了面，毛泽东没问周恩来上海之行情况，而指着东南亚地形图说：「我们还是先谈这个。十多天了，陈赓一封电报，搅得我思绪万端，放不下来。我们南边要是能有这么大片战略缓冲区，该有多好。美国和西方列强，就不敢来亚洲国家发号施令，撒野放屁了。恩来，你不要管我作何打算，只管说出你自己的看法，我洗耳恭听。」

周恩来笑了笑，谦逊地说：「那好，我就来班门弄斧，给主席做个参考。我完全赞同主席的深谋远虑。也的确应当学习苏联老大哥的东欧经验，是史达林同志的高明之举，大手笔啊！东德、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七个国家。本来还有南斯拉夫和奥地利、芬兰三个呢。南共领袖铁托闹独立性，向西方

国家示好，一九四八年被史达林同志开除出共产国际情报局。奥地利和芬兰于二战后期本来也被苏联红军所占领，战后签订赫尔辛基协定，两大阵营划分欧洲势力范围时，史达林向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作出妥协，同意从奥地利和芬兰撤军，让这两个国家中立化。所以，回顾二战历史，现在的东欧社会主义七国是苏联红军从德、意法西斯铁蹄下解放出来的，至今由苏联红军协防捍卫，在那里成立共产党政权，组成社会主义大家庭，是势所必然，顺理成章的事。」

周恩来说：「回来看看我们亚洲，东南亚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必须由我们派出大军去从头解放。二次大战已经结束，我们师出无名？这是头一个大的难题。再者，这个地区既有回教（如马来西亚），又有佛教（如缅、泰、寮、柬），各国共产党游击队的基础也很不平衡，各国政权也还相当稳定，加上去年美国搞了个马尼拉共同防务条约，把泰国、马来西亚、越南都拖进去了，划定了势力范围，我一旦有大动作，必然引起连锁反应。如果我们现在就同意陈赓率大军去横扫，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是犯了左倾盲动的错误。陈赓同志大约忘记了，当年国民党与美国联合指挥的中国远征军，全副美式装备，穿越缅甸中部的野人山区时，九万人马最后走出野人山的只剩下八千余人，八万来人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死于饥饿、瘟疫和毒蛇猛兽。东南亚境内大部分地区为崇山峻岭，悬崖峭壁，河水湍急，没有人烟，没有道路，没有桥梁。也就没有供给，大部队能有什么作为？我的意见，是遵从主席一贯的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别国的革命，外国不可以去包办，只可以给予指导、支持，帮助他们创造条件，就像当年苏联和共产国际帮助我们时所做的那样。」

毛泽东眼睛盯住周恩来：「你比他们二位更彻底，更消极。照你讲的，我们在东南亚，只能坐视，毫无作为，毫无希望了？」

周恩来说：「有，但不是陈赓的办法。我已和稼祥、克农二位初步谈了一下，东南亚革命，应促其逐个解决。不能一刀切。首先我们可以帮助胡志明的越南党及其它下武装力量，从法国殖民主义手中解放越南，必要时可以暗中出兵，让两广士兵换装成越南士兵参战，建成东南亚第一个红色政权。我很同意克农说的，促成寮国、柬埔寨的中

立化，我们与之团结友好，不去干涉他们的内政，日后争取跟他们结成反美同盟。然后一个目标是马来亚半岛，很可能建成东南亚的第二个红色政权。我记得主席在延安说过多次的比喻，革命好比割猪肉，要一刀一刀的割，建立根据地，就是从敌人身上一块一块地割下地盘，最后连成一片，就是革命胜利。」

毛泽东笑了：「用我的矛，攻我的盾，你和稼祥的手法完全一样，只是更为高明了。好了，我基本上同意你前天电话里说的，目前我们把力量摆在北方，摆在朝鲜半岛方向，避免两面作战。但在东南亚方面，我们也应积极主动些，总可以做些前期准备工作啊！」

周恩来说：「稼祥、克农二位已经有了很好的主意，符合我们长远的战略目标，我提议由主席召开个专门会议来议一议，制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政策方针。」

毛泽东问王稼祥：「驻苏数年，你是得到老大哥的真传了？什么好主意啊？」

王稼祥说：「可以考虑从广东、广西、云南三省区，再抽调一批有政治、军事工作经验的同志，经过专门训练，主要是分别学习各国语言文化、宗教风俗，之后分头潜往东南亚各国的游击队根据地及地下党组织，去做政治、军事顾问，加强领导力量。当然，还要包括一定的经费援助和装备给养。好在我们与东南亚各国，都有陆路相通，化装成渔船走海路也不是很远。」

毛泽东说：「好！我们自延安起一直在这么做，但气魄不够大。今后要大手笔，下大力气。李大部长，你的锦囊妙计呢？」

李克农说：「报告主席，我建议在我国南方，比方湖南的长沙、衡阳，广西的柳州、桂林，广东的乐昌、韶关等城市的郊外，每处划出一座或数座山头，设置一批游击队骨干训练营地，当然是作为军事禁区，绝对秘密，与外界隔离的，让东南亚各国的同志轮流来接受训练，学习马列理论，熟悉战略战术；同时，还应修建几座保密疗养院，以供各国党、游击队的重要领导人养伤养病，短期休息……。」

毛泽东终于高兴地笑了：「很好很好，东南亚战略开始具体化了。你们二位立即着手，组成专门班子，把这两件事抓起来。要什么条件，

由总理大人去统筹安排。游击训练营地，除了培训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军事人才，今后还要面向西亚、南亚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一句话，面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全球战略。」

这时，毛泽东的卫士送进来一封北朝鲜领袖金日成的电报。

第三十二章 朝鲜事变毛周点将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是人类步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重要时日。这天凌晨，五十万全副苏联武装的北朝鲜大军，潮水般涌过三十八度线，向南朝鲜发起突然袭击。钢铁洪流，全线席卷，锐不可挡。大韩民国李承晚政权及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大约作梦也没有想象到，这五十万北方大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来自何地。

两天之后的六月二十七日，北方大军兵临大韩民国首都汉城，李承晚政府弃城南逃。

同一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作出激烈反应，宣布驻日美军第八集团军所属第一军开赴朝鲜半岛参战；并改变放弃台湾的初衷，而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及军事协防台湾，以阻止共产党军队南北呼应，一举截断西方世界在远东地区的海上生命线。

同一天，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辩论朝鲜局势至深夜。表决之前，各国代表需要向各自的政府首脑请示。在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苏联代表没有返回会场的情况下，使得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名义，决定向朝鲜半岛派兵维持局势，称为联合国派遣军。当然是以美国军队及大韩民国军队为主，其余英、法、荷、比、加、澳、新、土等国家都是象征性地派出一个旅、一个团、一个营乃至一个连的部队参战。说是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曾提出派两个军至韩国打击共产党军队，但被美国所婉拒。

消息传到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气得拍了桌子：「老大哥怎么这样不负责任？苏联代表为什么不回到安理会会场使用否决权？这下子好了，美国军队以联合国派遣军的名义出现在朝鲜半岛，是反侵略来了；而把北朝鲜人民军为实现国家统一的内战，变成为对大韩民国的入侵。毛泽东说：「二十世纪的荒诞逻辑又一次重演丑剧，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无耻之尤。」

朱德说：「我们不怕，是近水楼台，他们隔了半个地球，远水难救近火。」；刘少奇说：「美国军火商又要大发战争财了，美帝国主义是无战不兴，无战不富，近百年来一直在发战争横财。」周恩来说：「联

合国已经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强国对外用兵的工具，将来一定要联合世界上的大多数弱小国家，来全面改造它，或是重组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来对抗它！]

六月二十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宣布中国政府决不坐视美军入侵朝鲜及台湾海峡，将以一切手段全力支持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同时号召全国人民进行充分准备，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实为公开宣布介入朝鲜战事。

使得毛泽东、周恩来们感到鼓舞、欣慰的是，北朝鲜人民军在占领汉城之后，七月初将战线迅猛南移。南朝鲜李承晚政权的军队已溃不成军，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只顾往南方逃命。虽然未如史达林同志所要求的那样，三至四个星期之内解决问题，但到了八月初，北方大军已占领了南朝鲜百分之九十二的土地及控制了百分之九十一的人口，而把李承晚的残部和匆匆赶来救命的美国军队压缩到了洛东江以北的狭小地带，有待歼灭。

实际上，朝鲜战事从爆发的那一刻起，即有三个司令部在操作着这场国际战争：一是北朝鲜金日成将军的人民军总司令部（有一批苏联顾问），二是日本东京的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部，三是北京中南海的中共中央军委作战局。

七月中旬，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下令调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等部，组成东北边防军部队，直属中央军委指挥，下辖第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加上三个独立炮兵师，计二十六万精锐，任命邓华为司令员，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为必要时入朝参战作准备。到了八月下旬，随着朝鲜战局的发展，仍由周恩来主持会议，决定增调第一野战军的第十九兵团、第三野战军的第九兵团入东北，作为东北边防军的后备部队。这样东北边防军就拥有了三个兵团下辖十二个军六十余万人马。

在中南海居仁堂，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为毛泽东于延安时期推薦给周）任副局长的中央军委作战局，日夜研究、推演着韩朝战

局。雷英夫每日向周恩来报告三至四次前线战况。进入八月份，双方在洛东江地区的战事呈胶着状态。国际上各种势力纷纷对朝鲜战局作出各种预测。北朝鲜人民军宣布八月份将取得彻底胜利，会将美、伪军队全部赶下日本海，并在南朝鲜全境实行土地改革；欧美及亚洲的军事观察家们则预言北朝鲜共军即将遭受失败并从此一败涂地；美国的新闻舆论却闪烁其词，一会说参战美军将会撤退回日本，一会说联合国派遣军将在朝鲜半岛的适当地点实施大规模登陆，另辟战场。正是这后一点，引起了中共中央军委作战局的高度警觉。

八月二十三日晚，周恩来在西花厅后院办公室听取军事秘书雷英夫的战况汇报后，敏锐地作出了五点战局分析：一、敌军目前在洛东江以北的狭小地带集中了十几个师固守，与北方大军隔江对峙，是要以此来拖住北方大军的主力，使其不能机动；二、美军在日本还有两个师的兵力，新近又组建了机动兵团，正在大搞登陆作战训练，意欲何为？三、侵朝美军及麦克阿瑟将军本人整个二战期间都在太平洋战区，一直进行岛屿作战，大规模登陆作战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不可能不发挥此一军事优势；四、美、英等国的多支舰队（携有相当数量的登陆艇）正向朝鲜半岛海域结集。这些舰队显然不是为了解决后勤供应，而极大可能是为了登陆作战；五、朝鲜半岛是个狭长地形，从北到南，北方大军的战略补给线已经拖得很长了，汉城则是这条战略补给线的枢纽，铁路、公路的交汇点。汉城之南几十公里处即是海港仁川。如果美军在仁川登陆，并一举拿下汉城，横截开去，很容易就把北方大军的主力部队包围起来，南北夹击，予以歼灭。

朝鲜战局表面上看北胜南败，形势大好，实际上很险，是一种全军覆灭式大危险！周恩来被自己和军事秘书的分析吓出了两手冷汗。他说：「很好，这是我们的共同作品，需要马上报告主席。」

果然，毛泽东在电话里听了周恩来的战局简要分析后，也予以高度重视，让周恩来立即带上军事秘书到菊香书屋详谈。毛泽东再次听了战局五点分析，连称有理，又问美军除已到达朝鲜参战的部队外，现可立即参战的部队还有哪些？周恩来回答：「已侵朝的是美国第八集团军所属第一军的两个师，可立即参战的是该集团军的第九军和第

十军。加上第六舰队、第七舰队，以及美国第五航空队拥有的七百余架战机和第二十战略轰炸机航空队的三百余架各型轰炸机。制海权和制空权都在他们手里。」

接着毛泽东又问到麦克阿瑟将军的个人性格。周恩来说，根据外电报导介绍：「麦克阿瑟是个倔老头儿，二战以来一直担任东方盟军统帅，他下定决心的事谁也改变不了，连美国总统都敢于顶撞，是个十分狂妄的好战分子。美国国内则把他视为民族英雄。」

毛泽东听了，兴致很浓，连说好好！

针对朝鲜战局即将出现的险情，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出三项措施，交由周恩来立即执行：「一、命令东北边防军采取一切措施，作好一切工作，务于九月底之前开赴鸭绿江边境沿线，随时准备入朝作战；二、立即通知北朝鲜和苏联，我们判断美军将在仁川大举登陆。向他们讲清楚美军仁川登陆的利害关系，建议人民军立即在洛东江一带布设疑兵，主力部队适当后撤，控制战略高地及交通要道，并布署力量在仁川沿海构筑工事，严密防守，以阻延敌军登陆。如果北朝鲜方面不相信我们的建议，执迷不悟，我们则一定要把自己的「暗助部队」撤回到三八线附近，保持进可攻、退可守的态势；三、军委总参谋部、政府外交部密切注意美海、陆、空部队动向，随时报告。并通知全国各大军区负责人，立即着手研究朝鲜战局，向中央报告研究心得。」

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已将上述三点记述下来。秘书将纪录稿交周恩来审阅、签字后，立即离开，去交付执行。

毛泽东说：「恩来，你又要做我的军事伙伴啦。这回要当真武松，打真老虎。朝鲜战局，我们将从暗助走向明帮。暗助诸多方便，明帮需要全国动员。首先做好党内、军内工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调，统一号令，统一指挥，还是五统一。」

周恩来说：「是啊，公开出兵的事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主席让各大军区研究朝鲜战局这一点特别重要，是为全军总动员的前奏。我建议召开一次军委会议，把六大军区司令员、政委都请来，各路大将齐集，议论议论，做个思想准备。」

毛泽东想了想，点点头，拿起手边的铅笔，慢条斯理地在纸上写

下长串名字，边说：「不一定统统请来。先通知这些人来开会，加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

周恩来接过名单，看着那一长串熟悉的名字：「东北局，高岗、李富春；华北局，聂荣臻、薄一波；华东局，陈毅、粟裕；中南局，林彪、罗荣桓；西南局，刘伯承、邓小平；西北局，习仲勋。」

周恩来的目光停留在名单的末尾：「西北局只有政委习仲勋，而没有司令员彭德怀。彭德怀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司令，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犹豫了一下，才问：「主席，是不是把彭老总的名字给漏下了？」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微笑着：「彭大将军如何漏得下？是颗难剃的头嘛。去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阅兵，也没有通知他来，代表一野的是贺龙。他和贺龙一直关系不妙，简直不能共事。大阅兵后只好把贺龙安排到西南军区去任司令员。还是邓小平能容人，懂得团结、尊重同志。这回，我也是担心他一来开会，就带头放炮，抬杠顶牛，再跟有的人一唱一合，事情就不好办罗。所以打算慢一步通知他好些。」

周恩来心里有数，毛泽东指的那个「有的人」是任弼时。任弼时是四月下旬从莫斯科回到北京的。在莫斯科疗养半年，病情已有好转，身体虽然虚弱，却不肯继续休息，中央只得批准他每天工作四小时。他依然那么勤勉、认真，在书记处会议上，照样敢于发表与毛泽东相左的意见。

毛泽东说：「恩来，名单就交给你了，先跟总司令、少奇、弼时他们通个气，再以军委名义发电报，通知各大区负责人安排好各自的工作，九月中旬到京，二十日开会。这之前，我们中央书记处还要召开扩大会，专门研究朝鲜战局。恩来啊，如果我们公开出兵，以什么名义为好？」

周恩来答：「当然应由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公开通电邀请，请求我们以军事手段支持他们的保家卫国、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

毛泽东摇摇头：「不对，我们的大军还是要秘密入朝，天兵天将先打它几个大胜战，到战场上去公开身份。我是指给我们的出国部队取个名字，而不要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

周恩来说：「我明白主席的意思了。前不久黄炎培老先生和我私下交谈，说我们如果公开出兵，可以用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个名义……。」

毛泽东抬高了声音，手掌在沙发扶手上一拍：「好！这个名字好，就叫中国人民志愿军！你看，由谁来挂帅出征好？」

周恩来谦逊地笑着：「我们各路大军将师的情况，孰优孰劣，主席比我看得更清楚啊！到时候主席登高一呼，应者如云罗。」

毛泽东面露不悦：「恩来，我是想请你先给参谋参谋，不是要你讲客气话。」

周恩来这才又盯住手上的名单，认真想了想，之后提出四个名字来：「林彪、邓小平、彭德怀、粟裕。」

毛泽东说：「老彭先不予考虑，让他留在大西北党政军一把抓吧。西北为王，顶多做个左宗棠。为什么不提东北王高岗？」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对自己的湘潭老乡彭德怀大将军成见很深，心里很有些感叹。彭老总是个大忠臣和大功臣，只因喜欢直来直去，不好吹吹拍拍，头上生角、身上有刺似的，令主席对他敬鬼神而远之了。便说：「高岗同志当然是位帅才。我的考虑是，东北地区实为我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战略腹地。我们的大兵团入朝作战后，负责后勤总供应的非高岗同志莫属了。可以说，后勤供应做好了，我们的参战就打赢一半了。」

毛泽东点点头，表示同意：「再说说林彪、邓小平、粟裕三位。」

周恩来说：「林、邓、粟都是我军的统帅之才，既有战略、又有战术。林彪统领东北数年，对东北以及朝鲜的民俗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相当熟悉，应当是领兵出战的最佳人选，他的弱点是身体弱，多病痛；邓小平可以统御三军，他的长处主席比我更了解，头脑灵活，计多谋足，善于应付大局面，大变故；关于粟裕同志，我觉得是我军难得的一位常胜将军，二十几年来身经百战，很少打过败战。说实在话，当年的华东战场，粟裕的决策指挥，是起了关键作用的，尽管他是名列陈毅、饶漱石之后的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陈、饶经常闹矛盾，实际工作往往是粟裕在做，他也从不计较名位，很难得的。如果林、邓因各种原因不能挂帅出征，粟裕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粟裕湖南会同人，一九二七年二十岁时加入共产党，同年参加南昌起义和湖南暴动，历任红军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团参谋长。抗日战争起一直留在华东地区率领新四军对日作战，解放战争期间曾为华东野战军代理司令员。他的资历不如陈毅老，文化素养也不如陈毅高，军事指挥才能却在陈毅之上。

毛泽东见周恩来如此推崇粟裕，起初并没有十分往心里去。他说：「还有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诸位呢，不都具有独当一面、统御一方的大才？」

周恩来说：「主席点到的，当然都是我军最优秀的将帅之才。刘伯承同志是国内外知名的军事家，出他必出邓，刘邓大军，名扬天下；陈毅则宜继续坐镇东南，为解放台湾做准备；罗荣桓体弱多病，一直住在医院里，似乎不宜出征。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主席比我更清楚，运筹帷幄，统御大军，呼风唤雨，就稍逊于前面几位了。」

毛泽东沉思良久，手指里夹了支烟忘了点燃。从不吸烟的周恩来，擦亮一支火柴，凑上去，帮主席点燃了。毛泽东深深吸上两口，温和地看周恩来一眼，表示谢意：「恩来，你讲的大致上不错。刘伯承嘛，长我一岁，老资格罗，一九二九年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理论上、实战上都很有一套罗。我准备把他摆到南京去，主持我军的最高学府（后称南京军事学院），负责培训全军的高级将领。我军的高级将领，多数是大老粗出身，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也各有指挥才能。就是高级将领，初级文化，缺少指挥诸军种协同作战的现代化战争知识。今后打的是海、陆、空立体战，没有科学文化知识，光懂吹号冲锋拼刺刀怎么行？所以急需补理论课、文化课；邓小平嘛，我准备调到中央来，大材大用，协助抓全局性工作；陈毅就依你说的，继续坐镇华东，准备解放台湾；罗荣桓保重身体；高岗负责总后勤。看来只好劳动林彪。林彪不成，就是粟裕。安排一下，我先找林彪个别谈话。」

第三十三章 林彪婉拒挂帅出征

林彪，原名林育容，一九〇六年生，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一九二六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任国民革命军排长。一九二七年参加周恩来、朱德、贺龙等领导的南昌起义，任特务连连长。一九二八年随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残部上井冈山。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林彪，是朱德、陈毅上山下久，路过一位个子瘦小的青年军官正在给自己的士兵训话：闹革命就要有地盘，有了地盘加上枪杆子，就可以建立政权，云云。毛泽东很感兴趣，问陈毅：那小个子是谁呀？好象很有见地呀。陈毅告诉老毛：是我们的连长，名叫林彪，上过黄埔，很会打仗。此后毛泽东开始注意这个小他十三岁的小伙子。

林彪也确有军事才能，几年之中，率领部属连打胜战，因战功一路晋升为红四军营长、团长，第一纵队司令员、军长、红一军团总指挥、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应当说，在当时的红军军官中，他是战功最突出、军阶也上升最快速的一位。一九二九年间，他出于对红军部队长期厮守偏僻山地，而被国民党大军四面围堵的局势的忧虑，曾经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请教「红色根据地能否长期存在」、「武装斗争的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毛泽东认为他的革命意志有所动摇，而写下一封长信，后又写下一篇文章，对他进行劝慰、开导，晓以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理论。此信即为后来公开发表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及《红色根据地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此事，也就成为了林彪历史上给人留下的一个口实。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于长征途中召开的贵州遵义会议上，任红一军团长的林彪，与红三军团长彭德怀等人一起，支持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改组了中央红军的领导。可是一个多月后的转战途中，林彪鉴于部队被毛泽东指挥得团团转（即所谓的三进遵义、四渡赤水、五出娄山），疲于奔命，而毅然给中央军委发电报，要求中央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红军统一归彭德怀指挥。他的这一要求当然没有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红军新三人团」所接受，反被毛泽东于一次军事碰头会上斥为「你个娃娃懂什么？」毛泽东心里却深

恨上了彭德怀，怀疑林彪是被彭德怀所利用。不久，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闹分裂，另立中央，中央红军残部只好组成北上抗日甘陕支队，以免被张国焘的大部队吃掉。中央甘陕支队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亲任政委，算是对林彪的安抚、让步。

一九三六年初，红军在陕北安顿下来之后，毛泽东决定率中央红军东征山西、河北。林彪坚决反对，认为毛泽东是军事冒险主义。他并提出将自己的部队拉到陕西、甘肃南部去打游击，开辟新的根据地，大有要跟毛泽东分道扬镳之势。这是林彪在历史上第二次反毛。毛泽东苦笑说：他是对我没有信心，而想效法刘邦，去经营汉中。中共中央当然不能让林彪出走，而由总书记张闻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出面，说好说歹，分析局势，权衡利弊，总算把林彪及其部队留在了陕北。此时的毛泽东，倒是表现出了一种难得的豁达大度，不计前嫌，任命林彪为抗日军政大学校长，让其主持中共的红色黄埔，培训中高级干部。不久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共红军接受南京中央政府改编，林彪又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政委罗荣桓），取得平型关大捷，全歼日军坂垣师团属下的一千五百余人，名震中外。

一九三九年，林彪于一次战斗中被友军阎锡山部士兵误伤，子弹击中脊椎神经，两次赴苏联医治未能痊愈，以致后来患上怕光怕风怕水怕热的毛病。一九四二年回到延安，参加毛泽东清算王明派系的整风运动。

林彪与毛泽东的第三次严重分歧，产生于一九四五年冬季开始的东北战场。当时林彪从延安率领十万人马经内蒙草原奔东北，去实施中共在苏联红军庇护下的「独霸东北」大计。延安的中共要员几乎倾巢而出，包括彭真、高岗、张闻天、陈云、李富春、李立三、林枫、萧劲光、宋任穷、郑位三、王稼祥、杨尚昆、滕代远、何凯丰、陶铸、伍修权等等。还有罗荣桓率领的从山东解放区渡海而去的数万人马。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四师的二万多人马也随后出关。加上从华北各个根据地去的陈赓、陈锡联、萧华、黄水胜等部。成立了中央东北局，初期由彭真任书记。军队则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翌年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由林彪任司令员，统一指挥。

南京中央政府出兵东北，比中共迟误了整两月，但派去的皆为全副美式装备的国军精锐，由美国海军、空军突击空运与海运。坐镇延安的毛泽东，于一九四五年冬、四六年春，连续向东北的彭真和林彪发出电令：要求彭、林将部队主力集中——辽东半岛海岸沿线，全力阻挡国军登陆，「务将国民党军队歼灭于海滩」。

其时中共的东北民主联军刚刚组建，武器装备仍是三八大盖加手榴弹，怎么阻挡得住全副美式装备的国军精锐？毛泽东无疑是坐在延安痴人说梦、异想天开了。林彪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复电，请求「毛主席头脑冷静」，陈述部队的艰苦处境，目前只宜保存实力，避敌锐气，作大步后撤。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发展农村根据地」。但毛泽东仍然命令林彪抢占吉林与辽宁两省交界处的战略要地四平，与国军展开四平血战。最后林彪不得不违背毛泽东的命令，未事先报告而放弃四平，率部队一路后退，一直退到黑龙江的松花江流域。留在辽宁的几支共军主力，则干脆撤退到了北朝鲜境内，避免了跟军威强盛的国军会战，从而逃过了被围歼的厄运。

一九四六年整整一年，林彪都被讥为「逃跑将军」、「常败将军」。

延安的毛泽东却头脑冷静下来，不得不同意林彪在东北所采取的保存实力、站稳脚跟、发展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战术。毛泽东仿佛这才想起，林彪在东北坚持的一套，正是过去自己在江西苏区提出的那一套啊！加上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的劝说，毛泽东进而同意继续重用林彪，改组了东北局，将彭真调回关内，而由林彪全权主持东北战局，出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兼政委，再任命高岗为第一副书记、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其余张闻天、陈云、罗荣桓、李富春、李立三、杨尚昆、王稼祥等等，无论其资格多老，在党内地位高低（其时林彪只是一名中央委员，而张闻天、陈云、高岗则是政治局委员），均任东北局副书记或委员。

经过整整一年多的败绩、挫折，林彪率东北共军，总算在国民党大军的穷追猛打之下保存了实力，立住了脚跟，加上从苏联红军手中接收到了大批日本关东军留下的坦克大炮重型武器，又在实行了土地改革的广大乡村招募到新的兵员，以及收编了相当数量的土匪武器，

军队战力大增。到了一九四七年夏季，林彪的部属已达五、六十万人马，拥有坦克近千辆，大炮数千门，由劣势转为优势，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解放哈尔滨，围困长春，夺回四平，使长春成为孤岛，郑洞国兵团成为笼中兽，将国民党主力部队压迫到辽宁省境内，实现黑龙江、吉林大地一片红。

应当说，此时的林彪，充分显示出了一名天才军事家的雄才伟略，非凡智能。他创造了一整套作战方法：三三制，一点两面，三慢一快、围点打援，集中三至四倍于敌人的绝对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歼灭战，及其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战争的首要目标，等等，后来都成为中共军队的经典。

东北战局，决定着国共两党的命运。双方都在东北投注巨本，出尽精锐。双方统帅毛泽东与蒋介石，均有出色表演：毛泽东与周恩来坐镇陕北，于林彪率东北人民解放军频频败退、屡受挫折之际，反而加重信任，撤销了彭真的东北中央局书记职务，让林彪兼任，使其独揽大权，统一领导党政军事，以力挽狂澜；而坐镇南京中央政府的蒋介石，却于东北战局形势微妙之际，三易主帅，先是以陈诚取代杜聿明，后又以卫立煌取代陈诚，导致将帅离心离德，上下猜疑防备，犯下兵家大忌。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高明还在于，于一九四六年夏季东北战局失利之际，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率二十万大军，从华北的晋冀根据地作战略出击，千里跃进大别山，犹如一支插向国民党政权心脏地区的利刃。对于中共的此一战略出击，蒋介石先生初时麻木不仁，及至刘邓大军过了黄淮地区，才组织军队围堵，已经为时晚矣。一个东北的林罗大军，一个中原的刘邓大军，即已隐伏着南京政权必然败亡的契机。

一九四八年夏、秋之间，为东北解放军打不打锦州，林彪与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引发了长达三个月的「电报扯皮」。毛泽东、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名义，命令林彪、罗荣桓留下少数部队迷惑长春被围敌军，以及牵制住沈阳的卫立煌部，而集中优势兵力，长驱南下，与廖耀湘兵团决战于锦州、营口一带，夺下锦州，整个东北战场就形成关门打狗之强势。林彪却认为毛泽东于千里之外，又一次异想天开瞎指挥了。

置北面的困兽郑洞国部、东面的强敌卫立煌部于不顾，长驱直下锦州与廖耀湘兵团进行决战？

要是被围困于长春的郑洞国兵团乘机突围，南下沈阳与卫立煌部连成一片，整个东北战局就又可能逆转；再者，国民党在山海关一线驻有五十余万大军，要是东北解放军主力孤军深入锦州、营口与廖耀湘兵团决战之际，山海关一线的国军从西面出击，沈阳的卫立煌部从东面出击，将我合围于锦州，岂不令致全军覆灭？这步险棋、死棋，林彪是断不要走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仗要一役一役来打，敌人要一部分一部分来解决，先解决被围困在长春的郑洞国兵团，免却后顾之忧之忧，再大军南下辽宁解决卫立煌部，最后寻找号称龙虎之师的廖耀湘兵团决一雌雄。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已经与刘少奇、朱德汇合于河北省西柏坡村。毛泽东对于林彪的抗命，一时又恼怒又束手无策，只能发出一封一封电报去催迫林彪下决心进行锦州会战，不可贻误战机。否则，国民党最精锐的廖耀湘兵团和新一军，很可能从海上跑掉，从而给平津和淮海两大战场增添新的变数。

这一次，毛泽东、周恩来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他的几十封电报（共有六十七封之多）虽然未能说服林彪，却说服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等一批主要负责人，他们在林彪面前要求服从中央军委的命令，大胆实施锦州会战。但林彪仍然迟疑不定，担心半世战功，一役败尽。直到八月间，周恩来说服毛泽东，派出情报要员潜往黑龙江双城子，秘密面告林彪：沈阳的卫立煌周围都是我方的潜伏人员，毛、周已亲自致信劝降，卫立煌已无信心在东北组织大战；北平的傅作义正与我代表秘密谈判，准备和平起义，因之我军在锦州与廖耀湘兵团决战之时，根本不存在被东、西两面的国民党大军合围夹击的可能！林彪这才恍然大悟：「这么要害的情报，为什么不及早告诉我？你以为我愿打没有取胜把握的会战？」

锦州战役于九月下旬打响。林彪集中了所辖四个兵团中的三个，十几个纵队（军）近四十万精锐，动用三千多门重炮，以三倍于廖耀湘兵团的绝对优势兵力，在锦州、营口一带血战十五个昼夜。抗战期

间曾经远征印度、缅甸的廖耀湘兵团表现出顽强的战斗力，团级指挥官均亲自率领士兵与共军厮杀。许多云、贵籍士兵被俘后仍然不服，以西南官话叫喊：「你们就是仗着人多，三、四个打我一个！我们一个对一个试试？看看谁能赢？」

果然如毛泽东、周恩来所料，整个锦州会战期间，东面沈阳的卫立煌按兵不动，西面北平的傅作义亦未伸援手，眼睁睁看着龙虎之师的廖耀湘兵团于血火中全军覆灭。更有妙者，锦州战役之后，镇守沈阳的东北剿共总司令卫立煌将军，竟丢下二十余万官兵，坐飞机只身逃回南京去了。一枪未放，沈阳解放，二十余万国军官兵接受东北人民解放军政编，成建制变为革命队伍。而那被围困了一年多的长春城，被活活饿死、冻死了二十几万平民之后，郑洞国兵团的残部起义投诚，亦被改编进了东北人民解放军。此一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林彪、罗荣桓统领东北人民解放军进山海关参加平津战役时，已是百万雄师，成为中共一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

这支部队数月之后所向披靡，一路南下，从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打到广东、广西和海南岛。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以中共将领在解放战争中的功绩而论，谁也比不上林彪，堪称第一战神。

一九四九年初，刘少奇主编的《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出版前夕，林彪要求毛泽东主席删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数处所提到的他的名字。二十几年的革命战争经历，足已证明他林彪的革命意志是坚定的。鉴于林彪的显赫战功，毛泽东指示刘少奇，将该文及有关注释中的林彪的大名，统统予以删除。毛泽东说：「文过饰非嘛，也应当替林彪饰这个非了。」

林彪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其为人性格，也确有不同凡响之处。他沉默寡言，生性孤僻，不尚交际，生活相当简朴。他除了为止伤痛而吸过鸦片之外，平日并无烟酒嗜好。在东北战场唯一的爱好是嚼炒黄豆。有人说他克敌制胜的锦囊妙计，都是他一粒一粒嚼炒黄豆时冥思苦想出来的。他给自己的在东北出生的女儿林立衡取名「豆豆」。

他是负伤最多的中共高级将领，身上的几处细碎的弹片因嵌入要害部位而一直未能取出，使他长期忍受着伤痛的折磨。

甚为引人思索的是林彪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关系。无论从年龄到革命资历，毛、周无疑都是他的上司和兄长。周恩来更是他黄埔军校时的老师。林彪在党内的好友是高岗，东北共事近四年，英雄惜英雄，相处愉快。他也尊敬彭德怀，而有些轻视朱德、刘少奇。他认朱德为空头司令，不具真才实料；刘少奇则是靠呼口号爬上党内二把手的高位。

每逢毛泽东或是周恩来个别召见他，或是他向毛、周汇报工作，总是身子坐得笔挺，脸上少有笑容，说话简洁扼要，绝无讨好客套。他也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敢于争辩，坚持己见，不亢不卑。谈完就走，从不拖泥带水。而在一切公开的会议场合，则总是称颂毛泽东，把自己的战绩归功于毛泽东的领导，甚至把自己在东北战场提出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等一整套战略战术，说成是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从来贪他人之功为己有，自然是心领神受了。这就是林彪虽然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反毛的纪录，毛却一直对他怀有好感予以重用的缘由。那时，毛泽东喜欢林彪正直无私，光明磊落，不搞阴谋。毛泽东也不用防范林彪，认林彪只是一名军人，其性格、气质都不适于作一位政治家的。

九月上旬，林彪在武汉接到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打来的电话，通知他提早几天到北京，毛泽东主席要找他谈话，有要事相商。并告诉他，中央办公厅已替他在北京西城区毛家湾准备了一座大四合院，供他全家居住。林彪来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办公室时，毛、周二人起立相迎，同时向他伸出热情的双手。林彪则坚持先敬礼后握手，这是他军人的习惯。

毛泽东拉住林彪的手，许久都不放下：「育容啊，你脸色还是发白，身体有没有全面检查？专家们的意见怎样？」

林彪仿佛不习惯自己的手被人长时间的握住，而轻轻地、无损礼节地松了出来：「感谢主席关心，还没有来得及请首都的专家们检查身体。我想也没有啥子大问题，反正活着干，死了算！」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赞许地笑了。林彪却只是动了动嘴角，没有笑出来。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林彪的个性是比较呆板、枯燥的。

坐定之后，服务员来上了茶。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育容啊，朝鲜半岛战事已经进行快两个月，你研究过战局吧？有什么想法？」

林彪有些神思不定似的，看看毛泽东，又看看周恩来，欲言又止：「我？惭愧，还没有认真思考过。」

周恩来怕林彪的态度引起毛泽东不悦，忙说：「林总，主席一向很重视你在军事上的见解，早就想听听你关于朝鲜战事的看法了。这里只有主席和我两人，你怎么看的，就怎么说吧。」

毛泽东宽和地笑着：「听说你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孙子兵法》，很有心得。你我是同好啦。《孙子兵法》于我，也是百读不厌，常读常新。」

林彪额头上又冒汗了。他掏出手绢来擦着。爱出汗，怕燥热，是他的病症之一。他稍稍拘谨并稍稍抬高了一点他的湖北口音——这点跟毛泽东很相像，终生不改乡音：「朝鲜战局，北军节节胜利，南军一路败退，看似北军形势大好，其实很险，有致命的大险。」

毛泽东、周恩来相视一笑。毛泽东说：愿听端详。

林彪伸出右掌，在胸前做了个包抄手势：「现在，北军的主力都集中到了南方的洛东江一带，半岛中部、北部防务空虚，补给线拖得很长，只要美国军队在半岛中部实施登陆，很容易就把北军主力关在南部，有去无回。」

毛泽东点着头：「很好很好，英雄所见略同。总理也是这个看法。你能不能谈点对那个联合国派遣军的印象？他们的战斗力究竟如何？」

林彪身子笔挺，喝口茶清了清嗓子，便思路清晰，背书般娓娓道来：「眼下，联合国派遣军拥有的兵力，以美国第八集团军属下的三个军为主力，第一军辖骑兵第一师，步兵第二十四师；第七军辖步兵第二师与第二十五师；第十军辖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以及空降兵第一百八十七团。加上英军第二十七旅，第二十九旅，加拿大旅，土耳其旅，每旅五千余名官兵。南朝鲜李承晚军队亦已统归联合国派遣军指挥，并且是打头阵的，计有：第一军团辖首都师、步兵第三师，第二军团辖步兵第六、第七、第八师，第三军团辖步兵第二、第五、

第九师。此外还有南朝鲜的步兵第一师已配属美第一军作战，第十一师配属美第九军作战。以上是陆军情况，总兵力为四十余万。空军方面，有：美国空军第五航空队，拥有各型战斗机七百架，驾驶员都是经历过二战的空中老油条；美国第二十战略轰炸机航空队，拥有各型轰炸机三百架，一九四五年八月上旬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即是该战略轰炸机队所为。另外，美军每个陆军师选配备有十架侦察机，支持地面作战。海军方面，以美、英为主，拥有包括航母在内的各型军舰三百多艘，配备各型登陆艇。」

在听取林彪的上述敌情简报时，毛泽东、周恩来不时露出惊喜之色。他们心里不能不佩服，身子瘦弱的林彪实实在在是位军事天才，在各大军区的负责人中，很少有人可以与之相匹敌。不信，随便叫上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们来问问，他们绝无可能背书一样一口气说出联合国派遣军的以上数字简况来。

于是毛泽东说话的口气显现出一种少见的尊重：「林老总，依你之见，美军在朝鲜半岛，会于何时何地实施大规模抢滩登陆？」

林彪说：「迫在眉睫，时间大约不出本月，地点很可能选在汉城附近的仁川港……。恕我冒昧一句，如果真有我们的暗助部队到了南朝鲜，应尽快命令该部北撤到三十八度线附近来，才能化险为夷。北朝鲜人民军愿不愿撤，是他们的事。」

毛泽东眯缝起他古典美女式眼睛，没示可否，而由周恩来发问：「林总，你对朝鲜战局、敌军情况的见解，精深独到。请问，你研究朝鲜局势有多长时间了？」

林彪略带腼腆地先望望毛泽东，再望望周恩来，才说：「今年春上吧，我在中南军区院子里，搞了个外军情报资料室，养了一批懂英文、俄文、法文、德文、日文的读书人，让他们天天收听外电广播；又让广州方面，每星期两次派人乘渔船去香港或澳门，购买报纸杂志，特别是美、英、法三国的军事政治书刊杂志……。」

毛泽东说：「育容啊，你是个有心人罗，难得难得。我看除了军委作战局和总参三部，再没有人像你这样，关心、了解朝鲜战局了。我还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如美军果真在仁川或是别的什么地方登陆，

北朝鲜人民军反胜为败，一路败退到三十八度线以北，以致退到鸭绿江边境一线来，我们怎么办？」

林彪说：「我们就只好收容他们罗，他们曾收容过我们。」

毛泽东紧问：「我们难道见死不救，不应该出兵相助？」

林彪眼睛眨巴两下，脑子飞快一转：「恕我直言，只要美国军队不打到我东北境内来，我们不要轻言出战。」

毛泽东又一次吃惊了，看了周恩来一眼，难掩脸上的失望之色：「育容同志，此话怎讲？」

林彪说：「我们的国家成立不到一年，一切尚处在草创阶段。经济尚未恢复，土匪尚未剿清，西藏、台湾尚未解放。自己的屁股都没有来得及擦干净，怎么管得了邻居的事？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头，经济、军事比我强大得多，尚且没有去管。我若贸然宣布对美作战，一无空军，二无海军，制空权、制海权都在人家手里，光靠步枪机关枪，怎么去进行一场现代化战争？如果美帝国主义入侵我东北就不同了，我就跟他打一场人民战争！保家卫国，我林彪第一个请缨！」

林彪的态度如此明确、坚定，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法再开口，只得留客吃饭。

第三十四章 群英聚会中南海

九月十九日，美国陆、海、空三军果然演出拿手好戏，在朝鲜半岛中部的仁川实施抢滩登陆，很快摧毁了北朝鲜人民军的海岸防御，第二天即占领了南北交通枢纽汉城。尽管有中国同志自八月下旬以来再三提醒、警告，北朝鲜人民军并未果断后撤，主力部队被截在了南方，成为瓮中之鳖。侥幸北撤的小部分兵力，倒是在三十八度线一带组织起英勇抵抗，战事空前惨烈。朝鲜战局几乎于一夜之间逆转，从北方解放南方变成南方大举反攻北方，且锐不可挡。

十九日深夜，毛泽东于中南海菊香书屋办公室召开书记处紧急碰头会，讨论朝鲜半岛的危急局势。毛、朱、刘、周、任五大书记之外，只有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列席。毛泽东说，朝鲜的事，我们再不能迟疑、延误下去了，我的话放在这里：一个月之内，战火就要烧到鸭绿江边来，谁能确保我东北边境无事？周恩来坚定支持毛泽东：「与其被人打过来，不如我们打出去，我们已经避免不了这场战事，不是我们要打，而是美帝国主义逼着我们打。朱德不反对出兵，主要担心新组建的东北边防军部队准备不足，只有第十三兵团进入了中朝边境一线，其余一野的第十九兵团和三野的第九兵团尚在调运途中，要到十月中旬以后才能到位。刘少奇仍然坚持原先的意见：「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派遣军不侵犯我东北边境，我们还是不宜过早宣战，引火烧身，我们要把主要力气放在国内的各项紧急事务上，先巩固自己，再支持友邻。」任弼时更提出：「苏联老大哥为什么要坐视不管？他们的陆军、空军比我们现代化得多，我们只有陆军，尚无空军、海军，他们许诺的空中掩护在哪里？见不到踪影。」

中央五大书记各说各话，意见不能统一。尤其使毛泽东心里大不痛快的，是原先寄予了厚望的林彪，这次竟是个反战派，根本反对人民解放军卷入朝鲜战事。让朱德、周恩来分别找他谈了两次，他仍然借口身体不行，不能担负重任，并要求党中央批准他赴莫斯科疗伤治病。紧急碰头会只开了一个小时。散会前，毛泽东说：「明天就开军委扩大会议了，各路诸侯齐集，风云聚会哩。这里我提一个要求，也算

一条纪律，明天的开幕式上，我们都去坐坐，集体亮相。但我们都不要发表高见，以维护中央书记处的统一形象。会上会下，我们也都不要去影响各路诸侯，先让他们独立思考，各抒己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嘛！本次会议交由恩来主持、总理。总理就是要总理嘛。还有一个事，东北边防军已经扩充到了三个兵团加八个炮兵独立师，五十多万人马啊，相当于一支野战军了，原先欲请林彪大人挂任，但林大人厌战称病，要求去苏联疗养，怎么办？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恩来提出粟裕同志，我同意。以粟裕的军事才华、历史功绩，堪孚重望。听陈毅说他在青岛养病？身体行不行啊？谁代表中央军委去青岛拜望粟裕？」

周恩来指着列席会议的作战部长李涛说：「我看让李涛坐专机去一趟吧，代表军委向粟裕同志通报一下朝鲜战况，并征求意见。如他身体可以，就接来北京开会，由主席给他面授机宜。」

翌日，中央军委会议在怀仁堂一中型会议室举行。

会场被布置成椭圆形，中间一圈茶几，茶几之外一圈藤围椅，围坐下二、三十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最著名的将领。毛、朱、刘、周、任五大书记及政治局成员们进场时，将领们全体起立，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呼口号：向军委主席和中央首长敬礼，之后热烈鼓掌。

毛泽东等在椭圆形的中央位置落座后，将领们才相继坐下。周恩来没有坐下，而手执一纸名单，清了清嗓子，声音清晰地说：「受军委毛主席委托，由本人主持此次军委会议。下面点名，到者请起立：「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到！」「请坐下。」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同志因事请假，「副司令员贺晋年——」，「到！」「副政委李富春——」，「到！」「二位请坐下。」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到！」「政委谭政——」，「到！」「二位请坐下。」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到！」，「请坐下」。副司令员粟裕同志因病请假。「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到！」「政委邓小平——」，「到！」「副司令员兼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到！」「三位请坐下。」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同志因事请假，「政委习仲勋——」，「到！」「请坐下。」

下面是军委各总部、各军种及中央有关部门：总参谋长徐向前同

志因病请假。「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长罗荣桓——」，「到！」「请坐下。」「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到！」「请坐下。」「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到！」「请坐下。」「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到！」「请坐下。」「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到！」「请坐下。」「铁道兵司令员滕代远——」，「到！」「请坐下。」军委直属纵队司令员杨成武——」，「到！」「请坐下。」「东北边防军司令员邓华——」，「到！」「请坐下。」「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到！」「请坐下。」「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到！」「请坐下。」「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到！」「请坐下。」「中央调查部部长李克农——」，「到！」「请坐下。」「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到！」「请坐下。」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因事请假。「中央军委负责人兼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到！」「请坐下。」「中央军委负责人叶剑英——」，「到！」「请坐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到！」「请坐下。」

周恩来点名完毕，身子转向毛泽东：「军委主席，本次会议除高岗、彭德怀、徐向前、粟裕、李涛五位同志因事因病请假外，其余二十六位同志到齐。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在京的几位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都是老熟人了，就不一一介绍了。下面，请军委主席作指示！」

会场上响起一派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站起来鼓掌，笑笑微微，环视着会场，说：「应当由我和总司令、少奇、恩来、弼时等人来欢迎你们，来热烈鼓掌。欢迎各路英雄聚会中南海。我们几位没有居庙堂之高，你们诸位也不算处江湖之远，至多只坐三、四个小时的空军飞机，就统统集合了嘛！」

由于毛泽东带了头，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都跟着站起来向将领们鼓掌。将领们也再次起立，再向中央领导人鼓掌。会场气氛顿显活跃、热烈。毛泽东像往常一样，三言两语，便流露出了他的领袖魅力，精神感召力。

领袖对将领，将领对领袖，相互鼓掌致意达三分钟之久。

毛泽东双臂朝前伸出，巴掌向下压了两压：「坐下，都坐下。总是

这么对着鼓掌，你们还请不请我讲话呀？鼓掌还能当红烧肉吃呀？」

将领们笑了起来，这才一一落坐，各自掏出笔记本来。

毛泽东说：「本来没有准备讲话，恩来硬要我讲几句，也可以，算开场白吧。会议的内容，大家已经心里有数。这次是开诸葛亮会，请大家来参谋参谋，献计献策。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众笑）

「我们在座三、四十个臭皮匠，不就有十几个诸葛亮？」（众笑）「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南阳一个诸葛亮就使得三足鼎立，三分天下。我们今天有十几个诸葛亮，还搞不成亚洲一片红？」（众笑）「我们起码搞成两足鼎立，每个人都有两条粗腿嘛！」（众大笑）周恩来插话：「当今世界确是两足鼎立，一足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一足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

刘少奇插话：「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两足鼎力，一足苏联，一足中国。」

毛泽东说：「少奇的譬喻不尽准确。我看社会主义阵营像只螃蟹，有足五对，共同支撑着个硬壳大身躯，中、苏两国是前面的那对大钳子！」（众大笑）

「好了，下面转入正题。自四月份以来，中央已召开过一系列会议，研究朝鲜局势。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譬如以原第十三兵团为基础，组建了东北边防军和东北边防军炮兵部队。上个月又调了华东的第九兵团、西北的第十九兵团开赴东北驻防，作为二线力量。同志们都看过了军委的战报了吧？就在昨天，朝鲜战局发生逆转，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派遣军已在仁川实施大规模海、陆、空抢滩登陆，估计现在已经进了汉城。好在朝鲜人民军有所准备，部分队伍迅速后撤，否则就全部被人家包围在南部的洛东江地区，被一口吃掉了。书记处昨天晚上连夜开会，对朝鲜局势作了新的预测：美帝国主义凭了它的空中优势和陆军装甲火力，很快会突破北朝鲜人民军在三十八度线一带的防线，至迟一个月后会兵临平壤，并迅速将战火烧到中朝边境上来。战火马上就要烧到我们的家门口来了，局势就这么严重。我们怎么办？避免得了这场国际战争吗？我们是主动出兵，去援助朝鲜人民军收复失土，把战争打在国门之外，还是等到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打到我

东北境内来，再组织反击？美帝国主义既是个纸老虎，又是个真老虎。它已经在七月初派兵占领了我领土台湾省，称为「协防」。第七舰队已封锁了我台湾海峡，也称为「协防」。协什么防？典型的帝国主义强盗逻辑，无耻之极！试问美国可以到处派兵，到别国的领土上去「协防」，别国可不可以派部队到它美国领土上去「协防」？它早扔原子弹了！我鸟它嫉驰！记下这笔新账，到时候新账老账一起算。来而不往非礼也。美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经对我宣战了。我们敢不敢应战？何时应战？」

毛泽东说：「我代表中央先说这么多，算是抛砖引玉。为了不影响到在座各位的思路，书记处其它同志，就不再说什么了。先听大家的。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大家要百无禁忌，畅所欲言，以收群策群力之效。怎么样？下面的会议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朱总司令坐镇，其余同志随我退席，各忙各的去。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除了准备打战，还有各类重大问题、当务之急等着处理。等一会，我和少奇还要去出席中央政府委员会会议，向民主党派负责人通报朝鲜局势，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弼时同志是病号，中央只批准他每天工作四小时。大敌当前，我们更要照顾好伤病号，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说着，毛泽东站起身子，边微笑着向大家挥挥手，边离开会场。刘少奇、任弼时与其它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也都跟随毛泽东边招手边离去。刘少奇经过西北军区政委习仲勋和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身边时，本想过去握握手，打个招手，却见二人正在埋头交谈。杨得志问：「其它大区的司令员都来了，彭老总怎么没来？他还是全军的副总司令啊！」习仲勋回答：「不是请假，是中央通知上没有他，大约怕他来放炮、顶牛。彭老总人耿直，总是有啥说啥，许多人都怕他。」

主持军委会议的周恩来，每晚十一时负责向毛泽东作口头汇报。到了第三天，周恩来心里开始犯愁。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已从青岛返回，报告粟裕确实病得厉害，医生说是战争年代受伤引起的脑震荡复发，必须全休治疗。当晚，周恩来不得不面告毛泽东：「粟裕病重，医生不批准来京开会。看来，他也不宜于挂帅出征。」

毛泽东听了，只是淡淡地说：「又是个重病号啊！我昨天还收到他一封信。是托罗瑞卿交来的。我已回信，让他安心养病来日方长呢。军委会议，开得怎样了？还是众说纷纭，形成不了比较一致的看法？」

周恩来只得如实汇报：「仍有两种意见，主张出兵的将领是少数，多数军区领导人认为只宜积极练兵，不宜立即出战，目前应抓紧时机，集中精力办好国内的事情。」

毛泽东笑笑说：「嗬嗬，如此说来，六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都与朱、刘、任观点相近，你、我成为少数派罗。恩来，不要紧，你先讲讲，主张立即出兵的是哪几位？先报喜，后报忧，如何？」

周恩来翻看着手中的笔记本：「主张立即出兵的，有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东北边防军司令员邓华，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公安部长罗瑞卿。一共五位发言，态度坚决，旗帜鲜明。」

毛泽东颇为兴奋又颇有感触地问：「都是大区的副司令、兵团的司令员啊，难道就没有一位大区司令员或政委主张立即出兵的？官做得越大倒是越怕打仗了？没关系，官不在大小，他们都有些什么高见？」

周恩来说：「主张出兵的几位将领，讲的理由都很简单，但很过硬。贺晋年副司令员说：「让战火烧到我东北境内来？没门！反正都是打，为什么不主动打出去？跨过鸭绿江！反正他朝鲜半岛的坛坛罐罐已经打得稀巴烂了。我东北地区抗战时期被日本鬼子奴役了十五年，接着又打了三年内战。近两年刚喘了口气，恢复了生产，经济也刚有了起色，就又要等着做战场？」贺晋年说这些话时，眼睛都红了。东北边防军司令员邓华的发言很干脆：「中央军委组建东北边防军，就是为了保家卫国，反抗侵略，出不出兵，何时出兵，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目前边防军部队的任务是完成边境布防，修造工事，学习朝鲜语，抓紧隐蔽练兵；」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说的最有激情：「美帝国主义也太欺侮人了，手伸得太长了！想想一张世界地图，它美国大鼻子凭什么越过太平洋，跑到亚洲来耀武扬威？还打了鸟联合国的旗号，海、陆、空侵犯朝鲜半岛！还有「协防」我台湾省，封锁我台

湾海峡。「协防」是假，侵占是真！作为一名新中国军人，老子就咽不下这口恶气。到时候，只要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我十九兵团十多万官兵就是一只铁拳头，打过鸭绿江，跟美帝国主义的第八集团军刺刀见红，打它个稀巴烂！你美帝国主义不是有空军优势、炮火优势吗？我跟你打夜战、近战，拼刺刀！刺刀面前人人平等，面对面厮杀，你的空军优势、炮火优势顶个屁！」

毛泽东神情亢奋，双拳紧握，站起身子，大声叫好！

周恩来也跟着站起，也兴奋地地点着头，停了停，却又说：「主席，卡秋莎，我们又称六管火箭炮，八吨卡车载负，机动灵活。发射时六管齐出，可连发，一次六六三十六发高效燃烧弹，能烧穿钢甲，烧熔水泥工事，将敌军阵地变为焦炭。我们不是在西伯利亚基地看过苏军的演习？卡秋莎发射时整个天边都是血红的。二战时，曾在苏德战场上大显神威，被称为陆军死神，西方国家至今不能仿制。苏联老大哥已帮助我们在抚顺兵工厂制造……一百五十门卡秋莎，加上辅助设施，相当于一个特种火箭军。还是按总参谋部原先规划的，组成三个独立火箭师，分别划归十三兵团、九兵团、十九兵团吧。要不然，都属于东北边防军建制，其它两个兵团摆不平，闹起来，怎么办？好在我们自己不久就能制造了，在全军普及起来，就容易了。老大哥只是在弹药的配方上对我们留了一手。这是我们陆军的秘密武器，我们不宣扬。」

毛泽东挥了挥手：「也好，手背手心都是肉，那就还是按原方案办吧。绝对不要张扬，到时候请美军进火焰山，做焦炭。还有陈赓、罗瑞卿二位的高见呢？」

周恩来继续汇报：「陈赓是个好战分子。他说中央军委可以把第四兵团留在云南剿匪，保卫南疆，但他本人坚决要求上朝鲜战场，跟美帝国主义痛痛快快地打一场！不打战，他手痒心痒！」

毛泽东归座，欣慰地笑了：「陈赓好样的，我的老乡是条汉子！先时他请缨横扫东南亚，我说他想做二十世纪的成吉思汗；现在他请缨朝鲜，是要做中国的巴顿了。我一定成全他。罗瑞卿，罗长子呢？」

周恩来说：「罗长子的发言挺干脆，养兵千日，用在一朝，迟打不如早打，境内打不如境外打，打出去，打败美帝野心狼，再班师还朝。」

毛泽东手掌朝下一劈：「打败美帝野心狼，讲得好！恩来，我看我们的五位兵团司令都是主战派，全国十七个兵团，很有代表性啊！这次会上，他们虽然属于少数派，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过去列宁的布什维克就是少数派，我在江西苏区时期也是少数派，屡遭排斥、整肃啊！下面你介绍介绍这次会议的多数派，反对出兵朝鲜的，哪几位的发言比较典型？」

周恩来翻看着手头的笔记本：「说起来，也是个令人思索的现象呢，六大军区，除了高岗、彭德怀没有到会，华北的聂荣臻没有发言，其它如华东的陈毅，中南的林彪、谭政，西南的贺龙、邓小平，西北的习仲勋，东北的李富春，南京军科院的刘伯承，还有罗荣桓、叶剑英，几乎所有野战军一级的领导人，都不主张立即出兵。他们的意见归纳起来，大致上是五条：一、我国经过了几十年战争的摧残，战争创伤急待恢复，而财政又十分困难；二、国内还有部分边远地区和沿海岛屿包括台澎金马尚未解放，约有一百万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武装尚待肃清；三、广大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新建立的各级政权还有待巩固；四、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落后于美军，空军、海军尚在草创阶段，还谈不上制空权和制海权；五、由于长期战争的艰苦生活，军队官兵厌战、渴望和平的情绪相当普遍。总之，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战。其中，以林彪、邓小平二位的发言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

毛泽东不动声色，口气平和地问：「林彪又说了些什么？他平日沉默寡言，不尚交际，这次倒是话不少了？」

周恩来说：「畅所欲言还是好的。林彪在会上介绍了联合国派遣军队的组成，就是上次对主席和我说的，之后就讲美国的一个军，拥有各式火炮一千五百门，每个师还配备有十架侦察机，加上强大的空军支持，是海、陆、空立体作战。而我们的每个军才有三十六门大炮，陆军火力就不成比例，跑路仍是两条腿，弹药靠士兵肩膀扛。空军、海军成立不到一年，基本上等于没有。只有陆军靠人多，跟人家打人海战术，三、五个拼一个。最主要的，美国人手里有原子弹。打急了，美帝国主义不扔原子弹？谁能担这个保？扔上一个，我们就

吃不消了。林彪对敌人的武器装备，如数家珍，说得大家大眼瞪小眼，又惊讶，又佩服。他的结论是：「我军若贸然入朝，既无空中掩护，又无海上支持，敌我装备如此悬殊，必然是出去容易回来难，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的脸色在缓慢变化着，先是泛红，继而泛青，双拳搁在藤椅扶手上，透出他内心的失望与恼怒：「唯武器论，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他是在放屁。悲观厌战，革命意志衰退。又犯一九二九年的老毛病，编《毛选》刚替他文过饰非。在东北打了两年胜战，后半辈子想吃老本了。今后还怎么带兵？不谈战争性质，正义与非正义。不谈人的因素，军队士气。光谈武器装备，大炮飞机，共产党人、革命军人的气味哪里去了？还拿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来吓唬人。他有原子弹，老子有手榴弹，还有卡秋莎。不信手榴弹打不过他原子弹。杨得志比他高明多了，比他懂得现代化战争。美国人在日本丢下两颗原子弹时，美军还没有登陆日本。我跟他打近战、夜战，拼刺刀、肉搏，他怎么发挥空中优势？他怎么扔原子弹？连他自己的军队一起炸成肉饼？整个混账，似是而非，一派胡言。恩来，你替我通知杨尚昆，立即给林彪安排专家会诊，全面检查身体，身体和思想的毛病要一起治疗。需要送去苏联就送去，留在北京，会传染给别人。据我所知，他的恐美病，已经感染了高岗。好在高岗是条陕北硬汉，会听我的，不会听他的。他走之前，我不要再见到他。此人现在变得十分讨厌。」

周恩来迅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录下来：「好，明天一早我让杨尚昆去办。林的伤病，战争年代留下的，还是要给予关心。下面，我介绍一下邓小平的发言要点？」

毛泽东气色平和了些，点了点头。他燃起一支烟，吸起来。毛泽东吸烟，叫做吞云不吐雾，大口吸进去，不见一丝漏出来，全绕在五脏六腑里。城腑之深，可见一斑。

周恩来说：邓小平虽然也主张缓出兵，但他说的比较有道理，也比较有说服力。矮个子从来言简意赅：在朝鲜的联合国派遣军，是以联合国的名义来执行任务的，它只是对北朝鲜采取战争行动。起码到目前为止，联合国安理会并未提到要对我新中国进行制裁。而且外电

报导，美国总统杜鲁门已下令麦克阿瑟，美国军队不得追击北朝鲜军队至鸭绿江一线，美国飞机不得进入中国东北领空，并宣布美国不要跟中国打战，一旦朝鲜战事结束，美国将会撤除对台湾海峡的封锁。所以，我若立即出兵朝鲜，师出何名？苏联老大哥又躲在后面不肯露面，没有使用安理会的否决权，可见他也是要给联合国一个面子的。本人建议，只有在联合国派遣军入侵我东北边境，或派飞机轰炸我东北领土这个前提下，我才立即举兵反击侵略，打过鸭绿江去！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在延安说过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本人斗胆加上一言，一犯到底！邓小平还称赞了杨得志的见解，只要我军坚持打近战、夜战、拼刺刀，敌人的空中优势、火炮优势包括原子弹，就统统用不上，优势等于零。」

毛泽东的眉头舒展开来，脸上有了笑容：「看看！高水平出来了吧？主张缓出兵，也要说出个道理来嘛。林彪与之相比，相差何止千里。好个邓政委，我要和他详细谈谈，把他说服过来，人才难得。刘伯承、陈毅、贺龙、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习仲勋诸位呢？」

周恩来说：大体上，他们对林彪的唯武器装备论，也不大以为然；而都比较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刘伯承称他「我的邓政委」，举了举大拇指。

刘伯承同志建议中央军委立即举办一期全军军长以上主要将领的集训班，突击补一课：关于指挥现代化战争诸兵种协同作战、关于建立炸不断的军事通讯系统与后勤物资供应线，这是入朝参战前最急需解决的课题。朝鲜战场，已不同于我们过去打人民战争及其采行的人海战术了。

毛泽东点着头：「恩来啊，我们把刘伯承摆到南京军事科学院去培训高级将领，这步棋走得对啊！要说我军真正的战略家，就数他。林彪嘛，充其量算个战术家，只能发明个三三制，一点两面，围城打援之类。陈毅呢？陈老总有何高见？」

周恩来翻着笔记本：「陈毅赞同邓小平。他只是补充了一点，建议中央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东北边境的同时，也兼顾到东南沿海方面的紧张局面。第七舰队封锁我台湾海峡，随时可能大规模轰击我江、

浙、闽沿海大中城市和军事基地，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其它如贺龙、罗荣桓、叶剑英、习仲勋等，也都同意上述意见。罗荣桓是抱病从医院出来开会，医生没有批准，他坚持来的。剩下聂荣臻，他说中央让他作代总参谋长，管一些具体事务，所以他要遵守纪律，不谈个人的观点了。一句话，无条件地执行党中央和军委主席的命令。」

毛泽东目光盯住对面墙上的朝鲜半岛挂图，好一会，才说：「恩来啊，记得你说过，邓小平是个帅才，是个领袖人物。不错，不错……。我是在想啊，几乎成一种规律了，他们一做了大区司令、政委，党、政、军一把抓，类似过去的封王，就总是结记着恢复经济啊，工农业生产啊，地方建设啊，安定人心生养休息啊，连带一向较为主战的高岗，都受了影响。他们缺乏一点像杨得志、陈赓式的军人锐气。你说为什么？」

周恩来合上笔记本，恭敬的以双手压在膝盖上：「大概叫做在其位，谋其政吧。我们这些人，包括小平、陈毅、林彪、富春、贺龙、仲勋、剑英他们，出生入死打了半辈子仗，好不容易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还能不想到好好进行和平建设，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本人就是这样，做梦都想抓经济，搞建设，实践自己年轻时代所抱定的强盛国家、服务人民的志向。内心里，我是实在不想打战了。可是，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我们的家门口，硬不让我们有个和平的环境来建设国家，只好横下一条心，以正义战争来制止非正义战争，以战争手段来达到和平的目的了。」

毛泽东被周恩来的一番真挚话语感动，拉住了周恩来的手：「好，好，讲得很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嘛，一意主张出兵，是还有个另外的想法，另外的担心。我们如果迟迟不出兵，被美帝国主义视作软弱可欺，中国仍然可以被鱼肉，真的把战火烧到我东北境内来，那么根据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苏联红军就又可能返回我东三省来。苏军过去以占领军身分驻扎在东北，东北妇女遭了殃，日本人留下的好一点的工厂设备也被搬走了。请神容易送神难啊，我再不要看到新中国领土上出现外国军队……。当然我这话，现在不能公开说。你刚才的那番道理，感人至深，则一定要留到军委会议上作小

结时去说出来，很能服人的。我看，军委会议再开个两天，让大家把话讲完，就可以结束了。由你代表中央作小结。我和总司令、少奇、弼时出席，和大家照个相，吃顿饭。最后决定出兵、谁人挂帅，还是要到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上去定。等朝鲜战事告一段落，我看呀，可以考虑把现在各大区的主要负责人统统调进北京来，充实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机构，让大家机会均等，各展抱负。而把各大军区的领导职务，交给现在兵团一级的邓华、杨得志他们去做……。」

第三十五章 彭德怀临危受命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和阅兵仪式。晚上则在广场上进行文艺联欢并燃放焰火。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喝茶聊天，观看焰火，真是火树银花不夜天了。

正在这时，中南海机要局的工作人员匆匆忙忙登楼，将一封加急电报送交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起身退入楼后的休息室，速将电报看了一遍，迅即返回毛泽东身旁，蹲下身子在毛泽东耳边作了汇报，之后站在一旁等候指示。毛泽东并不着急，继续跟人说笑了一会，才回过脸来说：「真是个不合时宜的「国庆礼物」啊，也难怪金日成，我这里普天同庆，他那里大难当头嘛，焰火不看了，立即通知政治局成员，现在就到颐年堂开会。」

当晚，在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会议室，毛泽东主持政治局紧急会议。他让周恩来先念了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首相^⑧金日成和外务相朴宪永拍给他的求救电报：……自九月十九日美军仁川登陆，我即陷入险境。敌人以千余架各式飞机，对我前方、后方实施昼夜轰炸，我兵力与物资损失惨重。敌登陆部队与南线部队已连成一片，将我军截成南、北两段。主力陷落南方，突围无望。如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单靠我自己军力万难进行有效抵抗。我们万不得已，恳请你们施以援手，速派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朝，助我反抗美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

周恩来念完电报，叹了口气：「糟糕不糟糕，硬是不听我们的告诫，朝鲜人民军的主力到底被人家截在南方了，十来个全苏式装备的陆军师哪，坦克装甲车，榴弹炮加隆炮，只差卡秋莎了。」

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加上列席会议的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聂荣臻、习仲勋、李富春、谭政等六大军区的负责人，均热烈发言，各

^⑧金日成自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起，担任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内阁首相」，简称「首相」。

抒己见。

对是否立即出兵，多数人仍持谨慎态度。

会议进行到二日凌晨。军委作战局两次送来紧急情报：南朝鲜陆军第三师在美军强大炮火掩护下，已开始越过三十八度线向北进犯；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下达了「联合国派遣军第二号作战令」，命令正在三八线南侧集结待命的联合国部队，立即从陆地和海上越过三八线向北进军，一个月内迅速、彻底打败北朝鲜共军，十一月月上旬结束战事，返回各自的老家过感恩节！

会议开到天亮，除了骂一通麦克阿瑟的狂妄与狼子野心，没有作出决定。毛泽东回到菊香书屋，吃了安眠药也不能入眠。他只好起来给周恩来挂电话，吩咐马上拍电报到沈阳交高岗、邓华二位：一、请高岗同志接电报后立即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命令东北边防军提前结束军事演习，准备随时出动，并将部队可否随时出动即行电告军委。

十月二日午后，高岗匆匆飞抵北京。他知道肯定是要研究出兵援朝问题，这次自己再不能强调东北边防军准备不足了，否则会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斥责。下午三时，毛、朱、刘、周、任、高，加上代总长聂荣臻，在颐年堂举行会议。毛泽东开宗明旨：朝鲜局势如此恶劣，现在不是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要马上出兵。我是军委主席，你们再多的人有不同意见，最后也要听我的。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对整个战局至为重要。今天先讨论两个迫切问题，一是出兵时间，二是谁来挂帅。

高岗插问：「挂帅人选不是早已决定了是林总吗？」

毛泽东紧绷着脸孔说：「原先还考虑过粟裕。但粟裕的确有病，我已回信让他安心养病，来日方长，有机会领兵打战的。至于林彪，我和恩来九月上旬找他谈过一次，中旬总司令也找他谈过，下旬我又单独找他谈过。我详谈了我们为什么要冒险出兵，不出兵将来会有什么恶果，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对美帝国主义应该采取什么对策。从来的帝国主义都是欺软怕硬。中国地方大、人口多，现在要变成硬骨

头。不是说美军武装到了牙齿吗？这次就叫它把牙齿咬崩掉！可是林彪呢，后来不再谈判美军的飞机大炮如何厉害、猛烈了，而是强调他每晚上失眠，身体虚弱多伤病，怕风、怕光、怕水、怕热、怕吵，要求去苏联治疗。他患有「五怕」，怎么可能领兵作战？现在的问题是，除了林彪大人，我蜀中无大将了？战将如云，大将军多得很，但谁最合适呢？」

朱德总司令早就憋不住了，脱口而出：「我提彭德怀，我们为什么不用老彭？从井冈山起他就是红军副总司令，现在也是全军副总司令，军委副主席。我看老彭的威望，胆识，肯定都在原先考虑的人选之上。」

毛泽东终于点了点头：「好，我同意总司令的。大家如无意见，就用老彭吧。关键时刻，我的小同乡还是较得住的。老彭拜将，我已考虑过整整两天了。各位以为如何？」

高岗立即表态：「我赞成。彭总脾气大，却是大忠臣。长征末期，中央红军只剩下几千人马，成立北上甘陕支队，主席亲任政委，彭总任司令员，领着大家走出重围，到达陕北；四七年三月胡宗南率二十四万大军进攻延安，彭总率两万四千人英勇奋战，硬是把胡宗南打得团团转。历史紧要关头，疾风知劲草，彭总是大忠臣！」

刘少奇看了高岗一眼，心想你高岗一没有参加过长征，二没有参加延安保卫战，怎么话这么多？他嘴上却答着「是啊！是啊！老彭靠得住啊！」

周恩来也连声赞成，内心里却在苦笑：半个月前，连军委会议，都不同意给老彭发个通知啊！还算好，这份吃大苦的光荣差事，总算想到他了。

毛泽东目光锐利，明察秋毫，仿佛看出了周恩来心里的曲折，不予理会，而说：「总司令、少奇、弼时、高岗诸位，出兵的事，也不能由我一人说了算，我们可以继续扯皮。反正人多议论多，政治局也像个联合国了，再讨论一个月两月，半年一年，公说公理，婆说婆理，也不会有结果的。恩来，今天时间已晚，你去吩咐一下，明天一早，军委派专机到西安，去把彭大将军接来，一刻也不准停留。另外，立

即给史达林同志发给电报，告上我们已决定于本月十五日左右出兵朝鲜，请他实践由苏军提供空中掩护的诺言，还有他们早已答应的二十个陆军师的武器装备，为什么还不运来？是不是要我花钱买？可以作为长期信贷，我们以后还嘛。」

彭德怀，原名彭得华，字石穿，一八九八年生于湖南湘潭县乌石乡炭子冲，为毛泽东小同乡，跟刘少奇、周恩来同岁。幼年家境贫寒，从小苦力谋生。一九二八年加入湖南新军吃粮。由于吃苦耐劳，勤奋好学。一九二二年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任湘军营长、团长。一九二六年参加民国革命及北伐战争。一九二八年秘密加入中共，随即率领部队配合平江、浏阳一带农军，举行平浏暴动。年底率领起义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会合，出任工农红军副总司令、一九三一年，彭部扩编为红三军团，彭任军团长，杨尚昆任政委，刘少奇任政治部主任。其时刘少奇尚是他的下级。一九三一年起，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九三三年七月，中共举行宁都会议讨论第四次反围剿战略，彭德怀支持周恩来「先发制人」之方针，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之策略，并参与了秦邦宪、周恩来等人发起的对毛泽东的批判、排斥。一九三四年冬率红三军团参加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一九三五年九月，周恩来、毛泽东组织北上陕甘抗日中央支队，彭任司令员。彭德怀作战勇猛，所向无敌，率领红军残部出川入陕，走出绝境，与陕西红军刘志丹、高岗部会师。毛泽东写诗赞曰：「山高路险坑深，大军纵横驰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一九三七年，中共红军接受南京中央政府改编为八路军（后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下辖林彪、罗荣桓的一一五师，贺龙、关向应的一二〇师，刘伯承、邓小平的一一九师。一九四〇年八月至十一月，彭德怀不顾延安毛泽东的劝告，说服朱德，在华北发起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歼灭、俘获日伪军四万余人，拔除敌人据点二千九百余处，摧毁日伪所占领的铁路、公路数千公里。重庆的蒋介石发表嘉奖电，延安的毛泽东也不得不发来贺电，称颂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将士英勇杀敌的功绩。一九四一年兼任中共北方局书记。一九四三年春被调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期间根据毛泽

东的部署，举行了华北工作座谈会，名为由彭德怀汇报华北工作，实为批判斗争彭无视毛的劝阻，毅然发动华北百团大战、暴露中共军事实力的严重错误。因为按照毛的理论，蒋介石是今天的朋友，明天的敌人。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土地越多，就越是爱国主义。二次世界大战迟早要结束的，到时候日占区只是派人去「接受」，而国统区则要军队浴血苦战去「解放」。中共军队应当保存及壮大实力，留作日后打内战，夺政权。当参加华北工作座谈会的毛泽东的亲信如刘少奇、康生、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罗瑞卿们，根据新发明的「毛泽东思想」围攻彭德怀时，只有高岗、习仲勋、陈云、徐向前、邓小平等人保持沉默，或是私下里同情彭老总。彭德怀本人则拒不认错，硬起脖子对吵：「日本鬼子在蹂躏我国土，屠杀我民众，奸淫我姐妹，我指挥部队打日本鬼子打错了？老子不服不服不服！玉皇大帝下诏书老子也不认。为一己私利，枉顾民族大义，不管百姓死活，无耻无耻无耻……。」双方对吵了五十天。亦即十四年后的庐山会议上彭对毛说的：「华北会议你操了我五十天娘，现在我操你二十天还不行？」最后还是由周恩来出面当和事佬，对双方都进行劝解、安抚，又说服彭德怀检讨了几句不虚心、居功骄傲之类，华北会议才草草收场。不管毛泽东后来怎样否定华北百团大战，即便是在五、六十年代，中共军方的公开出版物中，也一直对此一战役的历史功绩给予肯定和赞扬。

正是延安整风，彭德怀和罗瑞卿结下了私怨。罗瑞卿深获毛泽东的信任，任党中央保卫局局长，自然唯毛之马首是瞻。彭德怀则斥其为空长了副高大身胚，骨子里缺点军人骨气。中共「七大」，毛泽东当上了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因之包括朱、刘、周、任在内，人人称毛泽东为「毛主席」，呼毛泽东为万岁。唯独彭德怀不称主席，不喊万岁，而坚持称呼毛泽东为「老毛」。他说，我不是不尊敬老毛，不服从老毛，我是不习惯，是反对全党拍马成风气，长此下去，对老毛本人也有害无益。对于彭德怀的这股凛然正气，刚直不阿，毛泽东初时还赞扬过多次。

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率二十四万大军进攻延安，彭德怀率二万四千人马奋力对抗，掩护毛、周、任的党中央机关撤退，转战陕北。

中共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硬是以少于十倍于敌人的兵力，连续取得多个战役的大胜，整旅、整师地吃掉敌人。其时，彭德怀、任弼时，一武一文，是唯一两位敢跟毛泽东争辩是非、不惜大吵大闹的人。彭德怀曾经大吼过：「老毛，我要是依了你的瞎指挥，死掉的是整营、整团的士兵！你的命令，正确的我执行，错误的我抗命，砍了我的脑壳也抗命！」

一九四八年春，毛、周、任等率党中央前委机关进入河北，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留在陕、甘、宁一带继续征战。全国胜利前后，毛泽东已经刻意疏离了自己的这位忠心耿耿、能征惯战却也浑身带刺的小同乡了。毛泽东疑心甚重，他任命对彭德怀不甚友好的罗瑞卿当公安部部长，掌控党中央政治保卫系统，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为着防范彭德怀这类将领「作反」。

直到这次军委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六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基本上到齐了，毛泽东却不让周恩来通知彭德怀出席。有时，周恩来也对喜欢言语犯上的老同事彭德怀甚有怜意。毛对彭的刻意冷落，周恩来内心里是有看法、有感叹的。他也曾借机会向毛泽东进书：彭老总忠心耿耿，是个「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式的人物啊，就是好提个意见，脾气倔一点。毛泽东却听不进去。

十月三日，华北地区乌云翻滚，阴雨迷蒙。其时空军为中央领导人备用的专机只有苏联赠送的小型伊尔十四（双螺旋桨），恶劣天气没法飞行。周恩来几次打电话到西郊机场催问也没有用，只得报告毛泽东，同意改在第二天气候好转再去西安接彭老总。

十月四日上午，中央专机抵达西安机常中央办厅警卫处两位「专使」立即乘车奔往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大楼彭德怀办公室。彭老总正在埋头审阅有关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的各种汇报、计划和图表，准备向中央汇报用的。「专使」向彭总行军礼后，说：「报告彭总，中央请您立即乘飞机到北京开会，周总理交代我们，一分钟都不准停留！」

彭德怀笑嘻嘻着：「这么急，火烧屁股了？我还没有进过中南海哪。昨天已经接到过电话，是杨尚昆打来的，没说具体事，是不是老毛有什么急事了？」

两位「专使」生怕彭老总不买账，忙说：「报告彭总，是毛主席亲自派我们来接您的，什么事情，我们也不清楚，现在走吧，专机在等着。」

彭德怀虎下脸来：「喊走就走？你们当我是谁的听差呀？我这里还一大摊工作，总要给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其它领导同志打个招呼吧？」

两位「专使」说：「不行！对谁也不能讲，要赶快去机场，不准停留，也不准带随员。」

彭德怀两眼一瞪，火了：「放肆！你们在对谁讲话？你们是哪一年参军，哪一年入党的？听着，我喊口令：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站好了！等着，我一刻钟以后动身。」

全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虎威，令两位「专使」规规矩矩地站着，哭笑不得。真是不像话，中央的两粒芝麻，也想到西北来充大料豆了。屎克螂过门坎，找挨摔！彭德怀把西北局秘书长常犁夫找来，交代说：「老毛让我立刻坐飞机到北京开会，来不及跟其它同志打招呼了，大约过几天就回来。我这次出门，除了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其余人先不要讲，有什么为难的事，等我或是习仲勋政委回来再办。」

虽然中央「专使」说不准带随员，彭德怀还是叫上了自己的主任秘书和警卫员，带上了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发展计划方案、调查报告和统计图表等。

中午十二时半，专机在太原机场降落加油。正好碰到在机场送客的山西省委书记范若愚。彭德怀硬被范若愚拉着，在机场吃了一顿中饭——山西刀削面。范若愚笑说：「全党全军都知道你的直筒子脾气，生活简朴，滴酒不沾，所以我们山西的汾酒和杏花村，都不敢上桌，只敢请你吃碗刀削面。」彭德怀吃出一头热汗，连说，「很好，已经很好了，胜利了，做大官了，也不要喝老百姓的血汗。」

下午四时正，专机抵达北京西郊机常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原刘少奇卫队队长李树槐来接机，紧握住彭德怀的手说：「彭总，天气不好，气流不稳，路上辛苦了，主席和总理交代，请您先到北京饭店休息一下，然后去中南海出席会议。」彭德怀马上沉下脸来，严肃地

说：「不是命令我一分钟也不能停留吗？先送去饭店休息？不！请直接送我到中南海老毛那里去，就是来开会的嘛。」

古都北京，几场秋雨过后，天高气爽，已经很有些凉意。车队驶向西直门大街，再折向西四北大街，一路向南，之后折向西四排楼。大街上人流车流，熙熙攘攘，两旁彩旗飘扬，一派和平的节庆气象。旧式的有轨电车，叮叮当地行使着。彭德怀从车窗内注视着大街上的一幅幅大标语：「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他不禁感叹地说：「我们的新中国满一周岁了，这是千千万万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我还是头一次来北京呢。」李树槐说：「是呀，去年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告新中国成立，当时广场上人山人海那个欢腾啊，中央和各大区的领导人都出席了开国大典，就是没有见到您彭总。」

彭德怀心里掠过一丝什么，若有所思地说：「那一刻，我正在甘肃西部指挥部队进军新疆……。」有句话，彭德怀不便说出来：「老毛点名贺龙代表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局，赴北京出席开国大典和阅兵式，根本没有通知我老彭来。」

汽车进入中南海西门，直接开到丰泽园门口。

周恩来迎候在颐年堂外石阶上，与彭德怀双手紧紧相握：「久违久违，是去年二月在西柏坡开过会之后，一年多了……。身体还很健旺嘛！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下午三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你。搞得你很紧张吧，用过午餐了吗？」

彭德怀的手被周恩来热情地拉住不放，一起进了烟雾腾腾的会议室。

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见到彭德怀进来，都站立起来，老彭、彭总的称呼着，一一跟他握手，欢迎久别重逢的战友。以往，任何将领来见毛泽东，都是先敬礼之后，毛泽东才起身与之握手。此刻毛泽东却跟彭德怀握手最热烈，时间也最久：「老彭，辛苦辛苦，赶了远路，总算到了，坐下坐下，就坐我身边这位置，少奇同志你让让。我要告诉你，在朝鲜，美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越过三十八度线，不久就要兵临平壤，再把战火烧到我们家门口来。政治局正在讨论出兵援朝问题。」

你先听听大家的发言，请你也准备谈谈自己的观点。」

彭德怀落座之后，才发现政治局会议有瓜子嗑，大中华香烟也随便抽。但会议气氛紧张、严肃，确有一种大敌当前的味道。包括跟他一起戎马生涯几十年的朱德总司令见了面，也没有多说几句话，有的同志更是只握手不说话。老朋友高岗则捧过一大把瓜子放在他面前，说：「彭总，进门随俗吧。」由于他来京之前，满脑袋装的都是建设、开发大西北的经济计划，对于中央召开如此紧急的会议，思想上并无准备。从几个同志的发言中，他才知道对于出不出兵援朝，大家各有看法，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缓出兵，有的主张美军侵犯我东北边境再反击。总之，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公开卷入朝鲜战事，哪怕继续派兵暗助，也比公开宣战有利。

当天下午的会议，开到晚上十一时才休会。反对出兵或主张缓出兵的，仍然占了多数。由于毛泽东未开口，会议未备晚餐，服务员只在会议桌上「补充」那几大碟黑瓜子。高岗人年轻，又抽烟又嗑瓜子，嗑得又快又凶，乱吐皮，瓜子壳撒了一地。散会时，毛泽东说：「你们的道理有一千条，抵不了我一条，朝鲜同志有大难，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明天下午三时继续在这里开会。」

走出颐年堂，彭德怀见聂荣臻的肩背上有几片瓜子壳，忙上前去替聂拍掉，边说：「吃了还想带走哇？」聂荣臻朝高岗笑笑：「我大约是沾了高副主席的光罗。」彭德怀笑了，减道：「高大麻子！这里是大内，你不可以随地乱吐啊！」高岗过来亲热地拉住彭德怀的手：「彭老哥，你什么时候请我回老家走走啊？我们一起去宁夏打黄羊，骑骆驼！」接着高岗又放低了声音说：「我每回来北京开马拉松会议都要饿肚皮，以后要自备干粮罗。」彭德怀说：「这就要怪老毛了，他自己越来越发福，不想吃东西，就以为别人也肚子不饿。怎么开会嗑起瓜子来了？」高岗说：「周恩来出的新点子，想叫大家少抽烟。结果是烟没少抽，瓜子也没少嗑。」

十月五日上午九时，通宵未眠的毛泽东，委托邓小平到北京饭店看望彭德怀。当年在大行山八路军总部，彭德怀是副总司令，邓小平赴一二九师任政委之前，是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两人虽然是上下级关

系，但都是直筒子脾气，办事爽快干脆，甚为相投的。两人在房间里谈了一个小时，之后同车去到中南海菊香书屋，邓小平把「客人」交给毛泽东之后离去。

毛泽东拉着彭德怀的手，在长沙发上坐下。彭德怀感到，老毛有好几年没有这样对他表示过亲热了。他这人从来服软不服硬，只要老毛对他表示出尊重，不像前两年那样敬鬼神而远之，他也就知足了。他彭德怀不过好提个意见，讲几句直话，不好吹拍，不习惯称主席，喊什么万岁万万岁罢了。那是过去喊皇上的，是封建，怎么也搬来喊人民领袖？都是刘少奇领着一班人子闹起来的，周恩来和高大麻了也跟着起哄。其实，只要事在理上，不弯弯扭扭，他彭德怀还是个好被领导的人。

服务员上来敬了茶，还有瓜子点心。彭德怀眼睛亮了亮，心想老毛住在这从前皇上住的地方，身边的女服务员怎么一个个都这么年轻漂亮啊，都是谁家的孩子们？

毛泽东眼皮有点浮肿，递给彭德怀一支烟。彭德怀连忙晃手：「多谢多谢，你忘记我是不抽烟的了。」毛泽东自己划了根火柴点燃了，吸着：「对对，你是烟酒无缘，生活简单，过去在延安就爱跟朱老总下个棋，听说你还满输得起的，只是爱悔棋……。老彭，我是想和你个别谈谈朝鲜局势。金日成的军队正在三十八度线以北拼死抵抗，但武器炮火比敌人差得很多，又没有空军掩护，是抵抗不了多久的。麦克阿瑟已经给金日成下了最后通牒……，我昨天晚上整个没合眼。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开政治局会议。你昨天还没有来得及发言。可是你都听到了，大家摆了很多困难。我们也确实存在很多困难，有些是严重困难。但如何对待、克服困难？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现在多数人强调困难，而忽视有利条件，不符合辩证法嘛。还有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义务嘛。不知道你彭老总是如何考虑的？」

彭德怀一口喝干了杯里的龙井茶，连杯里的茶叶片也扒进嘴里去嚼吃掉。这是湘北湘中一带人喝茶的习惯。漂亮的女服务员又端来一杯新沏好的茶给彭总。彭德怀望着毛泽东疲惫的眼神，坦率地说：「老毛，昨天晚上高大麻子拉我去吃了顿消夜，回到饭店也没睡得着觉。

我把你最后讲的几句话，反复想了想。我认为这是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如果我们只强调困难的一面，不同美国进犯到鸭绿江一线的危险后果联系起来看，不仅北朝鲜保不住，我整个东北也直接受到美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连一点战略缓冲的余地都没有。过去日本人侵略东北，就是利用朝鲜作跳板。出兵到底有利还是不利？我想了一晚。我觉得，我还是应当支持你立即出兵的决策。反正国家还穷，还没有来得及建设，要打就早打，到境外去打，打完了，再安安心心来搞建设。这次，我原以为是开经济方面的会，把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计划、图表统统带来。」

毛泽东一听，高兴得用手捶了一下沙发，大声说：「很好！你分析得好。看来我们又想到一起了。不像有的人，被美国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就说你彭总吧，四七年春天在陕北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不是以劣势的兵力和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优势的兵力和优势的装备的胡宗南大军吗？」

彭德怀说：「美军也有它致命的弱点，从美国本土到朝鲜半岛有五千多海里，它的兵力有限，补给线过长，不可能进行一场耗费时日的持久战。我们不同，随时可以出动百万大军，跟它狗日的打阵地战、消耗战，拖它个三、两年，它不败也败，不滚也要滚。我们出兵要快，要猛，先打它个狗日的措手不及！」

话已至此，毛泽东站起身来，微笑着说：「老彭，每逢关键时刻，你总是能做我军的大英雄……抗美援朝，这样艰巨的历史任务，你看派谁挂帅领兵呢？」

彭德怀急问：「我听说中央早已决定派林彪同志。」

毛泽东脸上的微笑不见了，双眉紧锁，两眼一闭地说：「是啊，前些时我和恩来、少奇、朱总司令商量的一致意见是林彪合适，因为他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地区的领导人，现在集结在南满的四个军和三个独立炮兵师都是原第四野战军的部队，仗打起来，首先依靠的也是东北地区作后勤支持。长白山山区的地形、风俗民情又和北朝鲜很相近。可是近一个月以来，我，恩来，朱总司令分别找他谈过多次，他不是强调美军的飞机大炮厉害，就是强调他身体多病，失眠严重，旧

伤复发，怕光、怕风、怕水、怕热、怕声音，硬是不肯接受任务。对不起，我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组织专家给他会诊，彻底检查一次身体。搞得他和叶群很紧张，求告傅连璋笔下留情。傅连璋写出了会诊报告，向我作了汇报：「没有检查出林彪的身体有什么大毛病，主要是精神问题，思想上患得患失，而且长期吸鸦片上了瘾。」过去吸鸦片是为了止痛，他却没有戒掉，成了瘾君子。傅连璋要求他一定戒毒，多做户外活动；多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傅连璋说林彪听了专家们的诊断，满头大汗，生怕中央给他处分……。傅连璋还怕林彪日后报复。我说，你怕什么？林彪活得过我？」

彭德怀在毛泽东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种冷漠、刻薄，心里很不是滋味：「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了，何苦跟人过不去罗。」他认识傅连璋，福建人，江西苏区时期就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是个很正直的同志。

毛泽东的眼神又趋温和了，脸上恢复了笑容，又笑微微地盯住了彭德怀：「老彭，你和林彪是两种风格、两种脾性的人罗，你豪爽坦荡，他则相反。」

彭德怀说：「林彪有病，还是要让他去疗养，毕竟是为革命立过大功的……。现在中央决定另派谁去呢？」

毛泽东换了一支烟，点燃吸着，重又坐下来，才说：「老彭，国有疑难识忠臣，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相商的意见，这副重担，还是请你来挑。这是一场比保卫延安更复杂更艰苦的战争，不知你身体情况怎样？你可能思想上没有这个准备吧？你考意考虑有些什么困难？」

说罢，毛泽东两眼注视着彭德怀。屋里呈现出顷暂的沉寂。茶水飘着清香。毛泽东手里的香烟在冒出一线细细的烟柱。这菊香书屋真清静，隐隐听得到院子里的鸟雀啁啾。值班的漂亮女服务员静候在雕花屏风背后，没有任何声音。

沉寂片刻之后，彭德怀面对毛泽东，两道刚毅的浓眉一扬，站起身子，双手捏拳一碰：「我这个人的脾气你也了解，从来吃敬酒不吃罚酒，国家有事，大敌当前，我老彭服从中央的决定，只有一条，前方的事，我说了算；后方的事，高岗说了算！前方后方拧成一股劲，结成一条心，我们保证打胜战！」

毛泽东高兴地随即站起，紧紧握住彭德怀的手，大声说：「太好了！太好了！家贫念贤妻，板荡识英雄。打完这一战，你就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放心，出兵朝鲜既是你挂帅，高岗、恩来和我，都一定要替你当好后勤……。中午在我这里吃便饭。你领兵援朝的事还不能对任何人说。下午继续在颐年室开会，你就第一个发言吧。相信彭老总豪言一出，大家都会热烈鼓掌。」

第三十六章 毛岸英从军

十月五日下午，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嗓门浊重，慷慨陈辞，表现出一种不可反驳、义无反顾的坚定：「出兵援朝是十分必要，十分紧迫的，打烂了，至多只算是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让美国的陆、海、空三军加上原子弹，摆在鸭绿江对岸和台湾，它要对我发动新的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眼睁睁看着美帝国主义占领了整个朝鲜半岛，将来问题更复杂，我们也就更被动。所以迟打不如早打，趁他现在还没有下狠心要跟我大打，我先下狠心跟他大打，打出新中国的国威、军威来！这样，对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大有好处，对国内、国外的反动派和亲美派更是个严厉的警告和打击。」

彭德怀的一席发言，把政治局内反对出兵朝鲜的意见平息了下去。他毕竟是威望仅次于朱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

毛泽东此时胸有成竹。他以锐利的目光环视会场一周，以拳头敲打着桌面说：「彭总今天的发言一针见血，很有见地，很有说服力。现在不是我们愿不愿意打这一仗，而是美帝国主义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犹豫退缩、担惊害怕都没有用，这种心理和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现在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敌人侵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刻打出去。关于由谁挂帅，既然林彪说他有病要去苏联疗养，我提议由彭德怀同志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第十三兵团、第九兵团、第十九兵团共十二个军和若干个炮兵独立师，十天之内做好渡江准备。……」

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把彭德怀、高岗、周恩来三人留下，在菊香书屋共进晚餐。席间，毛泽东吩咐彭德怀、高岗尽早赴东北中朝边境，召开军事会议，进行战前动员，并勘测、部署军队秘密渡江的地形、地点；周恩来则立即飞往莫斯科与史达林商谈，具体落实苏方早已允诺了的二十个陆军师的武器装备及由苏联空军向我入朝部队提供空中掩护的问题。

毛泽东举起手里酒杯，兴奋地说：「老彭啊，抗美援朝我是好战分子，你是一席豪言定乾坤。相信这些都是要载入史册的。这杯酒，

我先敬你。」

说罢，毛泽东将杯中酒一饮而荆周恩来、高岗也向彭德怀举杯敬酒，干了杯。

彭德怀不善饮，但盛情难却，也干了杯。

毛泽东此刻对彭德怀满怀敬重，继而说：「老彭，考虑到你和司令部人员的安全，开仗之初，你的指挥所可以设在鸭绿江西岸，长白山里，怎么样？」

彭德怀先看了看周恩来、高岗，之后面对毛泽东，决然地摇了摇头：「老毛，那怎么行？你可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不行。你知道我指挥打仗的习惯，司令部指挥所要尽量靠近前沿。」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那好，我尊重你的习惯。还有个事，为了你入朝后的工作需要，你把我的老大岸英带去，他既通俄文，也懂英文。我让他去的目的，一方面是为的你身边有个可靠的翻译，与苏联方面联络比较方便。金日成的司令部里有苏联军事顾问组，将来少不了要协同指挥作战的；另一方面也是让他作为第一批志愿军战士，到战争中去锻炼成长，我这也叫做送子从军吧！」

彭德怀没料到毛泽东会突然提出送子从军，惊讶得张嘴结舌。事关重大，他一时低下头去，不知如何作答。

便是周恩来、高岗也大感意外。席间沉默了一会，还是周恩来先开口，恳切地对毛泽东说：「岸英是否从军的事，放缓一步商量吧？免得彭老总为难。」

高岗也帮着说：「岸英情况特殊啊，自开慧同志牺牲，岸英当了小流浪儿，吃尽苦头。后又送去苏联学习了十多年，他已长期不在你身边生活。你们父子难得团聚在一起，还是留在主席身边照料吧！」

毛泽东不理会周恩来、高岗的劝解，只笑眯眯地望着彭德怀：「老彭啊，送子从军，我主意已定。这一仗是我力主打的，我必须带这个头罗。不然，那么多人反对，我何以服众？」

彭德怀头一昂，瞪着眼睛说：「老毛，你的话，正确的，我百分之百服从。你知道，我本人没有孩子，今后也不可能有……。你和开慧的这个儿子，长大到今天，不容易啊！要是我没有记错，他六岁就跟

着开慧坐牢，坐到八岁。开慧被杀后，他领着两个弟弟流浪到上海讨吃，还走失了一个小的。亏得他命大，在上海街头六年，没被人打死，也没饿死冻死。直到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才派人秘密到上海找到他们兄弟两个……。一九三七年才送到苏联去的吧？」

毛泽东听着，脸色有些寂然。周恩来怕彭德怀说走了题，连忙拉着高岗向毛泽东和彭德怀二人敬酒。

彭德怀却继续说：「老毛，我晓得你的心情，是想给全党带个头，做个榜样。可你这头一开，朱老总、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一大班子中央领导人的孩子，也都到了参军的年纪。你是叫我当志愿军司令员，还是当儿童团团长？带着一班王子王孙，保护他们都来不及，我还怎么去指挥打仗？」

彭德怀说话就这么直来直去，刺耳难听。都说他是个粗人，其实他是粗中有细，侠义心肠。

毛泽东听了，却哈哈笑了：「老彭，中央领导人的子女都是王子王孙了？哪还叫共产党？当然不是没有可能性，我们要警惕败家子。北京这个地方，原来就出过一批八旗子弟呢。这样吧，我到政治局会议上去宣布：岸英从军，做个代表，下不为例。给岸英取个化名，保守秘密。我不是送儿子去冒险，而是送他去锻炼。我们不都是二十几岁就提上脑壳干革命、闯天下了？岸英他们一代为什么要例外？」

彭德怀仍然坚定地摇着头：「老毛，这事没商量。上了战场，美帝国主义的子弹、炮弹不长眼睛，万一有个闪失，我怎么向你做交代？你现在就剩了岸英、岸青这么两个儿子，岸青又精神有毛病……。我不能担这个责任。我反对国事家事搅在一起。」

毛泽东说：「无国何有家？无家亦无国。我们共产党人，国即是家，家即是国。国不就是个放大的家？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们的革命事业是千千万万烈士的生命换来的。入朝参战，我们的军队也肯定会有重大的牺牲。毛泽东的儿子，就能够例外？既是送子从军，我就有这个思想准备。你们或许不了解岸英的经历。他早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就参加过苏联红军，任坦克部队中尉……。老彭啊，岸英在苏德战争中都没有死掉，这一次，他只是在

你身边工作，做个翻译官，就一定会有什么不测吗？」

周恩来、高岗都为毛泽东的凛然大义所感动。周恩来说：「主席一家，已经为革命事业牺牲了五位亲人，功在千秋。我还是先前的意见，岸英是否从军，我们再商量商量，不要让彭总为难。」

正在这时，江青端着一大盘黄晶晶的鸭梨进来了。为了表示对女主人的尊重，周恩来、彭德怀、高岗都起身致意。江青放下果盘，连声恭请三位领导人归坐，并笑容可掬地望一眼毛泽东，才说：「不怕老板批评，关于岸英从军的事，我这当后妈的也要反对。我只给老板生了个女儿，岸青又长期患病，这事太重大了。我是偏袒岸英的。岸英从苏联回来就认了我这个妈，一点不生分。刚回到延安时，他满嘴俄语，国语都忘光了，是我一句一句教他恢复的。现在他的一口北京话，发音很纯正。……」

毛泽东脸一沉，朝江青手一挥：「蓝苹你走！我们研究军事问题，你来插什么嘴？这是犯纪律的呢！你个做后妈的，也来扯后腿呢。」

毛岸英，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生于湖南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是毛泽东与他老师杨怀中的爱女杨开慧所生下的第一个儿子。随后又生下了岸青、岸龙两个男孩。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清党，大规模搜捕共产党人之际，毛泽东在武汉出席过了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立即将妻子和三名年幼的儿子秘密送回岳父老家——长沙县板仓乡杨家大宅躲藏。毛本人则去发动湖南秋收暴动，随后率领起义农军残部上了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从事武装割据去了。

杨开慧改名霞姑，领着三个儿子在老家板仓乡下东躲西藏。不久即被湖南军阀何键的部下捕获，连同三名儿子被关进监狱。初时，由于杨家在长沙的一些有名望的亲友出面营救，加上何键将军亦有意将杨开慧及三名孩子当作人质，以诱使井冈山上的「头号赤匪」毛泽东来归。谁知毛泽东干革命，是吃了秤砣铁了心，那怕爱妻及三名儿子送掉性命，他也决不回家。何键三次向井冈山派出「信使」，都空手而还。而且毛泽东于一九二八年春天，上井冈山不到半年时间，即与年仅十七岁的江西兴国县女红军贺子贞同居了，将长沙狱中的妻儿置之

脑后。到了一九三〇年，何键将军降格以求，只要杨开慧登报声明跟匪首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还她母子自由。杨开慧却坚贞不屈，宁可被杀头，也要保住跟毛泽东的革命名节。她长系狱中，当然不可能知道，她丈夫已于两年半前即背叛了她的名节，另觅「革命伴侣」了。同年十二月，毛岸英八岁，毛岸青六岁，毛岸龙四岁，他们的母亲终被何键下令枪决。

岸英、岸青、岸龙三兄弟被杨氏亲友保释出狱。之后通过中共地下组织，将三个孤儿辗转送到了上海，那里有座中共地下党中央秘密领导下的中国互济会大同幼稚园，专门收养革命烈士遗孤的。不久由于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地下党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岸英三兄弟被暂时寄养在一位「党的同情者」家里。由于白色恐怖，加上经济问题，这位「党的同情者」未有能力同情毛氏三孤儿，于是岸英领着两个弟弟流落上海街头，成为小乞丐。老二毛岸青曾于一次乞食时遭人以铁件击伤头部，致使后来神志不清。年纪最小的毛岸龙则于一天晚上走失，后来再也没有找回。

九岁的毛岸英和七岁的毛岸青，为了糊口活命，曾进过一家烧饼铺当童工，挨打挨骂，受尽折磨。两兄弟逃出了烧饼铺，在街上靠拾破烂、拣烟头、卖报纸，以及帮人推三轮车等，挣点钱谋生。晚上则露宿在街角巷尾，过着乞丐小童的非人生活，凡六年之久。

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领中央红军在陕北安顿下来。毛泽东总算父子之情未泯，委托周恩来设法替他寻找三个失落在上海的儿子。周恩来则把替毛寻子的任务交给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上海地下组织费尽周折，总算找到了毛岸英、毛岸青兄弟。毛岸龙则泥牛入海，生死不明了。毛泽东并未让人将两个孩子送到延安来父子团聚，仍由周恩来出面，请西安的张学良将军帮忙，乘东北义勇军李杜将军赴西欧考察的机会，将岸英、岸青兄弟及另一名中共干部的孩子带到法国巴黎，交给了中共旅欧支部留守人员。旅欧支部人员与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取得联络。苏方审核三名孩子的身份，只接受了岸英、岸青兄弟赴苏联读书，而将另一名中共干部的孩子排除在外。大约是那名儿童的父母级别名分不够。

一九三七年初，岸英、岸青兄弟来到了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红色首都莫斯科，开始在异国土地上生活，接受教育。他们起初进的是莫斯科郊外的莫尾诺国际第二儿童院，不久又被转到伊万诺夫城的国际第一儿童院读书。两所国际儿童院均为收容世界各国共产党及游击队领导人的年幼子女所设立，以培养未来世界的革命者。毛岸英学习努力，吃苦耐劳，并乐于助人，进步甚快，加入了共青团，并当上了团干部。毛岸青则因脑部受过伤害，一直迷迷糊糊，神志不大清楚。这期间，延安的毛泽东开始给两个儿子写信，寄中国图书。

一九三九年秋至一九四〇年春，周恩来携邓颖超、孙维世在莫斯科治疗臂伤，曾两次赴伊万诺夫城看望岸英、岸青兄弟。岸英从此十分敬爱周副主席，并一度想认周恩来做义父。周恩来怕引起毛泽东的不悦，未便答应。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凌晨，纳粹德国悍然向苏联发起闪电突袭，德、苏大战拉开战幕，年已十九岁的毛岸英，已长成一个身高一米八〇的高大小伙子，讲一口流利俄语，取了个俄国名字——谢廖沙，当上了国际儿童院的共青团书记和伊万诺夫市列宁区的团委委员。像当时所有的苏联热血青年一样，他强烈要求上前线。因他的背景特殊，申请迟迟未被批准。

一九四二年，苏、德战争愈打愈酷烈之际，二十岁的毛岸英怀着对德国法西斯的仇恨和对收容他的「第二祖国」苏联的热爱，再也无法安心读书和工作，他以俄文直接给史达林写下一封信：

最高统帅部敬爱的约瑟夫·史达林：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五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眼看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土地，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苏联人民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致革命敬礼谢廖沙（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一九四二年五月于伊万诺夫。

尽管毛岸英在自己的俄文名字后面特意注明了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但信发出后却杳无音信。他又写了第二封、第三封。也都石沉大海。苏联最富饶的西部和南部领地几乎全部被德军占领，首都莫斯科城也一度被德军包围，俄国民族的确到了面临生死存亡的最危急的

岁月。最高统帅史达林此时怎么可能给他——中国毛泽东的儿子回信呢？毛岸英却很有心劲。

一天，他趁一位苏联将军来国际儿童院视察之际，硬是缠住人家，要求上前线。苏联将军知道他是中共领袖毛泽东的长子之后，只得报告上级并经研究批准，安排他进了红军士官学校快速班，完成步兵教程；随着又进了莫斯科列宁军政学院，完成政治教程；最后转入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并在那里加入了苏联共产党。苏联最高统帅部，是有意将毛岸英作为中共新一代的军事将领来刻意栽培了。

一九四四年春天，毛岸英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被授予中尉军衔，分派到作战部队，担任了坦克连的党代表，参加了苏联红军对德国侵略者的大反攻。他头戴坦克帽，胸挂报话机，随坦克部队千里长驱，英勇杀敌，穿越了乌克兰、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当然，他受到了秘密的安全保护。最高统帅部绝对不会让中共领袖毛泽东这位在苏联长大的、大有出息的长子，牺牲在自己的部队里。

一九四六年夏天，毛岸英返回中国前夕，史达林大元帅给了他一个极高的荣誉，亲自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并送给了他一支手枪，作为对他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特殊奖赏。史达林紧紧拥抱了他，称他为好儿子，让他回到延安父亲身边后，不要忘记苏联党，苏联人民。毛岸英当即向史达林行了军礼：「敬爱的约瑟夫·史达林！我永远不会忘记，是苏联党和人民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收养了我和我的兄弟，苏联是我的第二祖国、第二母亲。我永远牢记第二祖国和第二母亲的养育之恩！」

毛岸英、毛岸青经新疆回到了延安。当年离别父亲时，岸英只有五岁，岸青只有三岁。一别十九年，兄弟俩都长成了大小伙子。特别是岸英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驾驶坦克长驱过东欧数国的经历，使他在延安成为青年英雄，传奇人物。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都分别在自己的窑洞里宴请他，欢迎他。周恩来与他作了彻夜长谈，请他详细介绍苏联党、政、军、情组织结

构，有关领导人的情况，以及苏联的地理物产、民族民俗、文化艺术等等。江青作为后母，更是对这位年纪仅小她七岁的毛家长子恩宠有加，衣食住行无不细心照料。吃饭时，则不停地给他们兄弟俩夹菜、添汤。兄弟俩又吃上了中国饭菜，吃的那个香啊，看着教人心疼。江青几乎每顿饭都要暗自擦眼泪。从小失去母爱的岸英、岸青兄弟，对于年轻美貌的后妈的细心照料，自是十分感动，几天之后，便对江青一口一声「妈」的叫上了，令到父亲毛泽东十分欣慰。

此时的毛泽东头脑冷静、清醒。令他不快的情况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是好些自认为面貌姣好的女青年主动找岸英交朋友；二是中央党校、共青团中央、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延安军政大学、鲁迅文艺学院、陕北公学等单位，纷纷约请岸英去作报告，介绍苏联国情及其卫国战争；三是中央军委、中央团委、陕西省委、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央西北局等单位，都争着向毛泽东要儿子，要求岸英去他们那里担负重要工作。

毛泽东望子成龙。他自有一套培养儿子的长远设想。他明白，让岸英留在延安，任由大家这么捧着哄着恭维着，再好的孩子也要被宠坏。党内也会留下不良影响，总不能说，毛泽东的儿子就接毛泽东的班吧？

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天，毛泽东让人从延安郊区找来一位劳动模范在家里吃饭，介绍给儿子认识：「岸英，你在苏联长大，国内的生活你不熟悉。你在苏联读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土学堂，就是农业劳动大学。这位劳模叔叔就是你的校长。」

接着，毛泽东侧过身去，对那劳动模范说：「我现在送给你一个学生，他住过外国的大学，没有住过中国的大学。他还是娃娃，我就拜托给你。他要和你一起住，一起吃，一起劳动作息。你要教他种地，告诉他，庄稼是怎么长出来的，怎样样才能多打粮食。他要在你的农业大学里毕了业，再回来上「延安大学」。」

毛岸英此时已认识了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名叫刘思齐，烈士后代。彼此都有了好感。但他还是高高兴兴下了乡，去读另一所大学。他在延安郊区劳动了五十多天，已是一九四七年春天。时值胡宗南部

署大军进攻延安，劳动模范不敢大意，把毛岸英送回到毛泽东身边，让毛泽东摸着儿子双手上的厚茧说：「他已经从我的劳动大学毕业了，这茧子就是证书。」

毛泽东很高兴，送了一件羊皮袄、一双牛皮靴作为酬劳。延安保卫战打响的前夕，负责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工作的周恩来，出于对毛岸英的喜爱，提议毛岸英留在军委工作，给自己做个助手。毛泽东没答应，分派儿子去了中央马列主义著作编译局，随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委到华北。根据毛泽东「继续让岸英熟悉农村工作」的指示，刘少奇安排毛岸英和刘思齐两人都到河北农村去参加土地改革。

一九四八年春天，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了河北省西柏坡村。二十七岁的毛岸英跟自己心爱的人儿刘思齐确定了关系，刘思齐并有了身孕。但毛岸英不敢告诉父亲，而请朱德夫人康克清出面，去向毛泽东提出，批准他们结婚。毛泽东却认为儿子胸无大志，沉迷于男女之情，不思建功立业，而且在跟他耍小聪明。便把儿子和刘思齐一起找来，问刘思齐的年龄。刘思齐不敢虚报，她还不满十八周岁。毛泽东说：「等小刘满了十八岁，再批准你们结婚。」毛岸英与之争辩：「妇方未滿十八岁结婚的人多得很，为什么我们就不行？」毛泽东说：「你举出例子来。」毛岸英说：「我不说具体的，反正你们老一辈的，好多叔叔伯伯们的对象，结婚时都没到十八岁。」毛泽东却认为儿子在隐射自己当年在井冈山跟十七岁的贺子贞同居的事，一时大怒：「你们走吧！我从来不收回成命！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毛岸英灰溜溜地领着刘思齐出了父亲的书房，看着眼泪含含的刘思齐，想想不对，便嘱咐她先走一步，自己则又返回到父亲的书房，说：「父亲，我已经二十七岁了，我的事还是由我自己作主吧，我和思齐想马上结婚。」毛泽东余怒未息，瞪圆眼睛吼道：「我是你的老子！我订的纪律你不遵守谁还遵守？再说一次，刘思齐不满十八岁不准你们结婚！」

父子俩激烈争吵了起来。毛泽东拍桌打椅，吼声如雷。室外值勤的卫士不敢进去劝解，连忙报告江青。江青也不敢进去，让快去请周副主席来，岸英要挨打了。周恩来立即赶来了，身手灵活地靠在窗边

听了听里边父子俩的争吵声，朝江青晃了晃手，又干咳两声，才轻轻推门而入。

周恩来总算把毛岸英劝出到书房外，再又返回去劝那脸色铁青、双拳紧握的怒目金刚毛泽东。可怜毛岸英急火攻心，呆立在院子里，两眼一黑，晕倒在地。江青连忙叫医生护士急救，一时院子里乱作一团。

毛泽东铁石心肠，明知道书房外发生的事，却认为是儿子在跟他「演戏」，不予理睬。周恩来急得院里院外的两头跑，毛泽东则坚持自己的「原则」，不肯作出宽容。

年轻的毛岸英，总算领略到了父亲的独裁性格及不通人情的滋味。父子俩的关系一度闹得挺僵。亏了周恩来两面说和，毛岸英才没有离家出走。其实，他又能走到哪里去呢？至多到某个野战兵团打仗去。他从小丧失了母爱父爱，至今也找不回来。

一九四九年春天，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毛岸英被任命为北平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行政级别已相当于部队的副师级。其实，毛泽东作为一位严父，对自己的长子寄予了大望，并有心替儿子安排下一条建功立业的道路：有了苏联的学历和从军资历，回国后第一步是让儿子下乡学习农业，参加土改熟悉农村工作；第二步是让儿子熟悉城市，又主要是熟悉工业；最后是让儿子从军，熟悉中共军事。这样，既种过地，又做过工，也当过兵，做为一名革命接班人，资历才算完整了。——二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期，毛泽东就是依此标准刻意提拔上海的造反派首领王洪文作为党中央的接班人的。

同年十月十五日，在中南海菊香书舍院内，毛泽东替长子毛岸英和刘思齐举办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办了三桌喜酒，请来了朱德、康克清夫妇，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李富春、蔡畅夫妇，谢觉哉、王定国夫妇，陈瑾昆、梁淑华夫妇等。毛泽东举杯走到亲家母张文秋面前敬酒：「谢谢你教育了思齐这个好孩子。」婚后，毛岸英、刘思齐生活和谐，恩恩爱爱，令人羡慕。由于一年前刘思齐被迫打了胎，手术做的不好，此后再没有怀孕。这也是严父毛泽东得到的报应。

一九五〇年十月七日晚，毛泽东举行家宴，以最亲切、最真挚的方式，为湘潭老乡、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送行。参加家宴的只有三个人：毛泽东、彭德怀、毛岸英。周恩来因赶赴苏联向史达林要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持去了，否则也可能应邀出席。

江青明白老板安排这席家宴的真正用意。她是竭力劝阻毛泽东送子从军的，但劝阻无效，反受到训斥，怕到家宴上来哭哭啼啼，而知趣地躲到西郊万寿路新六所一号院休息去了。江青是真心喜爱毛岸英的。她怎么也想不透，朝鲜战场上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那样厉害，老板为什么一定要送自己的长子去冒险？况且老板就只这么个中用又中看的儿子啊，老二岸青终年痴痴傻傻，只是个被伺候、被领养着的废物啊！婚后一年的毛岸英，却仿佛厌倦了平庸的生活，面对朝鲜局势，也极欲效仿父亲当年，去建立自己的功业。他喜欢以俄文朗诵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之歌》，满怀豪情，响往着投身大时代的大风大雨，像海燕那样欢呼：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罢！

父子俩正是不谋而合。

席间，彭德怀对于毛泽东这个长子，也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的。自一九四六年在延安见过几面后，一别又是四年，小伙子成长得更威武英俊了。

「岸英，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彭德怀大口吃着糖醋辣椒，问。他虽然是个粗人，也觉察到了，毛泽东这家宴，是一项特殊安排，有一种特殊气氛。看来老毛是决意要把儿子交给自己，带到朝鲜战场上去锻炼锻炼了。

「北京机器总厂。」毛岸英恭恭敬敬地回答。

「你们单位算哪一级别？」彭德怀又问。

「算师级吧，厂长书记都是部队上下来的正师级干部，战斗英雄。」毛岸英回答。

「……工人同志对朝鲜战争有什么反映？」彭德怀三句话不离本行。

毛岸英显得有些激动：「大家被真正发动起来了，坚决要求支持朝鲜人民。……」

「不是「发动」，是正义战争的召唤！难道你要去朝鲜是我「发动」的吗？」毛泽东微笑着纠正，同时巧妙地切入正题。

「老毛……你这做父亲的，真是要强人之难啊？」彭德怀停住杯筷，望着主人。

毛泽东微笑着，不答话，只是慈祥地望着儿子。

「彭叔叔，你不是正在招兵买马吗？我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军。」毛岸英尽量把话说得轻松些。

「你们父子不是和我开玩笑吧？」彭德怀忽然沉下脸来问。有句话，他不便说出来：「你们这是摆的鸿门宴，给我设下个圈套。」

「岸英想跟你这当叔叔的去打仗，你是司令员，得由你来批准喽，就看你肯不肯收他这个兵喽。」毛泽东依然貌似公允，莫测高深地微笑着。

「彭叔叔，不是开玩笑！我已经考虑了一个多月了。」毛岸英恳切地说。

「岸英，你听我说，现在国家最缺的，不是我这样的武夫，而是经济建设人才，你在工业界好好干，更可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彭德怀仍竭力劝阻。

「可是边防危急，大敌当前，我怎么能安心在后方工作呢？现在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了，我是国家主席的儿子，应该带头去朝鲜。」

彭德怀内心里是忧喜参半。作为一名老军人，他当然喜欢青年人踊跃从军，积极要求上前线。……可他依然闷着脸，摇着脸：「你结婚还不到一年吧？你们小两口商量过了？你可不能瞒着你爱人啊！」

「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她是烈士后代，她会支持我。」毛岸英含糊其辞地说。他的性格表面上比父亲温和，但内里却跟父亲一样执拗，想干一件事就非干不可，谁劝阻都不会回头。

彭德怀心里有数，他们父子俩一唱一和，早就商量好了，只等着他来表态了。这事也太教他为难了。战场上，子弹不认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

其实，作为父亲的毛泽东，也不是没有考虑过长子的安全问题。毛泽东本人就是从战火中闯荡出来的，自然娴熟军人的安全系数：战

斗一打响，从士兵到班长，每时每刻都会倒下一大片；排、连干部牺牲的最多，轮到营级干部牺牲已是打的十分艰苦，轮到团级干部牺牲可能是犯了战术性错误，轮到师级干部牺牲则一定犯了战略性错误。至于军以上干部，已不大有牺牲的可能，除非是全军覆灭时自杀或是被俘。至于总司令部人员，一般离开火线多则上百公里，少说也有几十公里，基本上不大存在伤亡问题。除非内部暗藏有间谍，引来敌机定点轰炸。

三人埋头吃着，沉默了一会。从来不称「毛主席」，而习惯称「老毛」的彭德怀，这时严肃地说：「毛泽东主席，我这个司令还是你封的，我哪能到你家里来招兵买马呢？」

「彭叔叔，你就让我去嘛！」毛岸英见彭德怀不肯松口，有些急了，就搬出一堆理由来：他上过苏联士官学校，莫斯科列宁军政学院，伏龙芝军事学院，当过苏联红军坦克兵中尉，参加过苏德战争，等等。他甚至具体提出，在朝鲜战场上，我军使用的是苏联坦克，他熟悉苏式坦克的性能，可以直接下坦克部队。

毛泽东满意地望望儿子，又恳切地朝彭德怀笑着：「德怀，你就收下他吧！我已跟政治局每位成员打好了招呼，岸英做个代表，其余领导人的孩子不在此例。岸英会讲俄语、英语，你到朝鲜，少不了要跟苏联人甚至跟美国人打交道啊！他这个翻译官，或者称参谋，你是可以放心使用的罗。」

彭德怀低下头，又默想了好一刻。也是面子难却，毛泽东一定要把他的长子托付给自己，也是最大的信任啊，不能不领这番盛情……。他终于昂起头，苦笑着说：「我真拿你们爷崽两个没办法。岸英，你父亲望子成龙，送你到前线去锻炼，进步快啊！我这做叔叔的，也是这个想法。战争嘛，就是要打破常规喽。好，我赞成你父亲的安排，你就做我的翻译官吧！」

毛岸英高兴得边拍掌边笑道：「太好了，太好了。」

彭德怀继续说：「岸英，你现在的职务算副师吧？我申报军委，先提你个正师。到了朝鲜，你就跟着我，一步也不准离开司令部指挥所。要在封建时代，你是东宫太子，我就是太子太保了罗。当然我们

是共产党，不讲那一套。我和你爷老倌一样，巴望你今后有大出息，成大气候。」

毛岸英停止了鼓掌，他懂事地看了父亲一眼。

毛泽东却哈哈大笑：「德怀啊，真有你的，好个太子太保！当然，我晓得你是讲笑谈。不过，还没有上朝鲜，你就先提他一级？不好。我是军委主席，难得通过罗。」

彭德怀说：「对不起，这事要由我司令员说了算。国难当头，岸英挺身而出，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有的高级干部就做不到，党中央派他去他都不干。」

毛泽东明白彭德怀指的是林彪等人。当着儿子的面，不便说什么：「好，很好，岸英从军，还是要注意保密。否则传到美国杜鲁门耳朵里，更要讲我毛泽东好战，把儿子都派到朝鲜去罗！」

说着，毛泽东、彭德怀两人哈哈大笑，都举起酒杯，站立起来。毛岸英也跟着举杯起立。毛泽东跟彭德怀、毛岸英碰了杯。三人一起干了杯。

第三十七章 杀子之仇不共天日

彭德怀不愧为中共军事猛虎，自十月十九日夜间起，指挥几十万大军秘密渡过鸭绿江，突然出现在朝鲜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实施的是不宣而战。在朝鲜人民军残部的配合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半年时间内连续发起五大战役，犹如天兵天将，锐不可当。尤其是头两大战役，把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部队打了个晕头转向，措手不及。彭德怀统率中朝大军于第三次战役时一度打过了三十八度线，重新占领了南韩首都汉城。第四次战役时，彭德怀不顾金日成死命反对，命令部队主动撤离汉城，以防美国军队故技重演——实施第二次仁川登陆。至一九五一年六月，中、美双方战线在三十八度线一带稳固下来，迫使联合国派遣军和大韩民国军队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美国不得不接受苏联等国家提出的停战谈判。

苏联装神弄鬼，这一回着实高明，史达林把美国、中国双双玩于掌股，自己未伤一兵一卒。彭德怀指挥朝鲜五大战役期间，中共志愿军并没有取得苏联原先承诺的空中掩护。开战前夕，毛泽东派周恩来赴苏联找史达林落实空中掩护及陆军武器装备。史达林却临时改变承诺，决意避免在朝鲜半岛与美军进行空战。苏联空军只对鸭绿江中国一侧实施掩护，以及派出空军及防空部队在中国辽东半岛和东南沿海一带大城市协助空防。至于中共自己新组建的空军部队，经苏联全力速成培训，迟至一九五一年下半年才匆匆投入作战。所以五大战役，中方完全以陆军部队投入厮杀，因之人员伤亡远对方严重。但中共军队能把西方世界头号强大的美国军队打回到三十八度线以南，并被迫同意坐下来进行停战谈判，已是一项震惊全世界的奇迹。中共不失时机的大力宣称，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受尽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如今第一次了打败了西方帝国主义。

然而，中国人民为朝鲜战争付出了太过沉重的代价。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共先后轮番出动了一百万野战军入朝作战，加上一百万左右的后勤部队，去日日夜夜抢修铁路、公路、涵洞、桥梁，以保障在没

线。

毛泽东为朝鲜战争付出的是他的长子毛岸英。

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任彭德怀的翻译兼机要秘书。他化了名，只有少数几位司令部机关负责人知道他的真正身分。他工作勤勉，待人和气，生活上不计较，能吃苦，经常通宵不眠，很得同事们的好感。当时司令部里还有一个苏联军事顾问组，全仗着他的俄语翻译。不几天彭德怀嫌麻烦，把几位老毛子统统打发回金日成的北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去了。

不久，毛岸英的英语能力却派上了大用场。那是十月三十一日上午，在志愿军总部的一间简易工棚里，审讯前线部队送回的第一名美军战俘莱斯（Liles）少校。为了解美军和南朝鲜军内情，彭德怀司令员亲自布置了这次审讯。由司令部组织部部长任荣担任主审，毛岸英担任翻译。

当莱斯被押解进来，颤抖着站在审讯台前，露出惊恐而绝望的眼神，形同一头被牵进屠宰场的羔羊。

「坐下！」主审官任荣威严地指指前边的一张木凳。

莱斯咽着口水，面露饥色。不过他身子仍然坐得笔挺，受伤的左臂则被绷带吊在脖子上，不由自主地抖动着。

按照预定的方案，审讯一开始就要打掉对方的自信心，给他个下马威。方案却被毛岸英打乱了。因他凝视着莱斯那只颤抖的左臂时，不知为什么就动了恻隐之心，也许他看到的不再是一个万恶的侵略者，而只是一名受伤的人。他不等主审官任荣发问，便以英语跟莱斯交谈起来。任荣虽是他的上司，但知道他的特殊身分，只好苦笑了笑，任由他们去乌里哇啦聊天似的，很不严肃了。整个志愿军司令部，都对毛岸英既尊重爱护，又放任宽容。

「您的左臂是怎么受伤的？」

「因我不了解贵军的战俘政策，跑了一下，被贵军士兵开了一枪……。」

「好险。有没有伤到骨头？」

「没有。我想是贵军士兵不想要我的命，才只伤了左臂……，上

帝保佑。」

「你吸烟吗？要不要来一支？」

莱斯点了点头。毛岸英给他一支大中华，告诉他这是中国的高级香烟，并替他点上火。

「你想吃点什么吗？看样子你很饿。……」

「假如可以的话。……我已经一天一晚没有得到食物。」

毛岸英不需要请示任何人，迳自走出审讯室，很快从宿舍里拿来一盒饼干。在场的人也都只好大眼瞪小眼。气氛很不严肃，但没有人表示异议。

「谢谢！万分感谢！」莱斯是饿极了，边吃边流泪：「上帝啊，真是出乎意料啊，东方人并不野蛮，很为文明啊！」

在毛岸英坚持下，直待莱斯吃下半盒饼干，喝下两大杯水，审讯才正式开始：「我们中国的饼干怎么样？」

「谢谢！是我出生以来吃到的最好的饼干，赛过我们美国的巧克力。」

毛岸英把这句话译成中文，在场的审讯人员都轻松地笑了。原先预期的威严气氛已荡然无存。莱斯对主审官的讯问有问必答，审讯进行得格外顺利：「你的姓名、职务？」

「莱斯，Liles，大韩民国第二军团第六师美国顾问团少校顾问。」

「简历？」

「一九二四年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一九四五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军校，一九四六年西点军校任教，一九四七年到驻日美军任职，一九四九年到韩国任顾问。」

「你对我军的战略战术有何印象？」

「我曾在美国西点军校任职，研究过各种战法。但恕我直言，贵军不是常规打法。首先贵军是秘密出兵，不宣而战，这很高明。战术上，你们的部队运动神速，前头拦住，后背截住，前后包抄，很可怕。这种战法，历史上似乎很少见到……。」

之后莱斯少校侃侃而谈，他也分不清谁是主审，谁是翻译，只是面对毛岸英像面对老朋友似的，将美军和大韩民国军队的一切，和盘

托出。

审讯结束，彭德怀听了汇报，非常满意。在司令部会议上，彭总表扬了毛岸英，称其为好小子，并命他把莱斯少校所谈情况，整理成文字材料，通报全军。彭德怀说：「优待俘虏，是我军的传统。今后捉到了美国鬼子，无论官兵，都要客客气气，好从他们嘴里掏东西。」

可是毛岸英毕竟是个特殊军人，他随身带着大堆行李：铺的盖的，棉的毛的；还有大摞书籍，中文、俄文、英文，线装的，平装的，精装的，等等。他的同室——彭德怀的警卫秘书笑话他：「你这是带着书山上战场啊！」毛岸英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书是爸爸送的，衣物是妈妈准备的，是带多了，你不要告诉彭叔叔，他会瞪眼睛，命令轻装的。」警卫秘书说：「你当彭总不知道？他早看到了，和我说过，你像你爸爸一样勤学，手不释卷，日后有大出息。真的，你妈妈是谁？」毛岸英说：「就是江青呀，又叫蓝苹。她不是我的生母，可待我很好，很关心的。这些，你不要说出去。你知道，我们家的事，都算机密。其实，我也是很不习惯的。」

毛岸英像父亲毛泽东一样，很有一些不合军旅生活的起居习惯。回国几年来，总是晨昏颠倒，晚上工作，白天睡觉。到了朝鲜，也是通宵工作，或是通宵读书，什么《朱元璋传》、《彼得大帝》、《拿破仑传》、《欧洲哲学史》、《法兰西内战》、《孙子兵法》……他读得如饥似渴，直到天亮才入眠。司令部机关人员日常也是要早集合、点名并出操的。毛岸英却常常起不了床，甚至吃不上早餐。彭德怀司令拿他这个特殊兵没办法，也就没有纠正他，而责成自己的军事秘书照料他：「记住！遇到空袭，一定要把毛岸英从床上拖起来，把他塞进防空洞里去！」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两架绰号「黑寡妇」的美军侦察机，在大榆洞上空盘旋了一小时后离去。大榆洞是座废弃了的矿山，临时做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驻地。此一异常现象引起了司令部作战处负责人的警惕，估计第二天天亮后可能有敌机来空袭，当即布置：司令部机关人员于明晨四时开完早饭，天亮之前全部进防空洞。防空洞分为三组：参谋部人员进南山大矿洞，政治部人员进山沟里的地下

涵洞，总部首长进一座仅可容纳七、八人的小矿洞。

这一晚，正是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最关键的一晚。彭德怀司令员领着毛岸英等几名工作人员，通晚忙碌，调兵遣将，督促全军各部队，务于拂晓前进入指定位置，完成掩蔽工事，做好当日黄昏时分发起第二次战役总攻击的准备。为了第十三兵团三十八军不能如时到达指定战位，彭德怀大发雷霆，下了死命令：如影响了整个战役，军长提脑壳来见。彭德怀并派出司令部组织部长任荣带工作组赶往东线第九兵团督战。

二十五日清晨，金灿灿的旭日从东方升起。躲进矿洞里的人彼此看得清对方。毛岸英空着肚皮靠墙而坐，闷头抽烟。他又因睡过了头，没有赶上早餐，还是被人从床上硬拉起，拉到这矿洞里来的。他眼下的同室是彭德怀的警卫员小高，二十来岁，比毛岸英还贪睡，每天还得靠毛岸英拉他起床。平日最关心他的那位彭总的警卫秘书此时又上前线传达命令去了。

上午九点多钟，还没见敌机的影子。防空洞里的人不耐烦了，开始议论纷纷：娘的，要来不来的，我还有大堆文件等着处理；美帝国主义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呢！等到今晚上，它就知趣了，第二次饱尝我军的铁拳！

毛岸英却有他独特的见解：「你们忘记了，今天是星期六，美国佬要准备休周末呢！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七日凌晨，正是美国夏威夷的星期日凌晨，美国大兵都在呼呼大睡，被日本空军敢死队偷袭珍珠港成功……。」

毛岸英喜欢啃书本，谈起事情来总是知识渊博。

直到上午十时，敌机还没有来空袭。大家的警惕性放松了，纷纷走出防空洞去抽烟、散步、解手。毛岸英和小高则更大胆，回到宿舍去喝水吃饼干，再返回防空洞。敌机仍不见来。毛岸英因惦记着「彭总作战室」有几份电报要处理，就跟几位同事回到了作战室办公。

尖厉的防空号突然吹响，时间是十一点钟左右。正在工作的毛岸英等人冲出「彭总作战室」，已来不及进入两百公尺外的防空矿洞，只好就近隐蔽。但见空中有四架轰炸机从南方飞来，带一股强大气流

掠过总部上空，向北方而去。毛岸英等人以为敌机又是轰炸鸭绿江大桥去了，就又返回到「彭总作战室」去。

没想到敌机在空中绕了一圈，悄然回头，其中一架俯冲下来，翅膀一抖扔下几十颗汽油燃烧弹。「彭总作战室」本是一座临时性木棚，顿时燃成一片火海。跟着是其余三架敌机轮番轰炸，在地面产生华氏两千多度的高温，足以把石头烧化。

毛岸英和彭总的警卫员小高未能冲出火海。谁也来不及救出他们。当空袭警报解除后，警卫排的士兵们在「彭总作战室」的灼热灰烬中扒出两具尸体，都烧得卷缩起来了，只剩下两副紧紧相贴的骨头架子。显然，小高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执行彭总交给他的特殊任务：保护毛岸英。人们含着泪把两副骨架拉开，其中一具的手骨上套有一只外国手表残骸，这就是毛岸英。

毛岸英入朝作战只有五十天，第二次战役在这天黄昏打响。他活了二十八岁零一个月。

彭德怀司令员几十年戎马生涯，出生入死从未掉过眼泪，面对毛岸英烧成一副骨架的遗体，他嚎啕大哭：「岸英啊，我的好侄子！为什么偏偏死掉的就是你啊！你本是我器重的后生子啊！」

当晚，彭德怀赶往三十八军前线督战之前，没有忘记交代自己的警卫参谋：「你负责替我查出来，我们司令部里有间谍，不是可能，而是完全肯定。自我们入朝作战一个多月来，我的司令部指挥所搬到哪里，帝国主义的侦察机和轰炸机就跟踪到哪里。中、朝双方人员中，只要查出来了，不管是谁，你先给我毙了，但要留下凭据。」

彭德怀抵三十八军阵地后，只向军长、军政委两人通报了毛岸英同志英勇牺牲的消息。这支中共军队最善战的钢铁之旅，随即完成了对美国第八集团军第二师及南朝鲜第二军团的分割、包围、歼灭，实现了彭德怀以上万名英勇战士的性命替毛岸英报仇的咒语。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威将军于十一月底沉痛宣布「第二师完全丧失战斗能力」，并命令所有联合国军队向三十八度线以南实施总撤退，以避免遭到北方大军从东部、中部、北部的全线攻击。整个朝鲜战局为之改观。

为表彰第十三兵团第三十八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突出战绩，彭德怀司令员亲笔书写了嘉奖令，写下了「三十八军万岁」的著名赞语。

再说在大榆洞志愿军总部，彭怀德的警卫参谋和司令部保卫处人员一起，终于查出来暗藏敌特，原来竟是金日成的北朝鲜人民军派来的一名联络官！当场搜出了美式微型发报机等间谍工具。因是朝方人员，只是被揍了个半死，未予立即枪决。待到彭德怀从前线回来，见抓到的间谍，竟是北朝鲜人民军派来的联络官，气得在电话里朝金日成吼道：「姓金的！你听着！我们来帮你打美帝，你派来的人却是美国狗特务！勾引美国飞机轰炸我司令部！这回炸死的是毛泽东的儿子！你不去北京替我向毛泽东交代清楚，老子饶不了你！」

彭德怀讲得出做得出，他命令警卫排押送那名间谍回到北朝鲜人民军总部，说是当着金日成将军的面，执行枪决。另一说金日成将军掏出手枪，当着中方押送人员的面，亲自毙了那名朝鲜民族败类。

金日成没有去北京向毛泽东作出解释，而是发了一封电报给周恩来，告上毛岸英同志英勇牺牲，朝鲜人民世代不会忘记这位中国青年英雄；以及彭德怀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对他进行电话侮辱，缺少起码的外交礼节。

周恩来此时已先接到过彭德怀的电报，彭德怀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作出沉重检讨，没有保护好毛岸英同志，是自己的失职，此事真不知道如何去向毛泽东同志作出交代，我们失去了一位最不应该失去的好青年，好干部。

周恩来也不敢将此一不幸稍息报告毛泽东。他告诉了朱德、刘少奇。

中央书记处的另一位书记任弼时，则已经于一个月前因肺部大出血去世。

刘少奇建议周恩来先把噩耗透给江青及主席身边的机要秘书、卫士长等人，但要暂时瞒住毛泽东同志，怕他感情上经受不住此一沉重打击。

听到毛岸英牺牲的信息，江青偷偷哭红了眼睛。她拉住毛泽东的一名卫士哭诉：「你们可以作证，我是反对老板让岸英从军的啊，人

家彭总起先也是不同意的啊，可是老板就是听不进，就是听不进啊！」

一天，毛泽东在大批卫士、秘书、医护人员的簇拥下，离开中南海，移至西郊万寿路新六所一号院换换环境。他照例每天都要仔细审阅志愿军总部从朝鲜发回的战报。读着读着，他心烦意乱，把战报朝地下一摔：「岸英有好久没有给我来信了！他怎么搞的？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他上回那份关于审讯美军俘虏的汇报，写的多好……。去告诉周恩来，周总理，把岸英给我调回来！」

机要秘书站在毛泽东身边，眼看着事情实在瞒不下去了，便按照周总理嘱咐过的，流着眼泪说：「写战报的换了人，是生手，不是岸英同志了……。」

毛泽东转过身子，瞪圆了眼睛，急促地问：「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把话讲清楚，不准吞吞吐吐！」

机要秘书声音低沉，报告了由于朝方叛徒出卖，引来敌机轰炸我志愿军总部，岸英和彭总的警卫员小高光荣牺牲的经过。

毛泽东脸色苍白，像一尊雕像，呆坐在藤围椅里。机要秘书慌了，赶忙按铃叫来了医生、护士。医生一摸脉，毛泽东的手足冰凉了。

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从中南海赶到，毛泽东已经在医生、护士的急救下苏醒过来。他泪水纵横地说了一段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被打死了，一个儿子疯掉了，一个儿子走丢了……。人算不如天算，我无后乎！」此后，毛泽东再没有为痛失长子哭泣过。

他把悲痛埋藏到心底里。

一个月后，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彭德怀从朝鲜回到北京，心情沉重地向毛泽东表示歉疚，自己没有照料好岸英，甘愿接受中央的处分：「岸英是个好青年，虽然只是相处了五十来天，但自己确是喜欢上了他，聪明，勤奋，有学问，又一点都不以高干子女自居，跟司令部的上上下下都关系融洽。最重要，岸英和我们老一代的，有许多不同的思想方法和处事方法，他仁慈，宽容，不记仇，有爱心。他上回对那名美国少校的表现，令我和司令部的人都很感动……。他是个革

命的人道主义者，伟大。」

听着彭德怀的汇报，毛泽东久久地沉默着，一支一支地抽着烟、凝望着书房窗外那已经光秃了的柳树枝条，忽然轻轻吟哦起《昭明文选中的〈枯树赋〉来：「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吟罢，毛泽东长长地叹了口气，站起身子，昂起头，在彭德怀面前走了几步，之后站住，声音转而激昂地说：「老彭，我不怪你。个人的痛苦我能忍受。你在朝鲜指挥得不错，不到两个月，就把帝国主义军队赶回到三十八度线以南。这才是主要的。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长了我中国人民的志气。人家欺负了我们一百多年，现在总算叫他们尝到了中国人的铁拳。从这一点来说，我很欣慰。志愿军官兵替中华民族出了口恶气。当然，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不能因为岸英是我的崽娃，就不应该牺牲。」

他作为一名普通军人，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尽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你们和朝鲜方面商量一下，就把他葬在朝鲜吧，不要弄回来了，免得老老小小，满朝文武，都来哭泣。葬在朝鲜，作为中朝人民的血肉友谊，做个长久的纪念。」

对于毛泽东的宽阔襟怀，义薄云天，彭德怀感动得五体投地。

接下来，毛泽东换了另一种口气，公事公办地说：「老彭，听讲你为了岸英的事，侮辱了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这是不允许的！是个很严重的错误。为这个，中央倒真是可以处分你。但你功大于过。这次算初次，下不为例。你回到朝鲜后，要亲自去向金日成同志道歉，并检讨自己的错误。就说是我毛泽东叫你这么做的。要记住了，志愿军是去帮助人家的，不是去当救主，更不是去做太上皇。想想看，如果你不尊重金日成同志，也就不会尊重我，性质是一样的。」

彭德怀回到朝鲜，没有去向金日成道歉，而是部署、指挥了第三次、第四次战役。中朝联军于第三次战役中攻越了三十八度线，又占领了汉城及南方的大片土地。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原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威将军为联合国派遣军新总司令。美军新总司令上任，力图挽回颓势，重新组织起战略反攻，并欲故技重演，实施第二次仁川登陆，

一举将中朝联军截成两段。

正在该战役的关键时刻，彭德怀识破了李奇威的图谋，当机立断，下令三十八度线以南部队作战略撤退，放弃汉城，移师三十八度线以北，组织起隐固防线。金日成却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身分，下令部队坚守汉城，以保持政治、军事、外交优势。前线大军接获两道截然相反的命令，一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一方是北朝鲜政权的最高领袖，一时不知所措，只好按兵不动，等候统一军令。在这同时，彭德怀和金日成亦分头电告北京，请毛泽东裁决。这次，毛泽东却支持了金日成，同意中朝联军不放弃汉城，但应全力防阻美军第二次仁川登陆。就在中朝双方来回电报扯皮的时日里，志愿军的一个整编师的二万四千人马，因孤军深入陷落重围，无法撤离。彭德怀毕竟是只军事老狐狸，当机立断，密令两个装甲团于黑夜突破一个缺口并坚守数小时，同时密令上述师的排以上干部以出席誓师大会为名，紧急集合，集体乘车冲过缺口，回到三十八度线自己一侧。于是这个师总算救下了全套干部，保留了建制番号。只可惜那二万四千余名志愿军士兵，兵不见官，群龙无首，而很快被联合国派遣军歼灭了，两万多人马当了俘虏，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最大败绩。

事后，汉城仍未保住。金日成自知闯下大祸，亲自赶到志愿军司令部，以图向彭德怀致歉并解释。彭德怀盛怒之下，下令自己的警卫排将金日成扣压二十四个小时，以示惩戒：「他个高丽草包送掉了我二万四千人马，老子扣押他二十四个小时，出出这口鸟气。」另有一说彭德怀当场掌了金日成两大嘴巴，似不大可信。

彭德怀在中共军中向以爱兵如子、上严下宽著称。他脾气暴躁，动辄训人、骂人、吼人。但被他吼骂的多是属下的高级将领，官越大他越骂得厉害，不管对方受不受得了，他自己总是骂过就算了，从不往心里去。他的理由是：你的阶级高，责任大，成千上万人马的性命捏在你手里，我不骂你骂谁？常被他责骂的大多数将领如王震、王平、杨得志、杨勇、黄克诚、邓华、洪学智等等，越被他骂倒越跟他亲近，视他为兄长、大英雄。

也有被他责骂后与他结下私怨的，如谢富治、罗瑞卿。彭德怀从

不责骂连、排以下官兵，对士兵，他像父兄般和蔼可亲，知暖知冷。他曾对人说：「我骂士兵做什么？每次战打下来，他们中的多数人就见不到了，我不忍心！」

对于彭德怀在志愿军的一个整编师陷落美军重围之际，果断而秘密下令，及时将排以上干部悉数救出一事，中共内部一直褒贬不一。有说他不愧为志愿军杰出统帅，能想他人之不想，能为他人之不为，保住了全套干部，那两师就保住了番号编制，不算全军覆灭。有了干部，何愁士兵？中国人民中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兵源呢；也有人指他平日爱兵如子是句空话，虚伪得很，到了关键时刻，就只要官不要兵了。他平日爱骂将领也是假，他心里真正喜欢的，是将领不是士卒。

第四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向北京发出电报，承认自己被丢失了二万四千人马一事气晕了头，下令扣押金日成二十四小时泄愤，是无法无天行为，请求党中央解除自己的志愿军司令员职务，这个仗他实在指挥不下去了。毛泽东、周恩来当即给彭德怀复电，称胜负乃兵家常事，朝鲜战场总的形势仍然很好，仍是我军大赢。彭德怀指挥得当有大功，一俟第五战役完成，战局稳固下来，即同意德怀同志回北京休息、工作。电报只字未提彭对金日成无法无天一事，只是留下了伏笔而已。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哭笑不得：「老毛啊，你死了个儿子，你悲痛，我也伤心，岸英是个好儿子。可你也支持了金日成的胡搅和，瞎指挥，使我方丢失了二万四千士兵啊，这个代价，太重太大了啊！」

第三十八章 周恩来欲做平民总理

朝鲜战争，前方总司令是彭德怀，后勤总指挥是高岗，全国总协调是周恩来。三人结成朝鲜——东北——北京一条龙，工作得相当高效、紧密。这确是周恩来生平最为忙碌的岁月，国内国外、前方后方一总揽。他又习惯于事必恭亲，既管大事，也抓小事，抓具体，抓落实。在中南海西花厅，他的总理办公室，秘书多达二十余人，分别替他联系着军事、外交、人事、工交、农林、财经、公安、统战、文教等各行各业。由这些秘书日日夜夜围着他转，随时向他汇报国内外发生的各类重大紧急事件，诸如军事政变、武装暴乱、洪涝灾害、地震、火车出轨、空难海难、瘟疫等等。

周恩来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多管事，爰办事，善处事。他虽然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排名第四，但实际上他是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位置。上面，他只对毛泽东一人负责；下面，则归他总揽一切。刘少奇位居第二，贵为党中央党务总管，却从来没有像他那样拥有过广泛的、几乎无所不包的权力。

他每天清晨五时甚至六时才上床，上午九时或是十时即起床。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从早到晚，他的节目表都安排得满满当当，以五至十分钟为一单元。分管各口的秘书们日常只能见缝插针地向他汇报请示工作，称为「六大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为周恩来的洗手间。每天上午九时或十时起床后，他要花一小时左右坐马桶，先流览一下当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的重要文章，接下来是听秘书们的汇报。每当这时，秘书们便挤站在洗手间门外，手拿事先写好的国内外大事汇报条，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自然是军事、外交优先，轮流进洗手间向他报告。女秘书不便进他的洗手间，则由男秘书代劳。处理过当日最紧急的事务，他才刷牙、洗脸、修面，再做一个一分钟他自己编排的健身操；「第二办公室」是他的早餐桌。只要是在西花厅家里，他一定要和夫人邓颖超共进早餐。在「第一办公室」没有抢上汇报的秘书们，这时便会在餐室门外探头探脑。周恩来眼尖，便会招手让某位秘书进来，边吃早点边批示急件。夫人邓颖超便会苦

笑：「你们二十几个对付他一个，再忙，也得让他喝口东西啊。」

「第三办公室」是他的座车。他每日上午、下午都要赶往各种场所，出席大会小会，以及接见、拜会来访的外国元首、政要，加上国内外的著名人士。在「第二办公室」仍未轮上汇报的秘书，便陪他坐一段汽车，在座车里请示工作；「第四办公室」是他出席各种会议、主持各类谈判时的中间休息室，由秘书们把当时发生的各种紧急事件向他请示处理、应付办法；「第五办公室」是紫光阁舞场或是怀仁堂剧场，一般时间为晚上八时至十时，遇有大事，秘书们随时可以进去向他报告，或是请他出到休息室接听电话、批示急件；每晚的十至十二时，多为周恩来去到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办公室，与毛泽东请示、商谈工作，也是中央书记处开碰头会的时间。

凌晨一至四时，是周恩来在西花厅后院书房的办公时间。当天的重要文件、报告，都在此一时间内审批。这个真正的办公书房，被称为「第六办公室」；「第七办公室」为他的卧室，每天凌晨四时上床后，他会把当天没有审阅完的文件，坐在床头来继续审阅。他的床上有张特制的斜面小台，放着他的老花镜，以及几支削好的铅笔。

他近似一台反应灵敏、速度快捷的工作机器。他的秘书们叹服他「用三个脑子同时思考各类问题」。其实造成他日夜忙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处理政务举轻若重，大事小事一把抓，对下属不放手，不放心。朝鲜战争期间，他的两位老下级：聂荣臻将军为全军总参谋长，杨立三为全军总后勤部部长。但前线来的每一封电报、战报他都要亲自过目，重要的电报还要呈交毛泽东批示，他再亲自回复；援朝部队的调兵令他也要亲手拟定，呈报毛泽东批准后再予发出。他完全取代了总参谋长的职权，聂荣臻实际上降格为一名「总参谋长助理」，跑出跑进，上传下达；对那位当年长征途中把他抬出大草地、救过他性命的杨立三（其时周恩来患肝脓肿病危），他同样不放手，运往朝鲜前线的每一批战略物资包括武器、弹药、干粮、被服等等，多少车皮、防潮防湿、运输时段，交接警卫，他都要一一过问，具体落实。他甚至常以电话、电报指挥某段被敌机炸毁了的铁路、公路、涵洞、桥梁如何抢修……。杨立三的总后勤部部长职权，实际上也由他包办代替

了。

一九五三年杨立三因病去世，周恩来以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总理之尊，坚持替这位曾经救过他性命的老下级抬棺木。当场许多人哀求他不必抬，他却说：「立三把我抬出了草地，今天我一定要抬他上八宝山啊！」他的此一报恩举动，感动得三军机关上上下下热泪盈眶，人人从心底里称他为「我们的好总理」。

周恩来一度力图树立自己的「平民总理」形象。他不时忙里偷闲，离开中南海走去访一些民主党派的「老朋友」，如宋庆龄、章士钊、张治中等，或是去看望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如郭沫若、梅兰芳、老舍等等。他最讨厌自己出门前呼后拥，前面警车闪灯开道，后面警卫车相随。他曾下令停止对他的座车进行「护卫」。但警卫车仍是远远的尾随。他很气愤，批评说：「你们瞒得过我的眼睛？过去我在重庆、南京，被中统钉梢惯了，你们也来这一套？我还怎么去接近人民群众？吓都被你们吓跑了！民主党派的老朋友更会对我们有看法的。」

中央警卫局却有相关的规定，凡中央领导人离开中南海，都应事先通知公安部，以便及时采行护卫措施。周恩来是很反感这套经毛泽东批准的「规定」的。有大半年时间，他每逢出门，事先不作交代，连自己的警卫员都不告诉，只是说声走上车就走，以便甩掉「尾巴」。

一次，他叫上车就出了中南海北门。司机问：「总理啊，去哪？左拐还是右拐？」他说：「右拐，往前开。」车到北海公园南大门，他让停车，下了车就往公园里边走。掏钱买了门票，售票老头没有认出他，他好开心。警卫员连忙找公用电话向公安部值班室报告。可是没等公安部的便衣们赶到，他已转身出了公园，上车后让司机再朝东边开。由于没有警车开道，司机必须遵守交通灯，走走停停。车到王府井大街，他让转右朝南，在东安市场门口，他突然提出要到市场里看看，好久没有逛过商店了。司机和警卫员不敢阻拦，只好由警卫员跟着，进了人潮涌涌的市场。他确是想了解一下物价，不大相信商业部门的那些汇报材料。可他刚在柜台前站下，立即被女营业员认了出来：「总理！您是周总理！快去告诉领导，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女营业员的一声声欢叫，首先是男女营业员们围了过来，跟着顾客们围了过

来，一下子围了好几百人。周恩来兴致很好，跟围观他的人一一握手。他的警卫员却急疯了，冲着一位男营业员叫喊：「快去给公安部打电话，派人来把总理接出去！」结果是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出马，领着大批便衣赶到，才把他接走。罗瑞卿问：「总理，您没有受惊吧？」他哈哈大笑：「我高兴得很！好久没有这样跟群众见面了。只是手指头有些酸痛，他们哪里是握手啊，简直是来抢我的手啊，我们的市民太可爱了。」

另有一次却差点出了大祸。

那是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来访，住在西郊万寿路新六所二号院。周恩来跟胡志明是真正的「同志加兄弟」。一九二二年周恩来在法国巴黎主持中共旅欧支部，会讲粤语的胡志明也在巴黎勤工俭学，两人结为好友。

一九二五年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胡志明曾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好友第二度相逢。第三度相逢已经进了北京。新中国成立后，胡志明几乎每年都要来访，来要武器，要弹药，要粮食，要军事顾问，以回越南去打击法国殖民主义者。胡志明在中共领导层人缘甚佳，跟毛、刘、朱、周四巨头都称兄道弟，无拘无束。因之每次来访，都能「满载而归」。

这天中午刚下过大雨，道路湿滑。周恩来的座车前排是杨师傅和机要秘书，中间一排是可以折迭的活动椅，平时放平当茶几用。周恩来和警卫员坐在后排。那时从西长安大街出了复兴门就算郊区了，道路平直，车辆行人少。周恩来从后窗望去，没有发现警卫车「跟踪」，便让杨师傅开快车。周恩来常在车上说：「在安全这个前提下，只有坐快车才得劲。」杨师傅技术一流，更是个开快车的高手。座车以一百多公里的时速疾驰着。

车上无人说话。因为周恩来有项特殊习惯，只要无人在车上向他汇报情况，他就身子一仰，眼睛一闭，能打上十几二十分钟的吨，并很快进入状态，发出轻微的鼾声。他说：「奇怪吧？早上睡觉要靠药片，唯有上了汽车最能入眠。」

难得周总理有时间睡觉。每当这时，杨师傅就会放慢车速，选条

僻静的道路多转悠十几分钟，哪怕事后因误了时间受到严肃批评。杨师傅就会说：「下次不敢，我老油条了。唯独不能停车，一停周总理准醒。」

座车快要驰近公主坟时，周恩来刚睡着，说时迟，那时快，从路南一座工厂的大门口，突然野牛一般冲出一辆大卡车，横过马路，斜刺里朝座车闯了过来！杨师傅一个急煞车，让那卡车冲到了前面去，再缓缓前行。

机要秘书、警卫员都吓傻了。周恩来被震醒了，立即明白了是前面疾驰着的那辆大卡车在肇事，便嘱咐：「杨师傅，跟上去，记下车牌号，哪有这样开卡车的？」因卡车是空车，马力大，已经跑出三百来米。追到两百米时，那卡车竟然突然一个大U字调转头，再次朝座车冲撞了过来。警卫员本能地叫了声：「这是美蒋特务！」杨师傅则叫了一声「护住总理——」，方向盘几个满打把，就从大卡车的车头侧面飞了过去。警卫员这时整个身子已覆盖周恩来身子，还伸出一只巴掌罩在总理的心脏部位。大卡车是躲过了，但前面不远是水泥电线杆。杨师傅一咬牙：妈的老子今天拼啦！

连点煞车连打方向盘，硬是绕开了电线杆，再驰出不远才停下。

周恩来率先坐直了身子，称赞说：「杨师傅，你的驾车本领世界水平，我要推荐你去给主席开车。」

杨师傅这才老泪纵横：「总理，您没事……要感谢史达林送您的这辆吉姆车哪，性能可靠，棒极了。」

机要秘书仍然面无人色：「总理，我要给您提意见！您不能再不要警卫车了。今天要不是杨师傅，全国上下都要大哭特哭了。」

警卫员气不过，下车去追那卡车，可那家伙已经跑得没了踪影。

事情报告给中央警卫局和公安部。公安部长罗瑞卿找到老上级周总理提抗议：「总理，您再要违反中央领导人安全保卫条例，私下甩掉警卫车跟随，我第一要报告毛主席，第二要提出辞职，这保卫工作我没法子干了。」

周恩来只得好言相慰：「你激动什么？我不是好好的吗？第一你不要辞职，第二你不要报告主席。今后，我接受你们的前呼后拥、鸣

锲开道还不行？」

那名开卡车肇事的司机很快被北京市公安局抓获并查明：不是什么美蒋特务，出身城市贫民，家庭无复杂背景，那天他是偷了他朋友的车匙无照驾车，而且根本控制不了那辆大卡车，老天保佑，总算没有闯下大祸。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对公安部门指示说：「把人放了吧，让他回工厂上班，通知他们厂领导，今后对青年工人加强纪律教育。但他毕竟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不要因为他们吓唬了我一次，就去妄加惩罚。」

周恩来对顽皮捣蛋的青年市民的宽容，一时传美为谈。但公安部门则长期对这名青年实施内部监控，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骑电单车闯进一辆公共汽车的车轮底下丧生。

闲话打住。一九五一年夏季，朝鲜战场上，中美双方打得空前惨烈。第四次战役中，二万四千名志愿军士兵陷入联合国军重围。周恩来日日夜夜焦灼忙碌，引发鼻腔大出血，一度流血不止。秘书们怎么劝他都不肯休息，邓颖超出面恳请也不管用。秘书们最后只好向毛泽东反映，请主席下命令。结果，还是毛泽东想得开，给周恩来挂电话：「我们不也俘虏了许多美国官兵（战后统计，双方战俘为一与七之比，美方为一，中方为七）？有什么了不起？朝鲜有彭德怀撑着，东北有高岗撑着，天塌不下来！现在我命令你休息三天，不许工作。」

毛泽东发了命令，周恩来只好遵从。可是休息到第二天，周恩来躺不住了，叫来政务院办公室主任：「工作是我生活的第一需要，这样躺着不行，你去给主席讲一讲，已经好了，可以工作了。」毛泽东却答复：「天塌不下，休满三天再说。」电话里，毛泽东并告诉说：「彭德怀昨天回来过，我正在睡觉，由护士做按摩，他在门口推开卫士长就闯了进来，真有他的……。他来要求把我们部署在辽宁的三个预备兵团，统统压过朝鲜三十八度线去，他要救出那二万四千名士兵。我火了，问他听了外电报导没有？人家已经把那批人送到朝鲜最南端的济州岛上去了，你怎么去救？我还批评了他，胆大包天，无法无天，竟敢把北朝鲜人民的最高领袖扣押二十四个小时！这是犯上作乱，你今

天敢扣押金日成，日后回了国，你还不敢扣押我们这些人？他倒是认了错，为了那二万四千名士兵气昏了头，做出了鲁莽行为，是军阀主义。说他这次赶回来之前，已经向金日成送去了检讨信，他请求中央给他处分。我说，现在不谈处分，先回朝鲜去，把第五次战役拿下来再说。他要求见总理。我说不准去见，总理累到鼻子大流血，中央命令他休息。情况就是这样，向你通报一下。我再说一遍，天塌不下来，你休满三天再说。」

接过毛泽东的电话，周恩来只好继续躺着。彭德怀在朝鲜闯了大祸、犯了大错的事，在中南海他本是第一个知道的，他暂时压住，未敢报告毛泽东。毛主席通过别的渠道了解到了。不管怎么说，彭德怀还是立了大功，功过相抵，功大于过。那二万四千名士兵落入敌手，金日成要负头份责任，但金日成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你彭德怀为这事气昏了头，扣押金日成二十四小时泄愤，不也是明摆着给毛主席难堪？说得难听点，不等于打了毛主席的耳光？彭德怀呀彭德怀，你带了大半辈子兵，五十几岁了，还这样不知死活？要是在过去的封建朝代，你彭德怀就是有十颗脑袋，也早搬家了。

不久，周恩来又累病了。病了也要工作，又事事不肯放手。把秘书们急得团团转。他的秘书皆为各行业精英，大者如范若愚、童小朋为正部级，多数秘书则为局级、副局级。秘书们有时也会替他「好心办坏事」，甚至不把毛泽东夫人江青放在眼里。这次周恩来犯病，秘书们未便再去惊动毛主席，而想出一个新招数，从文化部调来一部影片请他「审查」，换个方式来休息。周恩来不知底细，审片也是工作，就答应了。可是那天下午，秘书们好不容易取消了原来的一系列安排，刚请周总理坐下来看影片，就有电话来找。

文教秘书韦明去接电话，一听是江青打来的，忙问有什么吩咐？江青很不高兴，口气顶大：「不是找你，请总理听电话！」韦明耐着性子解释：「总理累病了，我们好不容易安排他看一场电影，休息一下，你的事情急不急？如果不急，是不是等总理看完影片后给你去电话？」江青是认识韦明的，在电话那头质问：「既然可以看电影，为什么不可以接电话？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理的意思？」韦明也火了——在

五十年代初，大家也实在没把毛泽东的这位名不正、言不顺的夫人放在眼里，便反问了一句：「请总理听电话，是你的意思还是主席的意思？」江青听这一问，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生硬地答道：「不用你管！我找的是总理。」韦明也是「护主」心切，你不用我管我就不管，于是把电话挂上了。人还没走开，江青又来电话了，气势汹汹地责问：「你怎么敢摔电话？你算老几？！」韦明自知有错，嘴上却说：「你不是不要我管吗？总理确是病了，主席每次来电话，都要先问一声，总理身体怎样？能不能听电话？」江青不要听韦明解释，只让他去传话。韦明因江青挂名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不敢大过得罪，只好去向周总理报告。周恩来马上到休息室接电话。

江青一谈就是四十多分钟。原来是地读了一个电影剧本，急欲向周恩来谈谈她的看法，以及是否应当支持拍摄等等。周恩来平日十分支持江青去管管电影创作的事，实际上也是在防范她插手政治。他静静地听着，耐心地应付着，一点不急不躁。放映室的影片却停在那里，等着周恩来回去再继续放映。室内一片低声抱怨：什么玩意呀，迟不来电话，早不来电话；告诉你吧，上回我去菊香书屋送文件，那里的几名卫士闲着没事，正在学江青走路扭屁股，毛主席看到了也没有批评……嘘！瞎说些什么呀？

事后，江青给周恩来写来一封两千余字的告状信，控告周的秘书韦明伤害她、打击她。周恩来把江青的信压下，拖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只要不涉及到毛泽东，周恩来也就没太把江青放在眼里。周恩来只是给自己的秘书们规定下了一条新的纪律：今后，跟所有部门的秘书同行们打交道，特别是跟主席、副主席、总司令身边的秘书们打交道，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可意气用事，对方有理要谦让，对方无理也要谦让。谦恭有理，态度和气，应当成为总理办公室的工作风气。

女子报仇，十年不晚。十五年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早已调任为甘肃省委副书记的韦明，被兰州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左派揪住他「疯狂反对旗手江青同志的滔天罪行」，对他施以无产阶级群众专政

的铁拳，被打得死去活来，并天天被押解到兰州市中心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塑像下罚跪，请罪，忍受着烈日的曝晒，达两个月之久。韦明则哑巴吃黄连，心里有数：一九五一年发生在中南海西花厅的事，如果不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亲自授意，甘肃省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左派，怎么可能了解到此一「天机」？

第三十九章 救金山护龚澎

也是越忙越紊乱。

朝鲜战事打打停停，中美双方正准备坐下来和谈之际，却凭空生出来两件事：一件有关孙维世，一件有关龚澎，令周恩来大费周章。

先说孙维世。干女儿的丈夫、著名戏剧家金山，随中国人民慰问团赴朝鲜前线慰问，并为北朝鲜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作专场演出。金山精湛的演技，豪气干云的大丈夫形象，风靡了金日成身边的男男女女。金日成厚待这位来自中国的伟大演员，在自己的宫殿般的地下寓所内留宿两日。

金山不愧为采花老手，竟与金日成美丽的女秘书发生闪电式恋情，双双堕入爱河，而被金日成的卫士当场捉获。金日成大怒，下令对金山和那女秘书同时执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纪律：处死，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尊严。后来金日成了解到金山是周恩来的干女婿，才将此一决定通知了北京的周恩来，但表示事关国家主权，决难宽容。周恩来接到金日成的绝密电报，气得两手发抖：「这个金山，顽习不改，色胆包天，闹风流案子闹到金日成将军的枪口上去了！活该，罪有应得，罪有应得……。」可是，金山若是真的被金日成处死，影响就太过恶劣，更会传为国际笑柄。那一来，金日成要置中国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的颜面于何地？置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颜面于何地？金山是以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身分赴朝鲜前线慰问演出的。自古两国相交，不斩来使。金山犯了罪，是应当受到惩罚。但这个惩罚必须由中国党和中国政府作出，而不能由朝鲜党和朝鲜政府作出，同样事关主权尊严问题。要不是我中国政府派出十二个野战军五、六十万人马在朝鲜战场浴血苦战，作出巨大的人员牺牲，把联合国军赶回到三十八度线以南，你北朝鲜政权只怕早就从地球上抹掉了，你金日成本人以及家人同事，也早就躲到我中国东北地区来当了政治难民了。

不行，金山的事，我周恩来不能不管。更何况，还有干女儿孙维世这一层哪，名分上，金山也是自己的女婿哪。然而。金日成毕竟是北朝鲜的最高领袖，事关两国国家之间的关系。要是金山的案子被金

日成直接捅到了毛泽东主席那里，最高领袖对最高领袖，毛泽东很可能说：「金日成同志，我同意你的处置，开除金山党籍，送他去见你们的地藏王。倒是您的秘书可以留下来，美丽的女子难免水性杨花的嘛。」

金山命在旦夕，这事还真不能迟误。周恩来把金日成的绝密电报收好。又感到自己也不宜出面去找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一听金山吃了豹子胆，偷鸡摸狗竟然摸到人家朝鲜领袖的床头去了，肯定不会宽容。此例一开，那还了得。周恩来明白，那一来就被动了，连个转圜的余地都没有了。

周恩来想到了孙维世。对啊，还是应当由孙维世出面去找毛泽东，去委委屈屈，哭哭鼻子，毛泽东会念及旧情，救她丈夫金山一命的。于是他同时做了两件事：一是给北朝鲜金日成回个绝密电报：金山事已悉，务请留人，稍候我中央意见；二是让夫人邓颖超立即乘车去接孙维世来，有事相商。总理专车驶往东城区的中央实验话剧院。副院长兼总导演的孙维世正在排练厅排戏，听到通知不知出了什么大事，因说一刻也不准耽搁，便匆匆忙上了车，才见干妈邓颖超已在车上等着：「妈！您都亲自来？有急事？」

邓颖超只是慈祥地笑着：「是爸爸找你有事，到底是什么事，我也不知道。他不说，我是不问的。你又导什么戏了？什么时候正式演出？」孙维世稍稍放心了。她最担心总理爸爸的身体，总是日夜忙碌，累到鼻子出血。正在排演的是她自己创作的大型话剧：《初升的太阳》，本想让丈夫金山主演，因金山参加慰问团去了朝鲜前线，一时半刻回不来，只好由别的演员担纲了。

专车很快返回中南海北门。因是总理座车，门卫举手行礼，车子往右拐进百十米，就到了西花厅门外。

周恩来已在一间小会客室里边审阅文件边等着。茶几上，礼仪性的摆着一大盘新下树的早熟苹果，另一盘子里则摆有一迭冒着热气的小毛巾。

邓颖超牵着女儿的手进来，说了声：「维维就交给你这当爸爸的了，你们谈吧。谈完了，一起吃晚饭吧。」

周恩来等夫人离开后，亲自起身去掩上门，又亲手给干女儿倒上

一杯热茶，才说：「维维，有件事，比较紧急，要争取时间，我们开门见山谈吧。但你要有思想准备，不要情绪化，好不好？」

孙维世明眸似水，睁得挺大：「爸爸！您别吓唬我，什么事？」

周恩来沉下脸说：「你不用怕，天塌下来有爸爸妈妈顶着。是金山在朝鲜出了点事，比较麻烦……。」

孙维世眼睛里泛起了泪光：「是他受伤了？」

周恩来苦笑着说：「比受伤还麻烦。他的事，涉及到我们和朝鲜的关系，两党两国的关系。所以不单是你我家里的私事……。」

孙维世一把抓住了爸爸的手：「爸！您就说嘛，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天哪，他出国前还是好好的，能出个什么事呀？」

周恩来轻轻松开了干女儿的手，从茶几上的白盘子里取下一块小毛巾，递了过去：「金山在金日成首相的官邸里犯了错误，据说是调戏了金首相的漂亮女秘书，金首相大怒，来电报告告诉我，要处置他，以维护北朝鲜的主权尊严。……但金山是我国赴朝慰问团成员，算我们派去的和平使者，怎么可以听任金首相去处置呢？不也事关我们国家和政府的主权尊严？还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尊严呢！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私事，是关系到两党两国间的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孙维世惊呆了，顿时泪流满面：「他个老色鬼！玩女人玩到外国去了……，爸爸！我怎么就这么命苦？这么倒霉？好不容易嫁了个男人，竟是嫁了个丢人丢到外国去的东西？」

周恩来神色严肃，再又递给干女儿一块小毛巾：「维维！现在不是骂人出气的时候，现在是救人要紧。要不，我怎么会请你妈妈亲自坐车去把你接回来？」

孙维世厉害地抽动着双肩，低下头去，哭泣着：「活该！等他吃了人家金首相的枪子儿，死在外国去好啦，还救他回来做什么？」

周恩来拧超双眉，瞪起了眼睛：「维维！此时此刻，你不能胡闹！第一，金山犯了错误，是很严重的错误，但仍然是我国公民，我们的话剧艺术家，怎么能任由外人去处置他？告诉你吧，金首相的电报上说，要把金山和女秘书一同处死；第二，我刚才已说过，对金山的处理，关系到我们党、我们政府、我们国家的颜面，关系到中国人民志

愿军的颜面，我们怎能见死不救？我们一定要救，把他救回来，按照我们的党纪国法来处理。这是个原则问题。维维，你知道，在原则问题上，爸爸是很少妥协的。」

孙维世抬起泪眼，悲愤中掺和进新的震惊：「金日成要处死他？那我服从组织，同意赶快救他。脑袋不是韭菜，割了……。但我能做什么？以金山妻子的名义，出面给金日成首相写信求请，求他饶下金山性命？让我顶着只绿帽，去救丈夫的性命。……」

周恩来嘴角动了动，口气缓和了下来：「维维，别说傻话，斗气话。一个革命者，个人生活往往要遭受各种委屈甚至羞辱的。但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是需要我们个人做出些牺牲的。你在入党宣誓时，不是保证为了党的事业，随时准备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宝贵的生命吗？现在的情况，正是组织上对你的一次新的考验。」

既已提到了组织考验的高度，孙维世作为一名革命烈士的遗孤，党一手培养的革命文艺战士，当然应该绝对服从：「爸，组织上要求我做什么，就只管吩咐好了。」

周恩来慈爱地抚着干女儿的手：「维维，这就对了，革命的后代，为组织分忧嘛。具体到金山这件事，不是要求你去写信给金日成首相，那起不了多大作用。我只是要求你出面去找一次主席。只要我们毛主席一开口，他金首相就是一千个不情愿，也不能不给个面子。说到底，他北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江山，还不是靠我几十万人民志愿军替他保下来，支撑着？」

说到去见毛泽东，孙维世却有些犹豫：「爸，我都有好几个月没有去见主席了。因为江青几次托人带话，要求跟我谈谈主席和我在莫斯科的事情，见她的鬼去，我一直没有理会她。她有胆量，直接去问主席好啦，她又没那个胆，真是柿子拣软的捏了。我主动退出来，跟金山结了婚，她还嫌不够？这个女人心肠可歹毒啦，你们中央领导人，至今还识不破她。……」

周恩来打断干女儿的话：「你和江青的那团麻纱，扯起来没个完，现在不扯好不好？眼前的急务，是救金山。你来我这里之前，我跟主

席通了电话，没有提金山的事，只说你有事，想去见他。他很高兴，说你几个月没去见他了，托中办给你送了几次春藕斋舞会的入场券，也没见你露面。他今晚上正好有空闲，他请你去吃晚饭，然后到春藕斋跳舞。」

孙维世有些迟疑地问：「蓝苹不在家？」

周恩来笑了笑：「她带着几名秀才，到西郊万寿路新六所讨论电影剧本去了，劲头很大。前些时我病的不行，她还在电话里和我大谈那剧本，叫什么《宋景诗》，写农民起义的。」

孙维世擦干泪水，眼睛放亮了：「好，我去。说起来，我也有对不起金山的地方。……去年十月，我也是让他顶着只绿帽，跟他结婚的。后来，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听说了主席和我在莫斯科如何如何的一些地下传闻，他玩世不恭地哈哈大笑：「好哇好哇，骑着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吧，金某说不定哪一时，也要弄个圣上身边的人儿来玩玩。」……没想到他真的就玩到金日成身边去了。」

周恩来正色道：「维维！你年纪也不小了，尽瞎说些什么？以后，不允许你在我这里说什么「绿帽」一类的话，俗气，典型的封建思想，封建意识，一点革命文艺战士的气味都没有。……好了，我叫车子送你过菊香书屋那边去。记住，救金山的事。」

送走孙维世，周恩来在西花厅前院站了好一会。他发觉自己越来越烦这位干女儿了。从前可没有这种感觉。曾经多么心疼她，惦挂她。自她一心高攀，跟主席有了那层关系，就开始轻看她了。绝不是忌妒，是轻看。

主席跟年轻女孩是很难认真的，她明明知道，却还要高攀。这孩子缺的是龚澎身上的那种典雅、高洁、脱俗。也难怪，书香世家的文化遗传，学是学不来的。维维沾染上的是文艺界又特别是影剧界常有的那种势利、俗气。

当晚十时，毛泽东从春藕斋舞厅休息室给周恩来电话：「恩来呀，金山的事，维维和我说了，我同情她，能晓大义，忍辱负重，这很不容易。我看这样吧，以你我二人的名义，给金日成同志发个急电，请他息怒，将金山押送我志愿军总部，再由志愿军总部派人押送回京，

我们一定从严处理，再把处理结果告诉他。在这同时，你也要给彭德怀他们打个招呼。先就这么办，可以吧？」

由于以毛泽东、周恩来两人的名义发出了电报，金日成虽然极不情愿，但终未敢下令处死金山。他只下令枪决了自己的那名国色天香又丧失了国格的女秘书。金山被押送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彭德怀很生气，骂道：「什么鸟皇亲国戚，搞腐败还不能在国内搞？骚包骚到人家国土上来，要是名普通官兵，早就毙掉了！」

随后，金山被送回到北京。在周恩来的一力周旋下，金山只是受到了党纪及行政处分：开除党籍，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其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等党内外职务，保留公职，留任青年艺术剧院导演，允予继续为繁荣新中国话剧事业效力。

朝鲜战争期间，另一桩令周恩来煞费苦心的事，跟美人儿龚澎有关。

自一九五一年八月起，中美双方同意在三十八度线上的开城板门店，坐下来进行停战谈判。中国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团团长为身兼中央调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军委副总参谋长三要职的情报老手李克农，首席谈判代表却是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在北京，则由毛泽东指示大的原则，周恩来掌控谈判的一切细节。乔冠华出面与美方代表的发言稿，均由周恩来审核批准，再以绝密电报发回朝鲜开城。谈判过程中，常常令美方代表尴尬的是：乔冠华精通英文，美方代表却不懂中文。乔冠华无须翻译，即已完全明白美方代表的发言，而以中文直接回答。美方的华语译员却常常不能将乔冠华的中文发言准确地翻译出来，乔冠华便不时地以他纯正流畅的英文给予纠正。美方代表一度提出：乔先生您的英文这么出色，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英文这一大家通用的国际语言来直接谈判呢？乔冠华回答：「尊敬的代表先生，那是不可以的，语言是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表征之一。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代表，怎么能够不以自己的语言跟别人谈判呢？我还可以荣幸地告诉您，我们中国语言已有超过五千年的历史。英文在这方面应当算是晚辈了。我们还可以很容易的计算出来，在我们这颗星球上，使用中文的人数，绝对数倍于使用英文的人数。尽管就我本人来说，

几乎每天都要阅读英文报刊，还有文艺小说。」

乔冠华在开城谈判桌上纵横捭阖，谈笑自如，才华横溢，令到美方谈判代表都朝他出示过大拇指，表示由衷的赞许；他的夫人龚澎在北京的生活却出现了麻烦。

那是一次中央人民政府召开的、讨论有关朝鲜停战谈判局势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又见到了前来列席会议的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龚澎。龚澎衣着朴素，依然仪态万方，秀丽迷人。毛泽东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又动了请龚澎做他的私人英文教员的念头。

毛泽东欲见某位女子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让机要秘书去交代中央办公厅，送春藕斋的舞票或是怀仁堂的戏票给谁谁谁。大都为三军文工团的那些漂亮妞儿。能够进中南海跳舞、观剧，陪伴的又竟然是伟大领袖，自然是喜从天降，皇恩浩荡了。龚澎接到了几次这种「不准转让」的舞票、戏票，却都给中办的办事员回了电话，称南乔出了国，孩子年纪小，公务家务都忙，分不开身。

毛泽东也像凡人一样，越是到不了手的事物，越是急欲到手。可他又毕竟身为「人民领袖」，不是过去的封建皇上，有的事情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不可以为所欲为的。何况以毛泽东的性情，在男女情事上，从来主张「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半点勉强不来的。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就是这个道理。他也只好再次通过组织途径，向外交部要人。这次他没让中办主任杨尚昆出面。杨尚昆办事面面俱到，动辄顾及大局，四平八稳，有些油了。他十分信任自己的年轻秘书田家英。田家英对他以师长相尊，唯命是从。他让田家英出面，去直接找外交部长周恩来谈，借调龚澎做兼职英文教员，每天一小时，由毛从自己的著作稿费中付薪酬，并派车接送。

田家英已升任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受命来到西花厅。在后院小会客室，周恩来亲切接待田家英。凡是菊香书屋的工作人员，上至陈伯达、师哲、胡乔木、田家英四大秘书，下至医生、护士、卫士们，周恩来都十分敬重，态度谦和。他尤其喜爱田家英这位小他二十四岁的青年干部，为人正派，又有学问，又有头脑，毛泽东主席的许多重

要讲话都出自他的手笔。当田家英说明来意，周恩来略略有些吃惊：「这是第二回提出借用龚澎了。记得去年是尚昆同志来提过。后来尚昆同意了我的意见，主席的私人英语教员，还是找位男青年为好……不是有了一位男青年任他的英文教员兼秘书了吗？怎么又忽然记起龚澎来了？」

田家英恭敬地说：「主席也的确有他令我们这些菊香书屋的工作人员心疼的地方。他和江青貌合神离已不是一两年了。但又要顾及党内外影响，不好休了再娶。长子岸英牺牲后，他更是内心里感到寂寞，甚至可以称为凄凉。他多次私下里对我说：「家英啊，一个儿子死了、一个儿子疯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入朝参战是我力主的，报应到了我身上。……我心里缺了块东西啊！」每次听到他这番内心独白的话，我都忍不住想掉泪。」

周恩来神情寂然，过了一会，才问：「家英，借龚澎这事，你看怎么办？」

田家英想了想，说：「从主席的角度来说，恕我大胆妄言，倒是真希望他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给他些精神的藉慰……。但龚澎却是不合适。」

周恩来点着头，感激地看着田家英，对自己这么信赖和坦诚：「是啊，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这在中央领导人中，是绝无仅有的。特别是长子岸英在朝鲜被炸死，可以说是主席个人生活中最大的不幸。所以，他有时发脾气、骂人，大家也都让着他，不计较。毕竟，他对革命的贡献最大，丰功伟绩，无人企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一九四九年的全面胜利，不会这么快就到来。这是个大道理，大前提。照说，我们服从毛主席，替他做任何事，都是应该的。可是呢，具体到某某人，某某事，就又感到很为难，很棘手。当然，不是说龚澎去做了做私人英语教员，就一定会有什么事。……她毕竟是位有夫之妇。你说，南乔作为我国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正在朝鲜开城跟美方代表唇枪舌战，斗智斗勇，我们更应当确保的家室安静。何况他们的两个孩子年岁太小，龚澎下了班不往家里跑，还要去兼做第二份工作？这事，真是棘手又棘手呢。」

田家英品着茶，静静地聆听着。总理谈论麻烦问题，常常会连续绕几道弯，绕出去老远，才又回到主旨上来。……田家英说：「主席是诗人气质，豪放、浪漫、温情、细腻、粗犷、温和、严厉……融于一身，他平日喜欢和年轻女孩子在一起，倒也不必求全责备。告诉总理一个事吧，但不能传出去，我会掉脑袋的。前些时，不知什么人，引荐一位老道士来见主席，听说做过白云观的老道长，来大谈《黄帝真经》、《素女经》、《闺房秘籍》等等，说黄帝长寿一千二百多岁，就是因为有一位叫彭祖的，传授皇帝以采补术，每夜驭童女十名。……主席听得很入迷。第二天就让到文津街对面的北京图书馆内库里，去找上述古籍来读。」

周恩来双眉紧拧，沉沉地叹了口气，才说：「家英，这话到此为止。以后道士尼姑之类，绝不允许进中南海。邪门歪道，妖言惑众。当然重要的宗教界统战人士除外。你看，龚澎这事，主席那边又催得急，我们该怎么回复呢？你能不能帮我出个主意？」

田家英笑望了总理一眼，抿紧了嘴唇，心想：生姜是老的辣哩！总理明明自己有了主意，却要我来替他说出来呢。说就说吧，反正总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出卖我这个后生晚辈的：「为了顾全大局，也是为了南乔夫妇。……总理可不可以在这几天，把龚澎同志调到朝鲜开城，协助我国和谈代表团工作？那里不正有大量的英文资料和中文资料，等着英翻中或是中翻英？龚澎同志英文能力强，好钢不正好用到刀刃上？」

周恩来一听，眉头舒展开来。的确，他自己心里也早就这么想的。如今话由田家英说出来，他不禁喜上心头，紧握住田家英的手说：「家英，如果我没有记错，你正好跟岸英同年，都是一九二二年出生。我痴长你二十四岁啊，主席更是长你二十九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再干个十几二十年，我们一辈就该退休了，休息了，你们一辈接我们的班，可以放心了。谢谢你，谢谢你给我出了这么个好主意。就这么办吧，你回去替我向主席汇报，就说是我说的，本来派外交部新闻司龚澎同志做主席的兼职英语教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相信龚澎同志本人也是很乐意的。但外交部上星期已知会了北朝鲜驻京使馆，我们

将立即派龚澎同志（乔冠华夫人）赴朝鲜开城，协助我和谈代表团工作。我代表团积压了大批英文资料急待翻译成中文。因为已经知会了朝鲜方面，外交部不宜收回成命。龚澎本人亦已作好了准备，不日即离京赴朝。……」

说来有趣，周恩来亦曾经力图保护干女儿孙维世。怎奈干女儿不甘寂寞，或者说是禁不住诱惑，自己要往上凑，你想保护她，她都不让你保护。话就放在这里吧，只要江青不死，或是不被毛泽东同志休掉，总有一天，孙维世要吃亏的。究竟吃多大的亏，当然一时难以说准。维维有句话算说对了，绝不可小看江青这女人。

龚澎不同，在公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员，在私是一位贤妻良母。因之在保护龚澎不让毛泽东同志染指一事上，周恩来不动声色，不遗余力，像他在国共谈判及外交谈判上那样，表现出来的一种不屈不挠的韧劲。

第四十章 高岗进京播火种

朝鲜战局边谈边打，中、美双方军队在三十八度线上呈胶着状态。北方的金日成和南方的李承晚，都是借用了外力，才保住了各自的半壁江山。

一九五二年秋季，毛泽东下令调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回北京，入住中南海永福堂，专职中央人民政府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怀曾向毛泽东提出返回西北局工作，他念念不忘自己那份大西北开发计划书。毛泽东笑问：「老彭，在北京住不惯？是不是嫌官小了啊？以后还可以加官晋爵嘛。」彭德怀被问得脸红脖子粗：「老毛，我受不起你这个玩笑。我老彭自拉队伍上井冈山，二十几年来什么时候向党伸手要过名，要过位？」毛泽东仍是笑呵呵的：「那就好，那就好，功高不震主，主就是党中央。还是留在北京，大家一个锅子里舀饭吃罗。」

彭德怀有个明显感觉，自毛岸英牺牲、朝鲜战局稳定下来之后，毛泽东对他已经没有了一九五〇年十月上旬请他挂帅出征时的那股亲热劲了。

那时每次谈话，毛泽东都要拉住他的手，真要比亲兄长还亲。现在又恢复到了四七年陕北转战之后的那种疏离感，又开始对他敬而远之，不亲不痛了。

安顿了彭德怀，毛泽东开始了自己的「削藩」行动。他亲自拟定名单，调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西南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小平、中南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子恢、华东军政委员会书记饶漱石、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习仲勋等人进京，充实中央领导班子。毛泽东并提名高岗为首席，组成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与周恩来任总理的政务院平行，为中央人民政府属下的两大执行机构。顾名思义，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专司财政经济，因之又被称为「经济内阁」，委员则包括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李先念等中共最重要的负责人。董必武老人说：「今年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都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千里驹罗。」由于名单是毛

泽东亲自拟定，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均不便提出不同意见，政治局会议上也就无异议通过。事实也一再说明了，毛泽东的权力已不受任何制约。

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尊，出任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正式处在了与周恩来平起平坐的地位，并有了一种凌驾、取代周恩来的态势。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刘少奇二人所采取的一项重大的分权行动。高岗的权力炙手可热。政治局会议通过高岗新职任命那天，毛泽东特意请全体政治局成员在颐年堂门口照相留念。刘少奇很识趣，自觉地将高岗让到了毛泽东身边。高岗倒是谦虚了一下：「少奇同志不可以的，主席身边是你，位置早已确定。」毛泽东却说：「什么确定不确定？你就站到我身边来嘛，少奇也可以站到你身边去，大家轮换轮换嘛。」

此后，中央日常工作采行刘少奇、周恩来、高岗三人轮值制，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可是此一来，也就造成了中央政府领导体制的混乱，政务院与国家经委分工不明，职能重迭，陈云、邓小平、邓子恢、薄一波、李富春等人更是两边挂职，权责含混。高岗虽然才干出众，能力超群，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为百万志愿军办后勤，处理大小问题果断坚决，立下了仅次于彭德怀的大功劳；但他并无中央工作经验，也无自己在北京的工作班底，更来不及营建起他个人在中央机关的人际关系。周恩来则不同，早在主持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期间，便广罗人才，广结善缘，经营起了自己的「影子内阁」。周恩来二、三十年来所刻意提拔、栽培起来的中高级干部，如今遍布中央机关各个部、委、办、厅、局，包括备受毛泽东器重的陈云、邓小平、薄一波、李富春、习仲勋、邓子恢等人，都十分敬重周恩来，遇事愿意找周恩来讨教、相商。周恩来虽在新成立的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内无一名分，却仍然实际掌握着中央政府的财经大权。高岗虽有名分，但他名下的国家经委却是个空架子，有待他去奋斗，去充实，以期不负毛泽东主席的厚望，早日把中央政府的财政经济大权从周恩来手中拿过来。

毛泽东之所以要在中央政府的权力架构上动这项大手术，是出于对刘少奇、周恩来二人权力日益稳固和扩展的担忧。刘少奇在党内分

管组织人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中央人民政府里也处于第一副主席的高位，并具体指导农村工作；周恩来则在国家行政系统总揽一切，包罗万象。刘、周二人合作密切，事事默契，大有一种欲把他毛泽东奉为神明，尊为圣人，而实际上权力架空了的趋势。以毛泽东的精明锐利，雄才伟略，他怎么能够容忍被人权力架空，变成一位只有荣誉没有内容的「开明国君」？那他不就成为日皇、泰皇、英国女皇一类人物了？

说起来，还是去年七月五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藕斋对中央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们的讲话——〈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中央马列学院第一班的学员皆为各个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刘少奇这篇讲话的标题，就很不自重地把自己摆到了党的最高领袖位置上。

外国有个马克思，中国有个刘克思啊，他是不是在为自己日后登基做理论准备啊？再看看他这篇讲话所提出的几个主要论点吧：一、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过渡所需要的时间将是相当漫长的，大约在十五年到三十年之间；二、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埋头苦干，责无旁贷，把我国建设成为工业化强国；三、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集体、私营、合营、个体应各得其所，都得到发展。只有在全面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前提下，逐步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才能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四、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及必要的军事工业。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才能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并积累资金去发展重工业；五、反对过早地动尧削弱甚至否定私有制，反对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搞建设性急不得，不可能一晚上吃成个大胖子，那只会得浮肿病。如过早实行社会主义，势必会在城市和乡村触动私有制。中国产业落后，过早实施国有化，只会伤害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对发展生产大不利。在农村，不顾条件去推行集体化，搞苏式集体农庄，动摇

私有经济，是太岁头上动土，你去动一下，结果农民认为你是搞共产，就把猪牛羊都杀掉吃掉，私有树木也砍掉用掉，只会对农村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六、只有稳妥地渡过了新民主主义阶段（需要二、三十年时间），工业发展了，农业发展了，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家经济主体的目标实现了，我们的经济企业管理干部也成长起来并日渐成熟了，各行的技术专家也大批培养出来了，工农联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巩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定并提高了，那时，我们才能真正地实行社会主义的步骤。

刘少奇的春藕斋讲话，无疑给新中国勾勒下了一幅脚踏实地、切实可行的发展蓝图，或可称为国家经济建设大纲。他之一再提出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长达二十年至三十年的时间，是因为党内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出现了一股急欲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左倾急躁情绪，不少人包括毛泽东在内，以为只要改变了生产关系，就能大幅度发展生产力，实现一次新的「解放」。刘少奇要给党内的这股左倾急躁情绪浇浇冷水，降降温，促其头脑清醒。难怪他要把这次讲话的题目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了。他在讲话中也顺带批评了山西省委范若愚等人盲目发展农林合作社的左倾做法，批评了东北地区限制富农经济、推行苏式农业集体化等激进政策。

马列学院第一班的大多数学员听了刘少奇的讲话后，觉得党中央对国家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是冷静、客观的，对防止党内的左倾幼稚病是及时和必要的。唯有受到刘少奇批评的山西省委和东北地区的负责人不服气，到毛泽东面前去告状、诉委屈，询问刘少奇同志的讲话是不是政治局讨论过的，是不是代表了党中央的指导方针，照刘少奇同志的说法，我们现在四、五十岁的一代人，是搞不上社会主义了？而资本主义一路搞下去，我们有什么前途？革命不是白干了？二、三十年后，农村不又成了新富农、新地主的天下？城市不又成了新老资本家和私营资本主义的天下？

正好，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编印的「简报」上读到了刘少奇讲话的纪录稿，也窝着一肚子火气，无由发作。刘少奇越权越位，大谈共产党的历史任务来了，俨然一副国家建设方针的总设计者、指导者的架

式！但在省市党组负责人面前，毛泽东又不得不维护中央的团结统一形象，不便直接点刘少奇的名，而只是说：「你们有什么想法和冤屈，就在我面前说出来嘛，我还总算是挂名的党主席和中央政府主席嘛！是的，我们有的同志的某些提法，你们思想不通，我也思想不通哦。不要紧，你们回去报个材料来，我来写个批示，以中央文件转发全党，以正视听，某些同志的讲话就泄了气，烟消云散罗。」

在如何对待私有制经济，如何对待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确存在着深刻的分歧。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从一九四八年三月中央机关抵达河北西柏坡，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对于新的国家如何进行和平建设，他心中无数，一片模糊。以致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访问莫斯科，被史达林问及中国需要苏联援建哪些项目时，他竟一问三不知，整个一个糊涂虫。他的长项在于指挥战争和进行权争。

有关新中国的建设大计，他只好任由刘少奇、周恩来们去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对于刘、周二位的治国能力，毛泽东也常常自叹不如。在中央的一系列会议上，他是赞同过刘少奇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施政大纲，并亲口许诺过可以实行二十年至三十年的新民主主义再转入社会主义。但仔细阅读了刘少奇的春藕斋讲话，他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并觉得问题非常严重：自己很快就年届花甲，照刘少奇的提法搞个二、三十年，不就跟社会主义无缘了？到马克思那里去见社会主义？刘少奇口口声声要保护、发展私有经济，先发展资本主义，后实行社会主义，我们的革命不等于白干了？

不行！全党干部不会答应，工人、贫苦农民不会答应。高兴的只会是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工商业者、富农和富裕中农，以及从属于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是个大原则问题，不能依了刘少奇。必须加速城、乡的社会主义改造，加速改革生产关系；必须由自己来主导国家的经济发展大计，而不是由刘少奇、周恩来们来合作无间，事事默契。

九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春藕斋舞厅休息室，毛泽东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找来，当着众多工作人员和文工团女演员的面，质问刘少

奇：「少奇同志，你七月五日在这里，是不是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叫做什么〈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好大的题目！」

刘少奇不知所以，连忙说：「是有一个讲话，对象是中央马列学院第一班的学员。我只是提出一些当前值得注意的问题，给大家思考，抛砖引玉罗。」

毛泽东瞪圆了眼睛、涨红了脸说：「好个抛砖引玉！你的那个讲话我拜读了，通篇不谈政治路线，不谈阶级斗争，不谈人民民主专政，光谈保护、发展私有经济，你这是是个什么样的历史任务？你是错误的！不是部分错误，而是完全的错误，百分之百！」

周恩来一见毛泽东要大发脾气了，连忙招呼休息室内的工作人员和女演员们都退出去，并去掩上房门。

毛泽东说：「恩来，你不用关上房门！我的话，为什么怕人听到？少奇以中央名义，提出新民主主义阶段要搞二、三十年，也就是要搞二、三十年的资本主义，新中国还有什么希望？我们这一代革命家还有什么希望？我们要进了棺材，做了鬼神，才见得到中国的社会主义？」

面对毛泽东的盛怒，刘少奇蒙受了委屈，不得不作出辩解：「主席，请不要动气，不要动气。我们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嘛！第一，我七月五日的讲话提纲，事先在中央书记处碰头会上交换过意见，主席、总司令、总理都在场，都是同意了；第二，关于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需时二、三十年，是在西柏坡政治局会议上，主席亲口说过的，有会议原始纪录做证嘛；第三，我讲的新民主主义新阶段，并没有什么创造发明，完全是阐述了主席的著作《论新民主主义》。……」

毛泽东在道理上说不过刘少奇。刘少奇从来逻辑思维很强，理论上也很有一套。毛泽东只能以气势压倒刘少奇。他粗暴地打断了刘少奇的辩解：「你住嘴！我不要听你的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你是中国的刘克思，你可以讲出第一百条理由和一千个依据来！我只问你，你要在新中国实行二、三十年时间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什么意思？你加入共产党闹革命，是为了什么？你到底还剩下有多少党性？我告诉你，山西省委的同志，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同志对你意见大得很！你以

为你翅膀硬了，羽翼已丰，可以以党中央代言人的资格讲话了？你做梦！你妄想！我毛泽东还没有死！」

刘少奇遭此飞来横祸，有口难辩，只有眼含泪水默不作声的份了。周恩来在一旁急得团团转，一会劝主席息怒，有话慢慢说，对少奇同志可以慢慢批评，不要伤了身体；一会劝少奇同志不要太过委屈，主席有丧子之痛，容易发火，我们大家要体谅他吧，我们只有一位主席哪。

毛泽东在怒斥了一通刘少奇之后，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恩来！你和他嘀嘀咕咕些什么？我告诉你，我不要看到你们哼哈二将，一唱一和，想架空我！你们去读读〈朋党论〉吧！」

毛泽东是失态和失控了。周恩来虽然自身也受到了斥责但仍能委曲求全，替毛泽东主席找到了台阶：「主席，不能这么吵下去了，我有个提议，由少奇同志收回他的讲话，党内不再印发、传达，并在适当范围内做个说明，消除一下影响。另外，少奇同志也确是一片好心，辛辛苦苦，他头发都花白了，为的是党的事业和国家建设。……」

毛泽东说：「头发花白是肾虚！婆娘太年轻了。……」说着又自己忍不住，转而笑了。

休息室内，激烈的争吵声停息下来。

休息室外舞厅里，乐队仍然在演奏着一支支舞曲。一对一对老少配舞伴，仍在翩翩起舞，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只有坐在舞厅靠近门口长沙发上的王光美，眼含泪花，胆战心惊，不知丈夫少奇犯了什么大错，被毛主席这样当众喝骂羞辱。她没有走避。她要等着少奇出来，一起回家。她和少奇虽然年龄上相差了二十几岁，但恩爱深重。她新近又有了身孕，跳舞时也要有所担心。

江青满面春风，跟周恩来的一位男秘书跳完一支曲子，便朝王光美走来。不知为什么，江青此刻显得很得意，也很友爱。她在王光美的身旁坐下，递上一张纸巾：「光美，你真是太年轻了，掉什么泪哟！快擦擦脸，叫人看了影响不好。我家老板那个脾气，你和少奇同志又不是不知道，生气骂起人来，从不给人面子的。他斥骂我，要比这还凶得多哟。我是家常便饭，不惯也惯了。其实，平日在菊香书屋，在

家人和工作人员面前，老板可没少夸少奇同志啦！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这话，老板都不知道当着多少人，说过多少遍。……」

对于江青，王光美从来又敬又畏。她拉住江青的手，说：「谢谢，谢谢你做大姐的体谅人，关心人，帮助人。我还能盼什么呢？只盼他们男同志能和衷共济，少奇能在主席领导下，为党的事业多做工作，少犯错误，尽量不要惹主席生气。」

江青忽然头一昂，不以为然地说：「光美，你年轻，没有经过延安整风，没有参加过革命战争。其实老板是很少对自己的同事发脾气的。要他发脾气，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才动了无产阶级领袖的雷霆之怒。老板这人，从来讲原则，小事马虎，大事决不糊涂。……」

正说着，周恩来和刘少奇，一左一右，陪伴着毛泽东从休息室出来了。因毛泽东刚发过火，女文工团团员们也就不敢像往常那样簇拥过来。王光美懂事地先看了江青一眼，随即风姿绰约地迎了上去，小鸟依人地向毛泽东伸出玉臂：「主席，我，能不能伴您跳一支曲子？」

毛泽东眼神有些发直地望着王光美，声音却先柔和下来：「光美啊，你今晚上好漂亮啊！谢谢你，谢谢你的邀请。可是对不起，刚发了顿脾气，有些累，要回去休息。改日我再请你跳吧。和你跳探戈，是一种高贵的享受呢。」

周恩来、刘少奇、王光美一路送毛泽东和江青出了春藕斋，看着毛、江上了车，才各自打道回府。今晚上谁都没有了舞兴。

周恩来独自走在万字廊上，步伐很快。廊下满池残荷，在秋风中飒飒作响。只有警卫员在他身后不远处跟着。他忽然停下，做了个深呼吸，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龚澎啊，我让你尽量避开春藕斋这些地方，是很对的吧？便是我自己，今后也要尽量少来。能不来，一定不来。」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高岗离开沈阳，赴京上任。毛泽东为此专门向全党全军颁发了一个文件，任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为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并继续兼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此后，在中直机关，人们对于刘少奇、周恩来，仍依习惯称为「刘副主席」、「周副主席」或是周总理，唯对

于高岗，则像尊称毛泽东一样，尊为「高主席」。一时中央有了两位主席，一为毛主席，一为高主席。

毛泽东一度欲让高岗住进中南海，与自己做邻居。高岗却仍要住在原选定的宅院：东交民巷八号，一座拥有假山亭榭莲池的旧式王府里。高岗鬼聪明，生活上他要独来独往，自成一体。住进中南海，唯一的好处是天天接近毛泽东，可私人生活上却要受到许多约束。住在单门独院的旧式王府里，他可以尽情享用东北来的特产如熊掌、雪蛤、鹿茸鹿鞭、野山参等大补之物，还有他从东北带来的小情妇、小战士等。他的权欲和性欲同等旺盛。他还可以在家里举办舞会，大宴小宴，联络各路诸侯。高岗年轻力壮，爱好广泛，酒、色、财、气，丰富多彩。他曾跟他的一位心腹吹牛：在东北哈尔滨，他一夜干过五名白俄女子，妙不可言。他每人送了一百大洋。那五名女子后来都很依恋他。他有长白山老道士传授给他的金枪不倒之术，长寿百岁之方。

高岗到中南海菊香书屋向毛泽东主席报到的那天，两人进行了愉快的交谈。

毛泽东说，前年柳亚子先生给我写过一首七律，头两句是：「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他把我比做刘邦。我怎么会是刘邦？你高岗也不是韩信，不是萧何，不是张良，不是周勃……你是我的「东北王」。这下子好了，有你「东北王」进京主事，我在菊香书屋睡得安稳了。」

高岗明知就里，却仍要试探地问：「中南海里有少奇同志、恩来总理，一个管党，一个主政，还不都是主席一手提拔重用的？」

毛泽东说：「实话告诉你吧！我指示新成立的这个和政务院平级的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派你当主席，其余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邓子恢、李富春、薄一波等人都在你之下当委员，就是为了制衡少奇、恩来二位的！注意，我是要让你们三足鼎立，相辅相成，不是天下纷争。你对他们有什么意见、看法，可以直接找他们本人谈，谈不通，再找我嘛。你要放手工作，排除干扰，学会在中央机关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建立起自己的人事关系、工作班子。你也可以提点具体要求，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你的忙？」

高岗见毛主席对自己这样交心交底，自是感激涕零：「主席，我过去在陕甘宁是你的保镖，现在到了北京，更是你的卫士，我发誓为你粉身碎骨，肝脑涂地！」

毛泽东面带不悦：「你我是老同志、老同事了，不要讲这些江湖上的话好不好？你忠于党主席，就是忠于党中央，一回事嘛。你新官上任，有无困难？」

高岗倒是心里早有谋略，此时仍然显出迟疑的样子：「主席，我在北京，在中央，尤其在国家经计委，是光杆司令一个。没有组织人事上的帮手，不大好开展工作。」

毛泽东点点头：「你可以从东北带几个人来嘛。不要带得太多，用干部，还是要搞五湖四海。……你说的组织人事上的帮手，只是这个意思？」

见毛泽东问到要害处，高岗倒是有所迟疑了，毕竟，这是个最敏感、最易闹下误会的问题。但权衡利弊，他先来了个半吞半吐：「主席，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不知该不该说出来，给主席做个参考？」

毛泽东见高岗畏首畏尾、瞻前顾后的样子，倒是笑了。他递给高岗一支烟，自己也口含一支。高岗连忙燃起打火机，替毛主席点燃了。毛泽东深深吸上一口，说：「你个高大麻子，陕北汉子，什么时候学得跟我要起心计来了？有话说，有屁放嘛！」

高岗两眼放光，脸膛泛红，明白毛泽东主席是一直喜欢和信赖着自己的：「其实呀，我也是为主席着想。……我是说，党中央进京后，一直缺个组织部部长。在延安是陈云同志，四五年冬他去东北局，后来就一直没再管过中组部的事。这个职务，实际上是由少奇同志兼着。我觉得少奇同志管组织，有时手伸得很长。比如三年前，他要派他老华北局的干部安子文到东北局去当组织部部长，这不是要往我的窝里插一刀子？对不起，被我顶了回去。安子文什么角色？他一九三六年怎么从北平军人反省院出来的？历史上都有疑点嘛。好家伙，在少奇同志重用下，如今安子文当上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名字还挺靠前面，这算怎样回事？组织工作大权，一定要掌握在忠于主席、忠于主席思想路线的人手里。」

也只有高岗能在毛泽东面前议论党的高级干部。换了别的人，早受到毛泽东的严厉训斥了。毛泽东吸着烟，对高岗所发表的高见，没予肯定，也没予否定，只是问：「有话摆明了说，你高岗是不是想推荐一个什么人来作中央组织部长？」

高岗说：「我只想给主席提个参考意见。」

毛泽东有些不耐烦了：「你提谁？提得对，我就依了你嘛。」

高岗只好直说了：「我提饶漱石同志。」

毛泽东盯住高岗问：「饶漱石？他也是老华北局的人啊！抗战时候去了新四军，倒是有些组织才能。他可是少奇同志的老下属。四一年少奇回延安参加中央工作，还是少奇推荐，由饶漱石接替，任新四军政委的。后来新四军发展成为华东野战军，饶任政委。成立华东局，饶任第一书记，就是跟司令员陈毅合作得不大愉快，是他整陈毅。陈毅在江西苏区时期跟着秦邦宪、洛甫、恩来他们跑，反我反得很厉害。但陈的好处是为人直爽，搞阳谋不搞阴谋，事情都是明摆着的，后来认错也很痛快、彻底。……你为什么还要向我推荐一位少奇同志的老部下？」

高岗身子朝毛泽东靠了靠，放低了声音说：「饶去过东北，我去过上海，我们之间有过几次深谈。饶对刘很反感，有很深刻的认识。他说刘在新四军里，每逢日寇进剿，就胆小如鼠，怕得要命，只顾安排自己撤退、逃命，根本不敢上前线指挥战斗。刘还动手打老婆，那个老婆叫王前，后来神经出了毛病……还有，饶说刘长期搞地下工作，关系很复杂，很多事情都不清不楚。胜利后，他使用的人，大部分是地下党干部，有的人可能有过变节行为，是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叛徒。……饶对我说，有机会给主席私下里反映反映吧，刘管什么都可以，就是不应当让他管党的组织人事工作。」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直到高岗推心置腹地把话说完，才又递给一支烟，自己也含上一支。高岗又连忙替毛主席点上火。毛泽东深深地吸上两口，说：「这烟是萧劲光托人从云南带来的，称为云烟，比大中华还上劲吧？回头你取走两条。……你刚才讲的这番话，就到这里为止吧。对少奇同志的水平和能力，你和饶都缺乏认识。他目前的地位，

是党的七大确立下来的，是历史的产物哪。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闹着玩的。京官不好做哪，你嘴巴上要派个站岗的才好。……许多人，许多事，留在肃反审干的时候再看吧！你的东北局里，有不有什么人，适合到中组部来工作的？」

高岗心里涌起一阵热浪：「有，当然有，现在东北局的组织部部长郭峰，人年轻，正派，苦出身，对党忠诚，如主席批准，我提议他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完全可以制约安子文。」

毛泽东点点头，停了一会，才说：「噢，你个高大麻子，原来心中早有一盘棋，越来越能干了罗。」

高岗崇敬地望着毛泽东，胸膛一拍说：「我高某，陕北大老粗一个，还不是靠了主席十几二十年的教导、栽培，一点一点上来的。」

毛泽东心情甚好，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我记得你老家是绥德吧？米脂出美女，绥德出汉子嘛。」

高岗不知毛主席为什么忽然要说起这个：「我老家是横山县，和绥德、米脂一个专区。我们老家的汉子都很粗壮，会打腰鼓。」

毛泽东说：「知道知道，延安住了近十二年，安塞腰鼓、横山腰鼓，都很有名的。……我的老乡彭德怀和你一样，也常称自己为老粗。我看你们各有心计，老粗不粗。……可以，中央组织部部长人选，我初步同意你的提议，调华东局饶漱石。东北局的郭峰也调来。但现在暂时保密，不要说出去。这回，我对你高大麻子，言听计从了，如何？」

高岗兴奋地站立起来，双足一并，举手向毛泽东行了个军礼：主席！我想敬你一杯酒！有了你的关怀爱护，我一定好好在中央做出成绩，替你争气。

毛泽东啁啁笑了：你如今是中央的大文官了，不是你东北军区的司令员兼政委了。噢，那军职你还兼着，你也是党、政、军一把抓罗。要敬我酒？你何不明白提出来要我留你吃饭？用我的酒来敬我，很好很好，有经济头脑。对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什么东北特产了。我们是革命同志，君子之交淡如水。我的保健医生里有位老中医，他讲我身上火气重，不能食用熊掌、鹿茸、鹿鞭、野山参之类，只有雪蛤性凉，尚可。我是个南方农民，从来只信五谷杂粮养人，辣子腊肉

下饭，红烧肥猪肉补脑子，江青就不肯相信这个，吃饭也吃不到一起。

高岗也哈哈笑着。他跟毛泽东讲起了他如何认识了长白山中的一位老道士，老道士如何向他传授健身长寿之术等等。毛泽东听得兴味盎然。他从来偏好「杂家」、「杂书」，认为里头有大学问。当然，高岗不敢在毛泽东面前吹嘘他在东北眠花卧柳、一夜干了五名白俄女子之类的风流逸事。他内心里确认，他比所有的中央领导人物都活得快乐、自在，懂得享受生活。什么刘少奇、周恩来，比起他来，都是些清教徒、苦行僧而已，或者说只是些嘴上说一套、心里想一套的伪善者而已。高岗倒是觉得，自己跟毛主席的气质比较相近。果然，接下来毛泽东就向他问起，辽宁的大连、黑龙江的牡丹江地方，是不是出美女？东北女子的性情，是不是比关内的温厚？